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上册

沈志华/主编

★ 具有93年历史、执政达74年的超级大党一瞬间瓦解了!

★ 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半世纪的超级大国神话般消失了!

★ 悠久与短暂,强盛与虚弱,历史的变换究竟说明了什么?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 十月革命：俄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折

★ 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危机与国家功能转化

★ 新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

★ 特权阶层：苏联“等级官员名册”制度的形成

★ 干部住房演变：住房公社—独户住宅—“贵族别墅”

★ 由对抗到承认：1917～1933年的俄美关系

★ 大清洗——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 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



上架建议：历史



ISBN 978-7-5097-0926-9
定价：148.00元（共三册）

www.ssap.com.cn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上册

沈志华/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中、下册）/沈志华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097－0926－9

Ⅰ.一… Ⅱ.沈… Ⅲ.苏联－历史－研究
Ⅳ.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7879号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中、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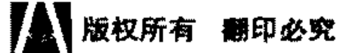
主　　编／沈志华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59367077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宋月华
责任编辑／周志宽　杨　群
责任校对／单远举　仪莉霞　冯振华
责任印制／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010）59367028
排　　版／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77.25
字　　数／1246千字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0926－9
定　　价／148.00元（共三册）



目　　录

上　　册

中 册

下 册

绪论

写一部实证性专题苏联史

课题组负责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有关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实证性专题研究著作，由24名中国学者合力完成，书中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共28个专题，总计约130万字。

苏联的历史，就是体现为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道路的历史。20世纪开始不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许多东方国家带来了希望和振奋，他们似乎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然而，到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竟画上了句号！像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93年历史，拥有1900万党员，执掌国家政权达74年之久的超级大党，像苏联这样一个占有世界版图1/6的领土，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拥有一批"社会主义大家庭"卫星国成员，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超级大国，竟然神话般地消失了！悠久与短暂，强盛与虚弱，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立之久远，毁于一旦，社会主义大厦结构建之宏伟，隳于朽败，历史要向人们说明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但又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尤其如此。

苏联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中，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的影响时间最长，力度也最大。从孙中山1921年提出"以俄为师"到毛泽东1953年号召在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几十年来，中国人就是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

是中国的榜样。人们曾经如此地向往苏联，模仿苏联，以至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中国人关注苏联，学习苏联，是有理由的。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讲，还是从历史传统和经济结构上讲，俄国都是一个半欧洲、半亚洲型国家。特别是16世纪下半叶的立沃尼亚战争以后，俄国失去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而不得不全力转向东方和南方。列宁认为，俄国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洲式的"。[①] 而整个说来，列宁反对把"封建"这一描绘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关系的术语应用到俄国的做法，他认为用这类词汇来描写中世纪的俄国是很不合适的。[②] 根据列宁的看法，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③] 恩格斯也认为，俄国"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欧洲的中国"。[④] 因此，俄国显然可以列入东方社会的范畴，而正是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状态的这些特性，中国人很早就相信，俄国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是值得效仿的。

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久，俄国人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壮大的新的方式，开创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这就是革命的方式，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理论上，是马克思最早提出了以革命的方式摧毁旧社会的命题，指出了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但实践这一理论的却是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产阶级的种种革命的和改良的方式大体完成对传统农业改造而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许多东方国家开始主动地（如俄国和日本）或被动地（如中国和印度）进入现代世界。面对外部世界蓬勃发展而本民族和国家却落后挨打的现实，这些东方国家开始努力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然而，除少数例外，东方国家都无法按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方式来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这里除了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不具有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曙光的种种有利条件（即地理环境、金矿、奴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第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第22卷，1965，第456页。

隶贸易、殖民地等)[1]，相反却普遍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排挤和剥削（它们是作为被剥夺者而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一客观原因外，更主要的则在于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

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由于自然的和地理的因素影响[2]，东方社会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的那种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当西方海上贸易引发的商品货币关系充分扩展并开始侵蚀欧洲封建庄园制的肌体时，当西方第三等级站起来向封建贵族提出历史性的挑战时，东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愚昧落后的未开放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3]；村社制度和宗族结构使社会分成各自独立而闭关自守的组织，这种简单的生产机体的不断再生产，保证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4]；政治领域的高度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则在维持这种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基础上造成经常的改朝换代和政权形式的动荡。所有这些东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特点，大体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5] 西方文明发展与这种东方社会传统冲撞的结果尽管对东方原有的超稳定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从而动摇了这种社会状态继续生存的根基，但是西方文明毕竟无法完全融入东方社会（相反也是一样），历史本身切断了大部分东方国家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先哲们把目光投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设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种种矛盾驱使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未来社会的更替形式和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最成功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

---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19页。

② 如恩格斯在分析东方“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因时所说的那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260～26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第9卷，第244页。马克思甚至认为这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6～397页。

⑤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是理论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不拟进行讨论。不过，总的说来，笔者倾向于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世界不同的文明区域的历史进程必然有其各自的发展特性。实在地说，囿于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缺乏对东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了解，所以中国学者对东方国家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研究不能仅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为中心，而必须建立自己的以探索历史发展轨迹为基础的“中国东方学”。

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思维方式以外，还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逻辑的分析，并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准备付诸实践的，恰恰不是在它的发源地——西方国家，而是在许多东方国家。正在这些东方国家寻求既能摆脱落后传统，又能对抗资本入侵的发展道路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很自然地首先与东方国家的知识阶层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结合起来，为他们所接受，并得到宣传和实践。于是，这些东方国家便开始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试图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在本国实现现代化。在这方面首先进行尝试的就是俄国。

如此看来，俄国在1917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尽管十月革命的成功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但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条件如此恶劣，力量如此弱小，时间如此短暂的情况下，一举掌握政权，这背后就隐藏着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问题在于，俄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苏联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上，苏联遇到了哪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又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苏联是怎样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只有把这些问题深入地、全面地讨论清楚，才能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那个大问题——通过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历史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换句话说，泱泱执政大党突然自行解散，赫赫超级大国顷刻分崩离析，原因究竟何在？

中国人学习苏联最积极，中国走过的道路与苏联也最相似——即使处于敌对状况也无法消除它们之间许多内在的同一性，按道理，我们应该对苏联的历史有更深刻、更细致的洞察和理解。然而，恰恰相反，在需要人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了解却显得十分浅薄。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争相发表意见，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内在原因。但是，谈到政治的原因，人们说不清苏联集权制建立的具体过程和内部结构；谈到政党的原因，人们不知道苏共干部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谈到经济原因，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人已经看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在战后和1956年两次试图进行改革，却都归于失败，而到80年代中央的改革措施竟层层受到阻碍；谈到民族原因，人们对30年代以来苏联实行的特殊移民

政策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谈到外部原因，人们又搞不懂为何一场阿富汗战争就把苏联拖入了国力衰竭的深渊……。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对苏联的认识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存在一种判断上的盲目。在中苏友好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历史作为榜样来学习，而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一本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苏分裂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现状作为靶子来批判，而我们对苏联的指责又完全陷入了一种主观的和凝固的概念——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实际上，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真正地把苏联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这种误区和盲目性的产生，一方面是主观上的原因，即受到以往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影响，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原因，即大量的苏联历史的真相还掩盖在被尘封的档案文献之中。所幸的是，苏联解体以后，发生了一场无论对于历史学还是对于档案学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俄国档案解密了。200余家俄国档案馆均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接纳各国学者前往查阅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苏联历史档案的俄国报纸杂志竟达150余种，各类专题的或系统的文件集和档案集更是层出不穷。这种状况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苏联历史无疑是大有益处的。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史料面前，应该说我们与国外同行大体上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与一批研究苏联历史的中国学者当时主张，我们应该暂时放弃争论，也不要急于讨论那些抽象的和宏大的问题，而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收集、整理和解读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个案的、专题的、实证的研究。因为只有在占有坚实的史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搞清楚过去发生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出现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而只有在对历史的个案和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重新理解那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国家的全部历史。到那时，才能逐步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1995年开始，花费了7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了34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2005年底承接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托付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05JJDGJW040），并组织了一批有志于苏联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了这一工程。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一共出版了三种比较有影响的有关苏联历史的

通史性著作，即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合著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该书2003年修订再版；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该书2004年修订再版；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从题目上看，三者讲的都是苏联兴亡的全过程；从内容上看，三者各有侧重，有的立足于历史过程的描述，有的专长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有的则试图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的作者和编者，大多是中国从事苏联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他们毕生关注苏联历史，具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说，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出版，是对中国此前阶段苏联史研究的总结，且对于中国的苏联史教学和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三本书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较少利用十几年来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较少对历史过程进行实证性的考察。自然，在一本几十万字的著作中，很难详细地讲述苏联74年的历史，而阅读档案又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年长的学者，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但对于年轻一些的研究者来说，这里就不应该存在问题。

我们想要讨论和争论的，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把苏联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一一搞清楚，没有对大部分基本史实取得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又怎能坐在一起讨论和回答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呢？有鉴于此，本课题在开始设计时，就没有把目标定为写作一部苏联通史或全史，更没有企图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盖棺论定，而是要求参与者只写自己最熟悉的、研究最深入的题目。从整个课题的结构和目的讲，我们不求全面，只求深入，不求宏篇大论，只求过程描述。试想，短短三年的时间，面对涌现出来的浩瀚新档案、新史料，如何做到全面贯通，如何写出宏篇大论？我们的方针是量力而行，实事求是，而未曾想“毕其功于一役”。

如今三年过去了，我们完成了这项工程，并拿出了一部学术著作呈现给读者。总结起来，本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　重视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的利用

本课题组对参与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使用俄国最新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把档案文献作为史实描述和判断的主要根据。当然，限于条件，

这种利用可以是直接的，即来自档案馆的复印文件，也可以是间接的，即来自档案集、文献集或转引其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文件。这一点，在专题和个案研究中尤其重要。所以，在本书28个专题和个案研究中，除有关档案尚未解密的专题（如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在专著基础上浓缩而成的综合性专题（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外，都是以档案文献为主来支撑整篇文章的。直接利用的俄国档案馆，有人们常见的总统档案馆（АПРФ）、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国家档案馆（ГАРФ）、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等，也有学者很少涉足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АВКВСР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国家军事档案馆（РГВА）、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ЦГАЛИ СПб）等。间接引用的专题档案集则达20余种，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学术著作中出现。

其实，使用档案文献并非易事。档案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就近现代史而言，构成史料的形式不外三种：档案文献、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当时公开出版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在进行历史研究考察时，这些史料都是需要的，但其中最可靠的无疑当属档案文献。当然，档案文献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档案的作用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但实际上俄国档案文献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受到相当限制的解密和开放方式，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这就是说，只有经过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我们提出这样要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真实。我们要写的历史，不是研究者头脑中想象的历史，也不是别人要研究者按照他们的想象去描述的历史，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不错，历史的确都是历史学家“创造”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其神圣职责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告诉人们以前所发生的一切，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发掘、解读和运用历史档案文献。

二 立足专题或个案的实证性研究

一般出自个别，抽象源于具体，这个哲学道理在历史研究中也是通行

的。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把握苏联历史的全貌，那么就必须从个别入手，从具体着眼。只有我们在总体上对苏联历史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都有了深入的考察和体会，才可能把握历史的全貌，而只有把握了历史的全貌，并对基本史实有了认同，才有可能思考和讨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状况和条件而言，我们主张首先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个案研究。

本课题所选28个专题，均是作者自报的，也是他们的研究所长和兴趣所在。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综合论述整个苏联时期的某项政策或某一个领域的状况，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等；还有的叙述一个时段的政策，如《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等；有的研究某一事件的始末，如《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以及《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等；还有的专门讨论某一制度、政策或现象，如《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等。无论在哪个层次或哪个侧面，无论题目大小，这些研究都力求把事情的始末说清楚，把问题的本质讲明白，都是要告诉读者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其实，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这样的故事越多，人们就越接近了解历史的全貌。“树木”见得多，离俯瞰“森林”就不远了。

三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在所

选28个专题研究中，有接近一半的题目是以往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过的。这里有《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研究》、《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1945~1949）》、《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等等，其中有些问题，即使在俄罗斯也才刚刚开始研究。

苏联74年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涉及方方面面，随手拈来，就是一个好题目。所以，我们的研究切不可只停留在一些老材料、老问题面前，止步不前，而应该不断开拓出新的局面。即使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题目，在新出现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面前，也应该露出新的面目，给人新的启发。本课题中亦有不少人们常见的研究题目，如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大清洗”、苏共二十大、“新思维”以及苏联解体的过程等，在利用新材料的基础上，这些研究都比以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于十月革命的复杂背景，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30年代“大清洗”的规模和运行机制，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起因，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产生的背景和变化过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彰显，文中描述详细充实，过往烟云历历在目。不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向人们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完整的和客观的历史现象，而且引入了新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问题的各个侧面，从而对这段历史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解读。

四　努力把年轻学者推上第一线

本课题在设计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应该努力把年轻一代的史学研究者推上第一线。这样考虑，首先是出于一种担忧，即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队伍目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苗头。改革开放以后，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学习俄语的学生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在大量青年学子拥向美国史、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同时，进入苏联史研究阵地的却寥寥无几。后继人才本来就少得可怜，研究经费又十分短缺，如果我

们再不利用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启动之机着眼于年轻人的培养和训练，那么早晚有一天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就会停顿下来。其次也是寄予一种希望。年轻学者精力旺盛，掌握语言的能力又相对较强，只要意识到位，并给以经费补贴，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去挖掘、收集和阅读大量的档案文献，而这一点是许多老一代研究者望尘莫及的。这些年轻学者一旦走上科学研究的正路，就完全有可能为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本课题组织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以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在24名作者中，年逾（或近）古稀的老一代学者5人，45岁以上的中年学者5人，其余十几位均可谓年轻学者或学生，包括参加课题研究期间的在读博士研究生9人（他们所做的研究都是其博士论文的精华或一部分），平均年龄约48岁，最小的只有25岁。这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有热情，有干劲，肯于埋头读书，用心收集和研读档案文献，只要看看文章的注释，就知道他们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当然，他们之中很多人还缺乏经验和训练，对史料分析、综合及升华的能力也比较欠缺，特别是中文的修养离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要求尚有距离。[①] 不过，只要继续努力，肯下工夫，勤于学习，相信他们必会有所作为，在未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最后还要说一句，这本书只是我们实证性专题研究的第一步。自然，仅仅靠一两部这样的研究著作，我们还不足以解答历史提出的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这样做，就是在朝着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向努力。我们相信，如果重视档案文献、强调实证研究在中国的苏联史学界形成风气，如果有更多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这样的研究中来，中国学者定然不会辜负人们的期望。

2008年9月

① 本课题在最后统稿时，也确实拿掉了两篇年轻作者的文章，在此，笔者希望他们不要气馁。他们掌握了很好的材料，但目前还不能充分利用这些史料讲述历史。就是说，方向是正确的，但功力还很欠缺。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苏州科技学院　姚海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一场扭转了俄国发展的方向、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大革命。在90年之后，俄国革命仍以其复杂的背景、宏大的场面、矛盾的现象、戏剧性的情节、众多的谜团以及持久而又深刻的历史意义吸引人们不断地探索、认识和理解。本文尝试以新的思路和角度对俄国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

1917年革命的根源存在于俄国历史长期因素（结构）、中期因素（形势）和短期因素（事件）的结合之中，存在于客观前提和主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中。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结构失衡，造成了系统性危机，是革命的客观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曾出现过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导致了危机加剧的形势，酝酿了新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一步步把俄国引向1917年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历史活动的精英和大众的思想、观念、情绪及行为，一方面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

约，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局势和事态的发展。

长期因素：俄国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1917年革命的深远历史根源，在于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特殊性造成的结构性矛盾。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罗斯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①] 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47页。

② 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107～109页。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但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农民的解放也是有条件的，除了土地问题完全按地主的愿望解决之外，农民在完成赎买份地以前仍负有对地主的义务；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以行政权力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俄国走上了一条不平衡的、扭曲的发展道路。

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贵族地主虽然保持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等级特权开始受到法律的限制，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垄断也发生动摇。工业资产阶级加快成长，许多市民、农民、职员以及一部分贵族纷纷从事工业活动，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到1870年代末，俄国已有工业企业将近28000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形成，它的组成包括原来国有土地和世袭领地上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村分化过程中成为无产者的破产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贫苦农民。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必然要求发展滞后的政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俄国社会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准备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

1860～1870年代的改革因其妥协性质而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

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而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任何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到 1890 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 1861 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或市场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国家杜马中的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 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 1890 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1861 年农民改革未能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土地问题直到 1917 年仍是俄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农民反对地主、夺取土地的斗争表明，不解决土地问题，俄国就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和进步。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在这两个因素之外，19世纪末叶俄国又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从而加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19世纪末，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过剩人口，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①] 19世纪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为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问题在于数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②]

在政治领域，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在俄罗斯出现合法政党以前，先进的社会就已通过‘聚谈’获得了统一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心”。[③] 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流派结成了联盟。它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持欢迎态度，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

① *Анфимов А. М.*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1881 – 1904. М., 1980, с. 229.

② *Белоусов Р.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I. На рубеже двух столетий. М., 1999, с. 21, 49.

③ *Маклаков В. А.* 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о на закате старой России. Париж, 1936, с. 210.

抗；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①] 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 19 世纪最后近 20 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问题。

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 1905 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 年 10 月 17 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中期因素：第一次革命后的形势变化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 10 月 17 日宣言

① *Леонтович В. В.* Истор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Париж, 1980, с. 237.

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斯托雷平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①] 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反人民的性质，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农产品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指出：“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认为，“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为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②] 这种主张的实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24页。

② 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第337页。

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俄国社会其他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在 1911 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与君主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十月党多数代表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与此同时，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自由派与右派的矛盾也日益扩大。

斯托雷平被刺及其体制的失败标志着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剧。但是，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并不表明俄国没有走和平革新道路的可能性。相反，1905 年革命后俄国和平发展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列宁在谈到斯托雷平改革的时候也曾说过，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

斯托雷平被刺后，俄国社会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反应。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最有文化、最城市化、更自觉的年轻一代，他们是战前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主要力量。作为新的工业高涨对工人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1911 年开始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的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 年，勒纳事件激起的罢工抗议浪潮的规模

仅次于 1905 年 1 月 9 日流血的星期日之后工人的反应。罢工抗议活动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并反映了要求平等和独立等心理层面因素。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在 1910 年为 1.4%，1913 年达到 13.4%；政治性罢工数量很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局部的”[①]，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战前工人运动和罢工浪潮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其富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它的口号和呼吁越来越贴近工人的情绪，使每次罢工在其参与者眼中都是朝光明未来前进的一步，不管其性质和直接结果如何；其次在于它系统持续地利用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组织和方式来影响他们，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利用其杜马代表不受侵犯权开展宣传活动，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②]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由于 1909～1913 年俄国工业的新一轮高涨，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与 1890 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涨相比较，这次工业高涨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③]这一特点在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得到了反映。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不平等的伙伴，经济利益要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国资产阶级具有更明确的阶级自觉和行动意识。“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

① Россия. 1913 год. Статист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СПб. 1995, с. 403; *Желтова В. П.* Стачечная борьб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1910 – 1912 гг. М., 1993, с. 209.

②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6, с. 11.

③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6, с. 6.

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① 1909～1910 年，被称为莫斯科工商阶级"年轻一代"代表的科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发起并领导了一个很有活力的运动，试图推动俄国大资产阶级发起新的自由主义运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实现包括建立法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内容的政治纲领。他们认为，这样的纲领不仅符合作为主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的总体利益。② 1912 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 1913 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转向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此外，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在知识阶层中也在蔓延，职业知识分子、大学生中的反对派情绪加强，特别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国家杜马连续通过自由主义性质的法律草案，多次否决政府各部的预算；而内阁频频拒绝杜马质询，国务会议经常否决杜马通过的法案。

在战前政治危机中，工人的罢工浪潮与职业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某些集团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这两股潮流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勒纳事件后工人运动的规模无疑推动了俄国社会各集团尤其是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反对派情绪的发展。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发展，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承认甚至同情。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加剧战前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 1905 年以前的老路上去，政权内部在对政权性质、国家管理和自治制度等问题

① T. G. Owen, *Capitalism and Politics in Russia;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scow Merchants, 1855 – 1905*. Cambrige, 1981, p. 200.

②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6, с. 6.

的看法上倾向于倒退。18世纪以来，在把宗法制政权人格化的俄国传统与彼得大帝引入俄罗斯帝国的官僚制度及其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之间开始产生矛盾，但这两种立场在较长时间里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妥协的。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虽然政权内部两种观点的分歧有所加剧，但亚历山大三世以其个人权威遏制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到尼古拉二世时期，这种分歧以尖锐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为加强沙皇个人权威而采取的行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退化倾向，如回到17世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宫廷礼仪等。这种传统的反动在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行动中也有反映，他甚至采用阴谋方法对付自己的政府，如1913年同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多次秘密会见商讨被反对派称之为“国家政变”的计划，而不让自己的大臣会议主席知情。[①]

战前政治危机的发展与政府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强硬态度也有直接关系。政府特别是内务部及其所辖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监视，并且经常违反法律，对工会和具有反对派情绪的社会组织以及合法刊物为所欲为。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温和的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1913年秋天司法部着手制定限制出版自由和议员不受侵犯权的法案，以限制杜马成员在塔夫里达宫以外进行政治宣传。尼古拉二世与马克拉科夫密商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在首都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家杜马、取消杜马立法权等内容。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从国外回来听说此事后结束了这个方案，但到1914年春天戈列梅金内阁时，这个方案又重新复活。在1914年6月末，即彼得堡总罢工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宣布在彼得堡实行非常状态的法令，只需要填上具体日期和君主的签字就可生效了。[②]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沙皇制度的危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并将此作为摆脱杜马内部僵局的唯一出路。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立宪民主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

①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6, с. 13.

②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6, с. 12.

外。立宪民主党活动家认为，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思想和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短期因素：战争影响下的事态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及其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对马匹的征用使欧俄50个省用于农业的马的总数从1914年的1790万匹缩减至1917年的1280万匹，耕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供应军队也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长84%，而同期的物价却增长了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长了4～5倍甚至更多。[①] 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

①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865～870、882、885页。

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的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中央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自由主义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①]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在所有这类社会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自由主义者。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

① Буржуазия накануне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 М. -Л. , 1927, с. 1～2.

“特洛伊木马”。[1]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 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 1917 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党的接近。进步党很重视实业界与知识界的联合，认为俄国社会应该关注工业问题，因为如果说战场上的胜利取决于工业的繁荣，那么在内政问题上也基本如此。而在知识阶层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立宪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意识到对于俄国的发展来说，必须以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来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2]

自由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了加强同革命力量联合的主张。1915 年秋，科诺瓦洛夫与古契科夫力图与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代表建立联系并达成妥协，具体的渠道是由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诺瓦洛夫与该委员会中的工人团及其领袖格沃兹杰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接触。有关的活动为形成“革命护国主义者”联盟奠定了基础，而革

---

[1]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 М., 1988, *с*. 42.

[2]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 *с*. 45.

命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在建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义政党为主、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成立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联合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开表示，进步同盟的意义在于解决政权问题。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1]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柯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科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科夫谴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说现政府是“可怜的、恶劣的、污糟的”。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宪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要求党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党接近”，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全俄社会力量的指挥部”，组织同政权的斗争。

1916年秋，前线战局恶化，经济面临崩溃，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涨。在10月中旬进步同盟领导人与内务大臣的会谈中，同盟要求吸收自由主义活动家进入政府，而政府方面认为进步同盟“希望社会动荡和改变现存制度”，会谈以双方断绝所有联系而告结束。

在1916年11月1日杜马年会开会时，杜马主席罗将柯接受了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要求成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的请愿书。在宣读了杜马多数派声明之后，米留可夫、舒尔金等发表了演说。米留可夫强烈谴责现政府背叛俄罗斯民族利益，宣称“我们对这个政权能否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已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所作的纠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在我们和这个政权之间，鸿沟正在扩大并变得不可逾越。除了争取现政府垮台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别的

① *Палеолог М.*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во врем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 М.-Пг., 1923, с. 154.

任务”;“为了数百万牺牲的生命,为了流淌成河的鲜血,为了我们对于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政府负起责任为止”。[1]

米留可夫的演说在杜马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演说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单行本和口头方式迅速传播。进步同盟领导人的言论促进了反政府情绪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出了革命的信号。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尔梅尔的职务。

1916年末,局势的危急甚至促使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在沙皇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后,保皇派集团刺杀了权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廷。进步联盟首脑也曾参与此事,试图藉此迫使沙皇让步并防止革命发生。在对尼古拉二世失望之余,一部分自由主义活动家开始与军方接触,积极准备发动政变。到1917年初,政变“阴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宫廷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革命运动、自由主义运动以及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士要求改变政治方针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权陷入了全面危机,为二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1917年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极端表现。在沙皇政权不能继续以主动的改革来缓和矛盾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开辟发展道路的方式。俄国近代以来失衡的结构、斯托雷平体制失败后形成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矛盾的激化和事态的发展,这些因素的结合酝酿了1917年革命的爆发。

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

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一切都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

[1] ГАРФ, ф. 523, оп. 3, д. 22.

自发性与革命进程

自发性是二月革命的主要特征，从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这8天局势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自发性爆发的结果。这8天的时间可以分为两段：2月27日以前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运动，各政党都未充分认识局势的性质，也未采取实际措施来组织和引导革命；27日开始各政党竭力影响革命进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促使沙皇退位、组织临时政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组成苏维埃、影响群众运动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力量有限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但“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①]

二月革命史的研究者几乎公认，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这一天是国际妇女日，在首都的一些企业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小型集会或会议，开始了罢工和游行。工人队伍按习惯走向市中心涅瓦大街，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这一天，彼得格勒有12.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2%）参加了罢工。

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真实原因是彼得格勒粮食供应不足。有一种说法，23日开始的事件就是“面包骚动”。沙皇政权的保安局在2月初的报告中就指出，“如果居民还没有发动饥饿暴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组织这样的暴动：愤怒在增长，而且看不到增长的尽头。而这类饥饿群众的自发暴动将是走向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疯狂和无情破坏道路的第一或最后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②] 2月中旬，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排队买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居民中的担心、不安和不满在不断加剧。据二月事件的参与者记载：23日的“罢工很快变成了大街上的骚动。这种骚动是自发的……原因是商店门前排队的人们买不到面包”。[③] 当然，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仅仅是积聚在帝国内部的不满这一巨大的炸弹和火药桶的引爆物而已。

---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2, М., 1966, с. 672.

② *Станислав Кульчицкий*,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День, 4 октября 2003.

③ *ЗаславскийД. О.*, *Канторович Вл. А.*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М., 1923, с. 18.

罢工开始后，它并没有被马上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也没有人想过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人们对于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已不感到陌生了，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正因如此，"几乎谁都没有把2月23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①]

但23日开始的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2月24日，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一些面包铺遭到抢劫，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6万人，一些工厂还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城市居民的其他一些阶层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但各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区联派等，都还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但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群众运动的浪潮仍然在自发地滚滚向前。

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沙皇当局也把它视为通常的"骚动"，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担心。2月22日离开彼得格勒去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在25日获悉彼得格勒的事态后，给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去简短电报，要求立即制止首都的骚动。当天夜里，有100余名各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2月26日是星期日，警察和部队在城里一些地区向游行者开枪。巴甫洛夫近卫团第四连的士兵拒绝执行镇压游行者的命令，带着30支步枪和不超过100发子弹走上街头，往涅瓦大街进发。在遇到一队骑警阻拦后，他们开了枪。弹药用完后，他们返回兵营并筑起路障。造反遭到镇压，19名主谋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到26日傍晚时，很多人都感到，秩序已经恢复了。晚上，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宣布了沙皇关于杜马休会并延期至4月的敕令，并将其送达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这个行动被认为实际上就是解散杜马。沙皇政权一向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是造成革命形势的重要原因，所以希望通过解散立宪派控制的国家杜马来除掉骚动的中心。

此时，运动似乎已被压制下去了。26日晚上，在克伦斯基家中举行的各左翼政党聚会上，对局势的估计是保守的。卡尤罗夫回忆说，当时"可

①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30页。

以感觉到一点：起义已被消灭了。游行是手无寸铁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击采取坚决措施的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的代表尤烈涅夫认为：“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看法。[1]

至此，由23日自发开始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事实很清楚，运动并不是按照某个政党的既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也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和发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提出疑问：“二月下旬发生的‘面包骚动’可以被认为是自发的，但它难道已经是那个我们所称的二月革命吗?”[2]

随后发生的事情又是出人意料的。局势在2月27日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发动了游行，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

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1/3。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散掉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直接指挥的约1000人的一支部队起先集中在海军部大厦等待前线部队到达，然后又到冬宫广场准备保卫冬宫。28日黎明时分，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来到了冬宫，在同将军们谈话之后，他指示哈巴罗夫的部队离开冬宫，他不想让人说罗曼诺夫家族又像1905年1月那样在冬宫广场上向群众开枪。[3] 于是哈巴罗夫的部队回到了海军部大厦。28日白天，人群包围了海军部大厦。在得到消息说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以及没有前线部队到达彼得格勒之后，哈巴罗夫命令部队有组织地不带武器撤出海军部大厦。就这样，彼得格勒已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

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人。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

---

①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第30页。

②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2002, с. 8.

③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М., 1995, с. 30.

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①] 在旧制度垮台之后，围绕着调动卫戍部队到前线的问题，仍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把哪怕一部分"革命卫戍部队"调离首都，但布尔什维克把卫戍部队士兵视为自己最主要的支柱，捍卫他们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利，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确实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在前线部队甚至在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中，对于首都卫戍部队极为鄙视和敌视。在阵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威胁："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那帮家伙押进战壕!"[②] 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③] 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

---

① Из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1917 год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2, №45, 12 ноября 2002 г.

② Из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1917 год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2, №45, 12 ноября 2002 г.

③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с. 29.

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这天，刚从监狱中出来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人、孟什维克 K. A. 格沃兹杰夫、П. О. 波格丹诺夫、Г. З. 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利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立即散发传单，要求各企业和部队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利达宫集中：每1000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选出一名代表。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超过10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齐赫泽担任主席，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呼吁书，内称“斗争还在继续，它应该进行到底。旧政权应该彻底推翻并让位于新的人民管理。这样俄罗斯才能得救。为了顺利完成争取民主的斗争，人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我们将齐心协力为彻底排除旧政府、在普遍秘密直接和平等基础上选举并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①]

会上还成立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和菲里波夫斯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建议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选举连和营的委员会或苏维埃，由其掌握武器、控制部队和管理军营内部生活；宣布士兵与其他公民平等。苏维埃决议以呼吁书或命令的形式公布这些决定。为形成这个文件，选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当天完成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所有武器必须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士兵在享有公民权利方面不受任何限制，等等。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证实，一号命令当时共印刷了900万份。[②] 在这之后，苏维埃在士兵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俄国军队迅速瓦解。

苏维埃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不过，在其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对自己的力量并无信心，也不够强硬。

---

① Станислав Кульчицкий,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День, 4 октября 2003.

② *В. В. Кожинов*, Россия век XX 1900 - 1939. Москва, 1999. http: //hronos. km. ru/libris/kozhin20vek. html

每次一听说有某支部队快要到达或可能发生枪击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就抓起自己的大衣或斗篷，仓皇奔向出口。[1] 沙皇政权可能镇压仍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令人恐惧的阴影。

在彼得格勒的运动愈演愈烈之时，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加强了对政府的压力。2 月 27 日，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几乎同时，也是在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召集进步同盟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根据会议的授权，罗将柯向正在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指出，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由沙皇发表宣言，宣布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来组织新内阁。罗将柯还同军队主要将领谈判，促使他们向沙皇施加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召开了部分杜马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恢复首都秩序与联系有关机构和人士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由罗将柯任主席。杜马临时委员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它将负责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同时罗将柯电告沙皇，说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作用，无知的群众主宰着局势，为了防止军官和政府官员被杀、安抚狂热的情绪，杜马委员会决定承担起政府职能。但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袖是小心翼翼的，“就像在苏维埃中的情绪一样，这里也没有任何自信——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会有部队从前线回来，将会严厉地对付‘杜马革命家’”。[2]

君主制问题

在 27 日中午以前，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的将军们还没有特别注意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道，认为这只是通常的“骚动”。但在传来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暴动、首都当局无力用自己的力量将其平息的消息后，大本营才“清醒过来”。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反应是明确的：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曾任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由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秘密命令授权伊万诺夫将军对居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3]

---

①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с. 31.

②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с. 31.

③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5.

根据沙皇的指示，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命令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前往彼得格勒，同时还从北方战线、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调了几个团和一些“可靠的将军”去彼得格勒。运载格奥尔基营的列车在3月1日早上到达皇村，然后又退到维里扎车站并在这里停下，部队没有采取行动。从北方战线调来的一支部队在卢加车站同地方部队的代表相遇，随后宣布自己不会承担讨伐任务。

28日清晨，在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出发前，尼古拉二世乘专列离开了大本营前往彼得格勒郊外的皇村。这一天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动乱还没有波及俄罗斯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后，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如托斯诺、柳班等看来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后来弄清楚，是经过托斯诺和柳班的军车上的士兵砸了车站上的小吃部，然后又上车走了。但为了安全，沙皇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沙皇专列在3月1日中午停靠旧鲁萨车站，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还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3月1日晚上专列到达普斯科夫车站后，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登上了沙皇专列，在此之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鲁兹斯基后来写道：沙皇对他提出的“关于成立责任内阁必要性的理由平静地、冷静地但又带有强烈信念地表示反对”，说难以想象一个立宪制的俄罗斯将会是什么样子。[1] 沙皇不同意鲁兹斯基提出的“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公式，但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3月2日0时20分，沙皇给已经率领部队到达皇村的伊万诺夫将军发去这样一封电报：“在我到达和向我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2] 但他事实上再也未能到达皇村，而已在皇村待命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那么俄罗斯将会成为立宪君主制国家。然

---

①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с. 32.

② *Боханов А. Н.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138.

而，彼得格勒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下层”，但如火如荼的群众集会、游行，以及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的情况，对杜马反对派形成了新的压力。在杜马临时委员会中，以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为首的部分人倾向作出更大的让步以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即废黜尼古拉二世，以一位新的君主来取代他。按照米留科夫及其支持者的考虑，这将为保留君主制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具体的方案是：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将皇位让与皇位继承人、13岁的阿列克谢，由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杜马领袖们感到，这个方案比较适合快速变化的局势。十月党人古契科夫和君主主义者舒尔金被火速派往普斯科夫，以便直接与尼古拉二世谈判。

鲁兹斯基将军在结束同沙皇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与罗将柯通话。通话是从3月2日的凌晨3点30分开始的，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鲁兹斯基告诉罗将柯沙皇已作出让步时，罗将柯回答说：“很遗憾，宣言（指成立责任内阁的宣言）已经晚了”。“皇朝的问题被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要求沙皇逊位给儿子，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摄政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罗将柯表示，只有这样处理，危机才可能解决，“政变将是自愿的，而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痛苦的，那时一切都将在几天内结束。”[①] 为了敦促尼古拉二世退位，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古契科夫和舒尔金作为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

鲁兹斯基与罗将柯的谈话通过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了解杜马领袖的新意见后，指示大本营的卢科姆斯基将军把北方战线参谋长Ю. 达尼洛夫将军叫到电话机旁，要求他立即“不顾礼节”叫醒尼古拉二世，把鲁兹斯基和罗将柯谈话的全部内容提供给他。同时，他指示将鲁兹斯基与罗将柯谈话的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舰队的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要求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的措辞是有倾向性的：“看来，局势不允许其他的解决办法”。当天，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等先后回电，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做出牺牲。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将军在电报中说：

---

①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6－17.

"为了拯救祖国和皇朝，作出符合杜马主席声明的决定，看来是能够制止革命、把俄国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措施。"[①] 只有罗马尼亚战线司令萨哈罗夫将军愤怒地表示反对并谴责罗将柯等杜马立宪派领袖的"背叛行为"。

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从阿列克谢耶夫那里收到的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尼古拉二世面无表情地读了鲁兹斯基带来的电报，然后鲁兹斯基开始说话：只有这条出路，让位给皇太子。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尼古拉二世说："我不知道，是否全俄罗斯都希望这样。"鲁兹斯基将军回答说："陛下，现在没有进行民意调查的可能性，但事态发展很快，形势已经恶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拖延都有可能产生无可挽回的灾难。"鲁兹斯基要求沙皇听听在场的萨维奇和达尼洛夫将军的意见，尼古拉二世表示"希望听到坦诚的意见"。两位将军支持自己的司令的意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沙皇说："我决定了，我退位。"[②] 随后拟定了给罗将柯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两份电报，其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将皇位让与继承人阿列克谢皇子，在他成年以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摄政。但在电报就要发出时遭到了一些沙皇侍从的阻止，他们为沙皇的决定而震惊，要求缓一缓再发出电报，至少等到彼得格勒有新消息来，因为当时知道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已经出发来普斯科夫了。尼古拉二世有些动摇，也许是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于是决定听了杜马使者的意见再说。

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沙皇阐述了关于他让位于阿列克谢的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白天他决定让位于儿子，但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和儿子的病情之后，决定不仅自己退位，而且也代儿子让位于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鲁兹斯基将军后来写道：大家都哑口无言，因为沙皇没有权力为儿子——法定继承人——放弃皇位。在一阵沉默之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接受了新的方案。他们认为，在国家基础已遭破坏、对法律的理解变得虚幻的情况下，让谁成为新的君主的问题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他们只

①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18.

② Отречение Николая Ⅱ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чевидцев. Л. , 1927, с. 197 – 199.

是请求尼古拉二世在签署定于3月2日下午3点退位的文件前，批准任命李沃夫为总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总司令。在沙皇签署的声明中说，“我传位于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我嘱托我的兄弟在管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并宣誓忠于那些将由他们确定的原则”。稍后，3月7日，在对军队的最后文告中，尼古拉二世要求“服从临时政府”。这个文告被临时政府禁止发布。

保存下来的沙皇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的谈话记录表明，沙皇是动摇的。他的怀疑源自于他不相信缺乏经验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具有管理这样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庞大国家的能力，以及确信只有君主制和专制制度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他在决定退位的时候相信，俄国的君主制度将会保留。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尼古拉二世回到包厢时眼中含着泪水。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显然，他认为自己是被那些有义务为自己服务到底的人出卖的。在俄国君主制垮台的过程中，平时是如此强硬、如此招眼的俄国君主主义者，特别是黑色百人团，在关键时刻却没有表现出保卫君主制和君主的愿望，相反急忙离开了沉没中的君主制船只。

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早上还调动部队前往彼得格勒，但到晚上他就决定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了。在这段时间里，罗将柯说服他不要用暴力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彼得格勒，而要用政治的方法促使沙皇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这个关键军事领导人立场的转变对后来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得到各战线司令的支持后，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已经到达彼得格勒郊区的伊万诺夫将军放弃早先确定的行动，并促使尼古拉二世接受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要求。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急剧转变，后来一些侨民和君主主义者指责他背叛。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同情自由主义领袖，主要是出于吸引更广泛社会力量参加军事努力的考虑。他认为，由于拉斯普京丑闻，尼古拉二世在军队高层已经威信扫地，随着他的退位，政权将得到巩固，军事努力将会更加积极。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了，就像当初试图通过允诺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挽救君主制一样。随着彼得格勒群众情绪

的发展，自由派领袖中出现了主张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罗将柯在与普斯科夫和大本营联系过程中竭力使将军们相信，拒绝宣布米哈伊尔为皇帝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是有效的，立宪会议将就俄国君主制度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新的突然的转折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气愤，他试图在大本营召开战线司令会议，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对政府施加压力，但他已找不到直接的支持，将军们不再愿意干涉彼得格勒的政治骚动。

3 月 3 日清晨，10～12 名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来到百万街布加金娜公爵夫人宅邸，米哈伊尔就藏在那里，向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供"裁夺"：以克伦斯基和罗将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以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坚持要他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罗斯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在拟定的宣言文稿中是这样写的："我决定：我只在我们的人民表达了自己意志的情况下才可能接受最高权力，他们应该举行全民选举，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宣言呼吁全体居民服从临时政府并以此使之合法化。[1] 俄罗斯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挟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是结束君主制的主要力量。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群众的情绪是出现了超越立宪君主制的范围的趋势，在有些工人、士兵的集会上，通过了实现共和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是出自"孱弱的群众"，而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然后"执行委员们"向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倾向于由立宪会议解决未来国家制度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加强。这些事态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情绪。3 月 2 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立宪派在国家制度和皇位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群众长时间的反对王朝的口号声。随后，举行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卫戍部队的军官派出代表团向杜马委员会表示，如果米留可夫不收回自己的话，那么

[1]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25.

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里都无法保证。米留可夫只得宣布，他说过的有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于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毁掉，把古契科夫干掉。

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庞大的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革命期间，工人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并不一致，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在一部分情绪激进的首都工人提出“打倒沙皇”的口号后，仍有很多工人对此并不确定，甚至愿意支持君主制度。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社会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政权问题

当沙皇专列在铁路线上来回运动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

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但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通过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的妥协性纲领的八点内容是：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俄国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苏维埃确实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工人、农民、士兵）的利益，而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以及全国性的利益。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已经创造了日后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除布尔什维克）

组织联合政府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一条较为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条件。

通常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因此，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情况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就是没有有效的政权。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未能摆脱旧制度遗产就急剧地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主化，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因此不可能没有消极后果。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接受为允许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临时政府只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才被迫作出了政策让步，但实际上临时政府还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领袖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结果最终被群众抛弃。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以及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2月底3月初彼得格勒的事变。

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布勃利科夫关于杜马已掌握政权的电报以及报纸上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导，成为地方上开始革命的信号。“电报革命”也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微弱的这一事实，说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但首都与外地的革命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如果说彼得格勒的革命主要是在“打倒战争”的口号下展开的，那么外省的革命则更多的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进行的。“革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地方3月发生事件的潜台词，有时甚至成为直接的口号。

2 月 27 日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后，马上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自治机关的有力支持。数千封来自地方的电报都表示拥护革命、拥护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机关都把它视为“革命人民意志的产物”，是人民“早已期待的政府”并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宣称已为全面支持临时政府作好了准备。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人在给李沃夫总理的电报中说，他作为地方自治运动公认的领袖而当选为政府首脑是实现俄国地方自治运动宿愿的保证。斯摩棱斯克地方自治会议表示相信，李沃夫领导的政府“将把祖国引向最后的胜利并为伟大的俄罗斯开辟光辉的前景”。[①]

革命初期，临时政府把地方自治机关作为地方政权的唯一基础。在二月革命从首都向外省发展时，地方自治机关成为临时政府的权力在地方上的支柱。许多省、县的地方自治机关向临时政府提出，他们应该成为地方政权的骨干。还有一些地方自治机关干脆自行接管了当地政权。而临时政府也在 3 月 5 日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临时政府委任的拥有全权的政治委员，暂署当地政务，从而使临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控制了全国。

但这个决定也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任命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政治委员是对革命的嘲弄，并纷纷给临时政府发出信件和电报表示抗议，要求临时政府以至李沃夫总理本人解除当地政治委员的权力，其理由都是这些人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3 月，在彼得格勒、明斯克、梁赞等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群众自发地逮捕政治委员或宣布解除他们职务的事件。4 月，政府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这类情况的报告。在革命中被卷入政治生活的人民群众迅速地觉醒，要求一切政府官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形势迫使自由主义政党控制的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做出妥协，改变了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同时开始正视“社会执行委员会”的存在。社会执行委员会出现于二月革命期间，并很快遍布全国，在省、县、区各级积极活动。同地方自治机关相比，社会执行委员会是群众自发的组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立场也更为激进。

---

① *Грасименко Г. А.* Земство в Февраль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7, No. 4, с. 76.

3月中旬，临时政府决定省和县的政治委员由选举产生，力图争取社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临时政府还公开表示，当初指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地方政治委员，是认为他们在民主阶层中享有威望并受到信任，堪为政权的基础；现在既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都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由其他社会人士担任政治委员。3月27日，临时政府又发出指示，各省政治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应依靠同全省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社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应成为全省社会意见的负责任的表达者。于是，社会执行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自治机关而成为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原先由临时政府任命的省、县政治委员，开始被社会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接替，政权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让步也许是自由主义在二月革命后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作出的最重要的努力。自由主义领导集团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削弱了自己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

三　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转变

二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尽管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运动，但在总体上未能对局势产生明显影响。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布尔什维克与俄国其他政治力量一样，都面临历史性的抉择。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依据建党初期就已明确的革命理论，准备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框架内的合法反对派之路。而列宁回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趋势，把党领上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国内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的认识

在二月革命中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公开地聚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积极开展活动、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是比较弱的，总共只有2.3万名党员，在彼得格勒只有2000人左右，许多地方组织尚未恢复。[①] 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或是侨居国外，或是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2, М., 1966, с. 547.

在流放地，主持中央俄罗斯局工作的是施略普尼科夫、莫洛托夫、扎罗斯基等人。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对二月革命后出现的政治局势的认识存在分歧，因而对于党在新条件下应取何种策略也是不一致的。

当时，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有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中央俄罗斯局，另一个是彼得堡委员会。它们在如何对待临时政府和仍在进行的战争问题上持不同立场。

在对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俄罗斯局所持观点较左，在其 3 月 4 日的声明中说，"目前的临时政府就其实质而言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站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立场上。因此，同它不能有任何妥协"。中央局宣布，它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性质的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①] 应该说，这个立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脱离的。中央俄罗斯局对于在革命中建立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苏维埃也认识不足，在中央俄罗斯局 2 月 28 日发表的宣言中，甚至只字未提苏维埃。

在首都工人中影响较大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要更现实一些，它赞成苏维埃作出的关于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彼得堡委员会在 3 月 5 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派人民群众利益的条件下，彼得堡委员会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权力。"[②] 彼得堡委员会的这个立场与主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场基本一致。

中央俄罗斯局曾试图纠正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但遭到拒绝。彼得堡委员会在 3 月 12 日的中央局会上发表声明称，它的主张"完全符合现在的要求，符合目前的利益，它的决议比较具体。……彼得堡委员会认为中央局的指示必须先交给彼得堡委员会讨论研究，然后再贯彻执行。……中央局应当重视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因为彼得堡委员会依靠群众。中央局在宣言中讲了一系列错话……中央局的这些做法有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信"。[③] 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迫使中央俄罗斯局修正自己的观点，在 3 月 9 日的会议记录中指出，中央局不认为支持临时政府是重要的，同时也没有

① Вопросы итории КПСС, 1962, No. 3, с. 136.

② Правда, 7 марта 1917.

③ Вопросы итории КПСС, 1962, No3, с. 144.

积极与临时政府对抗的途径，而在3月10日的决议草案中已经谈到了“影响临时政府”的可能性。①

在有关战争问题上，彼得堡委员会3月7日宣布，在推翻沙皇制度后，自己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因此“将坚决地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为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斗争”。彼得堡委员会决定，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呼吁各交战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并在前线联欢。中央局3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宣布，革命民主派的基本任务仍是把目前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压迫者—统治阶级的战争。”决议号召与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联合起来，在前线举行联欢，实现军队的民主化。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组织总体上都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但彼得堡委员会没有像中央俄罗斯局那样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这样，虽然在战争问题上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立场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护国主义”保持着距离，但是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共同点削弱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呼吁反对战争的实际影响力。

3月中旬开始，随着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返回彼得格勒，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3月12日，加米涅夫和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图鲁汗斯克边疆区的中央委员斯大林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一起回到了彼得格勒。这时，二月风暴已经过去，临时政府得到了几乎是充分的支持：具有保守情绪的阶层都把它视为能够对抗革命无政府主义并能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唯一中心；劳动群众的很大部分，其中包括很多工人，也把实现自己利益的希望与临时政府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激进的维堡区工人通过了把政权转交苏维埃的决议，但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完全不能影响彼得格勒和全俄罗斯的情绪。

3月中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中央俄罗斯局的影响力加强，而且实际上控制了《真理报》。他们连续发表文章，主张只要临时政府不直接危及群众利益就给予支持；要求放弃无条件反对战争的立场而改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迫其开始和谈的策略。这个新方针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

关键的问题在于对革命性质和发展前景的看法。大多数布尔什维克认

①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62, №3, с. 141, 143.

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结，他们没有想到现在就有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3月18日在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这个时期将会到来，推迟它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①

在3月22日布尔什维克中央俄罗斯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这两个重要的决议，并刊登在3月26日的《真理报》上。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苏维埃应当对临时政府的一切行动实行最坚决的监督"，"不仅要迫使临时政府放弃一切征服计划，而且还要它立即公开表达俄罗斯人民的意志，同所有交战国媾和。"②

3月27日到29日，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有条件的护国"和给予临时政府"有条件支持"的立场。正因如此，当老布尔什维克克拉西柯夫在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发言说应该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夺取政权"时，他显然是孤立的，甚至被会议主席剥夺了发言权。

现在，国内布尔什维克党内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俄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正如《真理报》复刊后第一期上的文章所说，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行民主共和制"。③

身在苏黎世的列宁很清楚，在当时所有国内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中，加米涅夫在确定党的政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在3月30日写给加涅茨基的信中说："加米涅夫应该懂得，他肩负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他在同一封信中表示："我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声明，而且是在报刊上声明：我甚至不惜立即同我们党内的任何一个人决裂，也不向克伦斯基一伙的社会爱国主义或者齐赫泽一伙的社会和平主义与考茨基主义让步。"④ 也许是意

---

① 布尔扎洛夫：《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策略》，《苏联历史论文选辑》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65，第60页。

② Вопросы итории КПСС, 1962, No. 3, c. 153.

③ Правда, 5 Марта 1917.

④ 《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596、593页。

识到了列宁的坚决态度，而且列宁已在回国途中，在党的工作者会议起草关于对临时政府态度的决议时，最终的表述改为“密切地监督临时政府的行动”。

很明显，在1917年3月中旬到4月初，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多数人遵循的是党在1905年革命中形成的策略路线。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1905年4月，举行了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在俄国，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还是最终目的，都首先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政体，这个民主革命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胜利的人民起义将产生一个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社会民主党在保持独立性的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否参加政府，都必须经常对政府施加压力。[1] 当时，列宁认为，这个决议明确以最低纲领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从而“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因为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广大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列宁指出，“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迈出第一步”。[2] 与孟什维克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负有起领导作用的使命，社会民主党将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采取不调和的敌对态度以便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3]

二月革命之后，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党自1905年革命以来对俄国革命性质和发展道路的估计得到了证实。他们认为临时政府是现有条件下可能有的最先进的政府，而党的当前任务是促进民主革命的发展，因此不能立即采取激烈反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在三月会议上，虽然所有代表都认为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实质上反对革命的政府，而且都承认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与这个政府的冲突，工兵代表苏维埃应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掌握全部政权，但绝大多数人认为改变政权性质不是现在要做的事情，“现在强行加速与资产阶级各阶层分离的过程，

---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89～9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18、521、522页。
③ 《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89～90页。

对我们是不利的。必须赢得时间……以便巩固革命的成果，作好与临时政府斗争的准备"。[①]

国内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与孟什维克对于俄国革命的认识是一致的。

孟什维克也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就形成了关于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未来的革命应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应该领导革命并组织政府，而社会主义政党将以反对党的资格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后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1917年的二月事件中，孟什维克对于政权问题的态度与其革命理论直接相关。在革命过程中成立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基础是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还得到了俄国军队、金融界和工商业界的支持，并且与英国和法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它在旧政权已经瘫痪的情况下开始行使政府职能。这种情况是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领导人所乐于见到的，他们认为杜马委员会采取的行动有助于平衡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权力。他们认为苏维埃应该是一个革命群众的自治机关，在政治上它应该是"人民的喉舌"、"革命的控制器"。因此，苏维埃可以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行使自治权，向政府施加压力、进行监督、引导它走正确道路，但苏维埃不能成为政权机关。而杜马委员会则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雏形，如果它能够公开地与专制政府的残余力量斗争，成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它就会与苏维埃形成一种同盟关系，从而更快地实现俄国革命的目标。

于是，苏维埃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很顺利地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因为杜马临时委员会也希望借助于在苏维埃中居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来平息街头的暴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议工人代表苏维埃承认将要公布的关于成立临时政府的宣言，并且呼吁群众支持临时政府，恢复秩序。[②]

---

① 参见布尔扎洛夫《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策略》，第71页。

② Martin McCaule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Soviet State 1917 - 1921, Documents*, London, 1980, p. 17.

苏维埃领导人对于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不感兴趣，但他们愿意给予政府有条件的支持。孟什维克认为，俄国的革命已经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推翻了沙皇，并且取得了成功，但还需要继续扫清旧制度的残余，以引进西方式的“先进的”制度。这个再造俄国的任务应该由临时政府来承担。孟什维克在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中说：“它（临时政府）的任务简单明了：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迅速而果断地摧毁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干扰建立新制度的一切事物，进而同样迅速而果断地创造新秩序赖以存在的一切。”[①]但是，“一旦临时政府抛弃革命的道路而选择妥协的道路，那么……将毫不畏惧地示威游行反对政府，并且像废除旧制度一样把它推翻”。[②]

就这样，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革命后政权问题的解决等重大问题上走到了一起，而革命已成为事实又使得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党的组织结构和俄国革命的条件的争论降到了次要地位。因此，尽管两党在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上还存在差异，但出于巩固革命的愿望，这两个党自下而上地趋向于重新统一。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愿望在一些地方组织中特别强烈，他们开始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争取联合。在派遣代表出席 3 月下旬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的 70 多个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已有 30 余个实现了同孟什维克的联合。在与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同时召开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对孟什维克领袖唐恩提出的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③]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还决定同孟什维克举行联席会议，并成立一个由加米涅夫、斯大林、泰奥多罗维奇、诺根等组成的谈判委员会与孟什维克国际派领导人就联合问题进行接触。

这种情况似乎预示着俄国将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将成为合法的反对党。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因素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列宁，他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他的思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最终从根本上改造了布尔什维克党。

---

① Abraham Ascher, *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6, p. 90.

② Abraham Ascher, *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93.

③ 参见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 85 页。

列宁的新思想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瑞士的苏黎世。在这之前，他像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彼得格勒会发生革命。2 月初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说“我们像往常一样，过得很平静”。当关于俄国二月事件的最初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是不太相信的。3 月 2 日（15 日）他在给克拉兰·阿尔曼德的信中说：“今天我们在苏黎世都很激动：3 月 15 日《苏黎世邮报》和《新苏黎世报》登载的电讯说，在俄国，经过 3 天的斗争，彼得格勒的革命于 3 月 14 日胜利了，说 12 名杜马代表掌握了政权，大臣们全都被捕了。如果这不是德国人胡说八道，那就是真的。目前俄国已处在革命前夜，这一点毫无疑问。”[①] 在很快确认了这个事实后，列宁受到极大震撼，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用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在得到关于革命的最初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②]

3 月 3 日（16 日），他写信给在挪威的柯仑泰：“刚才我们收到了第二批关于彼得格勒 3 月 1 日（14 日）革命的政府电报。工人们血战了一个星期，米留可夫 + 古契柯夫 + 克伦斯基却掌握了政权!! 完全符合欧洲的‘旧’模式……不过这没什么！这个‘第一次革命（由战争引起的第一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既不会是最后一个阶段，也不会仅仅是俄国的革命。……且看人民自由党怎样给人民以自由、面包、和平……等着瞧吧！……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允许合法的工人政党存在，如果我们的人要去同齐赫泽之流‘团结一致’，那就是莫大的不幸!!”[③] 在这封信中，列宁已经明确了自己政治路线的基础，这将是在他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推行的路线。这时候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在就政治立场的表述以及如何制定对临时政府的策略进行争论，但列宁已经把原则决定了。

接下来的日子，列宁开始急迫地寻求回国方案。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对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立场感到担忧。他曾请先行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告诉彼得格勒的同志，“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

---

① 《列宁全集》第 47 卷，第 564 ~ 565 页。译文有改动，参见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49, с. 399。

②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М., 1995, с. 54.

③ 《列宁全集》第 47 卷，第 564 ~ 565 页。

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①] 他还以《远方来信》的形式为《真理报》写文章，表达他对时局和党的策略的看法，但列宁的观点显然是那些从流放地回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在列宁回国前，《真理报》只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而且把其中尖锐批评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内容删去了。

在瑞士社会党人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和其他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于3月27日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俄国的敌国德国，再经瑞典、芬兰，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列宁一到彼得格勒就批评前去迎接他的加米涅夫："《真理报》上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看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们。"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者会议和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后来即以《四月提纲》而著名。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以工人代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以苏维埃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说二月革命后国内布尔什维克的主流观点是符合迄今为止是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和策略的，那么列宁的新思想意味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根本改变。

列宁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发展，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旧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主义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②]

列宁的回国最终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列宁演说时在场的孟什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8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维克苏汉诺夫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产生了雷击般作用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参加会议的持不同见解者……目瞪口呆，可以肯定，没有谁曾料到会有这样的讲话。"A. 波格丹诺夫向列宁大声叫道："这是热昏的胡话，是精神病人热昏的胡话。"斯科别列夫把列宁称为"一个置身于运动之外、完全不可救药的人"。[①] 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同样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德拉勃金回忆说："他的话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因为没有人曾经预料到这一点。相反，人们倒曾希望列宁的归来会说服中央俄罗斯局——特别是对临时政府持不调和立场的莫洛托夫同志——遵守秩序。"有的党员把列宁的提纲称为"乌托邦式的"，认为这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生活"。布哈林后来也曾说过，当时党的一部分组织把列宁的提纲看作是对于被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②] 在列宁发表演说的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他的只有柯仑泰，但她的发言"引起的只是讽刺、嘲笑和喧闹"。有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因此产生不满而转入了孟什维克的队伍。

4月6日，中央俄罗斯局举行会议讨论列宁的提纲。加米涅夫发言说，列宁没有提供"具体的指示，因为他把目前的形势估计得和1871年一样，然而我们这里还没有1789年和1848年完成的东西……政权不在苏维埃手里。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斯大林也认为，列宁的提纲只是略图，其中没有事实，因此不能令人满意。[③] 4月7日，列宁的提纲以他个人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发表。但加米涅夫第二天就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表示不能接受列宁的提纲，因为其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并试图把这场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还表示，在中央委员会作出新的决议之前，仍将继续执行和捍卫党的三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和战争问题的决议。在彼得堡委员会4月8日的会议上，列宁的提纲被交付表决，结果以13票反对、2票赞成、1票弃权被否决。

列宁顽强地为他的思想而斗争，他频频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开会、商谈，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观点。最后大

① *Суханов Н.* Записк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3，Берлин-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 1922，с. 48.

② 参见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1985，第72页。

③ 布尔扎洛夫：《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策略》，第69页。

家同意，把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4 月 8 日开始在党组织中就列宁的提纲进行辩论。列宁的提纲首先得到了普通工人党员的支持，他们比较容易地接受了关于实现革命转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委这一层反对列宁的提纲，但多数区级组织和所有基层组织都拥护。4 月中旬开始，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方党组织相继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支持《四月提纲》的决议。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层导中，仍然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在 4 月下旬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列宁关于战争和政权问题的决议案以多数票通过时，有一些人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而在革命转变问题上，列宁遇到了更为激烈的反对。李可夫的发言表达了反对者的看法，“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根据现有条件，根据居民的生活水平，开始社会主义变革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力量和客观条件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来完成这项任务”。加米涅夫也重申：“我认为列宁同志是不对的，他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我认为它还没有结束……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丧失了实行民主的一切可能性还为时过早。”[①] 在表决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案时，118 票中有 47 票反对或弃权，而且这还是在列宁反复做了工作之后。但无论如何，四月代表会议表明列宁争取到了党内的多数，他可以推行新方针了。

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影响了俄国革命的进程，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成为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策略原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列宁，没有列宁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这一提纲而作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将走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俄国也将因此而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俄国社会进行分析，显然只能得出在当时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的结论。列宁在十月革命 6 年后口授的《论我国革命》中承认了这一点。但他同时指出，“世界历史发

① Седьмая（апрельская）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СДРП（б）. Протоколы. М.，1958，с. 93，80.

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①] 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改变通常的历史顺序的机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先夺取政权，然后解决发展问题。在1917年的革命浪潮中，列宁充满了斗争精神，他不愿选择“平稳的航行”和充当“安全的反对派”，而宁愿“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但历史也已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前提的社会革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无产阶级首先面临着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文明国家的任务。[②]

四　布尔什维克与七月事件

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列宁《四月提纲》的思想后，开始为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临时政府在面对和处理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1917年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了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运动，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运动。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③] 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实际情况是，七月事件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686、688页。

③ *Иоффе Г. 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с. 84 – 85.

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在七月事件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和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七月事件的酝酿和发生

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生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普遍的宣传鼓动和党内激进分子的组织发动工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七月事件的原因分析在当时就是有分歧的。有些观察家确信，起义与联合政府瓦解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报纸特别关注临时政府中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因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部长的分歧而辞职的问题。[①] 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论报》记者认为，联合政府的瓦解给部分部队的士兵和一些工厂的工人提供了一个要求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绝好机会。也有一些别的说法，如认为首都的骚动是由卫戍部队反对军事指挥机关对前线拒绝进攻的部队采取严厉措施而引起的。[②] 综合后来的研究，七月事件的起因是：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在得到俄军在西南战线的进攻遭到失败的消息后，准备把部分彼得格勒的部队调往前线，引起士兵的骚动；而7月2日立宪民主党部长退出政府一事造成了群众不满情绪的普遍爆发。[③]

七月事件的大背景是6月以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拖延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在6月底和7月初的时候，整个彼得格勒“到处都在谈论某种事件即将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日……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哪里和怎样发动，但能感受到整个城市都处于大爆炸的前夜。”[④]

---

① 7月2日，因策列铁里、克伦斯基、捷列申科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代表团在基辅事实上承认了乌克兰在立宪会议前就享有广泛自治，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辞职，试图以此迫使临时政府对革命自发性施加更大压力。

②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 М., 1989, с. 30.

③ *Иоффе Г. 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с. 84 – 85; *Борисов Н. С.* Ключ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93, с. 110;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 – 1940. М., 1999, с. 47.

④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 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7 月 3 日早晨，第一机枪团士兵要求本团的各连委员会和团委员会会议立即讨论武装示威问题。会议气氛非常激烈，前线的问题和政府危机问题交织在一起。会议选举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每连派二人参加，以此来代替以前的团委员会。临时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彼得格勒各工厂、各部队和克朗施塔得去进行宣传鼓动，请求援助。

第一机枪团士兵的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7 月 3 日早上 7 时，很多工厂的工人排着队走上街头。9 时，有 7 个团的士兵拿着武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示威游行的人数很快达到数万人，他们的要求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任命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部长。涌向塔夫利达宫的人群具有“散漫的”的样子，示威游行像是破坏性行为，而不像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①

除了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以外，示威群众的另一个聚集地是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起事的士兵和工人是把布尔什维克视为自己的领导者而来到这里的。托洛茨基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来，是为了得到指示、领导和鼓励；到塔夫利达宫去，则是为了提出要求甚至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威胁。”②

虽然反对临时政府、不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政策的运动是自发地开始的，但舆论普遍认为发生危机的主要责任者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全俄中执委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出结论：首都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一部分手持武器上街是受到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认为布尔什维克试图利用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不满和不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党派报纸《交易所通报》的社论作者更直接地提出了问题：“这是什么？是实现 6 月 10 日没有实现的布尔什维克的欲望？是武装发动反对临时政府和按多数原则组织的民主制度？”官方机关从示威游行一开始就将其称为起义或暴动，并试图寻找武装力量来保卫临时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③

---

①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 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② *Троцкий Л.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③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 30.

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早在6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就试图借助于强力手段和街头斗争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向全俄中执委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施加压力来解决政权问题。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市苏维埃成员沃洛达尔斯基曾要求发动群众性示威游行，以此为手段破坏政府的军事努力、保持越来越不耐烦的工人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最终迫使苏维埃多数派组织由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建议在6月10日举行工人和士兵的反战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中央同意。只是由于苏维埃大会的多数代表反对这样的示威游行，而布尔什维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抗，才最终取消了示威游行的计划。然而，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定的6月18日支持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布尔什维克还是让参加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工人打出了自己的口号。这一成功刺激了党内的激进分子在7月初组织新的行动。他们主张把对于临时政府的压力扩大延伸到苏维埃。[①]

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宣传是鼓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的，而且7月3日开始的运动也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待运动的态度是不统一的。有些领导人认为发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对已经开始的运动持谨慎态度；有些人主张采取“立即行动”的路线，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其主要代表出自于党的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一些区的委员会；还有一些人则持观望态度，没有明确表明立场。[②]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克朗施塔得水兵和驻军中都有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由波得沃伊斯基和涅夫斯基等人领导的军事组织策划了3日开始的行动。[③] 也有学者虽然强调运动是自发开始的，但也承认军事组织利用了形势。无论何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是没有疑问的。军事组织领导人波得沃伊斯基具有超级极端分子的声誉，是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第一个宣

---

① *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 1993, с. 143.

②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 – 1940. с. 47.

③ *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 1993, с. 143.

称"革命没有结束，它刚刚开始"的人。另一位领导人涅夫斯基后来谈到自己在1917年革命中的活动时，经常赞扬军事组织领导层的独立性和激进主义。他说，7月3日，"在自己的新支持者卫戍部队士兵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准的情况下非常积极地推进了运动。"①

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最有影响的激进分子是拉脱维亚人马尔登·拉齐斯，他代表强大的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早在准备未能实现的6月10日游行时，拉齐斯就特别强调，游行参加者必须全副武装。他和同样好战的中央委员、立陶宛人斯米尔加一起，呼吁党"武装起来，夺取火车站、兵工厂、银行、邮局和电报局"。在七月事件发生前、不满情绪逐渐增长的情况下，他批评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了消防队员的作用。多年以后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说，列宁中断他在芬兰乡间的休息回到彼得格勒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疯狂追求"。②

但是，试图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的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被带上首都街头进行"武装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克朗施塔得水兵没有得到具体的任务。事件的目击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认为，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没有组织、也没有下令在7月3日起事，但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准备了起义，只是没有把起义时间确定在7月初。③

需要指出的是，7月3日起事士兵中的领头人物除了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机枪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布莱赫曼在7月3日早晨就公开号召以武力推翻政府；士兵领袖之一无政府主义者谢马什科少尉在第一机枪团发动过程中也十分活跃："他向工厂征用汽车，架上机枪，开到塔夫利达宫和其他地点。……自己又带着他那一团人走出兵营；他骑马到莫斯科团的后备连去，成功地劝说他们出来……他不断地与设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的［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联系。"④ 此外，无政府

①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 38.

② *Бонч-Бруевич В. Д.* На боевых постах Февральской 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31, с. 77.

③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 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④ *Троцкий Л.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主义活动家尼基弗洛娃在7月2～3日率领首都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团去克朗施塔得，在那里发表演说，动员水兵支持彼得格勒的起义，并成功地促使一大批水兵决定和克朗施塔得卫戍部队士兵一起参加彼的格勒的七月事件。[①]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一日三变

在7月3日一天里，布尔什维克中央对运动的态度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领导运动，再到取消支持。

3日早上开始的运动很快就表现出转变为无政府主义暴乱的现实危险，迹象已经开始露头。这种情况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当天下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试图制止运动。

3日下午3时左右，机枪团的两个士兵代表来到正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里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报告说他们团已经决定发动起义。据托洛茨基说，“没人料到此事，也没人希望发生此事”。托姆斯基宣布：“那些已经发动的团的做法不是同志式的，他们没有邀请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发动问题。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议：第一，发表呼吁书劝阻群众；第二，准备一封给执行委员会的信，要求它掌握政权。在缺乏进行新的革命的愿望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谈不上发动。”[②] 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赞成托姆斯基的提议。沃洛达尔斯基以会议的名义回答机枪团士兵，要他们服从党的决议。4时，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代表们分散到各区各工厂去做工作，劝阻群众上街。呼吁书的文本送到了《真理报》，准备次日早晨印在第一版上。斯大林奉命将党的决议通知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看来，在运动初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但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例如，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领导人拉齐斯明确地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认为它回避了同临时政府的坚决冲突。[③]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劝阻示威游行的决定后，街上的群众并没有平

① *Ермаков В. Д.* Маруся: портрет анархистк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1, N. 3. с. 91.

② *Троцкий Л.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 //gosprav. ru/trotsky_ october/2/07/

③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 40.

静下来。武装的士兵坐着征来的轻型汽车和军用卡车，手持武器，打着红旗，整个傍晚在全城活动。据报载，一群士兵曾试图逮捕军事部长克伦斯基，但未成功。傍晚时分，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工人举着旗帜，许多人还带着家人，聚集在临时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的玛丽宫和塔夫利达宫前面。他们打出的旗帜和喊出的口号是："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6月18日组织示威游行时就提出的口号。

晚上7时，在塔夫利达宫召开苏维埃工人部会议。会议过程中传来消息，工人队伍和两个团的士兵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加米涅夫在会场一片骚动中登上讲台，正式表态对起义予以承认："我们没有号召发动，但人民群众自己走上了街头表达自己的意志。既然人民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中间。现在我们将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给运动以组织性。"[①]

晚上8时，全副武装的士兵高举红旗和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标语，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聚集。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拉舍维奇在阳台上发表演说，试图叫士兵们回去，而群众在底下报之以一片"打倒！"的呼声。在部队之后，又来了很多工人。在此期间，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水兵们将开往彼得格勒，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们。克朗施塔得是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基地，决定性的因素。在7月3日夜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动摇的时刻，克朗施塔得是那些坚持主张起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手中的王牌。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紧张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起义群众领导者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加米涅夫在工人部会议上表了态，但要不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号召继续"和平示威"，"这个问题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彻夜受到犹豫和动摇的煎熬"。[②]

在示威游行浪潮高涨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

---

①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 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②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 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的领导人公开支持运动。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全市代表会议以及各部队和工厂的代表，共同通过一个决议：不再试图阻止群众，而要领导运动，促使政府危机的解决有利于人民；为此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平地去塔夫利达宫，选出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大家决定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次日继续示威，“以一种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让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关注群众的意志”。当时在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意了这个策略转变。这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决定领导运动了。立刻起草了告工人和士兵书；为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准备了相应的标语，以替代下午中央委员会制止示威的声明；新决议印成传单散发。

托洛茨基认为，“这并不是号召暴动”。但他承认，“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沃洛达尔斯基，动员卫戍部队的责任则属于军事组织”。虽然党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力量对比关系还未达到能够夺权的时候，因此主张示威游行应该具有和平性质，但事实上掌握了运动进程的党内持激进立场的活动家如斯米尔加、拉齐斯、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等，以群众情绪为依据，坚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①]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突然走到了舞台中心，“完全控制了运动，并且着手组织尽可能强大和广泛的军事支持。军事组织特别要求前线的支持，派出装甲车占领关键目标和桥梁，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占领了具有重要心理和战略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②]

晚上10时30分，在塔夫利达宫前面的广场上，示威群众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些代表求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罢免10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前线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监督生产。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拒绝群众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要求，坚持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在群众和苏维埃的相持中，夜渐渐深了。局势开始发生变化，群众慢

① *Горинов и др М. М.*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М., 1992. с. 48–49.

②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 38.

慢散去，街上和各区逐渐平静下来，天平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运动看起来趋于平息，这种情况促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再次趋于克制，取消了自己几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和平示威的号召”，“他们否定了继续运动并拒绝领导它”。[①] 为《真理报》准备的标语虽然已经排好了字，制好了版，但还是把它挖掉了。结果7月4日早上出版的《真理报》在第一版上留了一个空白。

局面失控与秩序恢复

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对运动的态度表现得十分矛盾。

4日一大早工人区就行动起来，普季洛夫工厂3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妇女和孩子，凌晨3时就往塔夫利达宫去。上午11时左右开始，陆续有一些部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了50万左右。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塔夫利达宫，有些队伍半路上拐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

塔夫利达宫周围到处是人，但既不像和平示威，也不成队伍。有些武装的示威者冲进了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最新呼吁：无意识的力量希望以武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有组织的民主制度，街头运动和破坏行为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所有站在保卫革命立场上的人”都应该“等待全权的民主机构就政权危机做出决定”，即两周以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解决问题。

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气氛也达到了高潮。中午12时，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约一万人，在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下，乘坐征用的拖船和客轮开进涅瓦河口。为了这次政治进军的需要，从军火库里拿出来75普特（约2.5吨）重的军火。克朗施塔得人在涅瓦河岸登陆后，列队前进到了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等待得到指示。“克朗施塔得的水兵和首都的工人受了布尔什维克普通党员鼓动家的鼓动，热烈响应号召。……但号召示威的人并不明白是要

---

①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 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彻底推翻政府还是只以和平的方式示威。"[1] 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有人号召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征用企业、银行、仓库、商店等。[2] "在'起义者'的队伍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计划性和自觉性，也根本谈不上对运动的限制和取消"。而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派出了忠诚的部队：士官生、谢苗诺夫团和哥萨克。局势变得非常严峻，看不到任何防止普遍暴乱和大规模流血的措施。

克朗施塔得人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听了列宁的演讲后前往塔夫利达宫，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遭到政府支持者的枪击，发生了对射。随后示威游行的水兵和士兵们开始了挨户搜查。发生了抢劫，很多商店遭难，首先是酒馆、饭店和烟草店。百货商场也遭到攻击。下午，在城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和枪击。"所有这些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这一切完全不像反对资产者部长的示威，也不像主张政权归苏维埃的起义"。[3] 在混乱中总共有 400 多人伤亡。[4]

一些事件亲历者指出，在"起义者"队伍中有一些挑拨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右翼沃伊廷斯基指出："无论如何，我有这样的印象，黑色百人团挑拨者在人群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自发的暴动。"[5] 卢纳察尔斯基在给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写道："一切都出界了。黑色百人团分子、流氓、挑衅者、无政府主义者、绝望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把示威变得盲目、混乱。……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实际上在自发性面前让步了。"[6]

5 时左右，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的克朗施塔得人到了塔夫利达宫门口，要求社会主义政党的部长出来见他们。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社会革命党领袖、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去见水兵。一个魁

---

①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王国龙译，施用勤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 300～301 页。

②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1999. с. 47.

③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 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④ *Борисов Н. С.* Ключ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а. М.，1993. с. 110。也有学者认为共有 700 多人伤亡。参见 *М. М. Горино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М.，1992. с. 48。

⑤ *Войтинский В.* 1917. Год побед и поражений http://www.felshtinsky.com/

⑥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Письма мои к тебе, конеч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2. с. 35.

梧的工人用最肮脏的词语咒骂切尔诺夫并给他迎面一拳，大声叫道："给你权力，你就接着！"水兵们宣布将切尔诺夫作为人质逮捕并把他塞进停在台阶旁的一辆汽车里，以此要求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在托洛茨基出来发表讲话后，克朗施塔得人才勉强放了他。[①]

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于下午6时在塔夫利达宫开会，54个工厂共派90个代表到会。代表在发言中抗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把示威者说成反革命派："你们看看我们的标语上写些什么。……我们要求10个资本家部长滚蛋。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人。……我们要求立即没收土地，立即实施监督工业。我们要求解决威胁我们的饥荒问题"。"你们见到的不是什么叛乱，而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示威。我们要求土地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我们要求政权转交苏维埃"。[②]

但是掌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想走上冒险的道路，他们认为政权交给苏维埃意味着要宣布和平政策、与协约国决裂、与本国资产阶级决裂并限于完全孤立，局面将不可收拾。策列铁里坚持："目前局势使得在彼得格勒环境之中不能实行任何新的办法"，所以只有"承认现存的政府……两星期之内召集一个苏维埃非常大会……在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开会，最好是在莫斯科"。[③]

布尔什维克犹豫不决

在4日彼得格勒局面明显失控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非常矛盾的。多伊彻指出："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游行队伍中的布尔什维克带头鼓动，组织得最好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动乱中表现最为突出等。[④]

---

① *Милюков П. 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859－1917). Т. 2. М., 1990. с. 334.

② *Троцкий Л.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③ *Троцкий Л.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④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301页。

列宁对于事件的态度自然是最为引人关注的。七月事件开始时，列宁不在彼得格勒。他在6月27日离开彼得格勒去了芬兰的涅伊沃尔村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打算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稍微休息几天，并为预定在7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作准备。

7月3日首都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马克西米利安·萨韦利耶夫去向列宁报告情况。鉴于彼得格勒形成了严重局面，而且党已经参与其中，必须立即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早间列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他刚听完最近事态发展的报告，上万名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还是不得不向坚持己见的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让步，同意与水兵见面。但列宁显然很不情愿，在走向阳台准备向水兵讲话时，他多次对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几位领导人嚷道："你们全都该打。"[①] 列宁对克朗施塔得水兵先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然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克朗施塔得人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多年之后，一位当时聆听列宁讲话的人回忆说：对很多水兵来说，列宁要求示威游行保持和平性是很意外的，他们中的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不能理解，武装起来并渴望战斗的队伍怎能满足于成为普通的手持武器的队列呢？[②]

有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布党中央和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形势的人质"、"党内局势的人质"。[③] 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就如列宁对水兵们的讲话所传达的信息是模糊的一样，他对当前运动的态度也是不很明朗的。在4日回到彼得格勒以后直到5日凌晨最终决定停止示威以前，列宁的立场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④] 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

① *Кедров М.* Из красной тетради об Ильиче.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ладимире Ильиче Ленине. М. 1956. т. 1. с.485.

②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37.

③ *Калягин А. В.* Ию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17 года: причины, характер, последствия. http://media.ssu.samara.ru/materials/russia_1917/part7/page1_7.html

④ *Горинов М. М.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с.49.

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同时也要准备好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撤退。[1]

当时与列宁十分接近的季诺维也夫在回忆录里说，对于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问题在现在的这场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解决了，事情只在于选择合适的时间。在7月的日子里，整个中央都曾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列宁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人民的愤怒浪潮高涨时，列宁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布尔什维克上层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列宁笑着对我们说，我们现在不试一试吗？但他又马上补充说，不，现在不能夺权，现在还没到时候，因为前线的士兵还不是都站在我们一边"。[2]

在七月事件中，列宁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他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当时的情况是，临时政府在首都工人和士兵中还有一定的支持；苏维埃领导层依旧不愿向群众压力让步；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外省居民还是前线士兵都不支持把政权转交苏维埃，在任何情况下"全国所有重要力量"都应该为继续战争和拯救革命共同努力。列宁注意到了这种局面，他认为外省和前线的情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但那里的情况并不乐观，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得到的支持较弱，很多士兵保持着对苏维埃领导层的信任。这种心态和这种判断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就是对当前运动的矛盾立场或犹豫不定。

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后几个小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知道了后来对事态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两个新事实：第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已向前线部队发出呼吁，要求恢复彼得格勒的秩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北方战线军队委员会已着手组织混合分队立即派往首都。第二，临时政府准备指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按照德国的指示组织七月起义，并以此动员卫戍部队对付布尔什维克。

面临这样的情况，采取谨慎的政治策略显然是必要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小心从事，他们反对可能导致与温和社会主义者彻底分裂的措施，反对不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

①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 38.

② *Зиновьев Г. Н.* 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г., 1918. с. 56－57.

立场而夺取政权。早在3日晚上进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确信已无法制止发动的情况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接受了党应该支持群众运动并控制它的意见，但同时他们坚持，示威游行必须是和平的。

原先持强硬态度的彼得堡委员会部分成员对7月4日是否采取更积极行动的问题也开始趋于谨慎。同工人和士兵有联系密切的沃洛达尔斯基明确指出，这些社会群体还保持着对苏维埃的忠诚，他不想站出来支持那种不顾苏维埃领导层的意志、推翻临时政府的意见。[①]

但与此矛盾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已经投入了战斗。特别是党内的激进力量打算放手一搏，7月4日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期待中央委员会发出信号，准备“把事情干到底”。[②]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③]、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保卫临时政府的分队，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时，原先保持中立的一些卫戍部队团队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早晨6时左右，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彼得格勒的街道很快恢复了常态。到7月6日早上，工人们复工了。从前线调来的支持临时政府的部队相继开进了彼得格勒。

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当前形势和党的立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考虑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坚定态度、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仍对苏维埃寄予希望、卫戍部队还有一些部队情绪的变化、前线部队中还缺少可靠的布尔什维克核心、群众意识到“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及他们无意明日再继续斗争等等

①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 39.

②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 40.

③ 据笔者考察，关于德国经费问题，现有的资料和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把一笔经费用于在俄罗斯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分是给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此情况并不了解。尽管列宁本人知道此事，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影响了他的立场或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至于临时政府关于七月事件是由列宁和德国人一起策划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

情况，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示威游行。[①]

5日凌晨2~3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5日早晨出版的《真理报》最后一版上刊登了一个简单声明："示威游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我们结束示威游行。"[②] 这个声明本身就是以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以"目的已经达到"作为结束运动的依据，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和参加运动的士兵、工人的目标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主张谨慎从事的领导人虽然认为夺权条件并不成熟，但也不排除相机行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这两派的目标最终都未能实现。

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从4月以来党员人数的增长也停止了。但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只是其夺权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五 走向武装夺权的十月

七月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它导致了俄国国内局势根本性的变化。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党的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现实的严峻。列宁认为："我们还不知道俄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复到君主制，是加强资产阶级，还是使政权转入一个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是谁都不知道的。"[③] 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显然是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他提到了多种可能性，而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必然性。

但是，布尔什维克经历了七月事件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两个月时间，就

① 关于7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详细情况至今未见具体材料，有可能是当时未做会议记录。

②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 42－43.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528页。

恢复甚至加强了力量，到9月初控制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苏维埃，迅速地接近了政权。这其中的原因，一般史学论著通常都以布尔什维克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发挥的作用来解释，但这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形势的变化，即右翼力量因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而受到削弱，而群众情绪因政府迟迟不能解决迫切问题而趋于激进化；二是布尔什维克抓住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领导层的弱点，及时调整了策略，修改了口号。

国内政局的左倾化

七月事件过后，李沃夫辞去总理职务。新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中有8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7人来自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政党。这个产生于中派右翼的“民主专政”表示，为了“维护新的国家制度，使其免遭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危害”，不排除采取最极端措施的可能性。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策列铁里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对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权力局面已经结束。

8月中旬，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务会议，希望动员全社会力量再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持抵制立场，未派代表参加。克伦斯基在会上呼吁实行妥协与和解，而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等军队将领则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恢复秩序。国务会议并未能起到巩固政府地位、稳定国内形势的作用。

由于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不仅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军事专政，甚至在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寄希望于实行更强硬的政治方针的倾向。8月20日，立宪民主党中央以多数票通过了支持建立军事专政的决定。米留可夫认为，“生活将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关于外科手术不可避免的思想。”[①] 他断言，克伦斯基将同科尔尼洛夫妥协，因为他

①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197.

"别无选择"。[1]

在一番犹豫之后，克伦斯基批准设立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以及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8月24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随后，他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军事和民事权力。于是，克伦斯基通电全国，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反叛，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来自苏维埃、工会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携手平息叛乱。在彼得格勒派出的宣传员的影响下，克雷莫夫部队中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克雷莫夫无法指挥部队，开枪自杀。9月1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逮捕，叛乱遭到彻底失败。当天，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并亲任总司令，同时宣告俄罗斯为民主共和国。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案，宣布支持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

由于八月叛乱的失败，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总体上出现了左倾化。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部分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2] 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

---

①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197.

② 参见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174页。

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稍后，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是列宁在七月事件后调整策略所取得的成功。

布尔什维克修改口号

从二月革命以来，列宁一直把苏维埃视为夺取政权的杠杆。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虽然收回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它没有放弃争取苏维埃领导权的努力。为了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苏维埃排挤出去，布尔什维克需要把这些民主派政党与作为反映群众意愿的组织苏维埃区分开来，需要在最迫切的问题上满足群众的直接要求，同时要修正甚至放弃自己原先的口号。分析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策略口号的变化，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短时间内不事声张地完成了这个调整过程。

战争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战争造成的重负和灾难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但各种政治力量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由于美国的参战，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协约国最终将获得胜利。自由主义政党希望与盟国一起战斗到胜利，俄国工商阶层已在考虑如何享受胜利的果实；革命民主派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在持革命护国主义立场的同时，希望尽快从战争中脱身，但在怎样做到这一点上却无能为力。

布尔什维克自 1914 年 8 月起就提出了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且很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够夺取政权。但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并通过这个转变来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认为“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①] 在 6 月 22 日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表示：我们“不同任何资本家单独媾和，首先是不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和。……我们不承认同德国资本家的任何单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 436 页。

独媾和，不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也不承认同英法帝国主义的任何单独媾和"。[1] 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这一立场：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也不进行谈判。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8月初结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仍然没有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主张，只是继续强调"只有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导致民主的和平"，"真正民主的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等比较空洞的说法。但是，到8月底，这种模糊性就不复存在了，布尔什维克开始采用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2]

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在人民中间，"给农民土地"这个口号是广为知晓的。农民要求在劳作于土地之上的人之间平均分配土地，而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的要求平分土地。四月代表会议决议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即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党忠告农民要有组织地夺取土地，绝不容许有一点损坏财产的行为"。[3] 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不过，到8月，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政权"的决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4]

"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对此布尔什维克的理解与无产阶级群众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第六次代表大会强调要对大企业实行国有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59～260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81～482、510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40、441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10页。

化，逐步把工人监督发展为对生产进行完全的调节。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作出了新的表示，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1]

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是否定联邦制思想的，认为联邦制将会使民族差别长期存在下去。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重新考虑联邦制问题，在6月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让俄罗斯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此后他不断谈到了使俄罗斯联邦化的问题。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例如，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很活跃，不过一直对它的民族性“视而不见”。但在8月22日，布尔什维克很突然地以独立党团的名义加入了乌克兰中央拉达。[2] 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3]

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的脉搏，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个变化“对以后事态的影响甚至大于科尔尼洛夫叛乱”。[4]

武装夺权问题上的分歧

9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联合作出决定，“召集一切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民主机关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政权组织问题，这一政权应能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5] 9月14日，全俄民主会议召开。全俄民主会议排除了资产阶级分子，1000余名代表均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86～487、510页。

② *Станисла Кульчицкий.*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Чужие лозунг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 День. 18 октября 2003.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10页。

④ *Станисла Кульчицкий.*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День. 18 октября 2003.

⑤ 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商务印书馆，1987，第59页。

来自苏维埃、合作社、自治机关、工会、土地委员会等民主组织，几乎都分别属于某个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团体。布尔什维克只在少数大城市、芬兰和波罗的海舰队有较大影响，因此只有89名代表参加。

会议在政权组成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没有自由主义者的政府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些赞成加米涅夫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派、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建立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则要求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为了摆脱困境，会议主席团于9月20日决议成立经常性的代表机关——全俄民主理事会，即预备议会，由它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控制政府。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在10月初召开的预备议会上，托洛茨基言辞激烈地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列宁在9月末或10月初回到了彼得格勒，把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0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武装起义决议的依据，除了国际形势、军事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①]

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反对的意见仍然相当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怀疑武装起义能否成功，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10月11日致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组织的信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关于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俄国大多数工人和大部分士兵都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又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②]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12页。

② 参见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64～72页。

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忙去接近它们。"[①] 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②]

布尔什维克将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是公开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和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在会议上谈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 月 20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

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们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这使得起义得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的支持。克伦斯基在 10 月 24 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唐恩认为，这是在最后一分钟向政府指明的可能得救的道路，因为这些措施的实行将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唐恩和郭茨立即赶到冬宫，要求克伦斯基马上公布这一决定，但遭到拒绝。

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 6 人，伤

①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 М., 1989. с. 225.

②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Письма мои к тебе, конеч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2. с. 42.

50人。[1] 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51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崩得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嚣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冷淡而轻蔑地表示："让他们统统走开吧！他们都不过是些废物，就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2] 这个场面意味着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之后，俄国主要政治力量达成协议，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国家治理形式并解决和平、土地、民族等重要问题；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从1917年3月2日到1918年1月6日，立宪会议问题是影响群众的情绪、政党的活动、政府的政策以至俄国革命进程和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之一。

临时政府与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已传入俄国，在先进贵族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传播。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都把立宪会议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20世纪初

---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кн. 1, М. 1967. с. 321 – 328.

② 参见约翰·里得《震撼世界的十天》，郭圣铭译，人民出版社，1980，第107～109页。

期，俄罗斯几乎所有的政党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都赞成和支持立宪会议的口号。1917 年二月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后，立宪会议思想在俄国社会得到广泛传播。俄国主要政治力量意识到，俄罗斯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召开立宪会议，由立宪会议来确定国家治理方式，解决国家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自由主义政党在二月革命期间曾力图挽救君主制度，但在这一努力失败之后，很快转而支持立宪会议的口号。自由主义政党认为必须由立宪会议来确认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制定国家宪法、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但也有一些立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立宪会议应该成为一次性的现象：通过宪法，确定俄罗斯国家体制的类型，而“不能使自己承担‘全部政权’的职能”，“因为在其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人民主权”。[①]

在苏维埃中占有优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巩固革命成果与立宪会议结合起来，认为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是保护人民利益和为社会主义进一步斗争的最好形式。孟什维克把立宪会议视为“革命的花冠”，社会革命党把立宪会议称为俄罗斯“全部土地的会议”。他们认为，政权和人民这两种力量将在立宪会议上实现联合，创造“俄国社会重建的奇迹”。[②]

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期间也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随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号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这并非意味着取消立宪会议的口号，布尔什维克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立宪会议选举和召开的保障，是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

在召开立宪会议成为各主要政治力量共识的背景下，3 月 2 日晚上，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会谈，明确了关于立宪会议法律地位的三项原则：①普遍的自由的选举（“全民的意志”）；②立宪会议享有解决国家生活的主要问题包括确定国家治理形式的特别权力（在立宪会议之前“不预先解决”）；③只有立宪会议自己能够决定自己任务的范围和界限（“俄罗斯土地的主人”）。由此也明确了临时政府的法

①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раницы документа. http://www.actref.ru/jur/the_constituent_assembly/m/59762/1.1.html

②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раницы документа. http://www.actref.ru/jur/the_constituent_assembly/m/59762/1.1.html

律地位以及对其活动的限制：新政府为临时政府，它将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管理国家，它无权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它应为立宪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1]

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在3月3日的声明中宣布将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3月5日作出了“关于成立特别会议起草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决议”，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科科什金被任命为特别会议主席。特别会议于6月底形成了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条例草案第一部分[2]，并认为“从未有过如此广泛地实现普选原则的法令，俄罗斯在这方面无疑是走在其他国家前面的”。根据选举条例，立宪会议由居民根据普遍的、不分性别选举权平等的原则，通过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800名代表组成。年满20岁的公民和年满18岁的军人享有选举权。

5月下旬，临时政府决定成立直属政府的立宪会议大厦改建委员会，由临时政府商业和工业委员（部长）斯捷潘诺夫任主席。7月20日，临时政府批准了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第一部分，同时责成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做好编制选民名单的准备工作和选举的技术准备，决定在参政院内成立一个特别机构以解决立宪会议选举条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3] 为解决立宪会议召开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临时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法律会议。法律会议研究了立宪会议开幕式的程序和立宪会议开幕之后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问题，向临时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与立宪会议的权力本质有关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议，强调立宪会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意愿”。法律会议还草拟了“关于保卫立宪会议安全和维护立宪会议大厦秩序的暂行规定”、“关于组建立宪会议临时执行机关的法律草案以及立宪会议法令颁布方式的草案”等法律文件。[4] 临时政府下属的制定根本法草案特别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研究了公民自由权利宣言及其保障措施，并形成了相应的意见。

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法律作用和一般政治意义是重视的，也为立宪

---

①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http://refhist.ru/history/the_constituent_assembly and _ its_ historical_ value/m/28516/1. 3. html

② 立宪会议选举条例完成起草并公布的只有这一部分。

③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я, 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1, с. 11－12.

④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я, 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23－27.

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即便在国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但是，临时政府未能满足群众要求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解决一系列迫切问题的愿望。在临时政府存在的整个时间里，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都未能成为现实，而人民群众在等待中逐渐失去希望和耐心。

在有关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问题上，下述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用拟议中的立宪会议来回避解决一切涉及大多数居民根本利益的实际问题，如和平、土地、工人监督、民族自治等。……临时政府及支持它的各政党竭力拖延立宪会议选举，推迟其召开的日期……真正的原因在于，选举的政治环境使这些民主主义者非常担心选举结果会对自己不利。"①

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临时政府在2～10月期间几经改组，其构成有较大变化，而且自由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政党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不能说他们都是因担心选举结果对己不利而拖延选举，譬如社会革命党就不太可能有这种担心。

立宪民主党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从初夏开始确有变化。在看到俄罗斯社会分裂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一些立宪民主党人开始认为，把立宪会议视为人民共同意志表达者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立宪民主党在5～6月间举行的城市杜马选举中表现不佳，确实使一些人担心未来的立宪会议将削弱他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权力。因为农民和士兵——穿军装的农民——的代表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而农村和军队又是立宪民主党的影响特别薄弱的地方。"立宪民主党人需要争取时间，以便尽可能使自己的党成为农民所熟悉的党"。② 立宪民主党希望把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希望那时胜利将使革命降温，也将加强作为胜利组织者的立宪民主党的分量，还将有助于在爱国主义浪潮中熨平阶级和民族矛盾。

但是，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自由主义者占据绝对优势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意识到国内局势的紧张程度在加剧，必须给群众一个解决问题的确定的时间预期。6月14日（27日）临时政府宣布，立宪会议的选举定于9

① 参见 *Иоффе Г. З.* Третьего не дано: Почему было распущен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http://www.rus-lib.ru/book/35/16/047-066.html

② W. S. Moss, "The February Regime: Prerequisites of Success." *Soviet Studies* 1967, vol. 19, No. 1, p. 104.

月17日（30日）举行。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就任总理并组成了温和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联合政府。8月9日（22日），决定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直到此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仍具有压倒性影响，没有理由因担心选举失利而推迟选举，尤其是最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在俄国农村有着深厚根基，推迟立宪会议选举不太可能为其带来利益。

临时政府未能如群众希望的那样尽快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它对立宪会议选举时间的安排与群众对立宪会议的迫切期待不相符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

第一届临时政府任命的负责制订有关立宪会议法律的特别会议主席科科什金认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首先需要完成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工作，如制订选举法、建立地方选举机关、编制选民名册等，此外还应“有时间进行选举宣传，以便居民能以觉悟的态度对待选举”。他的结论是“立宪会议未必能在夏末秋初之前召集”。[①] 组织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普遍的选举，准备工作需要时间，这是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尽管很多人认为准备工作进展迟缓，但未必是有意拖延，自食其言。

然而，在革命浪潮高涨的年代，以月计算的等待时间可能已经足以引起群众的不满、焦虑和怀疑。临时政府忽视了革命仍在进行之中、自发性支配着事态发展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没有意识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的迫切性，没有从革命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立宪会议对于革命进程和国家前途的影响。这是它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重大问题之一。

但导致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政党未能按人民的希望尽快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的最主要原因，也许是战争问题的牵制。

二月革命的爆发说明俄国人民由于战争而处于毫无出路的状态，已经不愿意再打下去。全国已充满对战争的疲惫和不满，继续战争的政策不符合俄国人民的愿望。而临时政府和先后参与其中的自由主义政党和温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总体上都坚持战争政策。不少自由主义者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因为“俄罗斯的荣誉和尊严不容许宣布与盟国的条约只是一纸空文”；因为英、美、法等盟国对于俄国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

① *Кокошкин ф. ф.*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Пг. 1917. c.6 –7.

如果盟国失败，就可能导致旧制度在俄国复辟；因为“只有战争的胜利才是可能把所有俄罗斯人联合起来的共同目标”。[①] 四月危机后加入政府并逐渐加强了自己在政府中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排除了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和约会被视为对盟国民主的英国和法国的叛卖；同德国签订和约还可能使年轻的革命俄国受到威胁，德国的胜利将导致君主制的复辟和新的革命制度的毁灭。[②]

自由主义政党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一致同意继续战争，其逻辑结果就是延缓召开立宪会议，因为召开立宪会议就意味着必须解决包括土地问题在内的所有迫切问题。根据3月2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国家治理形式以及和平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都应由立宪会议来解决。他们担心，在当时俄国军队已经涣散而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等重要问题，不仅将触动在前线作战的军官阶层的利益，而且也会让农民士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回家，而这将意味着前线的崩溃和普遍的混乱，意味着俄国的战败。为了保证战争的进行，他们都不急于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就这样，由于受到继续战争政策的牵制，临时政府、自由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延缓了对俄国社会进行民主改造的日程，其政治后果就是削弱自己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力。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2～10月间，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选举如期举行。在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很多地方提到了立宪会议：致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苏维埃政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土地法令具有临时性质，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③] 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

① T. Riha, *Russian European: Paul Miliukov in Russian Politics*. N. Y. 1969. pp. 310－313.

②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第7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5、18、22页。

“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1]

1917 年 10 月 27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 11 月 12 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 715 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 370 名，布尔什维克 175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 40 名，孟什维克 15 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 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2] 按照党派提出的名单进行的选举，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选举之后，主要政党立即表明了自己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选举中得到多数的社会革命党首先表示，应该把全部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在选举中得票较少的立宪民主党也表示支持立宪会议并赞成在预定日期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公开表示不支持立宪会议，在知道选举结果后更是如此。但其中以卡姆科夫、施泰恩伯格为首的中派坚持认为立宪会议可以作为人民政权的一种形式加以利用。即便在人民委员会对立宪民主党采取措施后，施泰恩伯格仍坚持认为，应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立宪会议，否则立宪会议就会变成一个扩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根据 1917 年 4 月确定的方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因此，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

---

① 伦纳德·夏皮罗：《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 205 页；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я, 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1, с. 7。

② 与立宪会议选举相关的数据有不同说法。关于应选出的立宪会议代表人数，一般都引用 800 人这一数字，这是选举条例规定的。Л. Г. Протасова 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临时政府先前确定 800 人，但后来增加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哥萨克区和军队的名额，总共应选出 820 名代表。关于实际被选入全俄立宪会议的人数也有争论，分别有 767 人、715 人、707 人等不同数据，本文取 715 人之说。但关于主要党派的当选代表人数基本是一致的。参阅 *Протасов Л. Г.*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 1997. с. 164, 295; *Знаменский О. 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Л., 1976. с. 270 - 273;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РФ (вариант). http://refjustice.ru/law/electoral_system_in_the_russian_federation_a_variant/m/21419/1.46.htm

变力量对比关系。11 月 21 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送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于当天通过，此时立宪会议选举工作尚未完全结束。这个法令规定，“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城市杜马、地方自治机关以及一切代表机构的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也不例外。苏维埃应根据有关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新当选的代表从当选时刻起代替以前选出的代表”。[①] 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如米留可夫、阿夫克森齐耶夫、郭茨等。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

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 月 8 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②] 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③] 苏维埃政权随即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

11 月 23 日，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11 月 26 日，在临时政府确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 11 月 28 日的前两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根据全俄选举委员会政治委员乌里茨基的邀请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 400 人，会议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

11 月 28 日是原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组织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同时有约 60 名立宪会议代表进入塔夫利达宫的会场，宣称自己为立宪会议部分成员会议，将每天在塔夫利达宫集合直到足够数量的代表到达并认为自己合法为止。会议很快被驱散。当天，立宪会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拒绝在乌里茨基领导

①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я, 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1, с. 56－57.

② *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 1993, с. 153－154.

③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 379 页。

下工作。晚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其领导人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进行特别管制。11月29日公布的“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强调，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资产阶级的叛乱都将被镇压。[①]

随着围绕立宪会议开幕问题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采取了更坚决和果断的措施。12月1日，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当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由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一切事务。人民委员会还宣布，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领导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那里登记并取得塔夫利达宫办公室发放的临时证件。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1917年11~12月间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苏维埃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两天，1月3日，通过了又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②]

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③] 在

①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я, 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с.57 –58.

②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 1. М., 1957. с. 323, 324; *Протасов Л. Г.*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 1997. с. 288, 307.

③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http://refhist.ru/history/the_constituent_assembly_and_its_historical_value/m/28516/1.1.html

塔夫利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①]立宪民主党因被苏维埃政权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未能出席会议。右翼力量的代表也没有出席会议。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冲突主要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展开。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②]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这个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交出去。实际上，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③] 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做出否定性评价并最终予以驱散，与布尔什维克党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认识和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定关系。

---

① *Знаменский О. 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созыв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шения. Л., 1976. с. 339.

②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傅惟慈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22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15页。

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建党初期就存在分歧，而且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反映了这种矛盾：纲领确认党的最近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并承认各项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原则；但又认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要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当时，大会在一些代表的嘘声中宣布，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在不超过两周的时间内驱散不合它心意的议会。[①] 在10多年后，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驱散立宪会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卢森堡在评论俄国立宪会议问题时曾经指出，"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不应该用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专政来反对民主。[②] 这些观点和这种意识正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中比较淡漠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的问题从思想认识问题转变成为现实的政治实践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其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高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同时也否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就已确定并在党的名称中得到体现的基本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主张和坚持的社会政治变革目标。

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影响其政策的重要因素。在《火星报》讨论党的纲领时，普列汉诺夫曾提出过一个比较谨慎的表述："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列宁认为，"这显然不够。资本主义已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③] 一战期间，列宁一度修正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中等偏下的国家。二月革命后回国以前，列宁在给瑞士工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卷，第37～38页；普利马克：《另一个列宁》，《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1期，第30页。

②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16、32页。

③ 参见普利马克《另一个列宁》，《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1期，第30页。

人的告别信中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①] 但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就提出，俄国革命必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而在迅速夺取政权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标志的立宪会议马上被视作完全过时的东西。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超前性。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并不能掩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这一事实。在十月革命成功5年之后，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不能跳过某个发展阶段。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②]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对立宪会议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1917年12月2日选举产生的领导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临时局主要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林、李可夫等人，他们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革命的结束阶段，主张人民委员会停止对立宪会议的召开和活动进行控制。加米涅夫的支持者表示，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领导党团是不合适的。他们把立宪会议视为保住民主力量统一的唯一机会，准备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实现联合。[③] 列宁认为这些意见是不顾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现实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为此他坚持在12月11日重新选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临时局，并在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其中强调"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形式"。[④] 列宁的思想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基本方针。布尔什维克内部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于俄国实际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

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

---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90页。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677、691～692、698页。

③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я, 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6－7.

④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77页。

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为驱散立宪会议进行准备工作期间，士兵和工人中曾发生过抵制行动。1月3日，军事人民委员克雷连科亲自到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为驱散立宪会议做动员，希望瓦解他所说的“这里的军营充斥的严重的反革命情绪”。但在这里，他没有获得成功。社会革命党得到布尔什维克要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上街游行反对立宪会议的消息后，于1月3日在第二波罗的海舰队举行会议。在一些有感召力的发言之后，一个水兵情绪激昂地叫道：“弟兄们，同志们，让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人民的立宪会议。”下面叫道：“我们宣誓！”“跪下，同志们，跪下！”数千水兵双膝跪下：“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立宪会议。”水兵们履行了自己的誓言，1月5日没有上街。[①] 在1月5日前一个工厂集会上，主持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号召：“同志们，我们必须、也能够驱散立宪会议，因为已经很明显，立宪会议浸透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并倾向于反革命。”但他遭到最高纲领派成员、工人施马科夫的反驳：“不对，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对。要知道你们是在破坏全体人民的特有权力，是人民选出了这个全俄会议。如果你们这样行事，那么请记住，俄国人民和俄国无产阶级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这种暴力。”[②] 立宪会议被驱散后，从各地仍然继续不断地给立宪会议发来祝贺和支持的信件。在很多城市发生了保卫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在莫斯科等地的示威中有人员伤亡。高尔基写了《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认为立宪会议是一个将给全体俄国民主派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机构，他把1918年1月5日比作1905年1月9日，代表了左翼知识阶层对立宪会议的态度。直到1918年1月底，立宪会议的话题仍未从报刊上消失。

---

① *Соколов Б.* Защит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собрани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емуары. М., 1991. с. 368.

② *Соколов Б.* Защит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собрани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емуары. с. 365.

但另一方面，也有对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持肯定态度的力量。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不仅事先认可了驱散计划，而且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上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致行动。在苏维埃三大上支持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驱散立宪会议法令的，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外，还有部分以马尔托夫、唐恩为首的孟什维克左翼。地方苏维埃对驱散立宪会议一事也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莫斯科苏维埃在1月8日决议中赞成驱散立宪会议，认为“立宪会议一开始就试图以自己的工作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斗争成果从人民那里夺走”。著名社会革命党评论家斯维亚季茨基指出，右翼力量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也高呼“打倒立宪会议”，但“右翼资产阶级出版物叫喊‘打倒’只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满足他们。……人民权力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万岁，不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打倒。……在最后时刻，我们社会力量的左翼和右翼都背叛了民主主义”。[①]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驱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强烈的反应。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米诺尔谈到了他们离开塔夫利达宫以后的内心感受：“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要知道，如果人民不支持我们，不以威严的声音表示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人民保持沉默。”[②] 斯维亚季茨基也深深地为“人民对我们被驱散的那种冷漠”而感叹，他认为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对我们挥挥手说‘回家去吧’”。[③]

俄国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有关系的。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

①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http://historysibsuti.narod.ru/ув7.htm.

② *Знаменский О. 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созыв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шения. Л., 1976. с. 346.

③ *Знаменский О. 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созыв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шения. с. 350.

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1]

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这种情况正是二月革命后的现实。“在俄罗斯，形成西方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所必须的社会文化前提还很薄弱。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2] 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意识发展更加缓慢。虽然在1917年革命中许多省的农民苏维埃都热烈讨论共和形式，通过支持共和的方案并递交给当局，但作为一个阶层，农民群众的政治思维还是不发达的。一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服役的士兵写道：“农民对政治一无所知，尽管农村中有民主代表如苏维埃宣传员，农民也会很快就忘记告诉他们的有关自由民主、共和政体、君主专制的含义。”一位宣传员总结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作为公民应有的教育。”[3]

很多农民和士兵不明白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区别，他们支持共和国，又把实现自由和拥有土地的理想寄托在“农民的国王”或者其他独裁者——解放者身上。革命期间在俄国的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记载了一个士兵对他说的话：“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国，但领导我们的得是个好沙皇。”布坎南认为“俄国政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绝对的民主政治”。美国人弗兰克·戈尔德在其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名士兵说他希望能够选举总统，而当问他会选谁时，他的回答是：沙皇。在军队中常会有这样的口号：“我们要选举沙皇。”一位孟什维克党员描述了自己在弗拉基米尔一次军事集会上的经历：“我的发言内容是关于战争，和平，土地，以及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种种好处。当我的演讲和大家的欢呼都平息之后，忽然有人高呼，‘我们要您来做我们的沙皇’，士兵中立即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我拒绝了这顶罗曼诺夫的王冠，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多么

---

① *Бурганов А. Х.* Была 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здан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 5. с. 26.

② *Протасо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 1993. N. 5. с. 26 – 38.

③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9, p. 128.

单纯而又无知的人们，多么容易被控制的人们！”①

群众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是决定立宪会议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俄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立宪会议有不同理解。对于中间阶层和民主力量来说，主要是通过立宪会议以和平改革方式克服俄罗斯的危机、建立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而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而言，立宪会议的吸引力体现在它可能成为比较平均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工具。

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立宪会议对于前线士兵群众来说是某种未知的、不清楚的东西。他们的兴趣确定地、不掩饰地集中于苏维埃，那是一种贴近他们并使他们感到亲近的制度，就像他们的农村村社大会”。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通过社会活动家和出版物的持续不断的宣传和解释，在短短几个月里，群众的意识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全俄立宪会议的概念。很多群众集会经常一致响起“全部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这种情况在社会革命党影响较大的军队中特别明显。“6~7月间……各部队作出的决议的第一点往往就是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越来越多的人确信，只有立宪会议能给他们带来和平、消灭战争，让他们回家。这一时期通过的决议经常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同意坚守阵地，但不能超过11月，那时代表们应该召集起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立宪会议决定继续战争那该怎么办呢？这引发了某种不安，可以感觉到对立宪会议的信念是有限度的，是同最关注的问题——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苏维埃的贴近表明人民权力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更亲切、更明了。”②

农民对立宪会议的看法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把立宪会议看作是能够支持他们的土地要求的国家机构，称立宪会议为“农民意志的代言人”、“土地和自由的拯救者”。有时，农民还会天真地认为，只要大会有一位智慧的老农，只要立宪会议囊括足够的有威信有能力的农民，它就一定能够带给农民土地和自由。农民经常认为，立宪会议应当以独裁者的身

①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pp. 72 – 73.

②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http://refhist.ru/history/the_constituent_assembly_and_its_historical_value/m/28516/1.3.html; *Соколов Б.* Защит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собрани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емуары. с. 332 – 333.

份“掌握全权”，“成为全俄罗斯土地的主人”。[①] 显然，农民对于立宪会议的支持并非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信念，而只是因为它是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主人。亲社会革命党的《自由言论报》文章承认：“立宪会议……没有抓住群众，没有吸引群众，没有渗入到人民的心中，它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只是一个外国玩具，可以玩一玩，但不能当真。”[②]

相比之下，工农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工农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立宪会议也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在十月革命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仍有占全部选民约半数的 4400 万人参加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这个事实表明，至少俄国人民的半数是认可通过立宪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

由于处在战争和革命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沙皇制度瓦解以后的 8 个月时间里，无政府主义泛滥，二月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任务而言，仅有政治自由而缺乏相应社会经济前提保障是远远不够的。”[③]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薄弱，是影响俄国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

①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p. 141.

② *Протасов Л. Г.*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 1997. с. 320, 321.

③ *Шелохаев В. В.* История, деформированная властью, или хождение по кругу. Кентавр. 1994. N. 2. с. 16.

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

——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

华东师范大学　朱小萍、余伟民

1921年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军事基地——喀琅施塔得发生反政府兵变，苏俄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坚决地镇压了兵变，并且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一发生就宣称该事件是“受外国势力支持的白卫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反革命叛乱”，这也是此后苏联政府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一贯的官方说法。

与此同时，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绝大部分档案材料则被政府严加保密。由于缺乏资料，史学界对于这一在苏俄早期政治进程中影响甚大的事件几乎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政府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者无罪，并且要为他们修建纪念碑。[1] 时隔70年，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竟然如此大相径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同时，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也成为人们心中关切的问题。

本文根据1990年代解密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苏联档案文献，对喀

① Известия, 11 январь 1994г..

琅施塔得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客观的再研究，并试图重新认识喀琅施塔得事件对于苏联历史的深远意义。[①]

1921 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1921 年 4 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 Я. С. 阿格拉诺夫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调查结果的报告中，称"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是今年 2 月下旬在彼得堡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②] 阿格拉诺夫自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称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起义"，但他却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当时俄国的整个局势密不可分。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即面临协约国集团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武装叛乱。在国内战争的非常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 年 9 月 2 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布：在战争形势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全体居民都要无条件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国内所有的资源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18 年夏至 1920 年春为第一阶段，1920 年春至 1921 年春为第二阶段。前一阶

---

① 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再研究最有价值的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出版的两部专题文献资料集：*Яковлев А. Н.*（*общ. ред.*）Кронштадт, 1921,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7。该文献集内容包括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以及前后与此相关的苏俄政府重要会议记录、公告、军事命令、函件；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政情、军情报告；苏俄肃反机构的审讯笔录、重要公告和决定；彼得格勒军区、波罗的海舰队负责人与托洛茨基等人以及苏俄高层之间的信件、电报、通话笔录；喀琅施塔得驻军的大会决议、重要公告及呼吁书；彼得格勒军区巡回审判庭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与者、同情者、人质、进攻中的临阵脱逃者等的审讯和判决；国外报刊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报道等。该文献集的部分重要文献已译成中文，参见沈志华总主编、余伟民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 7 卷；*Кудрявцев И. И.*（*отв. сост.*）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9。这本文献集共收录 839 件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公开。

② ЦАФСБРФ（俄罗斯联邦安全机构中央档案馆），ф. 114728, Приложение, 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7 卷，第 114 页。

段主要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应急性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但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为“战时经济”的合理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1] 从客观效果上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作用，也为战争条件下强化专政机器、打击反对势力、稳定和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第二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将战时体制延伸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集聚战争资源上取得的成功以及这一战时体制中体现的某些“共产主义”的做法使得列宁一度以为，“应当用军事办法来解决经济任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一定能使我们获得巨大成就，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2] 因此，到 1920 年 3 月，因战争的非常形势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战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被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政策大加推广。尽管 1920 年 3 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放心大胆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任务”[3]，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共（布）中央决定：强化余粮收集制。按照这一指导思想，1920 年 9 月，俄共（布）中央给各省省委的信中强调：“下达给乡的征集额，就是余粮额，居民要用连环保的方式予以完成”[4]；同时，俄共（布）中央还决定，将 500 万规模的军队改编为劳动军；严惩劳动中的逃跑现象，直至关进集中营。[5] 除此之外，苏俄政府在工业国有化、经济关系实物化等方面，也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捷径的做法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1920 年到 1921 年初，苏维埃俄国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

---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 222、39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 300、30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403 页。

④ 《苏联经济指令》（俄文版），第 179 页。转引自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 119 页。

⑤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 14、15 页。

济上，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农业。由于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受挫，1920 年，耕地面积比一次世界大战前平均水平减少 7% 强，谷物产量仅相当于战前的 54%，单产相当于 2/3；经济作物情况更糟，棉花收获量仅为 6%，甜菜为 8% 弱。[①] 工业的情况更为严重，1920 年，工业品产量仅相当于 1913 年的 1/7。其中，大工业相当于 1/8，生铁产量为 1/22，甚至比 1901 年还少，煤产量比 1899 年还少，石油产量相当于 1890 年的水平，比 1913 年少了 1/2。[②]

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俄政府宣布实行商业国有化，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私人贸易。但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私人商业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只是改变了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黑市活动一度猖獗。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统计，1918～1919 年度在 26 个省运达的粮食总量中有 56% 是粮食投机小贩运来的。[③] 城市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以 10 倍的高价从黑市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1919 年春，在 15 个城市居民面包消费量中，从黑市上购买的占 60%。[④] 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苦中。人们连续几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也成为稀缺之物，由于饥荒和营养不良，流行性疾病一度泛滥。列宁后来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 1921 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⑤] 之所以“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酝酿着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政治危机。

1921 年春，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生活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诉诸行动。坦波夫省的一名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对农村形势的直观感受：“……农民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很快地杜

---

①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АН ССС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1921г. ～1925г.，Москва，1960，с. 234－235.

②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я АН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т. 8，Москва，1967，с. 24.

③ Коммюник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юро，№19－20，1920.

④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2，1919.

⑤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4～45 页。

绝这类现象，那将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的控诉，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①] 1920年末1921年初，农民的武装暴动遍及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中波沃尔日、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乌克兰和中亚。在这段时间整个俄国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最大的一起是"安东诺夫暴动"，这起暴动波及了整个坦波夫省。1921年2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缅任斯基、亚戈达等人在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国总的形势的报告中称，"现在的农民暴动不同于旧式农民暴动的一点在于，现在的农民暴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②]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1921年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处于动荡不安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形势尤为严峻。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共计1037人参加了罢工，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当天，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共计3700人，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彼得格勒电缆制造厂、国立第一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等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多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③] 由于缺乏原料、燃料，1921年2月11日彼得格勒93家企业宣布在3月1日前关闭，其中包括普梯洛夫厂（包括普梯洛夫股份公司的机器制造厂和锅炉钢铁厂）、谢斯特罗列茨基厂（兵工厂）、"三角"厂（橡胶工厂）等一些大企业，大约有27000名工人因此失业而被迫流落街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批企业长期停工或开工不足，工人阶级人数锐减，队伍涣散。许多工人由于饥饿的威胁，纷纷流往农村。还有一些人则脱离工厂，自谋生路，改行从事稀缺日用品的生产，

①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第48页。

②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 17，оп. 84，д. 265，л. 1－2，Записка Подвойского，Мехоношина，Муралова，Кедрова，Менжинского，Ягоды в ЦКРКП（б），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2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3页。

③ РЦХИДНИ，ф. 76，оп. 3，д. 167，л. 21－22，Из сводк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губчека в ВЧК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Петроград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2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8页。

成了小手工业者。加上参军的工人，到1920年，整个工人阶级只剩下不到战前的一半，纺织、水泥、采矿、制铁工人只剩下战前的14%～16%。[①] 无产阶级作为苏俄政权的阶级基础面临着消亡的危险，这也严重影响到了苏俄政权的统治基础。

军队中的情况也十分糟糕，“在国内战争暂告段落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军人复员问题引起了军队的极度不稳，战斗力大大下降……同时共和国形势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近期军事任务的性质（同农民暴动作斗争取代了同白卫军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显露了红军的机关管理系统对上述任务的不适应性”。[②] 常年作战已使士兵们疲惫不堪，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在与家乡的通信中，得知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集沉重等消息，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队战斗力日趋低下。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初的俄国，形势变得一触即发。

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重要支柱力量，因此，从1917年底起苏俄政府不断地从这里吸收可靠的士兵充实红军队伍，派往国内战争前线。而作为基地守卫者的补充，大多数是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通过休假、书信等方式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21年初俄国空前的经济困难中，在频繁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喀琅施塔得同样弥漫着对苏俄政府的不满情绪。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要求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当设于

① *Польяков* НЭП, Москва, 1982, с. 14.

②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84, д. 265, л. 1 – 2, Записка Подвойского, Мехоношина, Муралова, Кедрова, Менжинского, Ягоды в ЦКРКП (6),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2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页。

特鲁博奇厂的学员兵[①]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300名特鲁博奇厂的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500人汇集于瓦西里耶夫斯基区。鉴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政府派出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靠的军事院校的学员兵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一种叛变行为，决定彼得格勒戒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戒严的实施。

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②]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③] 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

① 俄文为Курсант，意指军事院校的学员，在苏俄时期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并且受到严格训练，在当时被政府认为是最可靠的军事政治后备力量，因此当时他们被派往宣布关闭的工厂站岗，禁止工人进入。

②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26 Февраля 1921г.，Приказ №1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комитета обороны）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укрепленного район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5页。

③ ЦАФСБРФ，ф.66，оп.1，д.32，л.119－120，Приказ ВЧК "об усилении борьбы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9页。

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 100 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Ф. И. 唐恩。另外还有约 200 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①] 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治反对派，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早在 1920 年 12 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已经躁动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是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长官日益增长的特权；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共党组织大约有 40% 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②] 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1921 年 2 月，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2 月 25 日前，两舰的形势还算稳定，但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一是由于调动引起的，因为在彼得格勒的生活相对比较轻松；二是因为缺乏制服和鞋；三是因为拖延 2 月 1 日前应当复员放假的期限和经医生委员会认定为伤员的士兵应当免职放假的期限。24 日、25 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使水兵们的情绪异常激动起来。25 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 于 2 月 26 日中午 1 时召开舰队会议；2. 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 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 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射击。”佐西莫夫很有经

①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67, л. 25 – 25об., Запис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с Петроградом,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24.

② РЦХИДНИ, ф. 76, оп. 3, д. 167, л. 13 – 39, 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1 – г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отдела ВЧК Фельдмана в особый отдел ВЧК,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39.

验地阐明了俄国的形势并回答了水兵们的提问，很快地控制了舰队的情绪。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来到军舰上，他不太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发表了职业性的讲话，说他作为政委可以保证所有的问题在几天后就可以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水兵们的情绪重又激动起来，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佐西莫夫建议水兵自己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形势。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由萨夫琴科（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水兵，无党籍，据阿格拉诺夫的报告称，除他之外，其他代表的身份均不得而知）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①]

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让水兵们感到不安，但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他们。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关于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①由于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并且在改选前就实行工人和农民的宣传自由；②要求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③要求集会、组织工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④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⑤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以及所有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和水兵；⑥选举专门委员会以重新审理被拘于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犯的案件；⑦取消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

① ЦАФСБРФ、ф. 114765，т. 17，л. 6－6об.，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2－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5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6页。

都可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用国家工具达到目的，取而代之的应是组织成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此国家应放弃这一特权；⑧立即撤除所有的征粮队；⑨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供应份额应均等；⑩取消所有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以及所有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的值班，如果这样的值班和队伍实在必要，可以在连队中选取，或按工人的意愿在工厂中选取；⑪给予农民以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且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供自己所用的牲畜；⑫请所有部队以及部队官兵同志附和我们的决议；⑬要求在出版物上广泛地宣传所有的决议。① 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⑭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⑮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② 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

①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 (Кронштадт), 3 марта 1921г., 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 – й и 2 – 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 Кронштадт, 1921, с. 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

②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 (Кронштадт), 3 марта 1921г., 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 – й и 2 – 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 Кронштадт, 1921, с. 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

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 月 1 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3 月 2 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 600 名代表参加，其中 25% 的代表为俄共党员。C. M. 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 5 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济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发言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①] 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②] 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

①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Москва: РГГУ, 1996, с. 193.

②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т. 4 (приложение), л. 9, Протокол №1 общего собрания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фортов "Шанц" и "Михаил", состоявщегося 3 марта по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Федоров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121.

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①] 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和炮台的革命秩序。”“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手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企业、工会、部队和海军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②] 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他们最初的两道命令，即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和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③]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

①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т. 10, п. 2, л. 28, Обраще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 крестьянам, рабочим и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55.

②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8 марта 1921г., Обращ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крепости и Кронштдат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8页。

③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198, 210, прим. 6.

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①] 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②] 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政府追究责任。

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③] 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

---

①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т. 239, л. 28; т. 32, л. 40; т. 35, л. 18; т. 12, л. 6/п.;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9 марта 1921г., 10 марта 1921г., 17 марта 1921г., О выходе кронштадтцев из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151.

②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4 марта 1921г., 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бюр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12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0页。

③ Архив Гувер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ойны, революции и мира Станфор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Коллекция Фрэнка Голдера, ящик 21 "Русское прошлое". Истор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 Санкт-Петенбург, 1991, с. 355–358, Господину коменданту карель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ектор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14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2页。

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他们大多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工人和职员。① 用阿格拉诺夫的话来说，很难确定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派归属，因为“兵变的参加者以无党派的名义小心地掩饰了自己的党派归属问题”。② 1921年4月23日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侦察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两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③ 根据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政府方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论。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并领导《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瓦利克和罗马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伊科夫负责交通，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领导粮食部门。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④ 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要塞

① ЦАФСБРФ，ф. 114728，т. 10，п. 2，л. 2，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ронштадта к рабочим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 и матрос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13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6页。

② ЦАФСБРФ，ф. 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

③ ЦАФСБРФ，ф. 114728，т. 22，л. 82，Терегрaмма Подгайского в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3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34页。

④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 №1，прим. 1.

司令部军事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军官组成。[1] 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最著名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战列舰支队指挥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时期的海军少校）和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沙俄时期的将军）。3 月 6 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海岸部主任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空军司令、通讯指挥、陆海军部队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以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索诺维亚诺夫要求与会者通报他们部队的人数，并把他们分配到各战区和要塞。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之后，要塞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包括在整条海岸线上部署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外的步兵、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水兵需留在军舰上稳住阵脚；在靠近彼得格勒港湾区域部署 560 步兵团；把其余的海岸线分为三个区域，由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在北岸部署鱼雷水兵部队以及舰艇混编部队；其余的岸上部队被划分为较小的军队集群派往各要塞，加强要塞防卫。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 560 团的总人数达 3000 人，有将近 2000 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

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还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2] 3 月 4 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

① *Козловский А. Н.* Правда о Кронштадте，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Гельсингфорс），5 апрель 1921г.

②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введение.

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击声，不要惊慌害怕”。[1] 另外，鉴于要塞粮食有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实行配额制，以渡过难关。

喀琅施塔得水兵、工人骚动的过程大致如此。可以看出，是1921年初俄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了喀琅施塔得的骚动，而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大规模罢工成了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导火线。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对农民的过激做法，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人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从理论上讲，自由选举本来就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此后的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无论是否通过自由选举的形式）。因此，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反政府性质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对骚动立即作出了反应并采取了严厉措施。

苏俄政府对事变的反应

事实上，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喀琅施塔得驻军的骚动迹象早就引起了苏俄政府的重视。为了控制这一不稳的局势，政府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二局情报处专门负责对喀琅施塔得的情报侦察，其活动范围遍及喀琅施塔得“所有的海军和陆军部队、他们的司令部、军事和苏维埃机关以及位于喀琅施塔得海防要塞区域的军需生产工厂和企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通函，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成为特别部的情报人员。到1921年2月底，特别部招募的情报人员已有176人，他们密切关注要塞的动态，指出可疑人物，经过特别部特派员的审查、总结，编成信息通报，送往特别部，直至中央。同时，有

---

①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4 марта 1921г.

2554人被附属于第二局的登记处登记在案，他们大多被怀疑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受到审查。[①] 政府以为，通过加强侦察工作，及时了解要塞的态势，就可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从而防止不满情绪的扩散，控制整个要塞的局势。1920年12月11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鉴于舰队骚动的形势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要求对舰队的政委干部作重要的“根本改变”，12月份替换25%的政委，接下来每月替换25%。[②]

但防范措施未能改变形势，如上所述，要塞的骚动仍在继续，直到2月28日两大战列舰的骚动惊动了苏俄高层。2月28日，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拨通了彼得格勒的直通电话：“叫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听电话并立即予以答复。请通报波罗的海舰队事件的情况。有的地方存在不满是否属实？由于什么原因？……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造成不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现在的局势如何？”[③] 在状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凭着三年内战的经验和直觉，苏俄高层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应与政治反对派和国外帝国主义有关。当天深夜，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发给列宁的密码电报中把“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通过的决议形容为“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的决议，并且“估计社会革命党已决定加速事件的发展。”[④] 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致电博季斯，说：“最近在国外的出版物上经常刊登关于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舰队阴谋起义的消息。所有以往的经验都说明，这种谣传是实际行动的先兆。因为阴谋的中心在国外，外国出版物的消息皆来自白卫军侨民界谋反的准备。比如，这样的情形曾发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必须立即同所有的主管部门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⑤] 当天晚上，托洛茨基再次给博季斯以及阿夫罗夫（彼得格勒军区

① ЦАФСБРФ, ф.114728, т. 269, лл.5－5об.，Из доклада начальник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части 2－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页。

②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введение, док. №3.

③ РГВА, ф.33987, оп.3с, д.65, л.46, Терегрa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алтийского флота Батису,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47.

④ РЦХИДНИ, ф.76, оп.3, д.167, л23, Шифротелеграмма Зиновьева Ленину,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47。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1页。

⑤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09, д.89, л.11, Терегрa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у пубалта Батису、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4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2页。

司令员）、库济明发去加急电报：“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你们管辖部队最近情况的报告。提醒你们决不允许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建议每隔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地方和采取的措施，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汇报得更及时。期望收到报告。”①

在3月1日喀琅施塔得人集会后，俄共喀琅施塔得要塞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用武力镇压决议支持者的可能性，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喀琅施塔得没有足够的可靠力量用于武力镇压。得知水兵骚动前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视察的加里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鉴于如此形势，3月2日3时30分，加里宁、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给托洛茨基发去了电报：“……我们现在确信，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起义的开端。我们估计事件将从今早开始迅速发展。需要得到您的帮助。”② 3月2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阿夫罗夫命令由骑兵连、步兵营、炮兵排和佩杰尔戈夫斯基学员指挥连组成的187旅夺取奥拉宁包姆，因为这里是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晚上，187旅逮捕了驻扎于奥拉宁包姆的第一舰艇大队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他们本是准备给予喀琅施塔得人支持的。政府军成功地控制了奥拉宁包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

3月2日，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宣布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性质，并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人对此加以拒绝。同一天，劳动国防委员会（原工农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改为现名）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宣布为“新白卫军的阴谋。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发动的叛乱”，喀琅施塔得人通过的决议被称作“极端反动的、社会革命党的”宣言。政府给这一事件如此定性是考虑到了当时俄国大部分民众的心理的，从沙俄时代过来不久又刚经历了内战的俄国人对于沙俄，对于帝国主义厌恶不已，将事件定性为白卫军的阴谋，并且还是由前沙俄将领领导的，这就争取到了大部分俄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换句话说，也就为政府采

---

① P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 339876，оп. 3с，д. 65，л. 51，Шифро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войскам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Аврову，комиссару балтфлота Кузьмину и начальку пубалта Батис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48。

② РЦХИДНИ，ф. 17，оп. 109，д. 27，л. 22，Терграмма Зиновьева，Калинина и Лашевича Троцком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59.

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在政府公告中，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1. 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谋不受法律保护；2. 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3. 彼得格勒防区的全部政权转交给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1] 根据公告中的第一条决定，在3月4日深夜，科兹洛夫斯基一家（妻子、女儿和四个儿子）被捕。随后，喀琅施塔得兵变领导人及军事专家的亲属均被逮捕并被作为人质。就在当天，国防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对兵变者的警告"的通告，宣布他们逮捕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参加者的家属，"逮捕这些人质为的是解救那些被喀琅施塔得叛变者逮捕的同志，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同志，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如果被捕的同志哪怕是头发掉了一根，那么上述人质将会人头落地！"[2] 政府立即收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用无线电对此做出的回应："……以彼得格勒卫戍军的名义，临时革命委员会要求在24小时以内释放彼得格勒委员会作为人质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所有家人。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告知，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他们的家人绝对不受侵犯，卫戍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委员会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的仇恨中，这样的逮捕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3]

3月3日，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由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国防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签署）："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命令：1. 所有的军事、国家机关应特别注意防卫仓库、桥梁、车站、铁路、电报和电话线，为此应给予卫戍区长官以足够的军事力量。防卫不力的后果由相应机关的负责人和政委承担责任；2. 所有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的执委会、区委会和苏维埃机关应采取一切果断措施在居民中

---

①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 3 марта 1921г., Обращение совета труда и обороны,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5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30页。

②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 4 марта 1921г., Собщение из Петрограда о взятии заложников,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9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4页。

③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рта 1921г., Кронштадт требует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заложников,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9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9页。

广泛宣传戒严的实施；3. 卫戍区司令在严格执行现有的规章、条例和规定的同时，应特别重视部队卫戍任务的执行；4. 应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范围内严格的公民秩序，一切破坏行为应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报告。……部队如上街应持枪行动。一旦遭到反击就地枪决。命令自宣布之时生效。"[①] 3月3日晨，政府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所有军舰、所有部门发布了命令，要求政委必须在岗待命；禁止局外人参加会议；所有在宣传中有明显反苏维埃倾向的人都应予以逮捕。这样，通过戒严，政府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基本上稳住了彼得格勒的局面。

在托洛茨基的多次催促下，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从3月2日起定时向中央汇报彼得格勒的局势，特别是喀琅施塔得的动静。3月3日14时30分，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势报告中全文抄录了喀琅施塔得卫戍区全体大会通过的决议。从现有的档案材料来看，苏俄高层应是从这份报告中才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内容的。决议的内容表明，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是现阶段全俄工农的普遍要求，是1920年以来全俄特别是农民对实施了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实施的不满的集中体现。随着侦察情报的增多，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越来越明朗，苏俄高层应当逐渐清楚，政府要对付的不是想象中的协约国、白卫军，甚至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②]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始至终全力准备对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镇压。3月3日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

①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 3 марта 1921г.. Приказ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комитетаобороны) по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му укрепленному району о введении осад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95.

② 在当时苏俄政府方面的文件中一般将这次兵变称作"叛乱"，俄文为Мятеж，意指叛乱、也有哗变的意思，无论是苏俄政府的公告，还是其内部决议，对喀琅施塔得事件大多使用的是这个单词；在政府的文件中，特别是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初期，有时将其称为Волнение，意指"骚动"；另外，在个别文件中，喀琅施塔得事件又被称为Возмущение，意指"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有时也把喀琅施塔得事件称作Восстание，意指（武装）起义，如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中就要求"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在阿格拉诺夫的调查报告中也使用了"起义"这个字眼。

和德边科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在途中，托洛茨基曾说，经过最初一轮的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①] 事实上，从3月2日起，阿夫罗夫就奉命开始着手集中军队形成对喀琅施塔得的包围，到3月4日已组成了两个战区——北方战区和南方战区。前者集中了1365名步兵、100名骑兵、14挺机关枪、24门炮。在南方战区，奥拉宁包姆区域集中了3596名步兵、74名骑兵、43挺机关枪和4门炮，佩杰尔戈夫区域集中了650名步兵，克拉斯诺弗洛茨基、佩列多沃伊、乌斯季耶要塞集中了3249名步兵、28挺机关枪、56门炮。还有总数包括2101名步兵、165名骑兵和25挺机关枪的三支学员兵队伍作为后备力量。彼得格勒的军事权力集中在新成立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手中，阿夫罗夫拥有对彼得格勒军队的指挥权。按照该委员会的指令，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的波罗的海舰队。[②]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后，针对军队指挥权力不集中，集结军队数量不够，彼得格勒城内可用于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军队数量十分有限等状况，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恢复第七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任临时指挥，同时兼任高射炮兵团指挥，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海军，都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同时责成图哈切夫斯基准备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同时任彼得格勒防区司令，此命令从3月5日17时45分开始执行；第二，立即采取措施尽快把最精锐部队及必要装备调入彼得格勒（从西线调取第27师、阻击队、重炮兵连以及装甲列车，空运探照灯、通讯工具等）；第三，把集中于彼得格勒的情绪不稳的水兵输送出该地域。[③] 从3月7日开始，大批水兵被调往亚述海和黑海。[④] 同时，加强对信息的封锁。托洛茨基给

---

①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199.

② РГВА, ф. 33988, оп. 2, д. 368, л. 519 – 525, 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 о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194.

③ РГВА, ф. 7, оп. 2, д. 530, л. 129, 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6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5页。

④ РЦХИДНИ, ф. 76, оп. 3, д. 167, лл. 7 – 8, Из оператив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сводки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ЧК Ленину,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8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5页。

图哈切夫斯基发去电报说："我专列的收音机今天几乎完全收到了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来自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干扰很小。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监督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工作，并对涅瓦河上的舰艇的收音机进行检查。"①

3月5日14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司令向喀琅施塔得人发出公告："工农政府决定：立即使喀琅施塔得和叛变的舰艇归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为此命令：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祖国之手应立即放下武器。解除固执己见者的武器并交由苏维埃政权处理。立即释放被捕的政委和政权的其他代表。只有完全投降者可视作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同时指令不惜一切武力击溃兵变和兵变者。使和平居民突然遭到灾难的责任应完全算在白卫军叛乱者的头上。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预先通告。"② 3月6日18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命令，宣称如果24小时内不停止暴动，政府将采取军事行动。③

为了使镇压行动不引起国际冲突，托洛茨基于3月7日16时，也就是进攻前夕，在他的专列上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去了电报："鉴于当前对叛变者开火的形势，我认为向芬兰政府作以下声明是合适的：'我们认为必须通知，白卫军奸细由于自己处于绝境可能会向芬兰海岸线射击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至于苏维埃司令部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力图在当前消灭叛变的同时不使芬兰公民遭受任何损失。'"④

可以看出，喀琅施塔得骚动引起了苏俄高层的强烈反应，在政治上，苏俄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将骚动定性为"新白卫军的阴谋"，并且是"由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领导的反革命叛乱"。在苏俄高层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后，他们已经清楚，实际面对的是一次有群众基础

---

① РГВА, ф. 33987, оп. 3с, д. 65, л. 58, 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7 - й армией Тухачевскому,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71.

②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т. 2, л. 2, К гарнизону и населению Кронштадта и мятежных фортов,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7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7页。

③ РГВА, ф. 33988, оп. 2, д. 368, л. 519 – 525, 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о 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194.

④ РГВА, ф. 33987, оп. 3с, д. 65, л. 60, 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рком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СФСР Чичерину,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7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3页。

的兵变。尽管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正为苏俄高层所考量，但喀琅施塔得人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就足以构成政府对之实施镇压的全部理由。这种基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反应在俄共（布）十大作出的决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俄共（布）十大的决策

对喀琅施塔得的正式进攻被定在3月8日，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在经过几次改期后于这一天的中午12时召开（会期从3月8日至16日）。[①]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宣布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经济上的退让和政治上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出台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苏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重大步骤。

面对国家的困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0年末开始重新考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问题。1921年2月2日，莫斯科五金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工农关系的报告以后，通过了建议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2月8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内容为：①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②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③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④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②] 会后，这一提纲发表于《真理报》，并在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文章。由此可见，转变经济政策，此时已在苏俄高层的考虑范围

---

① 根据现有档案资料，俄共中央委员会最初打算于1921年2月6日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经过了三次改期才最后确定于3月8日召开。РЦХИДНИ，ф.45，оп.1，д.1，л.86，Обсуждение на пленумах ЦКРКП（б）вопроса о сроке начала работы Х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3页。

内，到1921年2月，他们已经准备实施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而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喀琅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起事者的基本要求是政府正在考虑实施的政策。但政府没有与起事者进行过妥协性谈判，而是在实行经济政策重大变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琅施塔得进攻，即在顺应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却对起事者的政治行为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统一于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

一方面，俄共（布）十大宣布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是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发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危局的政治信号，列宁迅速理解了这一危机信号，他在一份报告提纲中写道：“向政治转化。1921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喀琅施塔得事件’。”① 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怎样去满足农民呢？……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② 在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是必要的，否则会丧失政权的基础，但对于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诸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则绝不妥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无异于叫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

所以，苏俄政府在顺应喀琅施塔得人的基本要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对胆敢向布尔什维克政权挑战的喀琅施塔得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做《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时这样说道：“……现在我想讲一讲喀琅施塔得事件。我还没有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最近的消息，但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次起义很快会显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军将领领导的样子，它如果不是被马上镇压，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被镇压。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③ 在严厉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同时，俄共（布）还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应争取最大限度的党内团结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82~3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53~54页。

③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арт 1921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1963，сс. 33－34，Из доклада Ленина на X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ЦКРКП（б），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246.

（和纪律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①“对党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②“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③“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①] 与此同时，大会还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力量展开更为严厉的斗争，以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后来在总结喀琅施塔得事件时，列宁指出：“‘喀琅施塔得’的教训——政治上：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济上：尽量满足中农。”[②] 经济上趋向宽松，政治上趋向集中，俄共（布）十大的决策鲜明地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取向。

无情的镇压与惩罚

军事进攻准备就绪，苏俄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武力镇压就开始了。俄共（布）十大召开前夜，3月7日18时35分，从谢斯特罗列茨克和“红山”炮台向喀琅施塔得进行了试探性炮击，对方几乎没有回应。[③] 列宁在向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暗示，到3月8日晚喀琅施塔得可能会有新闻传来。苏俄高层确信，在武力进攻下，“叛乱”将很快被平息。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经过一夜的炮击后，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下达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士兵们披着用来伪装的白色披风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开阔冰面上匍匐前进。3月8日整整一天政府军加强了对喀琅施塔得的炮轰，并用飞机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65～6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561页。

③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67，л.46，Сводк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на 11 часов ноч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4页。

托波尔”号以及喀琅施塔得城投放了525俄磅炸弹，但政府军的进攻遭到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反击。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对政府军方的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奥拉宁包姆、谢斯特罗列茨克沿岸地区——利西诺斯进行猛烈炮轰，使得谢斯特罗列茨克地区许多房屋着火，政府军至少5门大炮被炸坏。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政府军仅仅夺取了7号要塞。更为严重的是，被派去沿解冻的芬兰湾进攻要塞的红军的情绪不稳，从感情上来讲，他们同情喀琅施塔得人。部分红军士兵甚至公开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最为典型的是南方军队集群的561团，他们和喀琅施塔得的560团一样都是由库班人组成的，他们被调来执行进攻任务，但整个团都拒绝进攻，3月8日晨，该团有一个营（约600人）向喀琅施塔得投诚。从南方军区调来的混编团曾一度冲入喀琅施塔得，但却遭到了对方猛烈的机关枪扫射，不得不往后退却，并且有两个连被俘。3月8日22时，政府军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出发线。[①] 政府军的第一次强攻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政府报刊力图掩盖真相，富有政治经验的托洛茨基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电报中写道：“今天的《彼得格勒真理报》上说，对于我方狂风暴雨般的火力，喀琅施塔得的反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害怕浪费子弹，他们只用了轻型炮反击等等。这种不真实的消息在我看来是十分有害的。应该或者是不告知细节，或者是告知全部真相，因为居民们，特别是海军完全清楚事件的进程，上述做法会破坏他们对报刊的信任。”[②]

政府军第一次进攻的失败使得本以为在经过一次打击后喀琅施塔得人就会挂出白旗的托洛茨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加以重新考虑。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写道：“只有在解冻前可以占领喀琅施塔得。一旦海湾通航，喀琅施塔得就和国外建立了联系。到那时，整个岛对我们来说将成为不可抵达的。希望对方由于缺乏粮食而投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在通航前起义者的粮食是够用的。除此之外，他们现在已经从芬兰获得了一些物资（有资料表明获得了8车物资）。图哈

① РЦХИДНИ, ф. 76, оп. 3, д. 167, л. 50 – 50об., Телеграмма начальника 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7 – й армии плюто в ВЧК об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под Кронштадтом,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74.

② РГВА, ф. 33987, оп. 3, д. 65, л. 54.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201.

切夫斯基刚刚打电话来，说彼得格勒已经开始解冻。无论如何，必须在最近几天消灭喀琅施塔得叛乱。为此，必须征召相当数量的富有战斗力的共产党员和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到彼得格勒去。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我很担心，无论是党，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充分认识到喀琅施塔得问题的尖锐性。”①

据侦察情报称，喀琅施塔得有140门大炮用于海岸防御，防御的水兵和红军达28000人。要想顺利进攻，必须有两倍甚至是三倍于此的力量。苏俄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首先是加强第七集团军炮兵部队的力量，从西线调来了27师的榴弹炮兵连、重炮炮兵连和3个重炮营。3辆分别装有10英寸炮、6英寸“加农”炮、8英寸炮的装甲列车也被调往彼得格勒。为了加强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步兵部队，11师32旅、27师79旅被调集于利戈沃区。4支空军部队也从西线抵达彼得格勒。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对卡累利阿区的炮兵连进行了重新部署，把队伍集中于海岸线上，并且下令炮击时一定要对准目标，不得浪费火力。其次，鉴于第一次进攻中部队的骚动和拒绝进攻等情况，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如设立革命军事法庭巡回审判庭（审判程序得到了极大的简化），设立革命三人小组，在每支部队中安插情报员；在进攻中设立严密的散兵线，防止军人后退；那些被认为是最不可靠的部队在被解除武装后调往离喀琅施塔得很远的后方；被认为是带头起哄的军人被立即处以枪决。3月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秘书H. 科列斯金斯基向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发出电报：“根据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立即在24小时以内征召150名坚定、坚强、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作临时指挥，以解决喀琅施塔得事件。”② 到3月12日，共有将近300名俄共（布）十大代表被派往喀琅施塔得，他们不仅仅是去担任军事指挥，更重要的是去加强那些进攻部队的士气。另外，从3月9日早晨起，政府开始对普梯洛夫厂、奥布霍夫斯基厂、阿尔图拉·科佩拉厂、阿尔谢纳尔厂和诺别利亚厂这些罢工工厂的工人进行重新登记，采取这一措施后，彼得格勒的大部分工厂得以很快复工。政府还

① РГВА, ф. 33987, оп. 3, д. 65, л. 65.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201 – 202.

②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84, д. 228, л. 8, Телеграмма Крестинского в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РКП（б）о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248.

对彼得格勒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1]

3月9日，双方炮火不断。政府军对6号炮台、康斯坦丁要塞、南方炮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实施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方面则对谢斯特罗列茨克—利西诺斯区域和奥拉宁包姆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步兵重新占领了曾被政府军夺取的7号要塞。就在这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维尔舍宁在奥拉宁包姆被捕，他声称，之所以会出现在奥拉宁包姆是为了执行委员会交给他的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停止军事活动的谈判的任务。此前一天，也就是3月8日，政府曾收到赫尔辛福斯电台的报道，喀琅施塔得人向政府建议谈判，但镇压的车轮已经启动，政府对此不加理会。

3月10日，政府军仍然对上述的几个点实施打击。到3月11日，包括北方军队集群（谢斯特罗列茨克区）、南方军队集群（奥拉宁包姆—佩捷尔戈尔区）、利戈沃后备军和彼得格勒后备军在内的政府军总共集结了步兵15998名、骑兵354名。此外，在佩捷尔戈尔区还有27师80旅和167旅499、501团。[2] 整整一天，双方都持续炮击，政府军派出29架飞机加强侦察工作。鉴于解冻日期的日益逼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建议加快强攻要塞的准备。苏俄高层对战局高度关注，全俄肃反委员会呈列宁、斯大林的战报不断地从前线发往克里姆林宫，对彼得格勒的政治局势、军队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获得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情报等加以报告。

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政府除了在物质上尽量满足部队的需要外，还采取了更为强有力的政治措施。3月13日，南方军队集群政委伏罗希洛夫发布命令：“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兵变分子，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苏俄各地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派遣过去，以保证和加强对喀琅施塔得白卫军的胜利。从党代会代表中任命的特派员除了加强军事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还被派往作战部队。军队政委和

---

①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 8，л.8，Инструкция команде агентурных разведч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60.

② РГВА，ф.33988，оп.2，д.368，л.519－525，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о 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4.

指挥人员应把特派员看作帮助自己指挥和处理事务的有经验的同志。从收到此命令开始，所有的传单和打算印刷出版的文字材料必须交给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文字出版处审阅，没有该处的允许，这样的材料不得印刷。"[1] 南方军队集群司令谢佳金也于这一天发布了关于处理临阵脱逃等案件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不仅是军人的案件，而且部队驻扎地居民的案件都划归彼得格勒军区/州革命军事法庭巡回审判庭管辖，指导方针是"尽快结案"。[2]

3月14日，预定从北方发起的进攻由于第27奥姆斯基师第79旅第235理韦利斯基团和第237门斯基团发生兵变而推迟。这两个团的军人全副武装地走出营房，喊着"不要到冰面上去"、"召回部队"等口号，以示拒绝进攻喀琅施塔得。这些军人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逮捕。门斯基团和理韦利斯基团分别有41名、33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判决书向全体军人长时间地反复宣读，以示警告。3月15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布命令："……苏维埃政权用解除这些团的武装和逮捕表明，无论是目无纪律，还是叛变，都不允许在红军中发生。所有的奸细和造谣者都要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当被他们蒙骗的英雄们请求给予机会夺取喀琅施塔得，在苏维埃俄国工农面前赎罪的时候，我特此命令：归还门斯基团和理韦利斯基团武器和革命称号。我相信并且希望，重新看到自己的老战友成为英雄，我们曾一起夺取切利亚宾客和奥姆斯克，一起攻占华沙。前进！向喀琅施塔得叛徒进攻！"[3] 这一天，政府军在进攻方面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着力于整顿军纪，修筑防御工事，集结军队，为强攻做准备。

面临政府军围攻的喀琅施塔得处境日益困难。军事上，尽管喀琅施塔得在这一阶段对政府军的还击仍然是有力的，但已经明显感到防御力量的不足。科兹洛夫斯基事后回忆："要知道他们海岸线的总长度超过了30俄

---

①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 26，оп. 1，д. 79，л. 5 – 5об.，Приказ №5 п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войск финского залив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17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79页。

② РГВА，ф. 264，оп. 1，д. 69，л. 1，Приказ №12 войскам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7 – й армм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177.

③ РГВА，ф. 190，оп. 3，д. 514，л. 33，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7 – й армми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Кронштдат，1921，с. 20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89页。

里"，但"要塞可用于迎接进攻的自由的卫戍军是那么有限，散兵线中不得不每隔 5 俄丈才安排一个人"。[1] 况且自愿去最前线防卫的大多数是来自库班的青年水兵，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从未参加过战斗。用于防卫的有生力量的缺乏使得司令部的防卫计划没有完全得到实施。政治上，随着战斗的加剧[2]，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一部分无党派人士（包括军人）开始不服从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在工厂、军舰进行宣传，暗中破坏委员会各种措施的实施。临时革命委员会力图控制内部局势，它要求成立革命三人小组负责维持秩序，多次发出命令要求共产党员及居民交出左轮手枪、步枪、子弹等武器。临时革命委员会加强了对共产党员的监控，3 月 15 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解除所有共产党员政委和担任一定职务的共产党员的公职，并且对他们实施特别的监督，责令其不得进入军港，所有重要据点由非共产党员占领。[3] 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还不断地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发出呼吁，阐明起义的目的，以期获得支持，但彼得格勒已处于戒严状态，喀琅施塔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均无法活动。

在此期间，喀琅施塔得获得的外部援助主要来自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侨。尽管侨民界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各类团体都捐款为兵变者购买粮食，支持临时革命委员会。3 月 8 日，国际红十字会三人代表团抵达喀琅施塔得，"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前舰长维利肯男爵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被邀请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和防卫司令部的联席会议，他们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药品援助，但同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这些物资只有偷运过来。3 月 9 日，代表团返回芬兰，维利肯作为对即将运来的粮食进行分配的监督员留了下来。曾在《新俄罗斯生活报》发表的一篇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匿名回忆录中提到维利肯还建议用"800 人的武装力量"给予喀琅施塔得帮助，"……如果委员会同意，可以把这些人直接载运到喀琅施塔得或者他们有越过芬兰边界直接打

① Воля Россия, 5 мая 1921г..

②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1995, №3, с.40.

③ ЦАФСБРФ, ф.114728, т. 4 (приложение), л.53, Протокол общего объединен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членов местных ревоентроек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порт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14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7 卷，第 90 页。

击彼得格勒的可能性。临时革命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后认为，武装力量是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的，考虑到卫戍军的情绪，委员会以多数通过决定对此建议加以拒绝。”[①] 据阿格拉诺夫的调查，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佩特里琴科报告说社会革命党领袖 B. M. 切尔诺夫从雷瓦尔派来了信使，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作为立宪会议主席回到喀琅施塔得，在立宪会议的旗帜下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斗争，并表示愿意提供武力援助。除瓦列克表示赞同，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态度不甚明确外，大部分委员对此表示反对。11 日，维利肯在作客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时指出，只有在支持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的条件下武装起义者才能定期得到粮食。[②] 当天，喀琅施塔得获得了大约 400 普特的粮食，使得本已紧张的粮食供应稍加缓和。尽管没有接受任何政治义务，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难以掩饰其内心的矛盾，他们明白，这一举动将把喀琅施塔得与白卫军联系在一起。

3 月 15 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广播通告，邀请外国记者前往喀琅施塔得“了解英雄的卫戍军和要塞工人是为什么而战斗”。[③] 西欧和侨民界的 4 名记者对此做出反应并来到了喀琅施塔得。同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著名的题为《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的文章。[④]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态度并不明朗。除了舆论支持，西方国家并不打算趁机武力干涉，而是倾向于同苏俄建立正常关系。3 月 16 日，英国与苏俄签订了贸易协定，成为西方大国对苏俄的首次官方承认。

经过一周的僵持，形势已对喀琅施塔得明显不利。在收紧包围和加强军事部署后，3 月 16 日，政府军方面再次发布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时间定在 3 月 17 日。3 月 16 日 14 时到 21 时，政府军对喀琅施塔得城及其要塞进行了猛烈的炮击。3 月 17 日 2 时 45 分，北方军队集群开始强攻，

---

①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док. №625.

②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док. №828, прим. 1.

③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15 марта 1921г., Призыв к журналистам,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142.

④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15 марта 1921г., Стать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 а не партиям!”,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14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7 卷，第 92 页。

并于6时左右占领了7号要塞。南方军队集群于3时开始强攻，夺取喀琅施塔得城。政府军的强攻遭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还击，双方损失惨重。

3月17日4时50分，在第一阶段强攻的基础上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发出了总攻的命令："1. 北方军队集群应暂时限于牵制托特列边和'红军要塞'的行动，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军队集群；2. 南方军队集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3. 充分利用炮兵部队的协助进行城市中的巷战；4. 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1] 大约有两个师参加了这次进攻，并配有4列装甲列车和多个炮兵连。根据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3月17日的直通电话谈话记录，虽然政府军这次强攻取得了成功，但损失也相当惨重。特别是北方军队集群，是在蒙受了重大牺牲后才得以进入喀琅施塔得城西北部。[2] 21时左右，政府军迫使对方退出了喀琅施塔得城。陷于绝境中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向政府军派出洽降代表，声明如果保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议炸掉军舰，但遭到反对。占领了喀琅施塔得城的政府军立即开始了对兵变者的逮捕。此时，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者已经清楚，要塞必被攻陷。根据要塞司令总部的意见，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从喀琅施塔得撤走。他们向芬兰政府请求给予被交战国拘留者的身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撤向芬兰。得以逃往芬兰的大约有8000人，包括大部分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总部的成员。

3月18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占领了喀琅施塔得要塞。5时，占领了托特列边要塞和"红军"要塞。9时，南方军队集群的79旅和80旅抓获了城中的所有兵变者，11时左右，占领了里弗要塞、米柳京要塞、康斯坦丁要塞。这样，两个军队集群完成了全部的军事任务。

---

① РГВА, ф.190, оп.3, д.513, л.75, 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7－й армии северной 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ам о штурме Кронштадт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217。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6页。

② РГВА, ф.190, оп.3, д.527, л.178－180, Запис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главкома Каменева с командующим 7－й арммией Тухачевским о ходе штурма Кронштадт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218.

政府对红军及喀琅施塔得防御者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许多死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的人甚至没有埋葬，随着冰的融化产生了污染芬兰湾水区的问题，直到三个月后才得以解决。

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新任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彼得罗夫立即发布命令：宣布城市进入戒严状态；要求全体市民在24小时内交出武器；要求交出所有可疑的人以及协约国的间谍；不遵守命令者将按战时法律追究责任。[①] 同时，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被要求全部重新登记。

3月25日，苏俄政府在彼得格勒为在进攻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4月3日，为庆祝占领喀琅施塔得，政府举行了广场游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

镇压成功，惩罚便随之开始。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苏俄政府对不同程度卷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3月18日6时40分，也就是喀琅施塔得刚被攻陷的时候，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就向其副手列普谢发出指令："立即用人力加强特别部，特别部的工作十分缺乏人手。全部从喀琅施塔得逃出的被捕者须经过最仔细的审查。"[②] 接着，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第二专门处成立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在夺取喀琅施塔得以后惩罚被捕的叛乱者"。据三人小组负责人的报告，从3月20日到4月15日（三人小组于这一天解散）共有3000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处以极刑。[③] 根据三人小组的调查，认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全体人员在参加"叛乱"上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两舰的水兵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3月20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167名水兵受到特别三人小组的起诉，他们都被判枪决；"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起初有13名水兵受到起诉，被判处枪决，并且立即执行。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又有26人被判

---

① АПРФ, ф.26, оп.1, д.79, л.37, Приказ коменданта Кронштадта,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22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8页。

② АПРФ, ф.26, оп.1, д.79, л.45, Директива военкома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Ворошило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военкома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Лепсе,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293.

③ ЦАФСБРФ, ф.114728,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му мятежу, л.23 – 25об., Рапорт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троек при 1 – м и 2 – м особых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350.

处枪决。[①] 此外，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所有的水兵和红军士兵都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相当一部分水兵被押往位于白海的集中营。[②]

除此之外，三人小组还审判了所有在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退党的人，并把他们划分为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对活动，手持武器的政委、指挥官、集体退党的领导人、递交恶毒声明的人……被处以极刑；第二类，递交了较为不好的声明的人，政治上发展不好，年轻，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的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人包括递交了没有论据的声明的人，在材料中没有递交声明但自己认罪的人，递交了声明但曾受过革命委员会监控的人。他们被予以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判处参加一年社会劳动，缓期执行。"[③]

另外，喀琅施塔得一些党政负责人因支持兵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主要成员伊利因、卡班诺夫和佩尔武申被判处枪决。另有 8 人因事前知道临时局的号召，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缓期执行。[④] 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政委诺维亚科夫、战列舰舰队政委佐西莫夫、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特别处处长格里博夫等则因被认为在兵变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指挥不力而被追究责任。[⑤]

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陷落后，大约有 8000 名喀琅施塔得人得以逃往芬兰，其中包括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和要塞的军事专家。3 月 21 日，俄国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的旧称）给契切

---

①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т. 27, л. 9 - 10, Приговор, вынесенный выездной сессией окружного реввоентрибунал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пр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е кронштадтцам Денверу, Мазурову, Корзуну, Бекману, Левицкому, Тимонову, Сафронову, Сугачкову, Степанов, Тимонову, Сафронову, Сугачкову, Ефремову, Воробьеву, Стешину, Черноусову,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293.

②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206.

③ РГВА, ф. 33987, оп. 3, д. 65, л. 65.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201 - 202.

④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т. 29, л. 72 - 73, Из заключения следователя по делу временного бюр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343.

⑤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т. 173, л. 25, Заключение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ого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Каруся по делу о принятии своевременных мер к ликвидации восстания в Кронштадте,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337.

林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对待这些逃亡者的问题征求契切林的意见。[1] 3月28日，别尔津得到了答复："我向您通告我们的建议：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因为喀琅施塔得人毫无疑问都是兵变者。"[2] 后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罗夫、洛马诺夫等都被抓获并被处以枪决。另外，被俘的舰队指挥和要塞的军事指挥也被判处枪决、强制劳动等刑罚。[3] 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过程中因科兹洛夫斯基而被捕者多达27人，甚至其远亲也受牵连，他们大多受到流放、强制劳动的惩罚。

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共和国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代表团、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专门处特别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共对2103人处以了枪决，对6459人处以了各种期限的监禁，当时有1464人获释，但对他们的起诉并未撤销。[4] 1921年11月4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委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赦免了"在国外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普通参与者"。[5] 但在赦免前，这批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苏俄政府于1922年春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从1922年2月1日至1923年4月1日，喀琅施塔得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记，他们被划分为三类人，即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2048人）、与要塞无联系的人（516人）、刑事罪犯（192人）。到1923年4月1日，共有2514人被异地流放，其余的242人大多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工人及

---

① АВПРФ, ф.0135, оп.4, д.2, п.104, л.19 – 20об, Из письма полномоч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РСФСР в Финляндии Берзина Чичерину,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339.

② АВПРФ, ф.0135, оп.4, п.104, д.1, л.81, Из письма Чичерина Берзину,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342.

③ ЦАФСБРФ, ф.114728, т. 18, л.1 – 11,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заседании президиум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и по должности 20 апреля 1921г.,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307.

④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Введение, с.14 – 15.

⑤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док. №753, 825, 831, прим. 1.

其家属，因为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而被留在了喀琅施塔得。[①]

1921 年 4 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②] 这是迄今在档案文献中所见到的最为坦率和明确的结论。既然如此，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性质应当是清楚的。如果说，苏俄政府当时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定性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那么后来苏联长期坚持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官方说法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了。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苏维埃政权从理想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现实的政治国家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苏联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巩固政权需要的镇压一旦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选择取向，就会发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权力机制的蜕变，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衡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蜕变就为斯大林日后的个人专制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视角考察，喀琅施塔得事件所表现的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与 1930 年代确立的斯大林模式体制存在着内在的历史联系。

---

①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т. 269, л. 43, Сведения о работе комиссии по эвакуации за время с 1 февраля 1922 по 1 апреля 1923г.,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367.

② ЦАФСБРФ, ф. 114728. Приложение, 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 Кронштдат, 1921, с. 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7 卷，第 114 页。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

——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郑异凡

19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统治了苏联将近半个世纪。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出版物，大多的是宣传性的小册子，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为进攻所做的暂时退却，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材料是党的文献和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苏共二十大后，开放了部分档案资料，放宽了言禁，有的学者依据新材料写出了专著，例如埃·鲍·根基娜的《列宁的国务活动》（1969）[1]就有不少涉及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材料。

---

[1]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1921～1923）》，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真正掀起研究新经济政策热潮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时倡导“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的“空白点”，试图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改革的方案和依据。与此同时，给一批遭到镇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平反，陆续开放保密档案，主客观条件使新经济政策成为热门课题。苏联解体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历史学家们有了较多地研究和发表观点的自由，开始出现不少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和著作，许多有关俄国20世纪历史的专著中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新经济政策。[①] 出版了许多有关苏联史的论文集，及时传达了历史学家们的新观点、新成果以及新资料。[②]

出现一些有关20年代的专著，如希施金的《政权·政治·经济：革命后的俄国（1917～1928）》，别拉乌索夫的《20世纪俄国经济史》，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有较为系统的叙述。[③] 巴甫洛娃的《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罗戈文的《是否有选择？托洛茨基主义：多年后的观点》、《斯大林的新新经济政策》，特鲁坎的《1928～1929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和《通向极权之路（1917～1929）》等，就某些专

---

①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АСТ, 1996;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 – 1940.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9; *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 *Ходяков М. 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01; *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ОРМА, 2002; *Пихоя Р. Г.* (*общ. ре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лик. Москва: РАГС, 2005.

② *Никаноров Е. Б. и Разумов А. Я.* (*сост.*)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88. Л.,: Лениздат, 1989; *Никаноров Е. Б. и Разумов А. Я.* (*сост.*)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89. Л.: Лениздат, 1990; *Лельчук В. С.* (*ред.*) Историки порят. Тринадцать бесед.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ИскендероваА. А.* (*общ. ред.*) 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страниц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Иванов В. А.* Переписка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емы. Диалог ведет читатель.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Журавлева В. В.* (*ред.*) 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Пойск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обытия и факт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Шишкин В. И.* (*отв. ред.*)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уро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2; *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 *Ходяков М. 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 Лань, 2001.

③ *Шишкин В. А.*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1917 – 1928). С-Петербург: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7;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II.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ю к нэпу.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2000.

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

从 1980 年下半期起至今，许多历史档案陆续开放，一些历史学家放下研究工作，投身于档案的发掘整理工作，报刊上不断披露专题档案材料，陆续出版专题解密档案集，由 A. H. 雅柯夫列夫院士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俄国文件汇编”是一部规模庞大的档案文件集，其中直接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有《1921 年的喀琅施塔得》、《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打断的》（5 卷本）。[2]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带走了大量十月革命到 1920 年代末的档案资料，2 卷本《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和 4 卷本《托洛茨基档案》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 20 年代有关。[3] 1920 年代关于政策方针的争论主要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进行的，因此联共（俄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速记记录是研究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手重要文献。[4] 1990 年以来出版了一些历史文件选集，集中提供了一些基本文献和新文献。[5]

中国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著作有：杨承训、余大章合著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沈志华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等。[6] 郑

---

①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3; *Роговин В.* Была л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Троцкизм”: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годы.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1992; *Роговин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п. Москва, 1995; *Трукан Г.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искуссия 1928 – 1929 гг. о путях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Москва: Знание, 1990. *Трукан Г. А.* Путь к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у.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② Кронштадт 1921.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в Кронштадте весной 1921 г.,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7;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 (б). В 5 – ти томов.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2000.

③ *The Trotsky papers.* T. 2. 1920 – 1922. Mouton: The Harue-Paris, 1971; *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Ю. (ред. и сост.)* 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 (1923 – 1927). В 4 – х тт.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1990.

④ 《俄共（布）第 13 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部分教师译，人民出版社，1987。

⑤ *Киселев А. Ф., Щагин Э. М. (ред.)*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14 – 1945). Москв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6; *Главацко М. Е.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 – 1940.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3.

⑥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异凡著《布哈林论》、《天鹅之歌》和论文集《不惑集》、《史海探索》[1]，柳植（杨存堂）著《世纪的实践》，徐天新著《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叶书宗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中有不少写于1980年代以来的涉及新经济政策的论文。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苏联史学者研究的新成果。[2] 资料方面，1980年代以来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布哈林文选》、《李可夫文选》、《托洛茨基言论》等，收有当事人的有关文章和资料。[3] 2002年出版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约有10卷收有新经济政策的20年代的档案材料。[4] 王丽华主编的《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收集了1990年代以来俄国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很有参考价值。[5]

一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

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6]，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纯粹出于军事的需要，或者说战争所迫。早在1917年9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7] 可见，革命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粮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

① 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中文第2版；《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② 柳植、徐天新和叶书宗的论文集均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③ 《布哈林文选》（3卷本），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1～1983；《李可夫文选》，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6；《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三联书店，1979。

④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⑤ 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5。

⑥ 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通常译作"余粮收集制"，不确切。本文一律用"粮食征收制"。

⑦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2～303页。

已实行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引发广大农民的不满，反对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这是导致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引发各地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行动有纲领的农民起义，其纲领叫做“劳动农民联盟纲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这是一支农民军队，其建制和红军类似，也设有政委，在士兵和农民中开展政治工作。有25%～30%居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参加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把“叛乱”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骑马的军事匪帮”活动的结果，这

指的是当时的征粮队。起义最后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部队平定。

农民起义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导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1920～1921年冬，虽然战事基本结束，但彼得格勒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激起工人的严重不满，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厂举行集会和罢工，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转厂自由。罢工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出现传单，批评禁止集会的做法，要求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

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采取了加剧矛盾的措施，关闭这些工厂，其工人只发给一半口粮，继而宣布实行戒严。季诺维也夫声称，现在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肃反委员会开始大规模逮捕罢工工人。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罢工的消息传到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水兵决定派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全体船员作了报告。全体船员会议通过决议，声援罢工者。3月1日在雅科尔广场召开大会，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参加，听取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代表的报告。与会者对彼得格勒当局反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为表示愤慨，他们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官僚。他们赞同上述两舰的决议，此决议包含整个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最低纲领，要点如下：

>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所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应均等。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

> 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①]

喀琅施塔得约有16000名守军，起义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并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庞大军力进攻这个海军要塞，平定了叛乱。一部分起义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②] 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③]

喀琅施塔得暴动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甚至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②他们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③起义者齐心协力，顽强地同布尔什维克军队战斗，宁死不屈。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政权垮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的执政根基。1917年10月26日，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④] 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起义的问题。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1917年反对

① 《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喀琅施塔得），1921年3月3日，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24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4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4页。

④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页。

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 3 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继续反对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虽然是当时保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措施，但却导致执政党信任度的缺失。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支持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水兵起义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寻找出路

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收制都是战争的需要，所不同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这一制度的时候，加进了“共产主义”因素，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系，把全国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管理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过反对意见。1919 年 7 月 17 日，孟什维克中央建议，取消现行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①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关、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②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③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

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作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干预消费公社的法令。①

社会革命党人 B. K. 沃尔斯基指出："劳动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活的，显然，任何强制措施，任何警察机关都不可能使政治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必须用实物税代替农产品征集制。②

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1920 年 1 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 Ю. 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党的领导接受。

1920 年 2 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①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②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③ 这个建议以 11 票对 4 票被否决。这就是说，当时的最高领导的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现行政策的必要性，认识落后于现实。

1920 年 9 月 5 日奥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业下降的原因是粮食政策，他提出一个后来在俄共十大上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活下去。

1920 年 12 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表达了农民的要求，建议在缴纳了严格规定的国家赋税之后，

---

①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 288 页。

②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第 289 页。

③ *Троцкий Л.* Новый курс. Москва: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1924. с. 57 – 58.

农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应的价格进行自愿的商品交换。

因为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实行了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6月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粮食运动”在9月1日开始，在10月1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实行“小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地方苏维埃有许多孟什维克，当时的粮食委员是孟什维克 M. П. 雅库波维奇。他们对省的管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在粮食政策上得到了反映。9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①]

这时列宁的态度还没有改变。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②]

1921年1月，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起义运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决定改变方针。

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 1. 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
> 2. 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
> 3. 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
> 4. 如果农民能迅速缴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③]

---

① ЦПАИМЛ, ф. 2, оп. 1, д. 15337, л. 3, 引自 *Журавлев В. В.* (*ред.*) 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 55。

②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44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38页。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1921 年 3 月 8 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高潮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这时候国内经济崩溃，供应短缺，粮食定量削减，实际工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广大居民的不满，示威游行、罢工、骚乱甚至暴动震撼了整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尤其致命的是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业工人数 1917 年为 242.88 万，1920～1921 年为 118.86 万，即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再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处境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①]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初预定在 1921 年 2 月 6 日召开，后推迟到 3 月 6 日，最后在 3 月 8 日召开。如果在 2 月初召开，及时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有可能防止的。

3 月 8 日大会开幕。大会派遣了 300 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暴动。列宁评论说，这"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原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②]

令人不解的是大会并没有立即讨论改变粮食征收制度问题，先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党史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民族问题报告，党的建设的报告，工会问题的报告，等等。3 月 15 日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以后才讨论"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用一个上午时间完成这项议程。

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主报告，瞿鲁巴作了副报告。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6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9 页。

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①] 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

事先登记了11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言。为节约时间，限定6人，所以讨论是非常不充分的，有关粮食税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发言者都表示支持实行粮食税，但对“周转自由”，即放弃粮食贸易的国家垄断的恰当性，提出疑问。有两个担心：首先是担心农户收入分化加强，另一个是不相信在新的条件下居民粮食供应方面不会出现新的困难。发言者都赞同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有人主张不放弃强制和垄断，主张把粮食税的实施时间推迟到下一经济年度。

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为强制辩护，认为不动用强制就不可能得到粮食。副粮食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同意必须改变粮食政策，但主张保持垄断，不过要改变实施垄断的方法。同农民的交换只能由国家或者国家委托的机构来做。但他认为，垄断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实施垄断措施是出于特殊的经济条件。[②]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米柳亭发言说，不仅在政治上，并且在经济上我们必须同农民妥协，这是因为粮食征收制已经进入经济的死胡同。他反对保留垄断，认为不转向地方自由周转，这实际上同粮食征收制无异。如果我们想做让步，那就应当作真正的让步，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效果。继续实行征收制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征收遇到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浪潮，他们用武装的手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③]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50~65页。

②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 (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3, c. 431 - 434.

③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 (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c. 434 - 436.

列宁在总结发言中不点名地回答弗鲁姆金说："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对实行这一点的经济条件做出估计和检查。"[①]

列宁认为，农民纳税后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剩余粮食的自由经济流转是适当的，但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影响增长。这时候列宁对合作社是不放心的，他采取了灵活的表述：自由的小经济流转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他提出一个改革的重要方针——"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成立委员会来研究积累的经验。[②]

大会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结束了实行粮食税问题的讨论。提供表决的有两个草案，一个是列宁代表中央提出的草案，一个是弗鲁姆金的草案。弗鲁姆金说：不同点在于他的草案中的第6条，这条说的"不是流转，而是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用品和经营用品"。[③]

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写道："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决议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的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

---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7页。

③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445. 第6条全文："农民纳税后所有留在他们手中的粮食、饲料和原料储备可以由他们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提高个人的消费，或者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品和经营用品。"

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①] 由于形势紧迫，列宁提出："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②]

两个月后，5 月 26 ~28 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新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在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死气沉沉，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对发展农业不感兴趣，结果是我们失去了经济基础。现在的任务不是去研究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③]

代表会议认定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其基本手段是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要把商品交换集中到合作社手里，但绝不排挤正常的自由贸易。会议还大致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向，其中表示支持中小企业（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允许把国营企业租赁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赋予地方经济机关自行决定租赁关系的具体问题；还修改了大工业的计划，加强日用品和农民用品的生产；扩大每一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质资源中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会议赞同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④] 不久，此委托书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地方。它要求采取措施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且不要限制地方流转的范围，在可能的地方转向货币交换形式。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概念。代表会议决议写道："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⑤]

1921 年 6 月 11 日彼得·波格丹诺夫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是新经济政策的纲领性基础，它提出恢复市场、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 105 ~10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6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99 ~200 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120 ~122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327 页。

货币机制，改变工业的管理方针。建议取消无偿劳动，提高工资，把对工人的供应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同企业的工人人数挂钩。使经济政策的整个基础立足于经济核算之上，同时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对中小手工业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发展合作社，把企业交付租赁，等等。6月16日，政治局会议基本上通过此提纲。

这样，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纲领在内容上和具体化上都得到了丰富。

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粮食税的初步措施

粮食税的实施首先要取信于民，让广大农民相信这一措施的真实性和长期性。

俄共十大后不久，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告农民书》说，“今后……粮食征收制废除，代替它的是对农产品的实物税。实物税会少于粮食征收制的数额。它应当在春播之前规定下来……粮食税的征收不应当实行连环保，就是说，应当落到单个的农户头上，使勤劳的业主不必为同村的懒汉交税。农民完税后剩下的东西完全由他自己支配……他可以用它们通过合作社和在地方市场集市上交换所需要的产品。”[①]

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原料征收制的决定》，为执行这一决定，人民委员会于29日颁布《关于1921～1922年实物税额的决定》和《关于在已完成征收余粮任务的各省实行粮食、饲料、马铃薯和干草自由交换的法令》。自4月21日起，人民委员会还陆续通过确定粮食、马铃薯、油料和其他农产品的实物税额的多项决定，把俄共十大的决定法律化并予以具体贯彻。

根据新的规定，1921～1922年粮食税额不超过2.4亿普特，撤销原来按照粮食征收制征收4.23亿普特的指标的法令。1.6亿普特的缺额将通过商品交换取得。

粮食税的实施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新经济政策客观上要求放弃许多已经习惯但过时的观念，如对农民（小生产）的态度，对商业、金融

① *Главацко М. Е.*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40. Хрестоматия, с. 141－142.

和货币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包括具体政策、配套措施、理论观点以及人的观念并没有解决。

起初，农民没有表现出向当局缴纳粮食税的愿望，他们不相信不会再征收补充税额的保证，因此征收头一批粮食税不比实行粮食征收制时征收粮食轻松。1921 年 5 月下旬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表示："粮食税的征收一方面要完成得彻底，另一方面时间又要尽可能短。"为了使支配余粮的自由真正像自由，必须迅速征税，使征税人不致长时间地同农民纠缠。为此还免不了要采取强制手段。[①]

为征收粮食税动员了 1100 名共产党人下乡，但力量仍然不够。1921 年 7 月 9 日政治局认为必须派遣尽量多的党员实施粮食运动，甚至不惜为此关闭某些机关和一些人民委员部。组织局决定，派遣了 24 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征收粮食税的工作。各地组织也派大量的干部从事这一工作。

农民对征税进行了反抗。在乌克兰隐瞒征税土地达 40% ~50%，其他地区也隐瞒土地和牲口数。当局发现有隐瞒情节就增加税额，如果找不到隐瞒耕地的所有者，就把税额摊到富裕农民身上，而土地收归村有。到 1922 年 1 月在 44 个省份共发现 300 万俄亩隐瞒的土地。此类行为被看作是富农和反苏分子的反抗，目的是破坏恢复工作，以打击苏维埃国家。这就是说，拒交粮食税不是看作经济犯罪或者一般刑事罪，而是政治罪，是反革命行为。

"背口袋的人"继续被看作敌人，虽然在多年食品不足、闹饥荒的情况下，"背口袋"是群众自我保障的一种办法。据《真理报》报道，到 1921 年 8 月初"背口袋的人"从农村运往城市的粮食多于国家收购的。

1921 年 9 月全俄仅收到 3150 万普特粮食。只有两个省完成任务，10 个省完成 60%，10 个省完成 35% ~60%。下年度的播种任务没有完成。1921 年谷物播种面积为 7980 万俄亩，而 1922 年为 6620 万俄亩。不过，1921/22年度征收了 23300 万普特粮食，1922/23 年度为 36100 万，最终消除了 1921 年的饥荒后果。农民相信了税收的稳定性。

1922 年 3 月 1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 1922 ~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308 页。

1923 经济年度实行统一实物税的法令（按照统一的重量单位——普特小麦或者燕麦）。这刺激了粮食生产，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同实物税的形式发生矛盾。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定征收统一的农业货币税。从这时起农民可以较为灵活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包括减少谷物的生产，通过经济作物的生产来缴纳赋税。

在国家缺乏商品的情况下允许买卖剩余粮食促使国家采取如下措施：开放小私人企业和非国有化的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留在国家手中的企业不得不从平均主义的政策转向按劳动支付报酬。

1921 年 4 月 7 日通过“关于调节个人劳动报酬”的决定，根本改变了工资制度。取消了对计件工资的限制，对重要工业企业临时实施实物奖励。1921 年 9 月 10 日公布的“关于工资问题的基本条例”中强调把提高工资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品量的增加联系起来。

1921 年 10 月 1 日通过关于物资、货币和粮食供应的国家计划。由于粮食储备继续减少，计划大大低于实际需求，只好削减国家供应企业的数量，以便保存国家特别需要的工业部门。削减一直持续到 1922 年新的收割季节。结果由国家供应的工人不到半数。

没有列入基本企业的那些企业可以租给合作社和其他联合体以及私人。取消国家供应而又没有出租的企业必须关闭，工人分配到开工的企业。

农民恢复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

实施粮食税以后，农民起义减少以至基本上消除。但军事共产主义的后果并没有立即消除。

1922 年召开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大会。大会的一个任务是建立新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首先是恢复平衡的货币和金融体制。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首次列入金融政策问题，报告人是索柯里尼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此后开始了货币改革，发行新的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有固定的汇率，甚至有黄金的保证。

从“产品交换”到“商品买卖”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政策体系，而是通过不断的摸

索、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否允许引进市场机制。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①]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②]

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结为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跃进。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在商品货币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贸易自由”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看作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1920年11月30日列宁致谢·叶·丘茨卡耶夫的信中写道：“从货币向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是毫无疑义的。为使这一过渡胜利完成，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③]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问题。实施粮食税之后，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还把“贸易自由”看作是“反革命”的口号，“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起初设想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做买卖的商业的合法化，还是停留在“产品交换”上。他曾这样解释过：“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经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21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③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5~36页。

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1]

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作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用布哈林的说法，这是“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制度”，它是一种寿命极短的“经济的蜉蝣”，是通向正常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一小步。但是人为的限制是行不通的。“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住自己的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结果出现了多少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也就是说，先开放一半，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然后再开放另一半，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2]

1921 年 8 月 9 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3] 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4]

经济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然允许农民纳税以后拥有剩余农产品，他们就应当拥有自行处理这些产品的权利，有出售和用它交换所需产品的权利，要想人为地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地方的范围之内，限制在仅仅同国营工业产品的交换之内，是不现实的。1921 年 10 月 29 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68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55～356 页。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1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 270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63 页。

破——在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在报告中说："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① 列宁认为还需要后退，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②

但是即使如此，列宁还是把目标定位在恢复"正常的产品交换"上。他在总结发言中说："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③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一些传统的提法也作了修改，例如关于"投机倒把"的提法。长期以来，苏维埃政权一直把农民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行为宣布为投机倒把，甚至视为反革命行为而予以惩办。现在既然允许农民完税以后拥有余粮，那么他们处置自己的农产品的行为就不能再叫做投机倒把了。1921 年 3 月 3 日列宁在致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就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出售一事写道：依我看，应当允许带得更多。你们对投机倒把怕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们单个地换粮食，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东西带进贫困的俄罗斯应当给予鼓励，而不应当加以阻扰。④ 1921 年 4 月 21 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明确指出："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他主张"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这样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须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28 页，另见第 506 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28 ~ 22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37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50 卷，第 152 页。

的轨道"。[1] 这样就逐步承认了农民的商业行为的正当性，不能以投机倒把论处。

新经济政策表现在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资本让步。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但成为党的纲领任务，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了市场关系的作用，它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可以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下列一系列措施：

（1）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2）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3）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工业的非国有化。

（4）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5）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中的自由发展，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7）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

（8）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所作的中央政治报告中的数字，1922 年的农业产量达到战前的 3/4，1922/1923 年度农业总产量为战前的 78%。播种面积也增加了，1924 年达到 1916 年水平的 90%，是 1913 年的 80%。[2] 数字表明，无论是到恢复时期结束，还是此后时期，农业生产的这两个指标都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到 1925/1926 年度末，农业生产水平达到战前的 92%，播种面积到 1928 年仍比战前约少 10%。[3] 谷物的播种面积直到 1927 年才达到战前指标，而这时候经济作物和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24 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63 页。

③ *Шишкин В. А.* Власть，политика，экономика. с. 184.

扩大了一倍左右。

恢复时期农业上还有两个特点：①植物和动物养殖业的商品性增长，②农民的收入增加。根据国家计委的统计，谷物的商品粮为6.5亿~7亿普特，占全部收成的14%~15%。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还要高一些，为15%~20%，因为这是城乡主要食品。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农产品首先是粮食的出口。在长期停顿之后，1922年秋开始恢复谷物的出口，从当年的收获中出口了4000万普特，1924年初从1923年收获中出口了1亿多普特谷物。[①]

实行粮食税后，农村播种面积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土地仍属国有，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虽然有某些限制，但同意使用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动。

实行粮食税后，起初征收的是实物税，1923年改为统一的货币农业税，这就给予农民更大的经营自由，种植较能盈利的作物。在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瞿鲁巴引用了一组数字说明农民税负的减轻：战前每个农村居民的各种税款总数为10.37卢布，而苏维埃时期只有1920/21年接近此数，为10.30卢布，此后逐年下降：1921/22年为6.11卢布，1922/23年为3.98卢布，1923/24年为3.06卢布，1924/25年为3.96卢布。就直接税和间接税而言，以1912年为100，则1920/21年到1925/26年度分别为97、78、60、68、44。就总支出而言，则下降得还要多，因为战前除税负外还有非税负支出，如租金等。以1912年为100，相应的数字为60、48、37、42和27。[②]

与此同时，农民的货币收入增加。1924/25年度他们从出售粮食获得2.77亿卢布，1925/26年度已经是4.7亿卢布。除谷物以外，1923/24年度农民从出售亚麻、油料子、黄油、鸡蛋、羊毛等的收入中获得3亿卢布。1925/26年度收入增至5.8亿卢布。这意味着农户的货币收入，包括农村内部的流通，在1925/26年已超过10亿。

---

① *Шишкин В. А.*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с. 184－185.

②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25, с. 60.

国营工业的初步改革

工业的管理朝非集中化的方向进行改组。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有成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法改变其工作方法，如运用“盈利”、“经济或商业计算”、“产品成本”范畴，等等。另一方面，在一定界限内在工业和商业中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私人租赁国家企业，外国租让企业，在生产尤其是商业流转中成立有外国资本参加的混合公司。

工业的改组是在整个国有化工业之内进行的。1921 年 5 月 17 日人民委员会撤销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超过 5 名工人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决定，但没有取消 5 月 17 日以前实施的国有化，此前的国有化企业仍留在国家手中。

改革主要是取消垂直的部门行政结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特有的总管理局和各种中心，实施企业的非军事化，逐步从实物支付过渡到货币支付，等等。

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有权支配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负责，独立使用自己的利润和弥补损失，即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商业和“资本主义”原则。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变成协调中心，无权干预企业和托拉斯日常活动。其以往所属的 50 多个总管理局和中心改组后只剩下 16 个。办事机关大大缩减。职员人数减少了一半，为 9.1 万人。约有 2/3 的企业不归中央管理了。

按照 1921 年 8 月 9 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和 1921 年 8 月 12 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恢复大工业、振兴和发展生产的办法要点”进行国有工业管理的改组工作。建立了新的国有工业的管理形式——托拉斯，全部工业实行经济核算。托拉斯化同生产的集中化并行，尽量关闭不盈利的企业，让技术和装备良好的企业开工，这表现在 1921 年 5 月 11 日政治局根据列宁的草案通过的决定。[①]

在国营成分中分出燃料和原料较有保证、效益良好的大型企业，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余企业则出租。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联合成托拉斯。1921 年夏开始取消国家对企业的供应，自己到市场去采购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50 页。

资料，其活动严格建立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经济独立的原则之上。亏损和不盈利的企业（主要是前几年同生产军工产品有关的）则关闭或暂时停业。这项工作到 1922 年秋完成。托拉斯达到 459 个，其中 130 个属中央。虽然直属中央的托拉斯只占 40%，但占工人数的 84%（一个托拉斯平均 480 人）。托拉斯不少于 20% 的利润用来形成后备资本（不久降为 10%），后备资本用来支持扩大生产，补偿经营损失。

开始出现辛迪加—托拉斯在合作制原则上的自愿联合，从事销售、供应、信贷。到 1922 年底，80% 的托拉斯化工业已经实现辛迪加化，到 1928 年共有 23 个辛迪加，在几乎所有工业部门活动，掌握批发商业的基本部分。

但经济核算的实施往往不按商业规则办事，有时政治领导认为，只要用半军事命令，以逮捕和长期剥夺自由相威胁，就足以实施经济核算了。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型工业企业和托拉斯的资助也破坏了经济核算制，结果以商业原则对生产领域的调节没有得到发展。经济核算、收支相抵、盈利、价格形成等等机制的实施采用的仍然是强制的办法。

托洛茨基认为，市场规律可以用于一部分工业，但不适用于重工业的基本部门，重工业应当处于新经济政策建立的新的工业管理体制之外。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托洛茨基说："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我们中间某些人，尤其是经济工作者，给予市场以过分的期望。然而，我们有重工业，我们的市场只能逐步推行。我们的冶金业，我们的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只能逐步地从它们的干船坞——军事共产主义放进市场的大海之中。逐步地和缓慢地。如果我们让重工业从事市场的自由游戏，它必然搁浅，因为我们的重工业的状态优于现在的市场。我们应当使我们的重工业立足于千斤顶之上，使它不至于瓦解和沉没在市场的水洼之中。"[①] 依他的看法，重工业只能立足于计划之上。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党机关对工业工作的干预，以保证"阶级的纯洁性"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

托拉斯化只是表面上接受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它们看起来仍然是工业中的异体。建立的托拉斯在许多方面是表面

---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Бюллетень.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 1923, с. 244.

上的，通过把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总管理局分解成若干部分而成。多数托拉斯在技术上是亏损的，往往把相应的生产工作交给各企业，而自身变成商业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严重依附于私人中介。产品的成本非常高：战前1普特生铁成本为60戈比，现在是4卢布，战前1普特铁4卢布，而现在为6卢布。商业采购活动水平极低。托拉斯采购大量其生产用不上、但系“缺门”的东西，而不采购确实需要的产品和物资。例如，莫斯科印刷厂购买了砖头、木板、水泥、玻璃（5亿），而拒绝购买其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如颜料、干性油、呢绒，相反地，把这些东西出卖给其他企业。私人中介是国营企业之间商业关系中的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手完成大量交易，收取高额佣金。

1927年关于托拉斯的法令取消了作为托拉斯经济核算活动主要目标的赢利的概念，这就使托拉斯回到国营企业的地位，生产效益、盈利、成本等概念在这里已经不起什么重大作用，而从属于政治任务和该行业或企业对整个计划经济的作用。

国营工业中的新经济政策使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得以复苏。1921年工业生产达战前的33%，1922年达40%，1923年达50%。[①] 新经济政策和运用市场关系导致国内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轻工业接近农业原料，符合群众消费的需要（首先是农民），因此在新经济政策下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而重工业仅仅处于恢复的初始阶段，是亏损运行的。

国家保留对国营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控制而不松手，因为这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党的阶级支柱。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经济的这一领域真正建立了市场关系：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提供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工业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在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疑虑，对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是新经济政策又要求运用市场商业原则，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于是国家控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就发生难以解

---

① *Шишкин В. А.*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с. 195.

决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争论和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业的决议》中都有所反映。这次大会的特点是所谓“经济工作者”同“党的纯粹著作家、政论家”的尖锐冲突。后者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原则的纯洁性，而不是合理组织工业生产。

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观点是：托拉斯是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的国家机构。”[①]“党专政”的概念完全可以用于此类经济机关的工作，应当全力加强党在托拉斯选拔和形成党的核心、共产主义核心中的作用。他在报告中提到，古比雪夫委员会考察了28个托拉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党对经济事务干预得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强调党专政，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持党干预经济工作，经济工作占了全部工作的9/10。”[②]

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对商业、市场观念的改变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发展了有效的市场机制，通过商业来组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正常交换。

但是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交换并不是通过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进行的。1921年安排工业品同农民手头拥有的粮食的直接交换，谷物和马铃薯进城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其一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征收的新的农业税，如果可能的话，用工业品去交换食品。但两者都未能做到。1921年国家总共得到23300万普特谷物，为战前的64%。较为活跃的是第二条渠道——“背口袋的买卖”（мешочничество）。这是非常特殊的同农村进行产品交换的大众形式，它的特点是灵活。1921年春公布了“关于自由交换”的法令之后有大量的劳动集体、私人商贩、家庭“采购员”的代表从中部和西北部工业地区来到产粮省份，用各种金属制品交换面粉、麦粒、谷物和马铃薯。村民对这种产品交换的需求也比较高。

“背口袋的人”在竞争中战胜了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他们采购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1923，с. 24.

②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31、32.

的粮食比后者多。但他们不能解决整个粮食问题。所以1921年秋决定转向同农民进行市场商品交换，1922年开始了这种转变。这时候市场上出现了托拉斯、辛迪加、银行、大中型商店，还有千百万小商人。仅在1922年下半年领得经商许可证的就有8.53万摊贩、1.91万各种小铺的所有者、9.31万小店主，结果商业点迅速增加。

在商业发展中国营成分起决定性的作用，其1925/26年上半年的商品流转量比1921/22年下半年增长24.6倍，而私人商业仅1.8倍。商业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1922年下半年私商（主要是原“背口袋的人”）的成分几乎占商品流转的73%，国营商业约占18%，合作社占9.5%。三年半以后，商业中私人成分的比重降为25%，国营上升为57%，合作社为18%。私商主要把资本用于零售商业，国营企业主要是批发，而合作社则两者兼有。

困难很多，货币系统的健全化进展缓慢，到处可以感觉到周转金的缺乏，而信贷系统刚刚开始形成。商业的分支机构特别薄弱，特别是在农村。在城乡贸易中存在大规模破坏商业交换规则的“剪刀差”。

1922年秋出现工业品销售危机。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工业托拉斯为追逐利润继续提高价格，造成销售的严重困难。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走向截然不同，形成托洛茨基所说的“剪刀差”，结果引发了1923年9～10月的“销售危机”，不得不通过行政程序把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压低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以消除“剪刀差”。

在批发商业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占据优势地位。托拉斯联合起来的国营工业是市场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1922年为组织工业品的销售和生产企业的原料供应，开始建立由各托拉斯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以协调各托拉斯的商业和供应工作。股份公司在批发商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建立股份公司的最初目的是吸收本国和外国私人资本。同时也建立纯粹的国营股份公司。1924年10月1日已经有82个股份公司在活动，27个公司在筹备。开展业务的股份公司有固定资本1.18亿卢布，其中国营组织占86.2%，合作社和社会组织占1.9%，私人资本占11.9%。

辛迪加、托拉斯和股份公司执行了第一道的大批发职能，但是由于缺乏广泛的仓库分支网，它们无法把商品送到各地零售网点，尤其是农村。执行这一职能的下一个环节是消费合作社，它们的批发流转额1922/23年

度为3.47亿切尔文，1925/26年达30.9亿切尔文。但合作社的工作存在严重缺点，不能很快适应市场条件，因而削弱了与地方市场的联系。

正因为国营和合作社的商业机构运行不灵活，私商占据了工业品销售的大量阵地。一种形式是经纪业务，私商无须具备大量自有资金，只转卖国营企业的产品，而国营商业组织也需要私人经纪人向各地销售产品并采购原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业组织和商业组织的流转额中，1922年1～4月私人成分占22.7%，5～8月占35.8%。有的部门，如食盐辛迪加甚至占47.3%。它们往往获得交易额的10%～15%的利润。

政府对私人资本采取的是排挤的方针。1923年1月2日，人民委员会法令规定，各国营组织之间的交易禁止私人经纪人参加。排挤措施包括减少或停止对私人的贷款，规定批发商营业执照税的高税率，采用所得财产税累进制，等等。在3年内批发商业中的私营商业减少了一半左右。

与批发商业不同，在零售商业中，私商的零售网点占绝对的优势。1922年下半年发给私人的商业营业执照共54.71万张，其中肩贩商业占25.9%，售货摊棚占52.8%，商店只占21.3%。国营商业有0.93万个零售商业企业，合作社商业有2.26万个零售商业企业，它们在商店和小铺中占优势。私营商业在整个零售商品流转额中占主要地位，1922/23年度它在全国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比重为75.3%。[①]

私营商业网点主要设在农村，它们为城乡交流和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商业网点的恢复主要是在城市，农村的网点恢复得十分缓慢。1925/26年度农村平均每1000多居民只有一个零售商业企业，而1912年每550人就有一个。这样私营商业就大量往农村转移，填补这方面的空缺。1923/24年度私人商业在农村有8.27万个固定零售企业，占城乡全部私营零售企业的25.5%，到恢复时期末，农村私营零售企业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达15.58万。1925/26年度，在私营零售企业总量中农村网点占36.7%。[②]

到1926年，零售商品流转额才接近1913年的水平。

---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0，第196～198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95～197页。

与批发商业一样，在零售商业中苏维埃政权也竭力排挤私营商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部零售商业流转额中公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由1922/23年度的24.7%上升到1926年的59.3%，而私营商业则从75.3%下降到40.7%。

实际上，当时的迫切问题不是排挤农村中的私商，而是在农村继续发展为广大农村居民服务的零售商业网点。1926年在全国居民总数中农村居民占82%，而1925/26年度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农村只占25.8%。这就说明，这时候农村需要的是发展国营、合作社和私营的零售网点，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来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财政金融改革的成就

1920年市场关系几等于零。货币体系经不起纸币的超大量发行，同市场、批发市场、零售商店以及大量的小店铺一起崩溃。合作社处于休克状态。银行和信贷系统不再发挥职能。食品的定量配给制度不足以保证起码的生活。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布尔什维克仍然坚持消灭货币的方针，企图以实物交换防止使用货币的买卖交易。苏维埃纸币继续起着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从十月革命到1921年3月，苏维埃政府发行了纸币2327586.7百万卢布。1921年下半年和1922年全年发行新版纸币1999117289百万卢布。直到1921年下半年实物交换失败，不得不用商品买卖来取代“商品交换”，这才开始设法考虑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把消灭财政赤字，实行币制改革问题提上日程。

1921年10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称：为了促进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了使货币周转集中起来并贯彻其他旨在建立正确的货币流通的措施，决定成立国家银行。① 11月16日俄联邦国家银行成立。国家银行的任务是促进信贷和其他银行业务，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周转，还有集中货币周转以及实施其他旨在建立正常的货币流转的措施。

为了缩减国家的实际开支，1922年间政府削减了各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机关一半以上的开支，几乎削减了9/10的武装力量（同1920年相比）。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281页。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紧急集中工业于技术装备最好的企业，把技术装备不良的企业和小企业租让出去或者出租。同外国企业主和公司签订了第一批租让合同。1922 年底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工业托拉斯已经上缴国家纯利润 21274 万金卢布。

通过一系列严厉措施预算赤字逐季减少：1922 年 7～9 月收入为 14200 万金卢布，而开支为 26200 万，10～12 月收入为 17800 万，开支为 20900 万，1923 年 1～3 月收入为 23600 万，开支为 24300 万。[①]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苏维埃纸币的稳定问题，因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继续上涨。

为取消数量巨大的纸币，1921 年 11 月 3 日根据人民委员会指令决定发行新版货币。指令称，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有必要改组货币流通体系，为居民和工商业周转提供较为正常的经济核算基础和简化货币计算。为此宣布发行 1922 年版的货币，1 个新卢布等于 1 万旧卢布，新旧卢布同时流通。此外，人民委员会决定严格限制 1922 年按黄金计算的纸币数量。这些措施，保证了卢布汇率的逐步改善。1921 年 12 月 28 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经济工作的指令，指示财政人民委员部"全力以赴尽快减少并进而停止发行纸币，恢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正常的货币流通。应当坚持不懈、毫不因循拖拉地以税收代替纸币发行。"[②]

币制改革的基本做法是，一方面继续保留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的苏维埃纸币，同时由国家银行发行价值 10 卢布的银行券切尔文。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小于 10 卢布的国库券，包括银币和铜币，最后停止苏维埃纸币的流通。实行两种币制并存的办法，是为了用大量发行不断贬值的苏维埃纸币去弥补财政赤字，同时保持同黄金挂钩的切尔文的稳定，逐步用切尔文取代苏维埃纸币。

1922 年 10 月 11 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授权国家银行发行银行券，即切尔文，用黄金和外汇保证，法定 1 切尔文兑换 7.742 克黄金。可以用切尔文按照稳定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英镑以及其他外币。1922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发行。在一年半时间里切尔文同苏维埃纸币并存。

1923 年 1 月 9 日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银行券（切尔

①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с. 103.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1 卷，第 311 页。

文）"……在交易所的开价几乎同英国的英镑处于同样的水平……它很快就会在国家的经济中占重大的地位，其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坚决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把银行券用于预算目的，用来弥补预算赤字"。[①]

1923年2月15日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确定并通过人民委员会实施关于外汇业务的法令，除在国外的企业，禁止以外汇支付，同时禁止以沙皇时期铸造的金币支付。这些措施是防止影响银行券（切尔文）的信誉。

1923年2月1日国家银行发行193万切尔文（1930万金卢布），以信贷的形式供托拉斯和辛迪加恢复国营工业的固定资本和周转资本之用。国营工业利用新货币按照金卢布来计算价格以及其他生产因素。为了把切尔文推广到国内商品周转中，财政人民委员部责成国家银行确定切尔文对苏维埃纸币的牌价，每日公布。但国家银行不进行苏维埃纸币兑换切尔文的业务，以保持两种货币同时并存。银行也不进行切尔文兑换黄金的业务，虽然切尔文上面标有含金量。

1924年1月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给俄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于2月中旬结束。发行新的国库券用于预算和切尔文的兑换（按1切尔文兑换10卢布国库券的比率）。国库券的发行起初完全通过信贷机构，以后主要通过信贷机构。先发行5卢布面额的，然后是3卢布的，最后为1卢布的。接着国库券后又发行银币：高成色的1卢布和50戈比，低成色的20、15、10戈比。提供的白银数量应当满足银币流通的需要，发挥的作用不小于战前，即达到全部货币流通量的12%～15%。银币的这种发行量目的应是加强对货币改革的信任。"[②]

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的完成货币改革的计划得到1924年1月14～15日召开的俄共中央全会的批准。货币的发行量降低到商业流通所必需的限度。1924年2月切尔文的发行量为2730万卢布，3月为760万卢布，4月为690万。[③] 用切尔文更换苏维埃纸币的工作在1924年2～3月完成，但决

---

① ЦПАИМЛ, ф. 17, оп. 84, д. 438, л. 194。转引自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 104－105。

② ЦПАИМЛ, ф. 17, оп. 84, д. 659, л. 54－55。转引自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 108。

③ ЦПАИМЛ, ф. 17, оп. 84, д. 660, л. 115。转引自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 109。

定性步骤是在 1923 年完成的，那时切尔文已经几乎占货币流通的 70%，苏维埃纸币仅占 19.1%，中央金库的债券占 11.1%。1924 年 1 月 1 日流通中的苏维埃纸币总共只有 5800 万卢布，而银行券已经达到 2.8 亿卢布。因此，4/5 的货币周转立足于稳定的货币，只有 1/5 是不稳定的货币。

1924 年 2 月 14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完全停止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从 2 月 11 日起开始发行各种面额的卢布纸币，从 7 月 1 日起完全停止使用旧苏维埃纸币。3 月 7 日人民委员会规定切尔文的牌价：新版国库券 1 卢布等于 1923 年版卢布 5 万或者 1921 年版卢布 5000 万。苏维埃纸币将按照此牌价兑换新的国库券。全苏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货币流通系统已近乎健全”，切尔文已经获得国家“基本货币”的地位。

整个说来，1922～1924 年的金融改革不仅恢复和整顿了货币流通，消除了金融经济中的混乱状态，而且停止了货币的大量发行，为制定1923/24 年正常的预算创造了条件，恢复和整顿了税收制度，促进了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大工业、交通运输、银行信贷）运行机制的改造。

执行中的危机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执行过程中问题不少，危机不断。主要有两次较大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 1923 年夏秋出现的工业品的销售危机。托拉斯和工业企业追求高额利润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重工业长期处于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之下，许多工厂和托拉斯靠挪用流通资本生存。为使工业摆脱这种状况，1923 年 7 月 16 日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皮达可夫发布第 394 号命令，赋予托拉斯和辛迪加以保障最高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全权。“最近时期企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活动的总的指导原则是作为任务的利润和作为方法的平衡表”，根据这项命令，托拉斯猛烈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使农村根本无法承受。

农民经过 7 年战争终于获得一个不坏的收成，有可能用不多的钱去部分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然而他们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及轻工业所需的原料被压低价格，而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却一直上涨。农产品和工业品价

格的走向截然不同，一个下降，一个上扬，形成“剪刀差”，结果引发了1923年9～10月的“销售危机”。根据统计局提供的批发价，以1913年指数为100（用切尔文表示），农产品1922年10月为101，1923年9月为90，降低11个百分点，而相应的工业品分别为140和273，则提高133个百分点。按照财政部的零售价，农产品1922年10月为111，1923年9月为93，降低18个百分点，工业品分别为174和269，提高95个百分点。[①]

农产品的低价，使得农民缺乏购买工业品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导致产量并不高的工业品的大量积压，商品和资金的正常周转遭到破坏，出现协作单位之间无法支付，工厂拖延工资的发放现象。连续几个月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紧张。1923年7～8月一些城市，包括莫斯科、哈尔科夫，发生工潮。仅在1923年4～9月间就发生了5611起工人同行政当局的冲突，而且有191起伴随着罢工，参加人数达8万人。[②] 在高加索地区“剪刀差”导致格鲁吉亚爆发反苏维埃起义。这次起义在1924年席卷了格鲁吉亚1/3的县，在共产党内部称之为“第二个喀琅施塔得”。根据国家保卫总局的看法，这种起义还有可能在其他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发生。

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通过行政程序把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压低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指数，以1913年价格为100，1923年10月1日为88.8，到1924年10月1日则为136。在此期间，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缩小到1.46∶1；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减一半以上。[③] 1924年春，剪刀差已经大为缩小，4～6月已等于零。

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1925～1926年的冬季还出现过粮食收购“危机”，导致粮食出口计划完不成，并相应地减少进口。为此不得不削减商品的进口，从而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1926年的谷物收购困难，摆脱危机的办法是“取消”流通

①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II.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ю к нэпу. Москва: Изд. АТ, 2000, с. 351.

② 见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第203页。

③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80页。

领域的新经济政策。

第二次大危机是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与经济作物相比粮价不合理，农民（而不仅仅是"富农"）拒不出售谷物。以战前价格为100，1924/25年谷物价格为129，畜产品和经济作物为135，1927/28年相应为109和151。[①] 谷物价格逐年下降，而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价格则不断上涨，农业内部的"剪刀差"不断扩大。这样农民宁可把粮食留下用来饲养牲畜，用牲畜及其他经济作物换钱，去缴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税收也不利于谷物。大田作物在农民的纯收入中占39.5%，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却达66.59%，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27.8%，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5.2%。此外，工业品供应不足，也影响农民出售粮食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本来应当有针对性地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调整谷物同畜牧产品以及经济作物的价格，调整税收，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对不上号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5条和第107条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把行政命令措施推向极端。

在实施非常措施并同"右倾"斗争的过程中，斯大林公开提出"贡款"论，认为农民不仅应当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款，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应当缴纳一种"贡款"，即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品，使已经被否定的"剪刀差"合法化；同时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②] 这个"理论"为以后大规模镇压，包括消灭"富农"和镇压党内外的异议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虽然简捷有效，在短短时间内征购了大量的粮食，但此法只可用于一时，不能反复长期使用，数月以后斯大林再次实行非常措施就不灵了。依据"非常措施"的强制思路，不久斯大林就强制实施了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

20年代的几次危机提出了走市场道路还是行政命令的计划化道路问题，然而它们没有促使苏联走向市场经济，从解决办法到当权领导人的思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1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49～150页。

路，走的都是行政命令的强制道路。斯大林的最后胜利意味着苏联走市场经济的最后一点可能性的消失。

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

20世纪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新经济政策的通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意见。所以列宁一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一致通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对意见。通过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货币关系，建设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被看作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其次，新经济政策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出台的，而是以实施粮食税为开端逐步充实完善的。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机制。这就出现如何对待随之出现的私商（耐普曼）、"富农"、私人贸易，如何看待市场关系等问题。

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在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有人"出于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号啕大哭。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削弱各国革命运动。在俄国共产党内怀有这种情绪的人就更多了。

原工人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耐普"（НЭП）一词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Новая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其缩写词与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词相同）。他们说，耐普使财富在一极积累，而另一极贫困，使工人更加贫困。也许在某个地方工业和商业会得到发展，但工人阶级会落入深渊，矛盾将发展，其结果将是内部爆炸。[1]

抛开这种极端的看法不论，在党内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

[1]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18.

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回归还是创新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①]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②]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民对军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1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粮食征收制的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给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 年 1 月 26 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①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暂时退却，对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的任务可能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其二，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早在 1922 年夏列宁卧病高尔克的时候，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就发布打击耐普的支柱——粮食自由贸易的指令。由斯大林签发的 1922 年 8 月 24 日的密码电报写道：“1. 认为在完成

①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 23 页。

粮食税之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关于禁止自由买卖粮食的法令（这说明这时候存在这样的禁令——引注），并且严格限定仅适用于那些蓄意拒绝纳税的个别机关。2. 执行降低粮食价格的政策，因为粮食的昂贵价格将减少国家的粮食库存和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①]

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注），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退却是全面的，"在国际政策舞台，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②]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 年 1 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③]

在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要胜过斯大林，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新经济政策，其标题分别为：第 11 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第 12 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虽然分出专门的章节来论述新经济政策，但从副标题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所关注的重点，他的论点始终围绕阶级斗争、退却和进攻、国家资本主义展开。[④]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列宁说得完全对，说新经济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这种制度首先是为了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真正的结合。我重读了 1921 年出版的列宁的《论粮食税》。他列举了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租让制——第一种成分，合作

① ПАНО, ф. 1, оп. 2, д. 266, л. 31。转引自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уро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2, с. 102。

②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5、7.

③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 11 页。

④ 见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

社（把它叫做社会主义是白费劲，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租赁企业——数量不多。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在这一领域无须寻找更多的新东西，我们应当坚持1921～1922年所坚持的东西。”①

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发展经济是要有利于资本主义，还是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呢？谁战胜谁？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长入何方？”“蜕化的问题是存在的，资产阶级不相称的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②

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说法，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排除出新经济政策之外了。列宁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并多次指出过。在季诺维也夫书写《列宁主义》一书的时候（1924年）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其次，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而后者归根结底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只讲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完全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面，大大缩小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也大大贬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③ 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19.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6、8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①] 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②] 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③] 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④] 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虽然不是相对的，而只是绝对的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⑤]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2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9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196页。
⑤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220～221页。

时“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作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1] 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6页。

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①] 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②]

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认为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发展变化。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他一方面说，税收不要拿得过多，另一方面却宣布1922年不能少收，要收取得更多，粮食的价格要规定得“非常低”。[③] 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这种做法实施的就是该规律的精神。加米涅夫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得不同意伏龙芝的说法，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粮食数量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显然，我们越出了政治上所不能允许的经济界限。”他承认向农民增收高额粮食税是不合理的，说“我们应当修改我们同农民现有的协定，改善这个协定，应当在政治上关心农民。诚然，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何等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农民为支持整个国家大厦所支付的那一部分？”[④] 当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5、366页。

③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7页。

④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325、399.

时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但这一措施并没有改变通过征收直接和间接税的办法剥削农民的相当多的劳动以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增长的总的战略方针。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①] 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②] 又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③]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④] 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倚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谈话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1～363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41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

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①

早在党的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议论。

季诺维也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应当区分名词耐普（НЭП）和新经济政策。说到耐普的时候，向你们描绘的是耐普曼及其不良特点。我们常常说‘战胜耐普’。我不久前读到拉科夫斯基在乌克兰的讲话，他说：‘我们振兴了制糖工业，这是对耐普的最好胜利！’为什么这是对耐普的胜利？我不是在指责拉科夫斯基同志，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说。这是因为我们把耐普同耐普曼混淆了，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因此我们也许最好是约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耐普。”“一批或一小批被派到耐普阵营的经济工作者在那里沾染上了耐普的（нэповские）观点，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严肃的经济工作者是不会感到委屈的。”②

不少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斯米尔加在发言中说：“什么是战胜耐普？战胜耐普就是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战胜新经济政策。”③ 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们实行新政策是为了在其基础上和在很大程度上用其方法战胜它。怎样战胜？善于利用市场规律的作用，依靠这些规律，在其机制中输入国营生产原则，不断扩大计划原则。最后我们把这种计划原则运用到整个市场，从而吃掉和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自动接近其消灭，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之，这最新的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④

托洛茨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他在俄共十二大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说：总体上，新经济政策是“工人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社

①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327页。

②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24、32.

③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327.

④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313.

会的方法、手段和机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渡。"① 他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拉科夫斯基同志就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说道："但我们在制糖工业中取得成绩，生产得更多更好，这就是对耐普的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是对耐普的打击。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打击耐普？"不过，同志们，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但不是永远的。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在其基础上战胜它。如何战胜它？在市场规律的协助下，依靠市场规律，把我们国营生产的强大机器引入这个规律，扩大计划原则。依靠我们国家财富，此计划原则应当扩大到整个市场，吃掉它，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成就接近或者应当接近取消它，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它，此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权说，我们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胜利，并且是借助于新经济政策自己的方法取得胜利的。②

加米涅夫认为，"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上的泡沫，而新经济政策还不是我们共产主义的全部，不是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工具之一，共产主义的迂回运动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妥协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的萌芽。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对政治就一窍不通。③

这么多的领袖挺身为"战胜新经济政策"辩护，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宣传和推广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与"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相配合的还有"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

1924 年 5 月 23 ~31 日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作中央政治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中央组织报告，这是列宁去世后举行的第一次

---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282、286.

②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249 －250.

③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117、118、这里的记录是"耐普"，而不是"耐普曼"，看来是记录错误所致，后来斯大林借此做文章，攻击加米涅夫。

代表大会。会上出现拉林提出的新名词"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拉林在讨论中央的总结报告时，敏感地捕捉到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情绪发生变化，他援引季诺维也夫报告中"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计划"等，把它概括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私人商业资本施压的开始。

季诺维也夫在总结报告中说："新的商业政策和新的合作社政策，是当前两项主要课题"，"当然，所谓新政策是有条件的"。[①] 资产阶级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我们的任务是"为限制他们而斗争"，"在一定限度内为我们所保留的、有调节的、有序的、明文规定并加以监督的贸易自由，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础"。他建议"把私人商业纳入应有的轨道"，改变它对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现在是1:2），"随同这些措施还要把耐普曼驱逐出莫斯科、国营商业制定严格的规则、制定新的条例让格伯乌便宜行事"。关于富农问题应该注意别在对富农的让步方面搞过头。在农村兴起的有一般的耐普曼——高利贷者、小店主、酿私酒者和批发商人。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商业和合作化政策，那么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将长入社会主义。[②]

拉林由此得出结论，出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解，"原则没有变。什么变了呢？那就是我们变富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摆脱战后即3年前的那种贫困，因此我们更加坚决地贯彻我们原则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政策'等等的意义也就在于这种可能性的增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概括为，我们从旧的、习惯的、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我们这里将要做的一切的含义是，我们并不改变原则，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实施我们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所无法实施的那条路线的可能性。"[③] 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加米涅夫不接受"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手中有法律、税收以及各种管理机关，足以限制新经济政策，没有必

①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9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1~91页。

③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77、198页。

要另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主张对资本主义成分（从租让企业到私人零售商业）实行不调和的正面进攻。

古比雪夫说：“说的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斗争双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相互关系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要使商业流通领域出现有利于国营和合作社资本的影响增长。问题就在这里，问题也只能这样提。”①

加里宁在农村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农村商品经济在助长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认为“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关系，意味着私人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他提出，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沿着对我们最为有利的轨道并在我们严密的全面监督之下发展。②

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呼声，就是要千方百计压缩以至取消商品经济，打击以至消灭私商，使社会主义迅速压倒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5 月 29 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发言，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农民问题对我党来说有着根本的意义。我们是否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否取消新经济政策，是否能够维持苏维埃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状况”。他说，有私商和小铺的农村，要比既没有国营商业也没有合作社商业，刚刚开始准备组织这种商业的地区好得多。“既然那里没有合作社，它建立的速度又很慢，那么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工人，有私商比没有任何商业自然要有利一些”。“如果我们用压缩市场作为代价，以国家资本取代私人商业资本，这会是极大的错误，对党极为有害，会推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

李可夫说：“不久前我曾经请求为我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报纸。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文章，这是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教师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 40%，国家有 100 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 4 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而在我们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时候说结束新经济政策，这

①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348 ~ 349 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528 页。

是极大的错误。只有当我们在工人的数量上、同农村的商品联系的数量上超过战前的水平时，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李可夫认为，我们有半数以上的农村是同城市隔绝的，几乎从城市得不到任何商品，因为70%的工厂产品都被我们分配给城市了，只有30%的产品运往农村。这就是说，农村是通过农村的各类手工业和家庭式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这也是生长资产阶级的基础啊！富农阶级不能不成为这种与城市隔绝的农业生产的中心组织。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城市商品输入农村，这是同在这种土壤中产生着的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个方面。[①]

李可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商品粮的生产角度看，富农经济无疑生产得更多，从而购买得也更多，在城市里扩大了商品流转。诚然，以富农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阶层在发展，但富农的范畴至今还不明确，经常同中农，有时还同文明的贫农混为一谈。加里宁在报告中也指出富农概念不清的问题，他引用列宁的观点说，“不知道这个农户的经营史就说他是或者不是富农是不行的”。财产多少还不能说明就是富农，要分析这些财产是怎样积累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积累的？财产所有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最后，经济地理上所造成的特点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的农民在正常的情况下要比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富得多，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更接近富农。当时商业的现实情况是国营商业占1/3，私人商业占2/3。这不是主观愿望问题，而是现实力量问题。国营商业只能供应这么多，特别是在农村主要靠私人商业满足居民的需要，私商在满足居民的需要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限制甚至消灭私商，纯属空想。

大会决议中一方面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经济的振兴，“党现在没有任何根据来修改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认为“当前的任务是不断加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党中央委员会清楚地看到在目前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有所发展，并由此采取一切相应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②]

“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69~570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11页。

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1923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尽管在以后的3～4年里新经济政策表面上还被当作健全的正常的政策，尽管在1925年布哈林等人曾经大声疾呼要求把新经济政策推行到农村去，但其历史命运已经无法改变。

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

被迫实施的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在农民暴动，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威胁下，苏维埃政权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被迫实施的。那时候全党面对的是要么改革，要么苏维埃政权灭亡，别无选择。所以列宁多次说过，实行粮食税在党的十大上是一致通过的。农民由于实施粮食税，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感到满意，因而武装反抗的浪潮消退，国内形势转入稳定。

不过一年后威胁消除之后，党的领导核心以至普通党员中有许多人认为退却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转入进攻。在这强烈要求下，连列宁也顶不住，在党的十一大上，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仅仅1年以后，宣布停止退却，转入进攻。在此后的年代里，这股要求进攻的呼声不但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强烈。并且正是这种“左”的代表人物执掌政权，主导政策，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多数人对新经济政策心存疑虑，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用行政手段来限制新经济政策，甚至发布与新经济政策精神相违背的法令指示，缩小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和范围。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①] 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的年

① ПАНО，ф.1，оп.2，д.266，л.31。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3，с.208。

代里，实施新经济政策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恶”，苏维埃政权依然敌视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例如1926年8月23日中央组织局决定，禁止共产党员在租让和私人企业担任行政职务。[①]

经济核算制度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能够推广到所有工厂企业。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它们拥有有限的出售产品的权利。但1922年9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允许所属企业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停止这种过渡。向其他人民委员部说明，不赋予它们把所属企业转入经济核算之权。”[②] 经济核算仅到托拉斯一级，没有普及到企业。托拉斯受上级党政机关的指令的控制。按照1923年4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按照商业核算原则活动的国营工业企业（托拉斯）”的命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其计划管理，包括发放拥有建筑物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的许可证，出让、抵押和出租固定资产，任命和调动托拉斯的理事会和稽核委员会，批准生产计划、工作报告和平衡表，年度利润的分配，批准参加工商联合体，等等。这样，留给托拉斯的自主性就非常有限了。

国家保留对国营的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强大影响而不松手，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建立了市场关系的真正空间：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的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党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工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与此同时，逐步地并且越来越厉害地从国营企业间的供应、买卖中排挤私人商业中介。

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对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存在疑虑，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都有怀疑。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声称：“托拉斯无非是具有一定自主权

---

① ПАНО, ф.2, оп.2, д.116, л.3。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8。

② ПАНО, ф.1, оп.1, д.927, л.24。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1。

的国家机构，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① 1924 年 3 月 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机构和企业的自由，规定它们至少把 60% 的后备资金用来购置息票。1927 年 6 月 29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的新条例规定托拉斯完全服从国家的计划任务，取消了托拉斯提取利润这一条。

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处境非常不稳定。1923 年 10 月 9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高收入人群中强制摊派国家 6% 有奖公债，逃避购买等同于逃避税负。② 1924 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 1923 年 12 月底一直进行到 1924 年 1 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他们的家庭成员，除公务员外，一律迁出莫斯科，并禁止居留在各共和国首都和人口稠密的工商业中心。住房被查封，与其他屋内财产一起交付莫斯科不动产管理局处理。③ 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 年 4 月 24 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社的决定，其中规定：①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②着手制订商业条例，制订条例时须有国营商业代表参加并处于领导地位。③研究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等。由于商品荒，1925 年 11 月 4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斗争的专门决定："加强对那些因出售和倒卖日常用品而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合作社工作人员的镇压，迅速审理此类案件，并举行一系列的示范审判……规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关最多在两周期间内完成上述案件的初步调查……侦察要在最短期间完成。"④

1930 年 6 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44 – 45.

② ЦГАОП, ф. 1235, оп. 101, д. 4, л. 93。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22。

③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84, д. 485, л. 8。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22。

④ ПАНО, ф. 20, оп. 2, д. 57, л. 4 – 6。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23。

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①] 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无非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 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拔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左倾激进思潮的对抗

苏俄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无先例可循的创举，只能摸索前进。在这过程中有人从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观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人死守传统观念不放，总想走回头路，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宁是前者的代表，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实践，列宁由否定商业到承认商业，从试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到允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换，从只允许产品交换到承认商品买卖，最后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做生意。列宁的这个号召实际上意味着要全党学会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市场机制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列宁过早逝世，他的继任者多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并不理解，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看作是 1918 年春政策的回归，不承认它同以往的政策有质的差别。政策不稳定，受政治气候、党内斗争的影响甚深。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对耐普曼和富农的政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 268 页。下划线是原有的。

策，经常是党内争论的对象，党内除布哈林等少数人，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在骨子里他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政策的不稳定导致居民心态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没有人愿意把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①] 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多少严格的概念。1923年10月15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批评政治局的政策时指出：“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性决议。”[②] 党的领导也不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策略路线，而只是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牌，在整个20年代悄悄地破坏和扼杀新经济政策的根基。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平等观念与先富起来群体之间的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社会出现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一方面出现大量失业人群，另一方面出现一个富裕阶层，这个富裕阶层被官方定性为“新资产阶级”，采取了限制、压制和不断打击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怀有平均主义心态的群众的拥护，他们拥护“劫富济贫”的做法，在农村定期重分土地，剥夺“富农”或者富裕农民的财产。在城市，工人和市民对因新经济政策获利发家的耐普曼也心怀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剥削发家的。正因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3～306页。

② Правда, 3 января, 1923.

为如此，官方“转入进攻”、“打击富农”的方针能够得到城乡劳动者的拥护和欢迎。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斯大林派都担心农村的分化，都打“反富农”的牌。但是谁是富农，在整个20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曾经批评过乱划富农的现象，说被当作富农特征的有：“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住宅，制作并向本村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有的地区规定有2~3头奶牛或2头役畜者为富农，甚至连经常或临时出租住房者也算作富农。在许多场合被列入“富农”的是从事集约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种植高产作物、把农业劳动同辅助性手工业结合起来的农民。[①] 1929年5月，人民委员会曾规定过富农的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磨坊、油坊、碾米厂、梳羊毛机、弹毛机、烘干房或其他有机械动力的企业，等等。[②] 而这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小的乡镇企业主。剥夺富农前夕，为便于操作，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编制了“确定”富农的标准：每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全家至少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拥有磨坊、油坊，等等。[③] 在这些特征中，只要具备一个，就可以定为富农。但在这些特征中缺乏社会标准，即关于剥削的界定。把这些人当作“富农”打击甚至消灭，谁还会去努力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呢？

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形成一种仇富的气氛，以穷为荣，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干部把穷人当作唯一的依靠对象，以至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批评“左派”糊涂虫的观点，说“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④] 斯大林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34年了！可见“把穷人理想化”，“依靠穷人”的观念是多么牢固地扎根在各级干部的脑海之中。然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这些“左派”自己。

---

① 李可夫：《1928年中央11月全会总结》，《李可夫文选》，第395页。

② 见 *Данилов В. П. и ИвницкоН. А.* （*ред*）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ревни накануне и в ходе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Москва，1989，с. 221－222。

③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309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18页。

行政命令措施下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经济学家布哈林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也只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需要价值规律，而这以后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而代之以“劳动消耗规律”。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作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 年 12 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①] 1926 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②]

1923 年夏秋的销售危机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 394 号命令引发的，它要求国营托拉斯和辛迪加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竭力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严重的“剪刀差”，酿成所谓销售危机。而实际上当时工业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农民没有钱来购买，形成积压。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1924 年 10 月 28 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通告，地方领导人可以根据政治因素或者经济需要加强镇压，以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经济困难。西伯利

①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08。

② 转引自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下册，晨曦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 773 页。

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P. И. 艾赫 1925 年初就是这样做的。他指示格伯乌西伯利亚特派员采取措施逮捕最主要的私人粮食采购商和磨坊主。结果逮捕了 5 名大采购商，理由是他们高于限价收购粮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有规定，在俄联邦的某些区，格伯乌机关有权把从事粮食投机的人关进劳改营。[①]

1925 年农村有一个短暂的开放时期。但 1925 年下半年由于出现新的危机迹象，党的高层的情绪又发生变化，地方上重新开始向私人采购商发起进攻。交通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特派员帕弗卢诺夫斯基命令遵照条例行事，据此条例不保存和接受未列入名单的收购商（首先是私商）运往西伯利亚以外的面粉。1925 年 10 月 29 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决定采取措施使市场正常化，限制把车皮拨给私商。这种做法显然是同新经济政策相矛盾的。

1928 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并不是农村没有粮食，而是粮价不合理造成的，本来应当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调整谷物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刑法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

税收政策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 20 年代不断减免贫农户的农业税，增加富裕农民的税负。1923 ~ 1924 年占农户 9.5% 的富裕农民和"富农"缴纳了 29.2% 的税额，以后他们的税负比重继续增加。富裕阶层想通过分散的办法减轻税负，结果 20 年代农户分散化的速度比革命前快一倍，这种现象不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当然也有受益者，居民群众利用新经济政策给予的商机和自由，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的开始发家致富。在城市有耐普曼，他们在零售商业中占据巨大的份额，弥补了尾大不掉的国营商业的不足。耐普曼在活跃城乡流通、城乡交流，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部分善于经营的人士，他们的经营活动远远没有达到形成资产阶级的程度，并且由于大型批发业务都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耐普曼的活动受到严密的控制和约束，对整个国民经济并不构成

---

① ПАНО，ф. 1，оп. 2，д. 53，л. 13。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16。

威胁。

在农村从新经济政策得到好处的是善于经营的勤劳的农民。沙俄时代的富农经过国内战争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已经基本消灭，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被剥夺，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富农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在农村兴起的是那些善于经营耕作的勤勉的农民，他们利用缴纳粮食税后的剩余来改善和扩大生产，逐渐成为农村的富裕阶层，当时叫做“富裕农民”，以区别于所谓“富农”。但是他们的日子总的说来并不好过。按照过去村社的传统农村定期重分土地，这很不利于土地的改良，农民对过去富农的盘剥仍记忆犹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在农村就对“富农”实施剥夺，没收他们的土地、住宅和财产。

在农民写给报社的信函中有大量的申诉，对此表示不满。1925 年阿穆尔州的农妇马秀拉给《农民报》写信说：“共产党好像竭力要使所有的农民变穷，只鼓励贫农，不是帮助他，而是鼓励他穷，如果一个农民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经营，那他就会从贫农队伍中除名，在他头上贴上富农的标签，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可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改善自己的经营，这就在党的眼中成为富农。换句话说，这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1]

新经济政策本身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自身包含许多矛盾，例如近期任务与长期共产主义目标的矛盾。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当时领导人对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一看见生产有所增长，“资本主义成分”有所增加，就忍不住把这一切同共产主义目标对立起来，要求消灭耐普曼、“富农”等“资本主义成分”。“左派”都有“恐资病”，希望通过“大跃进”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比行政命令要慢。用一个命令就可以把“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甚至肉体消灭，通过命令可以制订和批准五年计划，按照规定的速度发展重工业，而通过市场，则费时费力，因为培育市场是需要时间的。为了发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9 卷，第 532 页。

展经济允许合法经营者发财致富，列宁说过，发财吧，但是请你们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宣传和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阶级以至所有的阶级，取消商品货币等“资产阶级”机制。军事共产主义被否定了，但是共产主义仍然是理想和奋斗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不但存在，还要加强。允许资产阶级存在甚至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哪怕加上一个限制词“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在当时的观念下不能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发生矛盾，而绝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动辄挥舞专政之剑来对付“阶级敌人”。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达成经济上的妥协，首先是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妥协，防止农民造反。党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同农民或者各资产阶级阶层作政治妥协。列宁说得相当明确：虽然我们允许资本主义，但这是在农民的需要的范围内，不允许任何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的法院应当懂得这一点。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承认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什么。[①] 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农民需要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那我们应该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②] “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③] 目前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④]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初说的这些话明确告诉全党，在经济问题上可以作让步，但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是不作任何让步的。

在准备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时，列宁确定了向农民作经济让步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方针问题。关于经济让步方面，报告提纲承认“经济上满足农民”的必要性并确定了一系列措施——流转自由，贸易自由，为此弄到商品，等等，但他把这种自由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意义”在提纲中被看作是“农民的（小资产阶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6－1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7页。

级）反革命问题"，并且认定"这样的反革命已在反对我们"。因此对待农民的政策是"可以把'绳子'放松一些，不要弄断它，'松开'一些"。这就是说拴农民的绳子还是要的，只是松开一些而已。把农民问题看作是"农民的反革命问题"显然太露骨，所以列宁在旁边注上："在报刊上缓和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①

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上，俄共十大的一些代表同样持强硬的态度。例如十大代表 К. Г. 扎维亚诺娃说：粮食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是确实必要的让步。但另一种让步，"违背共产党原则的实质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是不应当的。共产党在这里应当保持其本色，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它才会是强有力的"。②

这一时期出现了允许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扩大了选举权，允许开办私人出版社，出版非党杂志，实行司法改革，设检察官和律师。1924 年宪法赋予最高法院宪法监督权，等等。但所有这些民主变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善大多是表面的。其中多数表现的还是阶级原则和党性原则，一点也没有改变俄国居民基本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地位。

工业化需要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决定了需要增加长期投资。但外来资金短缺，而内部资金又受到政府"反资本主义"政策的抵制。一国社会主义搞闭关锁国，切断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在偿还革命前债务、赔偿被国有化的财产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妨碍了外资的流入，租让制没有得到发展。工业生产能力的全部开工要求大量的投资以更新机器设备，建立新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这里涉及的是投资大，而投资回收周期长的重工业部门。资金的严重不足，加强了集中分配和对经济实行行政干预的倾向。工业的增长要求农业增加商品率，以向城市提供粮食，保障工业的原料，加强出口以换回设备，用农产品去换取国外的装备，这就需要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然而，越是剥夺农民，农业发展就越缓慢，越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农村个体大商品农户的发展受到了压制。本来扩大农村市场，通过农民的积累，通过节约，可以得到工业化的资金，但这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斯大林没有这个耐性。

①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1963. с. 625 – 626。参见《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365 – 366 页。

②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 268.

缺乏政治体制保障的经济改革

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私人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目标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他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明确的解释，像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指示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来。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予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发展拉大距离的社会。

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应当是公平民主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这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障，要求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但是，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而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相反地，正因为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列宁逝世后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权力向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极权体制。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问题，缓和专政的问题，然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是加紧控制的进程。

一个是禁止其他政党。1922 年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接着，开展反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把原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部分移交革命法庭，另一些流放。1923 年 6 月 4 日俄共向党的省委和区委下达由莫洛托夫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同孟什维克斗争的

措施”的通告，规定一律解雇在工会、消费合作社、托拉斯、工业企业、保险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孟什维克。[①]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些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措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历史表明它们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后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同它们的思路大体一致。这是一种党外的监督力量，但被排除出政治之外。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取消党内民主，禁止各种派别甚至异议。然而，党内少数领导人却悄悄建立不合法的“三驾马车”、“七人小组”，夺取并控制党政大权，取消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逐渐形成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一言堂”。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补充以政治自由。民主化进程既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更没有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没有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成为一个缺乏政治监督的社会，无法无天的社会。

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②] 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吧”作出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③]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新经济政策终于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了。

---

① ПАНО，ф. 1，оп. 2、д. 245，л. 192。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ч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09－210。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俄文原文为：“Мы её отбросим к чорту”，全集的译文为“我们就把它抛开”，直译应是“我们让它见鬼去”。

③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3页。

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黄立茀

新经济政策时期，至少发生了两件大事：经济方面，以俄共（布）十大实行粮食税为起点，开始一定程度地运用市场机制恢复经济；政治方面，1923年11月，以任命制为核心的“等级官员名册”（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干部制度正式启动。1992年以后，俄罗斯学者运用苏联历史解密档案的研究表明，上述两件大事（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对这一时期苏维埃社会，首先是领导干部队伍的面貌和行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干部队伍的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社会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在党员和干部中出现了多种腐败现象。[①] 由于俄国学界对新经济政策时期上述问

① 参见 *Каржихина Т. П.*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7; *Пашин В. П.*, *Свириденко Ю. П.* Кадр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методы подбора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М.: ГАСБУ, 1998; *Свириденко Ю. П.*, *Пашин В. П.*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М.: ГАСБУ, 1995; *Нефедов В. Н.*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империи.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лго-Вятского кадрового центра, 1994.; *Гимпельсон Е. 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1918–1920. М.: 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 1998; *Аников Л.* Анатомия распада КПСС.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аппарата ЦК, Москва: Ресбублика, 1996; *Епихин А. Ю.*, *Мозохин О. 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21–1928). М.: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Гиперборея, 2007, и др.

题有了新的认识，对苏联历史中一些重要且颇具争议的问题：新经济政策为什么终结？苏联领导干部队伍何时开始演变，是怎样演变的？苏联消极现象的进程是怎样发展的……[①]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思路，并且做出了新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和政治的上述两大举措引起领导干部何种变化，对于客观地认识苏联史而言，可谓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不能不厘清的重要问题。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问题还未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相应的研究基本上还未展开。[②] 本文拟运用苏联历史解密档案和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参与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

一 苏联“等级官员名册”制度的创建

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干部制度与干部状况

1923 年 11 月 12 日，在苏联干部制度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一个决议，其中附有两个任命官员的名册，标志着以任命制为基础和核心，以“等级官员名册”（以下简称官册）为载体的干部制度诞生。官册制度是以严格登记、考察、鉴定为基础，由中央

---

① *Журавлев С. В.*, *Соколов А. К.*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людей в 1920 – е годы //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Ежегодник: 1997.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Ибрагимова Д. Х.* Нэп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ку.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 мысли, 1997; ее же. Рыночные свободы и сельский менталитет. Чего жаждал крестьянин при нэпе? // Менталитет и агра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XIX – XX вв.). М.: РОССПЭН, 1996; *Лившин А. Я.*, *Орлов И. Б.* 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о: диалог в письмах. М.: РОССПЭН, 2003; *Литвак К. Б.* Жизнь крестьянина 20 – х год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ифы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алии //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М.: наука, 1994; *Соколов А. К.* 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18 – 1929 гг. М.: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1998; и др.

② 这方面的成果很少，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 年第 3 期），对 1920 年代领导干部的工资收入等问题有所涉及。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和戴隆斌的《苏联“罗名制”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俄罗斯研究》2004 年第 3 期），概括地探讨了官册制度的创建与影响。黄立茀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中苏维埃国家早期腐败现象》（《中国改革》2005 年第 8 期），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干部腐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冯佩民的博士论文《苏联干部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2007，未刊），对官册制度的创建与影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和相关组织部门任免调配领导干部的系统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存在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直到1989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党的建设与干部政策委员会通过了废除“登记—监督任命官员名册”的决议，官册制度才宣告终结。[①]

官册制度的诞生，标志着干部任命制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它是苏联干部制度的转折点。那么，在官册制度之前，俄共干部制度是怎样的？为什么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生了这一转折？

十月革命胜利后至1923年官册制度创立以前，苏联对领导干部的挑选、配置，经历了从基层选举制→动员+粗放任命制→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的变化。十月革命前，列宁根据马克思关于通过普选制选举无产阶级政权机关代表的理论原则[②]，在《四月提纲》里提出了苏维埃政权应该实行直接普选制的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提出在完成“剥夺剥夺者”之后，要“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苏维埃政权曾一度由基层群众直接选举产生苏维埃代表，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就放弃了直接选举领导干部的做法。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战争爆发，选举方法不适用于紧迫的战争形势；此外，由于俄国长期受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文化落后[④]、政治自觉意识差，使得选举方法不适合俄国当时的国情。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会议上指出了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⑤] 1918年春，列宁首次提出干部的委派制原则，他认为“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别人员的这种办法”是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相一致的。[⑥] 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是苏联干部制度走向任命制的转折点。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中，确定了干部

① Правда, 16 октября 1989 г.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5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08页。

④ 人口中文盲约占70%。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页。

⑤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789页。

⑥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页。

任命制的原则，同时，决定组建相应的领导机构。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在组织工作上反对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由党中央集中管理全部干部的分配和调动："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议大家都必须执行。……责成中央委员会最坚决地反对这些问题上的各种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责成中央委员会有步骤地把党的工作人员从一个工作部门调到另一个工作部门，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以便最有效地使用他们。"[①] ②确定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建立中央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 ЦК）、中央组织局（Оргбюро ЦК）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政治局领导全部政治工作，"组织局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②] 列宁还强调指出，党管理干部对于实现布尔什维克政治路线的极端重要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力，它就不能指导政治"。[③]

俄共（布）八大以后，按照大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组织建设。从1919年3月以后，开始组建中央书记处所属各部，1919年6月，建立了登记分配部（Учётно_ рас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й отдел ЦК 简称 Учраспреда ЦК）。登记分配部的职能是接受所有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的工作者、收集领导干部成分的信息、对疏散和应征入伍的党员进行分配。[④]

十月革命刚结束的时候，在实行干部选举制原则的同时，为了接管原来的政府各部门，已经开始任命干部。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曾向党、苏维埃、军队、工会以及经济部门派去了大批干部。但是，这时的干部任命具有临时和应急的特征。八大确定干部任命制原则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实行由中央委员会委派领导干部。直到1923年官册制度创立之前，干部任命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565、568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6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2页。

④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 2005. С. 4。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书记处总书记以后，对书记处各部结构进行改组，对部的职能进行调整。1924年5月，中央登记分配部与组织指导部合并为中央组织分配部（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рас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й отдел/Орграспред ЦК）。参见 РГАСПИ：Крат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Вып．3．М．：РОССПЭН，2004．С．44。

从1919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到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即国内战争期间，是军事动员＋粗放任命的时期。1919年春以后，根据八大决议，俄共开始大规模通过干部任命制选拔和派遣适合的共产党人干部到热点地区。①这一阶段，党中央实际上担负着向所有机关派遣干部的重任。当时，领导干部人事档案很不完备，而希望中央委员会派遣领导干部的请求却非常多，因此，许多干部人事分配工作采取了“军事动员”的形式，也就是确定干部力量薄弱的地区，由党中央发出动员令，地方选派或党员自荐，由中央调配他们到这些地区去。当时，党来不及仔细研究派去的人是否适合和胜任分配给他的工作，往往在24小时内调动并派遣他们到需要的地区②，因此，当时是一种粗放的任命。八大以后，在1920年4～11月期间，中央委员会任命了37547名干部，他们被安排在最重要、最艰巨的工作岗位上。其中25249人是响应党的动员奔赴各地的。③在国内战争阶段，需要调配的干部数量很大，但是，动员的方式往往收效不理想。1920年九大决议中关于“动员人力参加运输业工作”的“告俄共地方组织书”指出，“运输业现在仍然处于危急状态，根据指令本来应当动员5000名共产党员，但到目前为止，总共才动员了1000名”。其原因，是“地方党组织往往不把最有经验的组织人员、经过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调给运输业”。④

1921年十大以后（实际上从1920年底已经开始）进入任命制第二个时期：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由于国内战争结束，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党的组织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对那些在战时由动员方式任命而实际上不适合领导工作的干部，调动他们的工作；提拔那些最有素养和最优秀的干部到经济、贸易岗位上工作；发挥专家——不仅在国内战争时期已经与党站在一起的专家，还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的专家——的作用。这些问题，都要求干部制度进行转型——“转向分配党的力量的新制度，

① *ДмитренкоВ. П.*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ı. XX ве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1996，с. 243.

② *РКП（б）ЦК* Руководящиекадры РКП（б）и их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24，с. 6.

③ 契尔年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问题》，陈联璧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第33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34页。

这种制度完全抛弃游击习气，动员的方法，抛弃那种由中央向所有机关派遣干部的方法”，“中央只参与安排综合的、最重要的国家机关的干部分配”。新的组织任务，要求党首先要选拔干部到最重要的岗位，因此需要认真地研究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能力等情况之后，才分配工作。[①] 组织工作的这些新要求，决定了任命制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大大改进了档案登记，对人员进行比较仔细的选择，用这种方法代替“动员”的方法，同时，开始把委任较低级干部的工作交给下级党的委员会。[②] 1921 年至 1922 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调动和分配的普通党员干部占 80%，领导干部占 20%，而到次年，相应的数字为 54.2% 和 45.8%。[③] 1921 年 3 月十大以后，还进行了多次动员，但是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原因，除地方党组织不愿放掉有经验、经过考验的优秀党员以外，最重要的，是许多被动员的干部不能胜任分配的工作，也有的党员干部不愿意到艰苦和危险的地方工作，硬性动员甚至导致许多党员退党。[④] 这表明，战争结束以后，通过动员的方式解决干部调配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了。

在任命制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缺乏具体、稳定的选拔制度，产生领导干部的方法并不统一：尽管由中央任命领导干部的方法占主体，但是绕过中央，通过部门选举产生领导干部的方法也在局部运行。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是“相对任命制”时期。新经济政策初期，部分托拉斯和辛迪加的管委会，甚至部分省委书记的产生都没有通过中央，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出现了无序状态。中央登记分配部主席卡冈诺维奇 1923 年 11 月 8 日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央登记分配部工作计划报告”，披露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工业中“建立了一系列大型托拉斯，经过中央委员会任命了这些托拉斯的主席，但是，外贸部却做了一系列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领导干部的任命”。“报纸上经常出现偶然性的声明，某个托拉斯或辛迪加选举了某人进入管委会”。在省

① *РКП (б) ЦК* Руководящиекадры РКП (б) и их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с. 8–9.

②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 278 页。

③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0, д. 139, л. 74.

④ 参见冯佩民《苏联干部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未刊，第 42 页。

委书记中，“50%以上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推荐”。由于在官册制度之前缺乏任命干部的详备档案，导致中央对干部情况心中无底。卡冈诺维奇在报告中还谈到，在农村党管干部的情况更差，中央几乎不掌握农村干部的情况，“无论在组织部，还是在登记分配部，关于谁在管理农村的资料都没有，甚至在党的十二大之前对农村的调查都没有着手”。在1923年9月卡冈诺维奇曾做过在“党掌握国家机关”进程中的困难的报告，其中概括了中央对领导干部组织管理的全貌：“既没有关于在国家部门和中央机关现有职务者的准确的呈报，也没有任何分配工作者的计划，许多工作者脱离工作擅自转到另外的城市，等等”。因此，卡冈诺维奇在报告中建议，“建立准确的‘国家机关职务清单，国家职务的任命和罢免是由中央委员会特别命令进行的’”。[①] 在1923年11月8日的报告中，卡冈诺维奇再一次提出建立官员名册的任务。他说：“毫无疑问，应该消除……在一系列机关中都可以看到的在使用共产党人问题上完全混乱的情况”，“我们应该建立稳定的官员名册，而迄今为止我们没有这个官员名册”。[②]

为了杜绝在一系列机关出现的领导干部选拔和使用的无序状态，使中央能够有计划地掌握和控制干部的选拔和调配，“等级官员名册”制度应运而生。新经济政策初期，随着党和国家中央机关的膨胀，官僚主义的各种弊病开始明显地出现在俄共（布）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在官册制度确立的关键时期，许多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都对干部制度中的某些原则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导致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尽管批评的声音非常强烈，但大多针对的是挑选干部的标准以及干部决定权的归属问题，而最实质的问题——干部任命原则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③]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官册任命制的创立，的确为当时组织工作所需要。

等级官员名册制度的创建

根据莫洛托夫关于建立“国家机关官员任命名册”的建议，从1923年开始，成立了以他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委员会，准备起草《关于任命

---

① РГАСПИ，ф. 17，оп. 112，д496，л. 17，转引自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2005。

②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2005，с. 14.

③ 参见冯佩民《苏联干部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博士论文），第53页。

制》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1923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做出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①] 1923年9月21日，中央组织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委员会，旨在详细审查卡冈诺维奇的报告。10月20日，组织局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卡冈诺维奇的报告。10月23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卡冈诺维奇的建议，但是决定暂缓确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官员名册。10月25～27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两天以后，中央组织局决定听取卡冈诺维奇的上述报告。1923年10月31日，中央组织局委员会根据关于登记和分配工作者到国家和经济机关的命令最终通过了第1号官册清单：《俄共（布）中央命令任免的中央机关及其地方机关职务清单》。与此同时，制订了第2号官册清单：《工作者之任免由中央机关和部门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的人民委员部与中央机关职务清单》。[②]

1923年11月12日，中央组织局通过一个决议，其中附有两个任命官员的名册，第1号名册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直接提名和任命，收录了3500个最重要的职位，第2号名册由部门提名，并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同意这些提名后，由部门任命，2号名册确定了1500个职位。[③] 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程序》的决议，在决议中，对第1号官册进行了补充，补充名单是“由中央委员会指派的专业委员会推选并交相应的代表大会或会议通过的”。决议还规定了第3号任命官员名册的产生方法：由国家的每个主管部门提名和任命，需得到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④] 第3号名册也被称为部门官员名册和地方官员名册。第3号官册在产生程序上与第2号官册的区别在于，其提名不用预先通知中央。在这个决议的附录中，对第1、2号任命官员名册进行了修订。根据组织分配部关于削减由其考察任命的官员数量的建议，第1号官册从3500人削减为1870人，第2号官册从1500人增加到1875人。总

①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8, д. 462, л. 32.
②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 2005, с. 6.
③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8, д. 457, л. 5.
④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8, д. 462, л. 1－2.

数为3545人。[1]

1923年6～11月，《关于任命制》决议通过，批准了第1号、第2号官册产生的办法；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程序》的决议，规定了第3号任命官员名册的产生方法，标志着俄共对领导干部的任免开始规范化，官册制度由此诞生。在此前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其他许多关于如何对领导干部进行登记，如何确定选拔标准与程序，如何确定工资与生活待遇，以及如何进行监督和处罚等方面的决议，使官册制度开始成为系统，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

官册制度建立以后，领导干部基本面貌的变化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不仅变化的范围广——涉及了从最高层到基层各个级别领导干部，而且变化的方面多——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和党中央组织部门通过官册制度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级别、全国各个领域干部的任免调配权力；通过登记、考察、鉴定、任免调动、管理与监督的运行机制，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了大调整。

官册制度的任免范围和运行机制

官册制度相比之前的任命制，可以称之为“绝对任命制”。因为这时的任命制已经完全排除了其他选拔干部的方法，将干部的任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三个官册中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由党中央组织机关直接任免。1926年三个官册任命官员的数量比例如下，1926年3月共任命4365人，其中，第1号官册占27.8%，第2号官册占29.4%，第3号官册占42.8%。以后，大致保持这个比例。[2] 根据制度规定，第1号官册包括党、国家、工会、合

①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8, д. 462, л. 3、21.

②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9, д. 142, л. 2.

作社和其他组织最高领导职务的名册，由党的最高机关——政治局、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批准。[①] 第2号官册由部门提名，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中央登记分配部批准。上述数字表明，由这两个官册任命的高级官员占到任免官员的大多数——57.2%。在最重要的部门，如编制指令性计划的国家计委、主管国家间关系的外交部、涉及国家政治安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等部门，由中央任命的官员比例更高，达到60%～80%。[②] 实际上，党的总书记斯大林不仅控制着第1号和第2号官册人员的任命，经常也操纵着第3号官册人员的任命。[③] 即使对地方和基层领导职务的任免由地方党的机关拍板，但也要报中央组织部门批准和备案。

关于任免领导干部的范围，官册包括了对国家各个领域领导人的任命。官册不仅包括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任免，也包括对社会组织（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等）领导干部的任免。[④] 除任命各人民委员部主席、副主席和部务委员会以外，还任命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厂长、木材采运企业领导人、供应站站长、仓库主管、办事处主任、托拉斯和辛迪加领导

① РГАСПИ，ф. 17，оп. 69，д. 141，л. 1－7，1926年3月1日，组织局批准了新的1号官册，由中央政治局任免的包括：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银行理事会；工业银行和农业银行主席；大型托拉斯和辛迪加主席。由中央组织局任免的有：各人民委员部副主席；苏联国营工业中央局委员会；苏联经济管理总局主席；苏联国家银行各部门主任；人民委员部主要管理局首长；工业银行、农业银行部门主任。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任免的有：中央托拉斯和辛迪加理事会理事；大型企业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部门主任；股份公司主席。

② 例如，1926年，根据第1、2、3号官册，任命到苏联国家计委的有1118人。其中在第1、2号官册中任命的官员占近60.3%；外交人民委员会372人，其中在第1、2号官册中任命的官员占近78.2%；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4人，其中在第1、2号官册中任命的官员占近83%；司法人民委员会134人，其中在第1、2号官册中任命的官员占81%以上。РГАСПИ，ф. 17，оп. 69，д. 142，л. 1－2。

③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7，1993.

④ 1925年，根据第1号和第2号官册，任命到苏联消费合作社联社43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国防和航空化学工程建设之友协会、国际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社会组织100人，所有毕业于中央级高等院校和党校的党员也被分配到上述机关。被任命的干部不仅有党员，而且包括非俄共党员。1925～1926年，共登记33个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附属于这些中央机关的地方机关的部门官册职位共73413人，其中中央17807人，外省55606人，1925年登记的官册职位，中央15922人，外省43246人。在这全部任命官员中，俄共（布）党员占30.8%，换言之，大部分部门的领导人是非党派人士。参见：РГАСПИ，ф. 17，оп. 69，д. 161，л. 19。

人、大使、领事等。官册还批准国家杂技团团长、内务部羁押管理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工业总局所有成员、苏联人民法院院长等。[1]此外，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按宪法规定，其领导干部应由选举产生，实际上也由中央组织局确定。[2]

总之，斯大林和中央组织部门通过官册制度控制了党、国家、社会团体高级干部和地方负责人的任免。

苏联官册制度自诞生以后，形成了三个重要环节：对干部候选人或在职负责干部进行登记考察鉴定；对干部候选人或在职干部进行任免调动；对官册中的领导干部进行管理与监督。在这三个环节中，任命与调动是官册制度的起点和核心，而对领导干部进行登记、考察、鉴定，成为任免干部的前提。1923年官册制度诞生以后，便对领导干部进行了普遍登记、考察鉴定、划分类型和任免调动。考察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项：组织行政能力；文化和专业水平；政治素质。[3] 当时，中央委员会还制订和批准了统一的“负责人考察条例”，该条例确定了考察鉴定后对负责人使用类型的划分：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不降职调往另一个单位者等。[4]

领导干部政治成分的变化

官册制度建立以前，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中央十分不满意。

首先是干部数量不足，尤其是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数量不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迅速组建了党、国家和苏维埃的领导机构，并需要立即向各级领导岗位派遣领导干部。苏维埃俄国最初的领导干部队伍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十月革命前参加革命的职业革命家，这批职业革命家组成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的核心。列宁去世的1924年，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中占92%。[5]

---

①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7, 1993.

②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8, д. 459, л. 6–12.

③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9, д. 139, л. 40; оп. 68, д. 449, л. 229.

④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 М.: Вагриус, 2003, с. 313.

⑤ *Каржихина Т. П.*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клатур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7, 1993.

但是，在夺取政权时期涌现的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各个级别政权机关对干部的需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下层劳动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列宁认为，工农群众中蕴藏着大量有行政才能的人才，需要培养和提拔他们。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和三级党校体制[①]，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胜任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管理工作，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补充了大批领导干部。苏维埃政权初期干部的第三个来源，是旧政权的管理人员。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借用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的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满脑子都是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②]

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以后，尽管有上述三个来源补充干部队伍，但是情况很不理想：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工农干部的培养需要一段时间，旧职员难以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领导干部的数量仍然严重不足。根据俄共中央的数据，1919年，由于领导干部不足，在省党委会中，只有12.5%的成员专职从事党的工作，82%的成员同时还要兼任苏维埃的工作。1919年夏，26个省的146个县党委会的基本成员虽然都是刚刚提拔到工作岗位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而其中党的专职干部也仅有9%，85%的县党委会成员同时还需完成苏维埃的工作。[③]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国家从战争和军事转向和平经济建设，俄共（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向经济管理部门派出领导干部。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经济领导干部来源不足，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提拔非党专家和旧职员到经济管理机关。1920年代初，在金属业生产管理机关，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比例近50%，纺织工业51%，采矿业61.9%。[④] 与此相对应的是，经

① 初级苏维埃党务干校为一级党校，培训期3个月；中级苏维埃党务干校为二级党校，培训期1年；共产主义大学是高级党校，培训期3年。通过这个教育体系，俄共培训了大批工农干部。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5页。

③ 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6），20 декабря 1919.

④ *ЕпихинА. Ю.*，*МозохинО. Б.* ВЧК-ОГПУ в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1921－1928），М.：Кучково поле Гиперборея，2007，с. 503.

济管理机关中，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例不高。1920 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了一系列部门和经济机关的干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93 个托拉斯管委会的 875 个成员中，共产党员占 37%（325 人），无党派占 63%（550 人）。社会地位的情况是：工人占 23%（203 人），职员占 21%（183 人），农民占 24%（209 人），其他 280 人，占 32%。[①] 1924 年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在教育、行政、对内与对外贸易、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经济人民委员部、合作社与贸易等 7 个专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非党派比例仍高达 45.5%，俄共党员比例勉强超过一半——为 54.5%。[②] 中央登记分配部主席卡冈诺维奇对当时领导干部阶级成分和政治成分的结构极不满意。[③]

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不得不任用旧的经济管理干部的同时，党中央部署以提拔党员领导干部的方法，来改造干部队伍的政治社会结构。在 1920 年 8 月战争基本结束时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了合理分配全体党员，提拔党员干部到重要领导岗位的任务："由于转移到经济任务，目前在我们党的面前提出了特殊的组织任务。……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 60 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必须在对党员进行确切登记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更有计划地分配党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党员能够从比较不重要的、范围比较小的工作被提拔担任比较重要的、范围比较大的工作。"[④] 1921 年 5 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更明确地提出了提拔新的党员干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任务：在新的复杂条件下，"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基本任务要求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合理分配党的力量方面，而这一工作首先应当同提拔新的工作人员，把他们从责任较轻的工作岗位调到责任较重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⑤] 根据中央的部署，1920 年代，大量的新官员被任命。以中央组织分配部任命的官员数额为例，1922 年 4 月至 1923 年 4 月间任命 1035 人，1923 年 4

①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 с. 311.

② *ЦК РКП (б)*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кадры РКП (б) и их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М.; Политика, 1924, с. 2.

③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 с. 311.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26～27 页。

⑤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122 页。

月至 1924 年 5 月为 6088 人，1924 年 5 月至 1925 年 12 月为 12227 人。[1] 1925～1926 年，共登记 33 个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附属于这些中央机关的地方机关的部门官册职位共 73413 人。[2]

1920 年代，根据党中央合理分配党的力量的精神，干部调动较频繁，官员流动性比较大。根据中央组织局 1927 年的数据，官册制度建立后的三年（1924～1926）中，全体领导干部中的 85% 变换了自己的职务。[3] 1921 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规定党的主要组织工作是“提拔新的工作人员”，因此，干部的流动主要是向上流动。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中央机关调人 1744 人，其中 65%（1127）是从地方上调来的。2825 个派到省和县的领导干部，其中 74%（2051）是从地方上调来的。根据登记分配部关于 302 名被调动的干部的资料，88%（266 名）的干部是上调。其中 133 名（44%）上调到更负责的岗位，37 名（12.25%）从县调到省，96 名（31.78%）上调到省内更负责的岗位。[4] 以 1926 年 7～9 月为例，经过中央登记分配部调动的干部 50% 任命到更高的职位，42% 是平调，只有 4.2% 是调到比以前低的岗位。[5]

那么，什么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的人成为新的官员呢？

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会议都规定了提拔共产党员到重要工作岗位的阶级原则。党制定的这个阶级原则，与当时多数俄共高级领导对非党员极端不信任是相一致的。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就说过：“苏维埃国家被迫使用 99.9% 是由知识分子、过去的私有者、业主、银行家、商人和旧店员组成的机关组织行政管理、生产、销售、计划、储存、金融等活动。而那些人的大多数不仅与苏维埃国家利益不同……而且是积极地仇视苏维埃国家的。”[6]

在提拔领导干部阶级原则的指导下，中央组织部门大规模地将俄共党员提拔到领导岗位，在这些岗位上提高了党员的比例：从 1923 年 4 月党的

---

①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8, д. 459, л. 7－17; ф. 17, оп. 69, д. 142, л. 1－2.

②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9, д. 161, л. 19.

③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9, д. 139, л. 40; оп. 68, д. 449, л. 229.

④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4, д. 238, л. 28.

⑤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8, д. 449, л. 70.

⑥ *Епихин А. Ю.*、*Мозохин О. 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с. 85。这个比例被明显夸大了，实际上是 50% 左右。

十二大之前至1924年1月十三大前的9个月时间，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在工业部门，从48.0%提高到59.6%，合作社部门从51.9%提高到60.1%，在对外贸易部门从70.4%提高到81.3%，在整个高级领导干部中从67.5%提高到74.9%。[①] 1924年4月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的第1号官册共列入3500名最重要、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对其中1016名干部的政治成分的研究表明，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导部门——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共产党员占86.1%，在外交部占92.0%，侦查—审讯和惩罚机关占99.1%。[②]

为了解决在经济领导干部中共产党员比例不高的问题，党向经济部门高级领导中大量补充共产党员，迅速提高了党员在经济管理层的比例：从1923年党的十二大至1927年党的十五大，在托拉斯管委会成员中，党员比例从42.0%提高到64.7%（详细数据参见表1）。[③]

表1　党的十二大至十五大托拉斯管委会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托拉斯主席			托拉斯管委会成员		
	抽样数	共产党员	党员占%	抽样数	共产党员	党员占%
十二大	95	72	80.0	243	102	42.0
十三大	85	76	89.4	179	96	53.6
十四大	91	87	95.6	208	132	63.5
十五大	54	53	98.1	153	99	64.7

经过党的组织部门的努力，至1929年1月，在苏联全体管理者中，联共（布）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达到76%。[④]

1923年以后，斯大林不仅通过官册制度使领导干部政治成分逐渐一元化，而且通过这一制度清除了政治反对派。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复杂的党派纷争。这种纷争既有经济建设路线分歧的

① *ЦК РКП（б）*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кадры РКП（б）и их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с. 4.

② РГАСПИ，ф. 17，оп. 68，д. 462，л. 2.

③ *Паши В. П.，Свириденко Ю. П.* Кадр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медоды подбора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М.：Наука，1998，с. 37.

④ *Гимпильсон Е. 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20－е годы.（Руководящие кад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СССР），М.：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2001，с. 127.

因素——随着恢复时期逐渐结束，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逐渐提上日程，苏维埃俄国是否继续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进行经济建设？托洛茨基反对派、新反对派以及“托—季联盟”等，与斯大林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纷争还有浓烈的权力斗争色彩——列宁逝世以后，党内出现领袖真空。谁能接任列宁的领袖地位？局面并不明朗。[①] 当时，经济建设路线方面的分歧与政治权力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还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通过扩大书记处（他在1922年4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权力，在党内的权力与地位迅速提升。但是，反对派的首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都是与列宁共同创建苏维埃俄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当时担任着党和国家要职，在党内有重要的影响和雄厚的组织基础。因此，若要打倒他们也并非易事。然而，由于斯大林是书记处书记，中央登记分配部是书记处的下属机构，斯大林得以通过中央登记分配部（后来是组织分配部）控制领导干部的任免，从而拥有了制服反对派的杀手锏。官册制度建立以后，在“提拔”干部是组织工作的主旋律，干部主要是向上流动的大潮下，斯大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量反对派领导干部调到基层部门或边远地区。根据中央组织局1927年4月4日的数据，1926年，在一系列中央机关（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托拉斯管委会、合作社中心等）领导干部的40%～60%，以及50%以上的工厂厂长，45%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官员和由中央掌控的2号官册中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在不到一年期间调到了较低的岗位上（苏维埃部门是27%）。[②] 借助组织局和书记处，“‘新反对派’的所有活动家都从高级岗位上被清除出来，被派到了低一个级别的职位上。从1926年3月，新反对派的拥护者有计划地被调换到远方的省份。1926年5～6月份，组织分配部调动了1497个党的工作者，其中只有391个调到中央机关，而调到农业和民族地区的有980个”。[③] 通过官册干

① 在1923年列宁病重以后党内便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斗争：1923年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25年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1926年托洛茨基反对派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合形成了“托—季联反对派联盟”。上述反对派关于党的建设、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某些主张包含了很多合理的成分，但是后来采取了分裂党的做法，破坏了党的统一，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

② РГАСПИ，ф. 17，оп. 69，д. 139，л. 40；оп. 68，д. 449，л. 229.

③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2005，с. 7.

部制度，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的关键岗位上任命了拥护自己路线的领导干部，从组织上彻底击溃了党内反对派，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为贯彻其政治、经济路线奠定了组织基础。

领导干部社会成分的变化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实行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路线。在吸收党员时，明确贯彻工人阶级优先的原则。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曾明确强调，“在进行重新登记时（指党员——笔者注），对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分子，必须把形式上的各种手续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对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入党，则应尽量加以限制。”[①] 在提拔领导干部时，苏维埃政权也注意提拔工人担任领导职务。尽管做出这些努力，在官册制度创建以前，领导干部中工人出身的比例还是不高。以中央机关领导人为例，1923 年 4 月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只有 32.1%。[②]

官册制度建立以后，努力改变领导干部的这种社会结构。[③] 在官册制度创建一年以后的 1924 年，工人被有计划地任命到最重要的岗位上，担任苏维埃省执委会主席、省检察长、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省金融部主任、省银行部经理、地方企业厂长、省联盟主席、省土地部主任。[④] 这种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 1923 年十二大至 1924 年十三大的一年时间，在中央领导机关任职的工人领导干部增加了 12 个百分点（见表 2）。[⑤]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40 页。

② РГАСПИ，ф. 17，оп. 68，д. 462，л. 14.

③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联共（布）中央登记分配部关于登记”的全宗中，收有对“人民委员会部、全俄中央执委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的负责干部进行登记的通告、指令、命令与程式”的诸多卷宗。这些指令和命令详细规定了对负责干部的分级、登记和鉴定的内容与标准。这些档案反映出，对上述范围领导干部进行考察鉴定的内容主要包括：在中央、省、地方或行业领域工作过的时间；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水平和对实际了解的情况；组织行政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参见 РГАСПИ，ф. 17，оп. 34，д. 18。

④ РГАСПИ，ф. 17，оп. 68，д. 462，л. 14.

⑤ РГАСПИ，ф. 17，оп. 68，д. 462，л. 14.

表 2　从俄共（布）十二大到十三大中央机关领导干部中出身于工人的比例

中央机关领导干部	总　数	出身于工人的百分比	出身于其他党派的百分比
1923 年 4 月 俄共（布）十二大前夕	673	32.1	
1924 年 5 月 俄共（布）十三大前夕	926	44.1	28.2

党的组织部门的努力，使领导干部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经济政策初期，由中央直接任命的 1 号官册中，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及其各委员会干部中的 69% 出身于职员，该项数字，在财政委员会是 88.0%，国内贸易委员会是 81.8%，外贸人民委员会是 91.8%，侦查一审判惩罚委员会是 61.8%，外交委员会是 92.1%。到 20 年代末则相反，在苏联最高管理机关中，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上升至 80.9%，而职员出身的干部下降到 18%（见表 3 和表 4）。

表 3　1924 年 4 月第 1 号官员名册社会成分

部　门	社　会　成　分							
	全部名册（人）	俄共党员	无党派	样本数	工人	农民	职员	不详
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和其各委员会	115	99 86.1%	16 13.9%	96	26 27.1%	3 3.1%	67 69.0%	
财政委员会	115	77 67.0%	38 33.0%	75	9 12.0%	—	66 88.0%	
国内贸易委员会	15	11 73.3%	4 26.7%	11	2 18.2%	—	9 81.8%	
外贸人民委员会	91	74 81.3%	17 18.7%	73	5 6.8%	—	67 91.8%	1 1.4%
侦查一审判惩罚委员会	331	328 99.1%	3 0.9%	328	93 28.4%	32 9.8%	203 61.8%	
外交委员会	124	114 92.0%	10 8.0%	114	9 7.9%	—	105 92.1%	

资料来源：РГАСПИ，ф. 17，оп. 68，д. 462，л. 2.

表 4　1929 年 10 月 1 日苏联最高管理机关全体成员社会成分（%）

部　门	联共（布）党员	工　人	职　员	农　民	其　他
苏联总管理机关	76.0	30.5	18.0	50.4	1.1

资料来源：*Бинеман Я.*，*Хейман С.* Кад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СССР. М.：Политика，1930，с. 81.

在企业中，1924～1929 年，工人出身的厂长几乎增加了 2 倍，从 39% 增加到 71.1%。有些部门，工人出身的厂长的比例更高：该项数字在纺织企业是 77.3%，皮革业 81.3%，森林纸业 73.1%，印刷业 93.3%。[1]

领导干部教育水平的变化

根据中央的精神，提拔领导干部时既要注意政治社会成分，也要注意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要求："地方组织一般应当按照每个共产党员的专长或职业分配他们担任党的工作"，为了胜利地完成上述任务，"所有组织必须把党员登记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统一的党证制度应当作为登记工作的基础。在进行党员登记工作的时候，地方组织和中央委员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党员的职业，注意他从事经济组织工作的工龄，以及每个党员在恢复国家经济工作中所起的作用"。[2] 组织部门根据这个精神制定了相应的考察标准。[3] 但是在挑选任命领导干部的实践中，往往只注重候选人的政治、社会成分，而其教育水平、职业素养等几乎不在考察内容之列。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工农出身的党员大批补充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同时，干部群体的文化水平大幅度地降低。

1924 年 4～5 月，在 56 个托拉斯主席中，有 12 个受过高等教育，12 个受过中等教育，多数——32 个受过初等教育。[4] 在党员企业厂长中教育

① РГАСПИ，ф. 17，оп. 74，д. 46，л. 4－5.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26～27 页。

③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联共（布）中央登记分配部关于登记"的全宗中，收有对"人民委员会部、全俄中央执委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的负责干部进行登记的通告、指令、命令与程式"的诸多卷宗。这些指令和命令详细规定了对负责干部的分级、登记和鉴定的内容与标准。这些档案反映出，对上述范围领导干部进行考察鉴定的内容主要包括：在中央、省、地方或行业领域工作过的时间；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水平和对实际了解的情况；组织行政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参见 РГАСПИ，ф. 17，оп. 34，д. 18。

④ РГАСПИ，ф. 17，оп. 34，д. 125，л. 19.

水平更低，同期，在200个共产党和无党派厂长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只有5个，80个只受过初等教育（见表5）。[①]

表5 1924年200个厂长受教育的水平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俄共（布）党员	5	15	80
无党派	56	18	26

参加历届俄共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反映不同时期从地方至中央各个级别，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领导干部的教育水平。从表6的数据看到，从党的八大到十五大，受过高等教育者从23.9%下降到4.4%，下降5.43倍，受过中等教育者从24.9%下降到12.9%，下降1.93倍；从八大到十四大，受过初等教育者从37.0%上升至66.1%，上升了1.79倍。[②]

表6 俄共/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教育水平百分比

代表大会	高等教育	开始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不足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家庭识字	未说明
八　大	23.9	—	24.9	—	37.0	14.1	—
九　大	9.4	18.8	23.4	13.3	32.1	10.6	—
十　大	7.7	8.6	23.3	2.3	48.4	7.4	2.3
十一大	8.6	5.2	21.0	6.7	47.0	11.2	0.3
十二大	—	—	29.4	—	49.7	—	—
十三大	6.6	—	17.9	—	66.8	8.8	—
十四大	5.1	—	22.3	—	66.1	—	—
十五大	4.4	2.8	12.9	—	—	—	—

可以佐证1920年代末文化水平滑坡的是，1929年苏联全体最高管理者中，完成高等教育者仅有3.7%，未完成高等教育者1.7%，受过中等教育者16.4%，初等教育和不识字者占了全体最高管理者的大多数——78.2%。[③]

①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4, д. 125, л. 5.

②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68, д. 449, л. 66.

③ *Бинеман Я.*, *Хейман С.* Кад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СССР. с. 81.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是要求专业水平很高的部门，但是由于这一部门对国家经济安全很重要，所以特别重视提拔工农干部。其结果是，1923～1929年，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从60.3%下降到31.4%，下降了近1倍，受过初等教育者从10.3%上升到29.1%，增加了2.82倍。该部门领导干部中文盲和少识字者比例变化，尤其能够说明文化水平下降的幅度，1923年，这一比例为0.1%，而1929年增加到7.2%，增加了72倍（见表7）。①

表7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领导干部教育水平（%）

年　代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文盲和少识字
1923	60.3	29.3	10.3	0.1
1924	54.2	31.6	14.3	—
1926	57.8	25.2	7.0	—
1927	57.7	30.3	12.0	—
1928	53.4	30.1	16.5	—
1929	31.4	32.3	29.1	7.2

三　领导干部的腐败、惩治与腐败回潮

1921年以后，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终结，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领导干部，尤其经济管理干部的行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1918～1920年反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国内战争期间，为了集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保卫年轻的革命政权，同时受到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影响，苏维埃国家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在农村实行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取消一切消费品的自由贸易；1920年1月以后撤销了银行，取消了货币结算——出现了经济的实物化；加快工业国有化步伐，实行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按经济部门设立总局，由总局实行指令性的直接领导，统收、统支。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水兵叛乱，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政治危机。为了遏制政治危机和迅速恢复被战争严重破

① *Бажанов В. А.* Восхождение к абсолютной власти (большевик и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20-е годы). Минск: Тесей, 2004, с. 176.

坏的经济，列宁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农民完税以后的粮食可以到市场上自由贸易；允许国内私人资本租赁企业和向国外资本租让企业；将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归还业主以及重建国家银行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体制亦从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向分散管理的托拉斯制转化：大规模地推行工业托拉斯化，在经济管理中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使托拉斯代替总管理局，成为工业管理的基本环节和基本核算单位。在托拉斯制下，托拉斯有权独立组织企业的生产，通过市场实行供销活动。新经济政策时期还实施了其他配套的经济措施：为了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营积极性，生产、供销和消费合作社也获得很大的发展。总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托拉斯管理者、各种合作社的管理者开始拥有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市场机制，就有了交易经济资源的条件。部分干部开始滥用权力，权钱交易，出现了腐败行为。

1992 年苏联历史档案大规模解密以后，这一时期领导干部腐败的情况浮出水面。

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ВЧК-ОГПУ）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 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 69641 件，职务犯罪 32177 件；1922 年判处贪污贿赂 32587 件，职务犯罪 14887 件。[①] 过去有苏联学者认为，苏共二十大以后，党内的腐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贪污贿赂的额度、波及的范围上都明显扩大。因此，赫鲁晓夫时期被说成是出现“贪污贿赂的真正转折点”。[②] 但是，据研究者列举的统计数字，1957 年因贪污腐败被定罪者只有 1800 人。[③] 显然，如果拿 1957 年被定罪的 1800 人与 1921 年的 69641 个贪污贿赂案件相比，那么结论应该是：早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腐败蔓延的现象。

新经济政策时期干部腐败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初期贪污贿赂蔓延开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

① *Епихин А. Ю.*, *Мозохин О. 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с. 246 – 300.

② 《苏联问题译丛》第 5 辑，三联书店，1980，第 202 页。

③ http://www.referats.net/pages/referats/rkr/page.php? id = 18545

首先，这一时期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开始变化，将谋求个人私利作为入党目的。而这种变化，与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俄共领导干部开始享受生活特权有关。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为了防范布尔什维克革命队伍成为执政党以后搞特权和变质，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生活待遇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在工资方面，列宁提出，实行巴黎公社关于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都“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的原则，并率先垂范。1917 年 11 月，列宁作为苏维埃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委员会主席，其最高工资为 500 旧卢布，比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 510 旧卢布还低 10 卢布。1919 年初，全国开始推行 35 级工资等级表，该表规定，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分别只相当于工资等级表中的 22～25 级。1922 年，开始实行 17 级工资制。8 月，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党的领导干部物质状况”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善”。决议中列入了中央和地方各个环节党的机关的领导者 15325 人，规定了其应享受的工资级别和其他方面的物质保障。“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政治、苏维埃、合作社、工会和经济负责干部的工资标准的新决议，来制定党的工作人员的相应工资等级表”，此外，“所有上述同志的住房（通过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医疗（通过卫生人民委员部），以及子女的教养和教育方面（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都应得到保证。有关措施应当由中央委员会用党的经费加以实施”。在该决议中，为了防止共产党员生活中的特权，规定了领导干部实际最高工资不能超过 17 级工资的一倍半，超过部分，需缴纳余额25%～50%作为互助基金。凡共产党员工资超过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的最高工资标准时，除按上述百分比进行扣除外，“还应当把超过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的最高工资标准的全部余额缴作互助基金”。[1] 稍后，该决议给党的领导人的物质保障的规定，也扩大到了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

该决议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宗旨：一方面，用党的经费保障和提高领导干部的物质生活，这在战争结束不久，领导干部“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是无可厚非的。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特权，对领导干部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244～246 页。

工资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体现了列宁防止领导干部特殊化的一贯思想。在决议颁布后的实践中，党政领导人的工资的确没有突破决议规定的限额。但是，在除工资以外没有严格数量规定的其他方面，领导干部开始享受特殊待遇，与群众生活的差距开始加大。以住房为例，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物质条件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苏维埃政权组建“住房公社”解决住房问题。在普通群众方面，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住房公社大多数由学生集体宿舍或其他住房等改建而成，配套设施非常一般。而最常见的领导干部的住房公社，则是由收归市有的大宾馆改建为“苏维埃楼”，各种公用设施要齐备、优越得多。1922 年末至 1923 年初，当国内战争的危机彻底消除的时候，领导干部纷纷搬出住房公社，搬进独户住宅。而普通群众还住在住房公社里，不少住户全家人共同占有一个房间，2～3 代人生活在用床单或窗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筒子楼里卫生设备短缺而简陋。而领导干部则是一个家庭居住在一套住宅里，不仅采暖、卫生、运输等各种设施完备，而且住房面积比老百姓大得多。1918 年，列宁曾在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命令中要求：允许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超过一个房间。而莫洛托夫家甚至占有整整一层楼。[1]

由于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在物质待遇上享有的种种好处开始显露出来，使群众对党的看法有所变化。1924 年 12 月 8 日《真理报》文章中的某农村党员说，现在许多人“把党看成带馅的大包子”。[2]“带馅的大包子”是用来满足人们食欲的美味。由于有些人认为党可以满足个人私欲，于是为觅私利而入党——在党内出现了追求名利的投机分子。在 1920 年 9 月底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了这种现象：“必须特别重视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在重新登记的工作方面，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严重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一个追求个人名利的可疑共产党员，带来两三份介绍书，就没有二话地被登记入党，然而，一些工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时间、不愿意或者不会搞到相

① 关于 1920 年代领导干部住房具体情况详见本书，张丹：《1920～30 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研究》。

② *Гимпильсон Е. 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20-е годы, с. 171.

当的介绍书，就被关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①

那些为了满足私欲的投机分子不仅钻入党内，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尽快爬到领导岗位。1927 年 1 月 18 日在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负责人 C. B. 科肖尔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形成了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同志——共产党员不愿意长时间在这样或那样的岗位上，特别是在技术工作，在职位不高的岗位上工作。……如果派共产党员去机关工作，他认为，他应该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岗位。他在工作不上心，而是窥测怎样才能更快地出人头地，成为部门或分部门的负责人等等。"②

其次，苏维埃政权早期贪污受贿现象增长，也与经济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经济管理高度集中，资金和物资供应由国家统一拨付，产品全部上交国家，同时经济关系实物化，既没有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的空间，也没有进行权力交易的市场条件。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一方面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另一方面经济管理权下放，出现了权力交易和贪污贿赂的空间与条件，给有些经济管理者谋私造成可乘之机。

再次，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现象扩展，还与对管理权力缺乏监督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为了增强与私商的竞争力，国有企业联合起来成立托拉斯。托拉斯的领导人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他们掌握着托拉斯所属企业生产、供应和销售的巨大权力。解密档案表明，由于缺乏监督，经济管理干部从贪图小便宜走上舞弊的道路。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 1924 年 2 月，在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经济部门工作者—领导人的腐化"堕落是从以优惠价格自我供应开始的。开始是拿少量的布匹、鞋子、衣服和食品给自己、给亲戚和熟人"。由于没有人发现，"后来就拿这些东西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③ 由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管理干部徇私舞弊得以蔓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普遍性。1923 年，B. B. 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总结中说，经常收受贿赂的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在托拉斯管理者中具有典型性："在研究了诸多纺织托拉斯的资料之后，若改一改勃拉戈夫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某些线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绝对抛开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39～40 页。

② РГАСПИ，ф. 17，оп. 34，д. 130，л. 20.

③ РГАСПИ，ф. 17，оп. 112，д. 140，л. 86.

刑事犯罪的因素，大概，那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由这些资料提供的托拉斯主席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主要的特性。"[1] 这些托拉斯管理者的特性之所以一致，都是钻了管理的空子。

最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现象扩展，还与俄国文化素质水平低下有关。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曾说，"贪污受贿"是"道地的俄国现象"，因为俄国文化素质低下，"贪污受贿"是"靠文盲这块土地滋养"的。另外，有些俄共党员政治素质不高也是贪污受贿蔓延的重要原因，列宁说，"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2]

新经济政策时期腐败行为的种类

新经济政策时期，在经济管理干部中的腐败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形式。

1. 浪费公款和赌博

还在1920年秋党的九大时，许多党的代表就已经谈到了特权对党内生活的腐蚀性的影响。他们愤怒地说："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在很多角落，中央或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地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或农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3]

党代表怒斥的奢侈现象，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B. B. 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文件中指出："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数额巨大。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4]

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和医疗等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

---

[1]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4, д. 130, л. 45-46.

[2]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97、201、198页。

[3] Девя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КП (Б), Протоколы. М.: Политика, 1972, с. 15.

[4]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00, д. 331/5993, л. 50.

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1]

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这些官员对《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置若罔闻。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1923 年 3 月，Ф. Э. 捷尔任斯基愤怒地指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2]

2. 贪污受贿和权钱交易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恢复了市场交易，托拉斯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通过市场，常常通过私商进行。私商为了得到业务，经常采取贿赂的方式。

1923 年，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的情报，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断地收受钱和物的贿赂，包括几串钻石项链、金表、金烟盒、带海狸鼠领的貂皮大衣。还有资料说明，勃拉戈夫是托拉斯负责人中受贿的组织者。[3]

有的经济领导人舞弊是为自己谋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 1924 年 2 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有些经济领导人之间拿本部门生产的产品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4]

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1924 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舞弊的行为。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5]

---

①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84, д. 467, л. 128–129.

② *Пашн В. П.*, *Свириденко Ю. П.* Кадр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медоды подбора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с. 73.

③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4, д. 130, л. 45–46.

④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4, д. 130, л. 20.

⑤ Три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 (б), Май 1924. Стеногр. Отчёт. с. 290.

经济领导人收受贿赂肥了自己，坑害了苏维埃国家。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西北铁路物资服务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牵扯到118个人受到法庭审判，受贿后，领导人提高了承包价格，签订了对承包人有利的合同，而铁路建设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呈报的账目中增加了货币开支，但是由于承包人造假，所供应的贵重材料都是铁路不需要或者是铁路不能用的。[①]

3. 贪污和盗用公款

贪污是经济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几乎在各种机关都有发生。关于贪污和盗用公款的情况可以从法庭卷宗中反映出来。在1925年3~9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其中发生在合作社的占28.7%，经济机关23.9%，民警机关17.3%，村苏维埃14.2%，苏维埃执委会4.1%，工会3.8%。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其中6698件（30%）涉及盗用公款。[②]

合作社是盗用公款最严重的地方。1925年11月30日举行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了下述数字：在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参与窃取公款或盗用公款。[③] 该会议还披露，根据司法人民委员会拥有的数字（42个省和自治州），在法庭审理中涉及各种形式合作社的案件共10387件，其中基层网工作者8833件，省和州机关767件，在涉案者中，有1708个人是俄共（布）党员，291人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④]

俄罗斯学者运用解密档案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受贿赂的干部通过破坏法律，在手里集中了巨额原始资本，并大肆挥霍国民财产，实际上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根据1920年代苏维埃经济学家的统计，由于他们的挥霍，国家财产的损失达到3.50亿金卢布。[⑤]

---

①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85, д. 166, л. 11.

② *Гимпельсон Е. 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1918 - 1920. М.: 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 2001. с. 187.

③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22, д. 738, л. 304.

④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22, д. 738, л. 304.

⑤ *Епихин А. Ю.*, *Мозохин О. 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с. 12.

苏维埃政权的惩治

1920年代初经济管理者中出现的腐化现象，严重危及着苏维埃政权的生存。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称：贪污受贿是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①] 1922年11月3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发往省委、州委和民族委员会的通告信中，痛斥腐败的严重危害：“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有使工人国家机关腐化和被摧毁的危险。”[②]

为了遏制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

1. 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与贪污受贿斗争的机关

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察院成为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作斗争”。[③]

1920年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成立工农检察院，1923年4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监察工作的基本目的，应该是弄清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实际成绩或缺点，确定该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盗窃方法并找出防止的措施，而不要偏重于搜寻个别的盗窃和舞弊行为”。[④]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同舞弊行为斗争的专门委员会：1922年在中央成立了附属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CTO）的与舞弊行为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在国家建立了附属于人民委员部的部门委员会，在省里成立地方的——省的委员会。1922年10月4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主动坦白和协助举报贪污受贿”者奖励的法令。[⑤] 1922年10月9日，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通令中，确定了“贪污受贿”的概念，列举了属于“贪污受贿”的行为：①收受生产机关合作者的物资、产品，利用其提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99页。

② РГАСПИ，ф. 17，оп. 60，д. 139，л. 81.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70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96页。

⑤ ГАРФ，ф. 4459，оп. 1，д. 1，л. 19.

供的住宅和利用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规定制度以外的运输工具；②在买卖和推销商品时，作为国家机关与私人之间的中介者参加工商活动；③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地位向有利益关联的个人和机关通报对其有利的关于某些企业与公民信用能力的情报以及通报其出国的情报；④在与国家机关签订合同时，在对工作进行国家验收时，在检查生产及与供货者和承包者进行结算时，接受酬劳。[①]

2. 在党内采取了惩治腐败的斗争形式

俄共首先采取了党内惩治的形式，遏制舞弊行为的蔓延。1923 年 11 月 5 日，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信中，针对超额交通开支的问题，提出了下述措施：①立即削减利用汽车出行；②禁止利用汽车办理私事；③对没有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削减汽车的所有党员、机关和企业领导人追究党纪责任。[②]

一经发现腐化分子，俄共党决不手软，坚决将腐化分子开除出党。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 1921 年 8 月 15 日至 1922 年 3 月，俄共对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进行了清除，共计清除 159355 人，其中近 17000 人因有受贿、勒索或其他舞弊行为被清除，占全部被除名党员的近 11%。[③]

3. 对触犯法律的腐化分子进行法律制裁

由于贪污是管理者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1918 年 5 月 8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受贿和行贿者的法令，规定对受贿和行贿者在不少于 5 年期间剥夺其自由并进行强制劳动。[④]

同时，苏维埃国家对触犯法律的舞弊者及时进行了审判和法律制裁。在 1925 年 3～9 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 786 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1925 年 7 月 1 日，在俄罗斯联邦 48 个省和州主持了对 20773 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⑤] 1925 年 11 月，在 42 个省和自治州，涉及合作社管理者贪污的案件共 10387 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⑥]

---

① ГАРФ, ф. 4459, оп. 1, д. 18, л. 2.

②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00, д. 331/5993, л. 50.

③ *Турищев Ю.* Партия у власти. М.: Наука, 1969, с. 47.

④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 2, М.: Политика, 1959, с. 241–242.

⑤ *Гимпельсон Е. 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1918–1920. М.: 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 2001, с. 187.

⑥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22, д. 738, л. 304.

此外，俄共有关部门还积极利用媒体，给受贿者曝光。为了这个目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部专门分出一些人，负责监视被发现的受批判者等。

由于打击措施有力，在短时间内，经济领域反对贪污贿赂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21 年贪污受贿和职务犯罪达到最高峰：贪污贿赂 69641 件，职务犯罪 32177 件。从 1922 年到 1925 年涉案逐年下降，1925 年贪污受贿案下降到 3942 件，职务犯罪下降到 7421 件。①

腐败现象的回潮

然而很长时间内，在苏维埃官方的法律文件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只有在旧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反腐斗争的俄罗斯学者指出，由于苏维埃政权对腐败根源的认识有误区，因此，缺乏同贪污贿赂斗争的足够的政治意志，缺乏进行有计划的、连续性的同贪污贿赂斗争的国家政策……1922 年成立的附属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与舞弊行为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反对贪污贿赂斗争的一次性的团体，不具有反腐败斗争逻辑的连续性。随着贪污贿赂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该委员会停办。1924 年开始，国家减弱了惩罚政策的力度。②

新经济政策时期，与腐败现象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相联系，在某些苏维埃法律工作者中“对犯罪者应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扩散开来。结果，那些受贿者、骗子和其他的罪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在审判时而免于受到惩处。③

1923 年以后，公开出版物称“由于 1922～1923 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贿行为越来越少”，“在 1923 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是，由于打击腐败的斗争措施没有触及贪污贿赂的根子，以及打

---

① *А. Ю. Епихин О. Б. Мозохин* ВЧК-ОГПУ в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1921－1928），с. 243－246、266－269.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с. 311.

② *Епихин А. Ю.，Мозохин О. 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с. 22.

③ *А. Ю. Епихин О. Б. Мозохин* ВЧК-ОГПУ в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1921－1928）. М.，Кучково поле Гиперборея，2007，с. 22.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с. 311.

击贪污贿赂罪犯时使用双重标准，结果，从1926年以后腐败性质的犯罪再一次系统、大量地出现。对档案文献的分析证明，1926年以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与年俱增（见表8）。与新经济政策初期有所不同的是，192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了攫取、滥用公款和作假等贪污贿赂的新形式。

表8 1921～1928年经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查处的腐败犯罪案件

年份	贪污贿赂	职务犯罪	攫取、滥用公款、作假	贿赂
1921	69641	32177		
1922	32587	14887		
1923	20464	9994		
1924	6413	7926	220	364
1925	3942	7421	368	454
1926	3702	1946	1817	2564
1927		5444	1947	3113
1928		16429	3634	4407

资料来源：根据 *Епихин А. Ю.*，*Мозохин О. 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с. 246～300有关数据制表。

分析表8数据，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1926年，贪污贿赂和职务犯罪降到最低点。第二，从1924年开始，攫取、滥用公款，作假，贿赂案件逐年上升。第三，从1926年开始，职务犯罪快速上升：1927年增加到5444件，是1926年的2.8倍；1928年16429件，是1927年的3倍多。

四 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尽管苏维埃政权执行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工人领导干部缺乏，在建立官册制度之前，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重约为一半。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后至1923年官册制度创立以前，对领导干部的挑选、配置，经历了从基层选举制→动员＋粗放任命制→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绝对任命制的变化。官册制度实质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组织杠杆，中央利用这个杠杆，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使共产党员和工人成为领导干部的主体。1920年代，苏维埃国家是被资本主义包围

的孤岛，对于部队伍政治、社会结构的改造，保证了其无产阶级性，这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提供了组织保证。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迅速恢复，与这支干部队伍对革命的忠诚和忘我的奋斗是分不开的。这是官册干部制度对苏联干部队伍影响和对苏联发展进程影响的主流，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流。

在充分肯定官册干部制度对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结构调整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应忽视在这种调整后出现的另一方面情况。由于大量提拔工人干部，使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大幅度降低。那么，这种变化与后来新经济政策终结是否有关联？换言之，与苏维埃俄国运用经济方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夭折是否有关联？当时的历史文献起码证明了一点，被提拔的这批工人干部不懂商品经济，不熟悉经济管理方法。1925 年 5 月 18 日贸易人民委员会企业负责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概括性地发言说：“我们努力从党员中进一步挑选部门负责人充实我们的机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派来的同志在我们的工作中不能用。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商业经验、懂商务，概括地说，懂得所有商品周转和信贷机关政策的商人。但是，在党员中间，符合这样条件的同志太少。”[①] 由于多数工人干部不懂商品经济，不熟悉、不习惯经济管理方法；由于大量工农补充进干部队伍，使得用行政命令方法建设和管理经济成为干部群体的主流经济意识。新经济政策道路，是运用市场经济方法建设和管理经济的道路。由于新经济政策与工农领导干部的经济意识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据此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后者对新经济政策终结是有重要影响的。然而，上述推论能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用史料进行实证研究。

从 1926 年至 1928 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迅速上升；1928 年滥用公款、作假、贿赂等案件也呈上升之势。1928 年以后，也就是斯大林实行大转折以后，这些腐败犯罪的情况怎样？其上升的趋势是否得到遏制？如果得到遏制，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些问题有待于运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犯罪案件的权威数据进一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会对苏维埃国家负面进程的发展做出更有根据的判断。这种研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确认关于苏共二十大是“贪污贿赂发展转折点”的传统判断是正

---

① РГАСПИ，ф. 17，оп. 68，д. 501，л. 11.

确的，但是，也有可能推翻这个判断或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本文的研究表明，新经济政策初期，尽管国家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由于转入市场经济以及对干部的权力缺乏监督，在1921年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这说明，如果市场经济和缺乏监督这两个现象并存，足以产生腐败；从1921年至1926年贪污贿赂案件大幅度下降，这表明：只要党和国家反腐的措施坚决有力，腐败是可以有效地被遏制的；从1924年以后，由于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上的偏差，反腐力度削弱，以及在法制机关的惩处中实行双重原则，导致1926年至1928年腐败案件大幅度回升，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党和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是否客观，反腐措施是否坚决有力，将对腐败进程能否遏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在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殊公民，对于反腐的成效，其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张丹

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涉及社稷江山的重大问题，苏联共产党兴衰的历史充分演绎了这个道理。许多中国学者认为，领导干部的特权和腐败使他们渐渐失去民心，是苏共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他们对苏共执政时期领导干部的特权、腐败以及特权阶层形成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 不过，苏共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哪个方面开始的，

① 刘廷合：《腐败、特权与苏东剧变》，《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第75～77页。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第81～86页。郭春生：《苏联特权阶层：内涵界定、形成时间、角色转化》，《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4～9页。郭春生：《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第96～100页。赵鹤梅：《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原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50～152转114页。李春隆：《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6期，第72～77页。宋镜明、李文珊：《特权腐败与苏共垮台的深层剖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64～67页。黄宗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第24～30页。张祖恩、孙卿：《浅析苏联剧变中的苏共特权阶层》，《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2期。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1页。

特权阶层的出现又是在什么时候？对这些问题，研究者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将对 1920～1930 年代苏联官册制度（номенклатура）[①] 形成和确立时期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进行研究，考察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初的 20 年里，苏共领导干部是否已经出现了住房特殊化？在住房方面是否形成了特权？尝试透过住房问题这个侧面，对这一时期的党群关系有一个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为探讨苏共衰亡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路径。

关于 1920～1930 年代苏联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属于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

目前还没有看到苏联时期的学者关于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这主要受到档案材料的限制，也是当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正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苏联时期的报纸非常愿意描写工人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1920 年代马雅可夫斯基还在诗歌里歌颂一位工人搬进了带有浴室的新住宅……但是，谁也不描写、也不会写诗歌颂扬领导干部的住房变迁，虽然这个阶层的居住面积与这个阶层的人数明显不成比例。"[②]

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学者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有大批成果问世。[③] 作为日常生活一个重要方面的住房问题，在

---

① 官册制度是苏联的干部任命制度，以对任命官员登记注册的花名册（简称"官册"）为核心，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考察、任免和管理的制度。1923 年《关于任命制》决议的通过和批准第一份官册，标志着官册制度诞生；1930 年代末最终定型；1989 年 10 月被废除。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 220～228 页。

② *Восленский М.*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Overseas Publications Interchange Ltd London, 1984, с. 304.

③ 通常这些成果都定位于某一个时期，集中对某一区域或某一类人物进行研究。如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20－30－е годы）,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3; *Гатауллина И. А.* Нэпов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Поволжья: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массовой маргинальности》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он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НЭ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аспекты》, 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6; *Заяунаева Е. А.*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рабочих Ярославля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ХⅨ-ХⅩ начале ВВ, Ярославль, 2005; *Руга В.*, *Кокорев А.* Москва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Очерки городской жизни начала ХⅩ века,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6; Петроград на переломе эпох. Город и его жители в （转下页注）

日常生活史中均有涉及。但这些成果多集中于对普通群众（包括在苏的外国工人）住房情况的研究，而对于领导干部住房情况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著问世，只有两篇论文发表。[①] 此外，在上述关于日常生活史的专著或文章中仅有少量篇幅涉及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

《1920～1930年代列宁格勒党—苏维埃官册制度下日常生活中的住房问题》一文是对列宁格勒领导干部住房问题最详尽、最深入的研究成果。文中围绕3栋住宅楼，运用大量档案材料详细阐释了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搬迁情况、如何获得并享用奢侈的家具、雇佣家庭女仆，并对大清洗时期领导干部的命运进行了介绍。[②]

《1920～1930年代苏联国家精英的住房条件和医疗服务》一文中运用回忆录和解密档案对1920～1930年代领导干部的三类住房：克里姆林宫、政府楼和别墅的居住面积、格局、房间设施、居住的人物和人物的内心感受给予了详细介绍，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领导干部优越的居住条件。

（接上页注③）годы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С. -Петербург: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0; *Антипина В. А.*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1930 – 1950 – е годы),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5; *Сергей Журавлев.* 《Маленькие люди》и《Большая история》: иностранцы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электрозавод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1920 – х – 30 – х гг,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2000。也有一些成果集中对某一时期进行宏观研究。如学位论文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город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в 1920 – 30 – е гг, http://www.mirrabot.com/work/work_24058.html.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Петербург: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3. *Лебина Н. Б.* Теневые стороны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рода 20 – 30 – 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2. *Сергей Журавлев*, *Михаил Мухин.* 《Крепость социализма》: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мотивация труда на советском предприятии, 1928 – 1938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4. *Елена О.* За фасадом《сталинского изобили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и рынок в снабжении 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годы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1927 – 1941, М.: РОССПЭН, 1998. *Араловец Н. А.* Городская семья в России 1897 – 1926 гг. Историк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М.: 2003。

①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1, №4, с. 98 – 110.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http://ricolor.org/history/rsv/elita/1/.

②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1, №4, с. 98 – 110.

但文中没有谈及1917年10月到新经济政策初年国家精英居住在住房公社的情况。[1]

在《居民和改革：新经济政策年代和赫鲁晓夫的十年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画面》一书中，作者用丰富的档案文献、学术资料、回忆录、网络资料等详细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年代和赫鲁晓夫执政这两个时期苏联普通居民的住房、休闲等情况，其中对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略有涉及。但文中仅对住房公社的缘起予以概述，也没有深入分析住房公社解体的原因。[2]

《莫斯科住房史》一书运用大量的回忆录、网络资料，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叙述了莫斯科从建城至今的住房建筑，其中有一小节介绍了莫斯科罗曼诺夫胡同3号楼领导干部的住房环境、周边建筑、雇佣家庭女仆及其居住者在1930年代大清洗时的命运；还介绍了大格鲁吉亚36号另一处干部住房的设计情况。[3]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莫斯科住房》一书叙述了苏联时期四种住房的设计和建设情况：低层的住房村、住房公社、独一无二的住房建设、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对苏维埃精英住房的设计和建设提出了新看法。[4]

《官册官员——苏联的统治阶级》一书中对领导干部的住宅进行了笼统介绍。由于文中列举的一些材料没有注明具体的时期或年代，有时带来理解上的困难。[5]

此外，还有一本译著《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主义：1930年代苏联城市社会史》，书中简要介绍了1930年代领导干部的住房建设情况。[6]

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仅在

---

① http://ricolor.org/history/rsv/elita/1/.

②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Петербург: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3.

③ *Кулакова.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 Москва: О. Г. И, 2006.

④ *Чередина И. С.* Московское жилье конца XIX- середины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Архитектура-С》, 2004.

⑤ *Восленский М.*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Overseas Publications Interchange Ltd London, 1984.

⑥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 город,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2006年的一部著作中简要提到了这一方面。[①]

上述情况表明，关于苏联领导干部[②]的住房问题尚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在充分吸收俄罗斯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档案文献、学术资料、公文材料和网络资料，从两个方面阐述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一方面介绍20余年中领导干部的三种住房类型：住房公社、独户住宅、别墅，包括居住面积、房屋格局、家居布置，也描述了官员如何度过休闲时光及人物的内心感受。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对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另一方面还简要介绍了20余年中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两相对照，可以更好地考察苏维埃政权最初的20年里领导干部是否已经出现了住房特殊化问题。

一 住房公社：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初显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由于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的住房条件十分恶劣。普通群众与资产阶级、高级官吏、高级职员等阶层的住房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继承了俄国本已十分尖锐的住房问题遗产，而连年的战争使俄国城市住房总面积的14%报废，更加剧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困难。[③] 仅1918～1920年间，俄国住房总面积的损失就超过20亿金卢布。[④] 在城市公用事业中，1.7%的自来水管道、15.4%的净化设备、20.2%的电站、25.3%的浴室、45.0%的洗衣房都无法使用。[⑤] 战争时期还被迫将许多住房改作医院。[⑥] 战时燃料极为短缺，居

---

①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在"社会结构两级性的深化"一节中（第180～197页），运用了新档案材料和统计数据，对斯大林时期领导集团通过住房获得的非工资收入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集团和劳动集团在住房分配方面的差距进行了分析。

② 囿于材料缺乏，本文重点探讨苏共高层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

③ *Араловец. Н. А.* Городская семья в России 1897 – 1926 гг. Историк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М.: ИРИ РАН, 2003, с. 170.

④ *Аркадьев. М.* О жилищн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в СССР.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с. 12.

⑤ *Араловец. Н. А.* Городская семья в России 1897 – 1926 гг. Историк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с. 170.

⑥ *АверченкоВ. А., ЦаревИ. Г.* Жилищ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старая песня о главном // Экономика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2005, №7, с. 48.

民在严寒而又漫长的冬季被迫将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如篱笆、家具和书籍等都做了燃料。[1] 1919年7月，莫斯科苏维埃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拆除不适合居住的木房屋、栅栏和其他木结构建筑作燃料。仅1919～1920年这个冬天就拆除了2500栋房屋[2]，1918～1920年末共拆除5000栋木结构建筑。[3]

由此可以看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住房形势就是相当严峻的。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居民中大力提倡住房公社（дом-коммуна）这种居住形式。这是带有日常生活基本配套设施的宿舍结构的住房，一个住房公社是由单独的一间间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公共食堂、幼儿园、洗衣房、浴室、理发馆、商店等组成。这意味着除了睡觉这种纯属个人行为需要在那间单独的房间里完成外，饮食、教育子女、洗衣、洗澡等一切行为，都要在公共场所完成。这样，就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化。在当时，采用这种住房形式有助于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因为集中供暖、公共食堂和公共洗浴等可以大大节约资源。

此外，住房公社这种居住形式也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住房公社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欧文所建立的基层社会组织中[4]，这也是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思想追求之一。[5]

---

① *Кулакова.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М.：О. Г. И，2006，с. 161.

② *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утях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 в Москве. 1918－1921 гг.）//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63，№5，с. 142.

③ ГАОР МО，ф. 66，оп. 1，д. 302，л. 32，д. 44，л. 15。转引自 *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утях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 в Москве. 1918－1921 гг.），с. 142。

④ 在傅立叶的理论中，"法郎吉"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法郎斯特尔"则是法郎吉成员居住的公共房舍。欧文设想的基层组织是"合作公社"。转引自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简史》，商务印书馆，1975，第111、133页。

⑤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借助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的梦阐述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共同经营的工场、公社与合作社的生活。转引自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30页。20世纪60年代广为流传的《青年俄罗斯》传单，主张成立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公共的工厂和商店、消灭婚姻和家庭、对儿童实行公共教育等。转引自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第156页。1863年成立的伊舒京青年组织，就要求推翻现存制度，把所有土地转归国家，建立劳动生产组合，收入归全体成员平均分配。转引自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160页。

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乌托邦思想，将其演变为“住房公社”：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这样，大家在一起工作，又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劳动、日常生活集体中努力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旷工者、破坏劳动纪律者、游手好闲者和玩忽职守者，会因受到道德谴责而被孤立起来，而先进生产者会因工作业绩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扬。由于个人行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切都会受到集体的评判和监督，因此，人们不能不好好工作，也无法逃避应有的劳动义务。[①] 一句话，通过生产和生活进程的紧密交织、互相渗透，这样就实现了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改造。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住房公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大力宣传的、最理想的住房组织形式。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组建了住房公社。其中，将收归城市所有的大宾馆改建而成的苏维埃楼，是最常见的住房公社形式。一份文件规定：苏维埃楼是带有单独房间、公共食堂和公共厨房的宿舍建筑，仅仅提供给苏维埃职员长期居住，职员必须持有苏维埃楼和旅馆的管理当局所颁发的证件。[②]

1923年的“莫斯科手册”，提供了13栋苏维埃楼的简况，其中有3栋（1号、2号、4号）是由宾馆改建而成的。分布最为集中的是在特维尔地区，共有7栋苏维埃楼（1号、4号、5号、7号、8号、12号、13号）；其次是普列奇斯滕斯基地区，共有3栋苏维埃楼（9号、10号、11号）。民族宾馆是1号苏维埃楼，从1918年3月12日开始，列宁、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在此居住。据证实，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三人共同居住在一间有两个房间的套房里。[③]

彼得格勒领导干部集中居住在三种住房公社里：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

① *Меерович М. Г.* Кто не работает, тот не живет.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опыт России (1917 – 1941 гг.), http: //www. circleplus. ru/archive/n/34/7.

② ЦГА СПБ（圣彼得堡国家档案中心），Ф. 1001, Оп. 1, Д. 302, Л. 307。转引自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27 – 28。

③ Московская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а СССР, http: //www. nedmos. info/moscow. html.

学、苏维埃楼、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

从1917年10月开始，最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居住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里。这里除了行政服务机构外，还有图书馆—阅览室、音乐学校、幼儿园、浴室、食堂。1920年之前，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现有的建筑中，725套住宅和594个房间都有住户，大约居住着600人。此外，还有1000多名工人和职员，如医生、厨师、锅炉工人、钳工、保安等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服务。[①]

苏维埃楼是由彼得格勒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一些宾馆改建的。苏维埃楼的行政机构负责住户的营养、日常生活服务、休闲。阿斯托利亚宾馆是1号苏维埃楼，这里的日常生活安排得最好。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都居住在这里，如捷尔任斯基、布哈林、别尔津、叶努基泽、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女儿等。[②] 1920年9月搬到阿斯托利亚的季诺维也夫，立刻在二层占有了5个房间。二层的2号居住着他的前妻 З. И. 莉莉娜和10岁的儿子。托洛茨基的女儿季娜伊达和布龙施泰因居住在楼上3号。[③] 季诺维也夫的助手 А. Е. 瓦西里耶夫有3个房间，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 Н. П. 科马罗夫有1个房间。[④]

欧洲宾馆是2号苏维埃楼，根据专门决议只有下列人有权居住在欧洲宾馆：①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②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会主任。③俄共（布）各省委员会委员。④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地方分局委员。⑤各省执行委员会委员。⑥各省执行委员会分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⑦各省执行委员会分委会委员。根据这个决议，苏维埃楼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军区提供42个房间，为俄共（布）各地方委员会、各地方苏维埃和出差的高级官员提供5个房间。决议有一个很有趣的附注：当有空房间时，允许党龄不晚于1918年的担任负

---

①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27.

② Московская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а СССР.

③ ЦГА СПБ, Ф. 7965, Оп. 1, Д. 392, Л. 316－317, 318－319, 12－13。转引自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29。

④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29.

责职务的工作人员搬进苏维埃楼。[1]

这个决议表明，能否居住在苏维埃楼要由官位等级来决定。因此，有机会入住苏维埃楼的人并不是很多的。有一份请求允许一位医生居住在阿斯托利亚的记录：我请求将医生 A. 吉宾同志安排在 1 号苏维埃楼。吉宾同志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应该把他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为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服务。[2] 从中可以看出，拥有杰出才能的、能"更好地为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服务"的人也有"破格"居住到苏维埃楼的机会。

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是由彼得格勒的许多二级宾馆改建的，一些党龄不长、职位不高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居住在这里。这也是带有单独房间和公共厨房的宿舍建筑。1 号苏维埃旅馆包括 3 栋楼，位于托洛茨基大街和弗拉基米尔胡同，可以为 300 名社会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提供长期服务，还可以为3000 名出差人员、会议代表、运动员、游览者等提供临时服务。[3] 据作家 Л. В. 尼库林和艺术家 Ю. П. 安年科夫回忆，旅馆里的生活是按照特殊的时间表进行的：白天整栋楼十室九空，差不多所有的住户都只是夜间才回来。一层住着性格平和的列米佐夫。三层住着文静的、总是若有所思的小姑娘，她是刑事侦查局的侦查员。五层住着一个好像有精神病的诗人瓦西里。深夜不眠的人在楼里走来走去，寻找孢子果、加酸果蔓的茶，幸运的时候能找到一点土豆。[4] 1921 年夏天以前，在苏维埃楼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的常住人口共计 800 人。[5]

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的一年半到两年期间，彼得格勒领导干部中的

---

① ЦГА СПБ, Ф. 1001, Оп. 1, Д. 338, Л. 8。转引自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28。

② ЦГА СПБ, Ф. 1001, Оп. 1, Д. 304, Л. 52。转引自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28。

③ Московская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а СССР.

④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28.

⑤ ЦГА СПБ, Ф. 1001, Оп. 1, Д. 302, Л. 344。转引自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29。

许多人仍居住在阿斯托利亚（1号苏维埃楼），苏维埃楼没有特别显著的变化。彼得格勒历史学家 M. Б. 拉比诺维奇从女大学生薇拉那里了解了关于阿斯托利亚的事情。薇拉的哥哥是一名共产党员、大学老师，薇拉同哥哥一起居住在阿斯托利亚。在这里，薇拉与自己的邻居、一位彼得格勒军区的工作人员相识并嫁给了他，年轻夫妇立刻分到了房子。据拉比诺维奇回忆：住在阿斯托利亚里的居民有老布尔什维克和官运亨通的年轻共产党员，后者比老布尔什维克人数多。拉比诺维奇称新经济政策初年的阿斯托利亚为“载有形形色色身份相似的人的诺亚方舟”。[①] 1922 年末至 1923 年初，当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时，领导干部纷纷搬出“住房公社”，享受独户住宅。

与领导干部的居住方式相同，普通群众中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住房公社的居住条件参差不齐，有由面积大、质量好的住房改建而成的，但这种好的大楼房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多数是由学生宿舍或其他住房等改建而成的。有所不同的是，领导干部在苏联经济恢复之初就纷纷搬出住房公社，普通居民则直到 1931 年才开始结束这种集体宿舍的生活。在整个 1920 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在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年工人中大力提倡带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等走廊体系的住房，这是当时官方宣传的最理想的住房形式。

莫斯科在 1919 年开始成立工人住房公社。大花园街 10 号楼是第一个住房公社，将日常生活最大限度的社会化、把女主人完全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住房公社创建者的座右铭。[②] 1919 年，莫斯科共有 102 个工人住房公社。[③] 到 1921 年 4 月共有 471 个住房公社，居住人数超过 9.9 万人，其中工人及其家属大约有 6.5 万人。[④] 到 1923 年 3 月共有 1075 个住房公

---

①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2.

② *Кулакова.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 М.: О. Г. И, 2006, С. 174.

③ *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утях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 в Москве. 1918 – 1921 гг.), с. 145.

④ ГАОР МО, ф. 4557, оп. 8, д. 3, л. 2; ф. 2285, оп. 1, д. 13, л. 11; ф. 4557, оп. 1, д. 144, лл. 6 – 8。转引自 *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утях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 в Москве. 1918 – 1921 гг.), с. 146。

社，居住着 10 万以上的工人，几乎占莫斯科城市居民的 6.6%（当时莫斯科的人口接近 150 万）。[①]

彼得格勒的住房公社是在 1918～1919 年出现的。[②] 1921 年成立了第一批青年住房公社。[③] 大学生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被迫居住在高等学院的宿舍里，联合组建一些规模不大的住房公社。其中，最著名的是梅特尼亚住房公社，几代大学生都在这里居住过。1921 年来到彼得格勒的工农速成中学的女学生 А. И. 罗斯基科娃回忆道：我住在梅特尼亚宿舍四层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张床、两把椅子、两个凳子，中央是砖砌的小铁炉子。[④] 还有一位工农速成中学的女学生回忆 1923 年时梅特尼亚的宿舍生活：在疲劳的一天结束后，我回到了梅特尼亚一个条件很不好的房间里，开始我用被盖住头，睡得很香甜。醒来的时候，我看见被上有几只硕大的老鼠。[⑤] 女作家 В. К. 克特林斯卡娅回忆了 1920 年代校外学院的宿舍生活，宿舍位于利泰尼大街一栋房子的顶层。她写道：我们房间唯一的一扇低低的小窗户朝着厢房的屋顶。天花板歪歪斜斜，小铁炉子的烟囱伸到烟道里，整个房间就靠这个小铁炉子取暖。一周洗一次澡，要在厨房烧水，然后用盆端到自己的房间里从头到脚洗一遍。[⑥] 1930 年 3 月中旬，列宁格勒共有 110 个日常生活公社和集体组织，共计 1

---

① *Меерович М. Г.* 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 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 – жилище,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 – 1932 ГГ, http://www.circle.ru/personalia/.personalia/。

此外，А. К. 索科洛夫还列举了两种住房公社的统计数字：一种是 1920 年莫斯科已建成 471 个住房公社，稍晚一些增加到 600 个。另一种是 1921 年莫斯科有 865 个住房公社。因此，索科洛夫认为，1921 年前莫斯科住房公社的数量就已达到 600～865 个，数据不统一是由于对住房公社的判断标准极为不统一造成的。转引自 *Соколов. А. К.*, *Козьменко. В. М.* （*отв. ред.*）Россия в ХХ веке: люди, идеи, власть.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ОССПЭН），2002，С. 209。

②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③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1.

④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2.

⑤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2.

⑥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2.

万人。[1]

从列举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住房公社的人数比例并不是很大。由于种种原因，住房公社并没有如执政党所愿，成为苏联居民主流的居住形式。其实，1920～1930年代苏联居民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后文将重点介绍。1928～1929年，伴随着苏联政治、经济上的转折，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大转变，住房政策随之发生变化。1931年，苏联政府颁布了统一的住房设计标准，公用事业管理总局规定，1931年重点建设带有独户住宅的住房。住房形式发生了改变。[2] 普通群众的住房公社生活，到此开始结束。

综合以上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住房公社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住房公社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住房公社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是由于生计困难而躲避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除了生计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官方意识形态的目标。所以，一旦难关已过，领导干部就公然违背官方的宣传口径，迫不及待地搬出住房公社，投入舒适、宽敞的居住条件的怀抱。而1920年代的普通群众，依然居住在不断组建的住房公社里。

第二，同为住房公社，在战时艰苦的环境里，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已有着“质”的区别。前者居住在大宾馆，服务设施齐备，甚至一个人就占有几个房间。此外，还拥有大批的工作人员为其服务，过着“相对禁欲主义”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住房公社是名副其实的“诺亚方舟”；而后者基本是几人一个房间，住房简陋，家具简单，甚至没有集中供暖和公共浴室，过着“绝对禁欲主义”的生活。

综上所述，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已经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只不过在战时艰难的环境里，他们没有条件为自己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与普通群众在这方面的差距还不是非常明显。在走出集体主义的“诺亚方舟”，搬进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独户住宅后，这种差距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

[1] *Хазанова В. Э.*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первой пятилетки. М. : наука, 1980, с. 218.

[2]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二 独户住宅：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加大

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引发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以俄共（布）十大为标志，苏维埃俄国开始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1922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的决议。该决议统计，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中央和区域机关、省级机关、县级机关、支部书记共计15325人。“鉴于目前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措施之一，即是通过地方执行委员会保证所有上述同志的住房。[①] 笔者认为，这一决议对领导干部住房形式的转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还需要其他档案材料予以证实。以此为契机，当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形势彻底消除、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领导干部立即脱掉禁欲主义外衣，抛弃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纷纷搬出国内战争时期那些“集体宿舍”，按照官位等级享受独户住宅，与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迅速拉开了差距。

早在1917年12月1日，列宁就在政府决议中签署：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②] 这是一个只对房间数量予以限制却没有明确面积标准的决议。从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领导干部的住宅分配中普遍贯彻这一原则。

新经济政策期间，由于国家无力承担维修、管理住房的责任，于是将革命胜利初期收归城市所有的一些中、小房产发还原主，并允许住房的买卖和租赁。但是，有许多住房，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仍然属于市有住房。领导干部就居住在这样的市有住房里。

莫斯科的领导干部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政府楼里。在1920年代，高级官员集中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如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等许多政治局委员及其家属都在此居住。1919年时列宁就已经在克里姆林宫拥有非常大的6个房间的住宅，其中4个房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244～2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01页。

间为家庭成员使用，还有一间是厨房，一间女仆的房间。[①] 前面提到列宁一家人从1918年3月12日开始在1号苏维埃楼居住，推算下来，列宁在1号苏维埃楼的居住时间应该在一年左右。B. Ф. 阿利卢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姥姥 O. E. 阿利卢耶娃居住在卡瓦列里斯基楼房里，捷尔任斯基的妻子 C. 西吉兹蒙多夫娜和她是隔壁邻居。离她们不远的另一栋楼房是米高扬的住宅。斯大林和 K. E. 伏罗希洛夫的住宅位于克里姆林宫里。"[②] 需要指出的是，米高扬在两个儿子结婚后，协同全家连同他的外甥一起搬进与这套住宅并排的、格局一样但是面积更大的住宅里，共有8个房间。[③] H. A. 米高扬在回忆录中写道："莫洛托夫住在我们这个门的三层，我们家住在二层……同楼梯并排的是平稳而又美观的电梯。古老的大理石台阶铺着带有黄花的红地毯。只能在政府的建筑里才能见到类似克里姆林宫那样的路面。"[④]

克里姆林宫整个建筑是一个长走廊体系，左右两边都是房间，天花板很低。房间的墙壁用木头包上，用暖气和贴上瓷砖的大壁炉取暖。住宅里一律都是套上白布套的柞木家具，家具是属于国家的，都挂着铁牌子。住宅通常是由卧室（每个家庭成员一间）、餐厅、图书馆和领导人的办公室兼卧室组成的。斯大林的住宅就是如此，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儿童区域，包括瓦西利和斯维特兰娜的两个卧室、公共餐厅和图书馆。第二部分是斯大林本人的区域，包括斯大林的房间、副官的房间、餐厅、图书馆、办公室兼卧室，都是门对门的一排房间。[⑤] 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居住面积很大，并且住宅、家具都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并不喜欢这个住所，他们都希望尽快搬离此地。H. A. 米高扬这样写道："克里姆

① РГАСПИ, ф. 2, оп. 1, д. 11186, л. 2。转引自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http: //ricolor. org/history/rsv/elita/1/

②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③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④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⑤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林宫的生活好像与世隔绝。我们好像生活在孤岛上，但这不是引人入胜的孤岛，而是被红砖墙隔离开的沉默的监狱。克里姆林宫里荒无人烟……好像神话里的恶魔法师给宫殿施了妖术，宫殿里所有的人都永远地睡着了。总是有一种神秘感和紧张感。"① 据笔者分析，高层领导人希望离开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原因有两点：①住所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国家的，住户没有归属感；②领导人非常不喜欢这种门对门的走廊体系的住宅，似乎又回到了住房公社时期。

克里姆林宫还有自己的电影厅。阿利卢耶娃回忆道："在克里姆林宫原冬季花园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电影厅，从这里有个过厅通往旧宫。午饭后，也就是晚上9点我们去看电影。当然这对我是太晚了，于是我就死活恳求要去……于是我就走在这大队人马的前面，朝着那一个人也没有的克里姆林宫的另一端走去。我们后面，一对装甲的专用汽车慢慢地爬行，再后面是无数的警卫人员……通常要看两部或更多的片子，看完电影是夜里两点钟……有多少好片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小银幕上首次放映呀！许多苏联最优秀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厅出现的……在战前时期，还没有批评电影和强迫改拍的作法。一般的情况是大家看看，也就批准，于是影片就可以上映了。如果不完全合乎口味，不怎么喜欢，也不影响片子和编剧的命运。几乎每部新片子都要受到'斥责'只是在战后才成了司空见惯的事。"②

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家庭成员，都持有一个特殊的通行证，那是一个暗红色的小本，是印花纸，上面有照片、全名和克里姆林宫警卫司令部的签字。封面上有压上花纹的字母"克里姆林宫"。③

除了克里姆林宫这个聚居地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居住在政府楼。例如罗曼诺夫胡同3号楼，这是革命前最华美的楼房之一。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的著名活动家如伏罗希洛夫、伏龙芝、谢尔巴科夫、斯米多维奇、科肖尔、布琼尼、科涅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华西列夫斯基、

---

①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②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赵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61－162页。

③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朱可夫等居住在这里。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在1920年代确有一些官员搬出了克里姆林宫，但具体时间不得而知。楼内每一套住宅都由4个、5个或更多的房间组成。楼房里通常都有内部特供商店和汽车库。[①] 同3号楼并排的是苏联卫生部第四管理总局下属的“克里姆林宫食堂”。按照当日的菜单将午餐票和晚餐票发给登记注册的人，他们可以为家庭订餐或者将干粮带走，只需要支付餐票。那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理发店、一个医疗中心。[②] 需要指出的是，3号楼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权空间，也有普通百姓居住在其中。A. 罗科索夫斯卡娅回忆道：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住在一个门里，莫洛托夫一家占整整一层楼，而在那个门的五层是公共住宅，那里居住着普通人的后代，他们的父亲和爷爷既不是领袖，也不是英雄。为这栋楼服务的工人——钳工、电工、修灯的人、油漆工居住在半地下室里。[③] 当然，众多的服务人员都由国家开支，房租也是微不足道的。

1928年开始为最高层领导干部建设第一栋多住宅的政府楼，它位于贝尔塞内夫沿岸街，正对着基督教堂，在克里姆林宫斜对面的莫斯科河对岸。这是一座集行政办公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楼，在竣工后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住宅楼之一。住宅的墙壁被用丝线绘制的彩画或者希腊的圆柱图案装饰起来，天花板上画着外国风景画和水果图案。家具都是统一标准的，看上去很笨重。电梯的造型很死板，但很光滑，镶着带有暗红色框的暗红色镜子，缓缓上下，并且只能用钥匙开启。楼里没有垃圾通道，通过厨房的货梯运送垃圾。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楼梯间挂着带蜡烛的灯笼，还有几盒火柴。两户一部楼梯。后院是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门诊部、洗衣房、各种工作间、仓库、美食店和百货商店。1931年秋这栋楼里居住着2745人。[④]

这栋楼房由面积和房间数量不等的506套住宅组成，莫斯科河沿岸街方向的几个门是面积最大的户型。按照房间（每人一间）、一间办公室、一间餐厅或者大厅的标准进行分配。B. 阿利卢耶夫这样描写他们的住宅：

---

①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② *Кулакова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 с. 200.

③ *Кулакова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 с. 200 - 201.

④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我们住在10号门。这个门所有的住宅都是5个房间，面积大约100平方米。住宅的格局是这样的：从大门进去是一个长走廊，一直通到远处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所有的窗户都对着院子，这是爷爷C.Я.阿利卢耶夫的办公室。大门向右是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整面墙是一扇大窗户，这是哥哥列昂尼德的房间。再向右是25平方米的餐厅，向左是我和保姆的17平方米的儿童房。从餐厅可以通过母亲的卧室，也是17平方米。卧室、餐厅和列昂尼德的房间的窗户都朝南，接受阳光多。其余的房间总是昏暗朦胧的，但是炎热的夏季在那些房间里是很舒服的。房间的天花板很高，有3米。厨房是狭长的，有12平方米。窗户下面是一个容量很大的墙柜，可以放食物。厨房里还有一个运送垃圾的货梯和放置家庭用具的阁楼。"大概这个门里所有的住宅都是这样的格局，只是奇数号的住宅里厨房稍微小一点，但是是正方形的。从五层开始有两个阳台，在二层、五层和八层甚至有3个阳台，无论偶数住宅还是奇数住宅都有公共阳台。[①] 1门的地下室是靶场，莫斯科第一所儿童影院坐落在沿岸街方向，影院上面是面积很大的运动场，有网球场地和排球场地。[②]

据1934年资料统计，这栋楼共有336名服务人员：137名领班守卫，20名女清洁工，8名男垃圾清洁工，40名扫院子的人（夏季少一些），3名园丁，38名消防员，4名警卫队长，35名钳工，25名电工，6名地板打蜡工人，7名司机，6名电梯维修员，7名医生和女护士。[③]

彼得格勒的领导干部也同样居住在市有住房里。彼得格勒原1号、2号苏维埃楼（阿斯托利亚和欧洲宾馆），叶拉兴半岛的别墅，喀琅魏克斯大街的21、23号楼，红色佐拉大街（石桥大街）的26/28号楼都属于市有住房。

喀琅魏克斯大街21、23号楼和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是1912～1914年按照伯努瓦家族的设计方案建造而成的。它们是一片带有大约250个设施完善的住宅的巨大的建筑群。住宅里有宽敞的浴室、集中供暖、电话、

①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②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③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正门和后门。每一个大门入口都有电梯，正门到第一层入口处铺着地毯。住宅分成主人的房间（4～5 间宽敞的房间）和仆人的房间（3～4 间不大的房间）。壁炉是用大理石镶砌的。[①] 1924 年 9 月，市属住房统一管理委员会在讨论住房改行经济核算制问题时，基于红色佐拉大街 26/28 号楼特殊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决定将其保留在住房分局的预算中。不仅如此，伯努瓦家族的这片建筑群还由市属住房托拉斯拨款进行了维修。楼里的技术人员剧增：1925～1926 年有 114 人在其中服务，包括 11 名打扫院子的人、9 名锅炉工人、12 名守卫者和 18 名正门守卫者。在随后的 5 年中增加到 170 人，其中扫院子的人增加到 16 人，正门守卫者达到 42 人。这些服务人员由托拉斯任命的房屋管理员管理。1926 年 2 月，住房分局在专门的决议中指出，这栋楼仍由省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②] 毫无疑问，这些众多的服务人员的开支都是由国家支付的。

彼得格勒领导干部集中居住的区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1920 年代中期集中于红色佐拉大街 26/28 号楼。而 1930 年代初的房簿资料显示，主要集中于喀琅魏克斯大街 21（27）号楼和 23/59（29/37）号楼。

1923 年，彼得格勒苏维埃有 25 名代表居住在 20 套住宅里（26/28 号楼有 14 套，23 号楼有 6 套）。[③] 其中包括 A. A. 古谢夫、Г. В. 日加列夫、Н. И. 伊万诺夫、Р. А. 卡普兰、И. П. 科萨列夫、Б. П. 波泽恩、К. В. 谢利维奥尔斯托夫、Э. А. 拉赫亚等。[④] 从 1924 年 4 月开始，季诺维也夫居住在 26/28 号楼 9 门二层 118 号住宅里。[⑤] 当时仅次于季诺维也夫的、联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书记、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 Г. Е. 叶夫多基莫夫得到了 26/28 号楼 3 门 23 号住宅，这是一套非常威风的住宅。在 26/28 号楼 2

---

①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8.

② ЦГА СПБ, Ф. 3201, Оп. 5, Д. 53, Л. 1。转引自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8。

③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8.

④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1, №4, с. 102.

⑤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6.

门20号住宅居住着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 E. B. 洛斯。[1] 彼得格勒军区指挥官 B. M. 吉季斯居住在三层119号住宅。四层的120号住宅分给了叶夫多基莫夫的妻子 K. B. 叶夫多基莫娃，她是民族楼食堂的主任。俄共（布）省委组织委员会主任 A. C. 库克林居住在五层121号住宅。[2]

各部门掌权的一把手也几乎都住在26/28号楼。如 Г. Ф. 费奥多罗夫、И. Е. 科特利亚科夫、Г. В. 齐佩罗维奇。[3] 波泽恩一家从1号苏维埃楼搬到了26/28号楼70号住宅，后来又换成了那栋楼的97号住宅。[4] З. И. 莉莉娜和儿子、Г. И. 萨法罗夫夫妻，他们只在乡村贫民第一大街4号楼居住了很短的时间，就搬到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和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里。[5] 1924年1月，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管理分局的领导人 И. М. 莫斯克温也搬到了26/28号楼。[6] 1924年4月，И. Ф. 卡达茨基搬进了26/28号楼，他是布尔什维克区党委会的工作人员。[7]

1930年代初开始，领导干部集中于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和23/59（29/37）号楼。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1门共23套住宅，都是大户型的。由7个房间组成的8号住宅是最好的住宅，在革命前这套住宅一年的维修费用是1440卢布。1930年，列宁格勒区委会副书记 M. C. 丘多夫从23/59号楼40号住宅搬到21号楼8号住宅。波泽恩同妻子、儿子从26/28号楼的97号住宅搬到了21号楼12号住宅，共有6个房间，1911年这套住宅的维修费用是1220卢布。联共（布）市委副书记 И. И.

---

①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с. 102.

② *Лебина Н. Б.*,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 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 38.

③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с. 102.

④ ЦГА СПБ., ф. 4304, д. 1133, л. 3; ф. 7965, оп. 1, д. 1028д, л. 107об. – 108。转引自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с. 102。

⑤ ЦГА СПБ., ф. 7965, оп. 1, д. 393, л. 63。转引自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с. 102。

⑥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с. 102.

⑦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с. 102.

加扎居住在9号住宅。10号住宅居住着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会主席M. M. 谢尔加宁。党的市委书记A. И. 乌加罗夫在1933年占据了17号住宅。从1927年起，列宁格勒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Г. Н. 佩拉耶夫居住在19号住宅里。1933年，И. Е. 卡斯帕罗夫一家搬到23号住宅，他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委会组织部主任。[①]

1930年代下半期，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100～109号住宅的居住情况如下：区执委会主席A. П. 格里奇玛诺夫从1936年9月开始居住在102号住宅里。区委会书记A. C. 谢尔巴科夫从1936年9月开始居住在103号住宅里。从1931年开始，列宁格勒军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机构副局长И. В. 扎波罗热茨居住在106号住宅里。在107号住宅里，从1935年3月居住着Н. Г. 茹利德－尼古拉耶夫，他是列宁格勒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管理局的领导人之一。从1925年开始，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卡达茨基居住在109号住宅里。[②]

1920年代，列宁格勒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活动家都同普通群众居住在一起。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从1926年4月开始居住在26/28号楼2门20号住宅里，这个门里所有其他的住宅都是有许多住户（普通的工人和职员）的典型的公共住宅。如在13号住宅里居住着9家共计21口人。[③] 这种情况在1932年左右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干部竭力构建独立化的居住空间。这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从住宅中迁出普通居民；某套住宅固定归属某个机关。

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1919年搬进了“斯韦特兰”工厂的女运输工人彼得拉科夫斯卡娅；1921年，工人斯米尔诺夫全家也搬了进来；随后，无产者索科洛夫一家也搬进来了。1930年代初，这套住宅共居住着5个家庭共20口人。1933年，住宅里所有的人都被迁出，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A. P. 斯特罗明全家及其亲属、

---

① ЦГА СПБ.，ф. 7965，оп. 1，д. 1028д。转引自 *ИзмозикВ. С.*，*Лебина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с. 106 – 107。

② *Измозик В. С.*、*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с. 107.

③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и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38 – 39.

同事占据了这套住宅。[①] 1918年，在彼得格勒区住房委员会的指示下，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被分配给工人以及政治技术学院、电子技术学院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居住。他们每20～30个人居住在一套住宅里。1932年所有普通人全部迁出，这栋楼完全成为领导干部的住所。[②]

归属某个机关的住宅，基本上是一个人搬出住宅，接替这个职位的人或同级别的人搬进相应的住宅。[③] 例如，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1号楼5号住宅里，先后居住着П. И. 斯特鲁贝——列宁格勒区执委会主席，他在1937年6月27日在莫斯科被逮捕，同年10月30日被枪毙；П. И. 斯莫罗金——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委会书记，1938年春天担任斯大林格勒区委会第一书记，在1939年2月25日被枪毙；З. А. 杰维基亚洛娃——联共（布）区委会科学分部主任。[④] 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1号楼12号住宅里，先后居住着列宁格勒地区检察官波泽恩，他于1938年7月9日被逮捕，1939年2月25日在莫斯科被枪毙[⑤]；1939年3月，区委员会书记И. О. 谢赫钦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搬进了这里；两个月后，党委员会书记А. Я. 叶菲莫夫及母亲和两个女儿搬进这里；1949年，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刑侦分局局长А. А. 科济列夫在此居住；随后是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局长Б. П. 波诺马廖夫；1954年居住着全苏联卫生技术设备科学研究院院长П. К. 伏罗希洛夫。[⑥] 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103号住宅从1930年代中期就被联共（布）区委会副书记丘多夫占据，他于1937年6月在莫斯科被逮捕，1937年10月30日被枪毙；之后居住着区委会书记谢尔巴科夫，后来迁居莫斯科；从1943年开始，苏联元帅、列宁格勒前线指挥员Л. А. 戈沃罗夫全家

①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5.

②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6.

③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7.

④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7.

⑤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7.

⑥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8.

在此居住。[①]

与领导干部宽敞的独户住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коммунальная квартира）里[②]，这是工业化时期住房建设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的产物。同住房公社一样，公共住宅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已有之，只不过在1920年代它不是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此外，居民还居住在工厂的宿舍和临时宿舍里。也有许多人栖身在走廊里和别人住宅的角落里——住在走廊和穿堂里的人通常还有床，而栖身在厨房或者其他公用空间角落的人就睡在地板上。[③]

丘科夫斯基在192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描写莫斯科的公共住宅：住宅里有一种特别的莫斯科的味道——从大群聚集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厕所总是在不间断地工作，在每套住宅里每分钟都能听得见厕所冲水的声音。[④] 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排队等待住房的人数是2.7万人，而能得到住房的不多于50～60人。[⑤] 莫斯科一个6口之家，孩子们请求不要让他们住到楼梯下的小屋里，那个小屋没有窗户，总面积才6平方米。[⑥] 36岁的列宁格勒工人，住在走廊5年，他给莫洛托

---

①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 - 1930 - х годов, с. 107.

② 笔者将公共住宅的含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公共住宅"就是几家合住的一套住房。它的俗称 коммуналка 被解释为：（俗）公共住宅（多户居住在一起的住宅，厨房、厕所、浴室等多合用）。转引自王嘉民、孙平主编《便携俄汉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420页。在财经辞典中，将公共住宅解释为两家或者更多家作为独立的租户占有一套住宅。转引自 http://slovari.yandex.ru/dict/glossary。狭义上的"公共住宅"是苏联时期出现的一个名词。在自由百科全书中对公共住宅的定义是：公共住宅是国有住宅，由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人均住宅标准分配居民居住，不考虑家庭状况和住宅的配置情况。通常在公共住宅里居住着几个家庭或者几个人，每个家庭或者个人占有一个或者几个房间，共用一个厨房和浴室。转引自 http://ru.wikipedia.org/wiki/。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居住在一套公共住宅里的居民往往素不相识，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

③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 город. М.: РОССПЭН. 2001, с.58.

④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20 - 30 - е годы），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3, с. 438.

⑤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20 - 30 - е годы），с. 439.

⑥ ГАРФ, ф.5446, оп.82, д.42, л.47 - 51。转引自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 - е годы: город,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с. 60。

夫写信，恳请给他“一间房间或者一所小住宅，以便他在其中过个人生活”。住宅对于他来说“就像空气那样是必须的。”① 1919年卫生人民委员会规定人均居住面积最少为8平方米。② 而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只有5.9平方米，莫斯科为5.2平方米。③ 1930年代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对于一个普通居民来说拥有一间人均5平方米的房间都是非常困难的。到1940年前，莫斯科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几乎4平方米。④

结合以上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住宅材料，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住房类型都发生了变化。前者经历了从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向一家一户的单独住宅的转变。而在独户住宅的居住条件下，又不断向更加宽敞、级别更高的住宅搬迁，住房类型上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者经历了从住房公社为主（尽管入社人数并不多，但却是1920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向公共住宅为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集体宿舍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而是住房类型上“换汤不换药”的变化。住宅中日常生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

第二，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和普通群众的公共住宅在人均居住面积和住宅的基础设施方面相去甚远。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前者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房间的，一人占有一个房间，许多干部的住宅里连保姆（女仆）也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这还没有将辅助面积计算在内。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时列宁家的女仆就有自己的房间。B. 阿利卢耶夫家的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包括保姆在内共5口人，人均居住面积为20平方米。而后者则是全家人共同占有一个房间，往往2～3代人生活在用床单或窗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⑤，拥有一间人均5平方米的房间都是非常困难的。姑且按照5

① ГАРФ，ф.5446，оп.82，д.64，л.161。转引自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 город, с. 60。

② *Меерович М.Г.* 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 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жилище,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 гг.

③ *Меерович М.Г.* 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 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жилище,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 гг.

④ *Орлов И.Б.*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адцатилетие, http://orlov-i-b.narod.ru/otechist/Kvartira.doc.

⑤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 город, с. 60.

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前者的人均面积是后者的4倍。想象一下那个即将搬进6平方米小屋的6口之家，人均居住面积仅仅1平方米。普通百姓家中也有雇佣女仆的，但由于住房危机，大部分家庭女仆都没有床铺，她们睡在走廊里、过道里、厨房里、桌子底下或者椅子上。1920年代中期，莫斯科一半的家庭女仆在厨房过夜。而从1929年开始，他们只有在得到住宅所有人的同意后才能在厨房里过夜。[1]

从住宅的基础设施来看，领导干部的住宅基础设施齐备，楼房内仅运输工具就有电梯、楼梯、货梯三种，而普通群众的住宅则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不齐备，使用公共的泄水盆、厕所、厨房设备，厨房通常只有煤油炉、火口和冷水龙头。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一共只有一个厕所。[2] 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没有浴室的住房里，一周在公共浴池洗一次澡。[3] 至于前者的配套设施——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百货商店、美食店，以及众多的服务人员，无须多论，这些都是普通群众根本无法企及的。

第三，虽然领导干部的住宅楼里也有普通群众居住，但二者的居住条件却迥然不同。领导干部普遍一个家庭居住在一套住宅里，像莫洛托夫那个级别的官员一家就占整整一层楼，而叶夫多基莫夫夫妻二人则各自占据一套住宅。至于同一栋楼里的普通群众，这样的一套住宅却是由几家合住的，共用厨房、卫生间等设施，也就是以公共住宅的形式居住着。如上文提到的，与基洛夫同一楼门的邻居就是9家21口人共同居住在一套住宅里。而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原本容纳20～30个人的一套住宅在1932年后却只供领导干部一家居住。如果我们假定官员的家庭为5口人，那么其人均居住面积则为普通群众的4～6倍。即便如此，领导干部仍然竭力排斥普通群众，努力构建独立化的居住空间。此外，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还要受到特殊的保护。例如，基洛夫家壁炉的烟道全部被砌在墙里。从基洛夫的家到斯莫尔尼宫沿线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为此大约有300人

---

[1]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 (20～30-е годы), с. 441.

[2] *Кулакова Н.*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 с. 166.

[3] *Орлов И. Б.*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адцатилетие.

从附近的住宅迁出。[①]

第四，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也有居住在公共住宅的。但同样是公共住宅，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也有着“质”的不同。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37号住宅居住着11个芬兰人：维尔塔宁一家（2人）、列赫基宁（1人）、佩尔托拉一家（4人）、贝利休（1人）、托柯伊（1人）、许尔斯葵木尔杰一家（2人）。维尔塔宁是芬兰语广播电台的责任编辑，列赫基宁是一家报纸的编辑部主任，佩尔托拉是这家报纸的主编，托柯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员。[②] 1933年，在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共居住着10个人。他们是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A. P. 斯特罗明和妻子、弟弟、两个孩子、家庭女仆、斯特罗明的近亲A. A. 比留科夫。还有3个与斯特罗明在职业上有密切关系的单身汉：A. И. 特罗伊茨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分局的局长助理，B. C. 叶夫多基莫夫是那个分局的办事员，П. K. 雅科夫列夫是军人。这套公共住宅的所有住户是那么“情投意合”，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红色街44号楼5号住宅搬到26/28号楼的，也是在同一天——1935年9月19日一同去莫斯科的。[③] 基洛夫的邻居P. T. 马齐耶夫斯基是“红色维博尔热茨”工厂的钳工，他和妻子E. A. 帕夫洛夫斯卡娅－马齐耶夫斯卡娅都是反对派成员。1934年，帕夫洛夫斯卡娅的亲戚、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反对派领导人П. A. 扎卢茨基和1934年前由于参加反对派被流放的Я. 拉比诺维奇，他们邀请马齐耶夫斯基一家居住到自己的住宅里。[④]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公共住宅与普通百姓有着“质”的不同：首先，领导干部的住宅非常宽敞，他们是真正自愿而非强迫性质的与人共居。大多是一些共性的特征，如相同

①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6.

②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5.

③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5.

④ АФСБ. д. № П－33614, л. 217, 219－219об., 229－229об。转引自 *Измозик В. С.*, *Лебина Н. 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с. 106。

的工作性质、相同的政治信仰等将住户联系在一起，绝不是和素不相识、毫不相关的人共同居住。其次，公共住宅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是普遍的、主流的居住形式，而 1920～1930 年代的城市居民则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

综上所述，如果说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已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那么到 1920～1930 年代，尤其是 1930 年代，这种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官民之间的住房差距越来越大，可谓泾渭分明。然而，这种差距还不是最大的。当我们走出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来到领导干部豪华奢侈的世外桃源——别墅时，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横亘在官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三　别墅：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世外桃源

提起别墅，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总是要与美丽、富贵、豪华甚至权力联系起来，绝非人人可以拥有的东西。而在苏联，由于地大物博，土地近乎可以无偿使用。因此，居民除在城市有住房外，还可以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作夏季避暑之用。[①] 可以说，别墅是苏联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普遍拥有的住所。因此，本文也将别墅作为一种住房类型进行考察。与别墅的“普遍性”并存的是巨大的“差异性”。依笔者看来，可以将其粗略分为“贵族别墅”和“平民别墅”两种类型。本节就分别对这两类别墅进行介绍。

同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的。官位等级高的人在郊区得到房屋或者在克里木、高加索得到讲究的别墅，官位等级较低的人在疗养区没有自己的别墅，只能去部门疗养院和休养所。1920 年代，夏季去国家别墅或者疗养院是党—国家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习以为常的事情，这项制度随着斯大林专制体制的建立得到巩固。[②] 同住房一样，这些别墅都是属于国家的，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只需交纳很少的房租。

---

① 高晓慧：《“住”在俄罗斯》，《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3 年第 2 期，第 49～50 页。

②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在莫斯科，所有的国家别墅，包括南方的疗养区，都位于莫斯科近郊通向鲁布列沃—乌兹别尼公路的美丽的森林地带。别墅村有内部特供商店、特供食堂、电影院、图书馆、运动场。

别墅多是由沙皇时期有名的地主的庄园改造而成的。比如，革命前一位著名的石油企业家祖巴洛夫的住宅就被改建为斯大林、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别墅。C. 阿利卢耶娃写道："祖巴洛夫一家在巴库和巴统拥有几处炼油厂。我父亲和 A. И. 米高扬都熟悉祖巴洛夫这个名字，他们在 20 世纪初就在他家的炼油厂领导过罢工，还在工人中组织过工人小组。革命以后，1919 年，当有可能使用莫斯科郊外许多被丢下的别墅和庄园时，父亲和 A. И. 米高扬都想起祖巴洛夫这个名字来了。A. И. 米高扬一家和孩子、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别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都迁进了当时称之为祖巴洛沃二村的那幢房子，而我们父母则住进了邻近的较小的祖巴洛沃四村。"①

H. A. 米高扬和 C. 阿利卢耶娃都在回忆录中介绍了米高扬的别墅。H. A. 米高扬写道："别墅是用红砖建造的，哥特式城堡的风格。三个方向都有大理石台阶铺就的门。半圆形的大理石台阶通到二层，地下室也是大理石台阶铺就的。有前厅和大厅，墙壁都用美丽的浸染的柞木包上，大厅挂着怀抱婴孩的圣母像，画框是意大利做工的大理石框，通向二楼台阶的墙上是风景画，台阶末端通往二层的墙壁用巨大的法国织花壁毯包裹着。一层和二层都是大理石壁炉……台球室里两个墙角的窗户镶嵌着柔和的彩色绘画。用浸染的柞木装修的餐厅装有老式不透明水晶玻璃吊灯，墙上挂着高脚盘和大碟子。雕花的酒柜一直顶到天花板。别墅有两扇通向服务员房间的门，有一扇通向走廊的后门，还有一扇通向院子的门，院子距离两层的厨房只有几步，厨房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一切都是那么舒适、宽敞、美丽。" C. 阿利卢耶娃的回忆与上述内容基本吻合："A. И. 米高扬的别墅至今还保留着它那主人丢下家流亡国外时所留下的那个样子。花厅里摆着一个主人心爱的大理石雕的狗；屋内陈设着当年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雕像；墙上挂着古老的巴黎织花戈白林挂毯；楼下房间的窗子是用彩色玻璃镶嵌成的图画。小花园、大花园、网

①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29～30 页。

球场、暖花房、温室、马厩都和原来一样。每当我到这位善良的老朋友的亲切的家中时，总是十分愉快。你一走进那间古色古香的餐厅，那里老是摆着那雕花的酒柜，挂着老式玻璃大吊灯，一个座钟也老是摆在壁炉上。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的十个孙儿孙女都在房前房后的草地上嬉戏，然后就在这个桌上进午餐。"①

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别墅也是非常豪华的。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②

斯大林在祖巴洛沃四村的别墅与众不同，它经常根据主人的爱好进行改建。C. 阿利卢耶娃写道："祖巴洛沃原是一个偏僻、荒芜、长满杂草的庄园，这所房子很阴暗，有着尖屋顶，摆满了古老的家具。我父亲将它改造成阳光充沛、收获十分丰富的园地，有花园菜园，盖起各种各样的有收益的房舍。原先的宅邸进行了改建，那哥特式高屋顶被拆掉，房间重新作了设计。古老家具拉走了，只在楼上妈妈的小房间里留下了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高大的穿衣镜，镶着金边，雕花的镜脚也是镀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母亲和父亲住楼上，孩子们和外祖母、外祖父以及来往的客人住楼下……"③

十月革命前，莫斯科的富人在近郊的乌索沃村建设了讲究的别墅，1930 年代那里成为政府别墅区。别墅是从鲁布列沃—乌兹别尼公路的岔道口开始的，这条公路向右通向森林，森林后面就是莫斯科河。在这片森林里有几套别墅，一套在 1937 年前属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卡拉汉，后来Л. П. 贝利亚在此居住。距离这套别墅不远是朱可夫元帅的别墅。而在波尔河的对岸，是官位稍微低一些的官员的别墅村。④

①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30 页。

②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③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38～39 页。

④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除了使用或改建原有的别墅外，莫斯科在 1930 年代中期还新建了许多专门的别墅村和疗养院供领导干部夏季休息和疗养。比如，建筑师梅尔让诺夫 1934 年在孔策沃专门为斯大林建造了一栋别墅。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地，不久就种上了一片树林，挖通了沟壑，堆成丘陵。这是“一幢现代化的轻巧的平房，它安卧在花园、森林和一片繁华之中。整个房顶是一片宽敞的、作日光浴用的平台……”后来这栋别墅按照斯大林的计划不断改建：“不是嫌阳光太少，就是需要在阴凉处有个平台。如果是平房，那么就再增建一层；如果是二层楼房，那么，就拆掉一层。”[①] 梅尔让诺夫还为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在南方设计和建造了好几处别墅。按照约凡建筑师的设计，距孔策沃不远建造了“巴尔维哈疗养院”。喀山第一书记拉祖莫夫，按照一座已成为党的工作人员高级休养所的私宅的标准，为自己建造了一栋别墅。随后，城市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利用从其他的款项中非法挪用的钱和地方工业领导人从自由资金中拨出来的钱，建造了一个别墅村。[②]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雅哥达原来是莫斯科地区党的高层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给自己建造了非常豪华的 15～20 或更多房间的别墅。[③]

夏季，精英也喜欢带着全家到索契或者克里木的国家别墅区或疗养院度假。根据贝利亚的指示，1930 年代在加格拉修建了一套别墅。H. 米高扬描写道：“这座建筑在今天看来都是建筑思想的典范。这是一座建立在简洁和严整的形式上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建筑：一层是一个通向凉台的大餐厅，带有威尼斯的落地窗户。凉台的另一边是客人的两个卧室和厨房、卫生间……房子建在山上，我们通常都是乘车去海边。岸边是隔开的一段海滨浴场，这个浴场是属于这栋别墅的，有小船和兽皮艇。当贝利亚搬到莫斯科时这套别墅分给了他。”[④]

许多国家别墅区都设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这里的墙壁和

---

①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22～23 页。

②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 город, с. 123.

③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 город, с. 123.

④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屋顶总是那么明亮。从上到下挂着一串串葡萄，成熟的浆果、梨、柠檬。在小畦躺着带小刺的黄瓜、浅淡的茄子、正在发红的番茄"[1]，由园丁培育它们。斯大林更喜欢自己动手改造园林。C. 阿利卢耶娃写道："我父亲立刻就把房屋周围的树林清理了，砍掉了一半树木，腾出了一片空地，房子变得比较明亮、暖和，也不那么潮湿了。林子也进行了清理，并加以维护，春天把枯树叶子耙净。我家门前有一处美丽的明快透光的白桦幼林，一片洁白。我们这些孩子就在这片林子里采蘑菇。不远的地方办了养蜂场，蜂场旁边的两块空地，夏天种上荞麦，供蜜蜂采蜜。那挺拔的干爽的松树林的四周留出空地，这些空地也精心地进行过清理，长着草莓和黑覆盆子果树丛，这儿的空气分外新鲜而且芬芳……他把大片土地种上果树，种上许许多多的草莓、覆盆子、黑豆树。离我家稍远有一小块长着灌木的空地，用铁丝网圈了起来，里面养着火鸡、野鸡和珍珠鸡；鸭子在小水池里游着。这一切都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逐渐繁荣起来、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实际上是在一个小小的地主庄园以及它的农村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们这里每年要割草，采蘑菇和浆果，每年有自家产的新鲜蜂蜜，自己的糖醋泡菜，自己养的家禽……我母亲只关心房前的大丁香树，只要每年春天能繁花满枝就行了。她还在阳台旁边种了一整排茉莉花，还让人给我搞了一个小园子，保姆教我挖地翻土，种上旱金莲和金盏花。"[2]

领导干部喜欢在闲暇时看电影，夏天几乎每个晚上都看。疗养院设有电影院；新建的国家别墅都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房间；未经改建的、没有专门放映间的别墅，则将屏幕悬挂在最大的房间的墙上，通常挂到台球室的墙上。例如，米高扬在比楚尼特的别墅通常每周日都放电影。屏幕挂在台球室的墙上，在凉台旁的大厅后面有一个放映室。放映厅非常宽敞，除全家以外还可以容纳几个客人。[3] 此外，所有的国家别墅和疗养院都设有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和浴室。几乎所有人的休闲方式都是

---

[1]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2]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31 ~ 32 页。

[3]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一样的：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①]

国家别墅和休养所拥有庞大的服务机构，一律由国家负责开支。例如，雅尔金“红星疗养院”，每月有担任负责职务的 53 名领导人在此休养。疗养院共有 95 名服务人员，仅医务工作者就有 20 名，包括 4 名医生和 16 名女护士。[②] 1930 年代初期以后，领导干部的家具、饮食、劳务等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支付。C. 阿利卢耶娃也写到这一问题：“我母亲没有享受过像后来这种毫无限制的用公款建立的豪华生活。这一切发生在她死后。这时我们家已经公家化了，军事化了，管理我们家务的是国家保安部的全权代表。妈妈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正常而朴素的。”[③] “主要的是我们家的管理制度完全改变了。以前是母亲自己随意从什么地方挑选人，她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挑选什么样的人。现在家中的服务人员都是公家派来的领国家工资的人。于是工作人员或服务人员（现在如此称呼，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仆人）的编制猛增起来。每个别墅里都出现了警卫长、警卫队（警卫队又有自己专门的首长），两名厨师，每天轮流值班，两班清扫人员和餐厅服务人员，也是分班轮换。这些人都是由专门的干部处选派来的……国家的‘服务人员的编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起来，绝非我们一家如此，其他政府成员，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家中都是一样……从实质上说，这一制度到处都是一样：完全依靠公家开支用度，由国家工作人员来管理，而住在这个家里的人都生活在日夜不断的警惕的眼睛的监视之下。这个制度是 30 年代初期在某处出现的，后来从规模和权限上都日益巩固和发展。”[④]

与豪华、奢侈的人间天堂——“贵族别墅”相比，普通群众的“平民别墅”则显得太寒酸、太简陋了。平民别墅就是在郊外靠近河流和森林的地方搭建的木制房屋，有平房，也有二层小楼。平房一般为“人”字形屋顶，便于大雪的滑落和融化。二层小楼的屋顶一般为苍穹顶型，呈半圆

---

①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②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 82，оп. 2，д. 1437，л. 123。转引自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 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 – 30 – е гг。

③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37 页。

④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39 ~ 141 页。

形。绝大多数别墅没有上下水，用水要到路边或村边的手压水井去打。别墅四周有木栅栏围起的一个小院子，种植一些果树、蔬菜和花木。[①]

综上所述，我们对“贵族别墅”和“平民别墅”的差别一目了然：前者多属西方风格的砖质房屋；后者是一层或两层的木质房屋。前者是现代化的建筑，豪华的装修，名贵的甚至多是进口的家具；后者连上下水都没有，需要去井里打水。前者休闲娱乐设施齐备，如运动场、游泳池、电影厅、温室、马厩、日光浴场，还有许多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免费服务；后者根本不要奢望会拥有这些设施。一句话，“贵族别墅”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里面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官民在别墅生活上的巨大差距难以衡量，这是横亘在官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通过对 1920～1930 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三种住房类型的考察，本文得出结论如下：①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开始出现了住房特殊化，但是与普通群众住房的差距还不是很明显。从 1920 年代上半期开始，领导干部与群众的住房差距逐渐拉大。到 1930 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的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由此可以认为，从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苏维埃领导干部享有住房的特权是在逐步扩大。②从经济收入来看，在 1930 年代之前，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很小。[②] 而该时期二者在住房方面已经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暂时可以推断，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住房方面开始的，大约是在列宁晚期和斯大林时期出现的。[③] ③1931 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④] 从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特殊化也呈扩大的趋势。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从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

① 高晓慧：《“住”在俄罗斯》，第 50 页。

②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 181 页。

③ 1920～1930 年代干群之间的经济差距主要表现在工资、住房、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等方面。在工资方面已有学者做出了结论。因此，如果再能补充对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方面的研究，可以最终得出一个更为客观的结论。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 174～175 页。

④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 182 页。

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至少说明，斯大林时期在缩小干群经济差距方面做出的努力是不够的。而这不能不对后来苏联领导干部中形成特权阶层，甚至于对苏共的衰亡、苏联的解体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怎么产生的？影响有多大？还有待于今后挖掘更多史料进行实证研究做出结论。

由对抗到承认：1917～1933年的俄美关系

黑龙江大学　沈莉华

1917～1933年俄美关系（从十月革命到苏美建交）是俄美关系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国外，很多研究俄美关系的学者力图通过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深入研究，来阐释为什么俄美两个大国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外交关系封冻多年以后，又是什么原因使两国关系峰回路转，走上缓和、合作的道路，以及两国这一时期的关系与冷战的传承关系。遗憾的是，由于长时间内没有外交关系，二战结束后，苏美又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双方学者难有机会广泛接触保存在对方国家的档案材料，加之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对抗，很多学者从本国政府的立场和国家利益出发来评述两国关系，其结论往往不够客观，甚至存在明显的偏见。冷战结束后，这种状况得到很大改观。最近几年，国外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史学界出版了不少关于1917～1933年俄美关系的档案文献、著述[1]，对涉

---

[1]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Н. Ш.*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 – 1923 годах: конфликт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199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6. *Корнилов Маскалова* (*отв. ред.*)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рала в XX веке, Т. I, 1900 – 1928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Академкнига, 2000. （转下页注）

及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研究。譬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近现代史》杂志主编谢瓦斯佳诺夫从1996年开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有关1917～1933年俄美关系的档案文献4部，其中经贸关系文献2部，政治关系2部。[①] 2004年底谢瓦斯佳诺夫还出版了俄美关系的专著——《莫斯科与华盛顿：通往承认之路》。[②] 与冷战时期相比，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史学界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研究都有了长足进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客观事实，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结论渐趋一致。尽管如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两国学者仍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难以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考虑到中国目前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作为对俄美关系很感兴趣的第三国学者，笔者希望利用手中掌握的最新档案资料特别是俄文资料，实事求是地对这一时期的俄美关系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探讨冷战的起源，以及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我们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接上页注①）*Мальков В. Л.* Вудро вильсон и новая Россия（февраль1917 – март1918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 6. 2000, №1. *Будницкий О. В.* Б. А. Бахметев-посол в США не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6. *Лапшина И. К.* дядюшка сэм: Партнер или враг? образ США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прессе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1920 – х годов //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0,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1. *ИванянЭ. 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Сафронов В. П.* СССР, США и японская агре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1931 – 1945гг, Москва: Ини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1. *Дэвис. Д., Трани. Ю.* Перв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аследие Вудро Вильсона 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ерия архив, Пер с англ,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Нежинский Л. Н.* В интересах народа или вопреки им?. Совет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17 – 1933 годах,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4. *Лукавышников В. О.*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холодный мир, Москва: наука-проект, 2005.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отв. ред.*）Россия и СШ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00 – 1930,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6.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отв. ред.*）Россия и СШ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 – 1933,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7.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отв.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1918 – 1926,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2002.;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отв.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 – 1933гг,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2002.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 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4.

十月革命后俄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1917年10月25日（俄历），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十月革命及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美国一开始就采取否认和敌视的态度。美国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断言苏维埃政权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崩溃的结局。

美驻俄大使弗朗西斯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伙追逐极端社会目的的激进革命分子。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影响，他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布尔什维克正试图创造一场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并坚决鼓吹以暴力来推进这场革命。现在看来，资产阶级（我、你和所有受过教育的白领人士被划为这一阶级）能否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安全的社会都成了问题。"[①] 国务卿兰辛是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苏维埃政府颁布《和平法令》后，兰辛称其是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因此，"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权，我们就毫无希望。"[②] 威尔逊总统对苏维埃政权更是持否定态度。十月革命后，威尔逊总统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社会主义非常迷茫，或许，它不可能实现。"后来威尔逊又宣称，革命的"毒素"实际上已经渗透到美国这个自由国家人民的血液里。[③]

美国政府如此否定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统治下的苏维埃俄国与美国的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苏维埃俄国主张的公有制在美国就不能得到认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银行、铁路、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等国有化法令。由于该法令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遭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片反对和斥责，他们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神圣原则的公然侵犯。例如，众议院代表米勒把俄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工业企业的措施称之为

---

① E. S. Norman, *War and Rp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1914－1921*,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p. 222.

② 张宏毅：《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第27页。

③ 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产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9页。

“盗窃”。[1] 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国有化条款，也给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在俄国的经济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失。一战以前美国投人俄国工业的资本为6800万美元。[2] 一战期间美国对俄投资逐渐加大，临时政府掌权后，美国进一步增加了对俄国的投资。然而，苏维埃政府企业国有化政策的出台使美国资本家在俄国的投资顷刻间化为乌有。

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根本对立的。美国实行的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是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选举制度和两党制度，而苏维埃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一党执政、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威尔逊总统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3]

其次，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由至上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使其对一切激进的暴力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布尔什维克党是靠暴力推翻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取得政权的。因此，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激进、最具暴力色彩的革命，美国政府公然表示反对。国务卿兰辛这样评价十月革命：“我相信，在野蛮和毁灭生命财产方面俄国革命的恐怖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了合法伪装，而前者哪一样都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头上更可怕的灾难。”[4]

再次，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革命思想使美国政府感到恐惧。一战期间，列宁依据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论断，提出了武力输出革命的思想。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

---

① *Золотухин В. П.*, *Мальков В. Л.*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внутр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США (1917－1920)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7, №10, с. 144.

② *Селезкев Г. К.* Экспанс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ю в 1917году//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4, № 3, с. 137.

③ 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产主义》，第22页。

④ G. F. Kennan, *Russia Leaves the War*,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56。转引自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产主义》，第27页。

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武装起义，必要时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国家。"[①] 世界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种宣传需要，还是其长期的战略选择？关于这一点直到目前俄国史学界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被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试图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世界革命思想不仅使很多美国人深感恐惧，也唤醒了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美国人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感和危机意识。

最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宗教信仰也存在根本冲突。美国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在美国很多人包括威尔逊总统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任何对宗教的攻击和批判都会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和反感。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而马克思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宣扬宗教是鸦片。这种无神论的宗教观必然会招致基督教信徒的不满和排斥，加之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存在排斥其他信仰的倾向。因此，在美国广大基督徒看来，布尔什维克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随即在德国、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地区传播开来。为了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1919 年 3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的成立引起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慌。为了抵制和消除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美国政府很快行动起来，开展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红色大恐怖"（Great Red Scare）运动。[②]

1919 年 2 月 6 日，西雅图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罢工导致工业生产停顿，公用事业和运输业严重瘫痪。西雅图市长奥利·汉森认为罢工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产业工会一手策划的，并声称这次罢工是全国性工人运动的开端。随后，参议院一些委员会和纽约议会开始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调查。2 月 11 日，美国司法部门在西海岸逮捕 53 名外国共产党人，并将其驱逐出境。

从 1919 年 4 月起，美国接连发生几起暗杀州长、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

① 《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 554 页。

② R. P. Browder, *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2.

的事件。有人把炸弹通过邮局寄给许多政府官员，包括西雅图市长汉森、司法部长帕尔默、邮政总局局长伯利森、霍姆斯法官以及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在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家中，装有炸弹的包裹把他的妻子和女仆炸成重伤；司法部长帕尔默的住宅因炸弹爆炸部分受到损坏。美国报刊称这些爆炸事件是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为，因此美国各地很快出台了一些反对暴力组织及其成员的法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宣布，鼓吹使用暴力的组织和成员不受法律保护。一些州议会还通过法律，宣布悬挂红旗为非法，禁止参加鼓吹使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禁止发表煽动叛乱的言论。在1919年，美国共有34个州制定了同样的法律。1920年，又有两个州通过类似立法。[①] 在1919年的一战停战纪念日，华盛顿州森特雷利亚的木材镇爆发了严重骚乱，新组成的美国军团成员袭击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在混战中4名袭击者被杀。事件发生后，警方随即突击搜查该州所有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逮捕该工会1000多名成员。涉嫌参与森特雷利亚事件的11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成员不久以杀人罪被判处长期监禁。美国的报纸以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和耸人听闻的报道来渲染这一事件，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恐慌。

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立法对外国侨民、持不同政见者和共产党人进行严厉惩处。1918年10月16日，国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凡拥护或属于任何主张以暴力推翻政府、谋杀政府官员，或是非法破坏他人财产组织的外侨，劳工部长都有权对其实行监禁或驱逐出境。1920年5月10日，该项法律被重新修订。按照重新修订的法律，对所有判定违反或阴谋违反"间谍法"、"资敌法"等战时法律的外侨，只要在一次审讯后发现他们是"美国的不良"居民，都可授权劳工部长对其拘禁或驱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美国根据外侨法把249名俄国人押解到"布福德"号运输舰上驱逐出境。[②]

1919年11月8日，800名纽约警察对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群众大会进行了突然袭击，数百名工人被逮捕。1920年1月2日，司法部

---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刘绪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75页。

② 德怀特·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宋岳亭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373～374页。

长帕尔默获得了逮捕 3000 名外籍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工党党员的逮捕令。[1] 在他的指挥下，数千名联邦特务和地方警察同时对全国所有共产党总部进行大规模搜捕，约有 4000 人被捕入狱，其中许多是非共产党人和美国公民。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甚至前来探监的人也因被怀疑为共产党而被捕。由于证据不足，约有 1/3 的受害者被无罪释放。

司法部长帕尔默在反对共产党等一切激进分子的大规模搜捕活动中，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保证公民个人自由的规定：不出示搜捕令就对公民进行拘捕；不论外侨还是本国公民，只要参加过激进分子的集会，或在集会场所周围逗留，就被逮捕；居民被长时间关押，却无权聘请律师；公民的私有财产被肆意破坏，根本得不到法律保护。[2]

帕尔默的恐怖行为，引起了美国各阶层群众的愤怒和指责。许多组织和知名人士都纷纷指责上述行动是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3] 为了抗议帕尔默在国内采取的恐怖行动，1920 年 5 月，12 位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系主任庞德和该学院教授费·弗兰克福特联名发表了一份告美国人民书，揭露了司法部长帕尔默滥用法律的严重行为。此后，美国政府虽然未再进行如此大规模针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活动，但针对激进分子的歧视和逮捕行动仍时有发生。

由此可见，由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布尔什维克党政权采取了否定和敌视态度，并在国内对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采取了镇压措施。在外交上，美国也始终避免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在此后不久便参与了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颠覆红色政权的武装干涉

尽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使美国政府本能地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视态度，但美国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

①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 355 页。
② 德怀特·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 年）》，第 375 页。
③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1965，第 71 页。

涉，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打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俄国是协约国战场的主力，承担着在东线战场对德作战的艰巨任务。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将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1917年11月8日，当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呼吁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立即终止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民主和约时，美国和协约国感到极大震撼和恐慌。在苏维埃政府没有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之前，为了阻止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美国极力避免公开批评和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政权，表面上做出与苏维埃政权友好的姿态，并派代表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以防止其倒向德国的怀抱，暗地里却与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合作，通过隐蔽干涉的方式达到其对抗苏维埃政权、促使俄国继续参战的目的。

美国政府把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代表卡列金作为合适人选。1917年12月10日，国务卿兰辛向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利用卡列金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很快得到总统批准。考虑到国内民众激烈反对干涉俄国事务，同时也想造成美国对俄国人民怀有好感的印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掩盖对苏维埃俄国采取的敌对行动。1917年12月13日，兰辛在给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季的电报中指示，名义上由英国和法国向卡列金提供必要的资助，美国则暗地里向英、法支付这笔费用。兰辛还特别提醒佩季，对于美国援助俄国反对派一事必须严守秘密。①

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同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和约的签订使美国和协约国希望俄国继续参战的企图彻底破产了。至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

苏维埃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欧洲战场的局势向不利于协约国的方向迅速发展。俄国退出了战争，绵延2500公里的东部战线不复存在，由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军队集结的长达600公里的西部战线压力大大增加。3月21日，德国与其盟国在西线向协约国阵地发起春季攻势，协约国军队在前线大大受挫。局势的发展促使协约国考虑恢复东线以牵制德国，阻止其从俄国方向调集军队增援西线的可能性。3月23

① *Вильямс В. Э.*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1917 - 1920гг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4, № 4, с. 176 - 177；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36页。

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采取行动，并不断对威尔逊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出兵。除英法等国要求美国出兵干涉外，美国国内也有人对政府施加压力。5 月 16 日，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向政府建议："和以前相比，西伯利亚现在的局势特别有利于美国和协约国的联合行动。如果美国现在还不行动的话，人们对美国的好感显然会降低。"[①] 一些侨民也要求美国政府参与干涉。1918 年 4～7 月，在美国的俄国侨民不断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求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支持干涉俄国。临时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积极开展宣传演说，并私下里做国务院官员的工作，以说服美国政府同意干涉。[②]

在美国政府就是否直接出兵颇感踌躇时，日本方面率先采取了军事行动。1918 年 4 月 5 日，日本以两个本国士兵被杀为借口，派少量军队在海参崴登陆。美国政府始终担心日本借出兵之机独霸俄国远东地区。因此，日军在海参崴登陆后，美国国内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呼声更加高涨。[③] 此时，美国政府还在等待时机，以便为出兵西伯利亚找到一个合适理由。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起义恰好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在苏维埃俄国的奥匈帝国战俘组成，共 5 万人。1918 年 3 月 26 日，该军团代表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作为法国军队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通过海参崴前往西线作战。5 月 26 日，该军团突然举行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由于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胜利令美国和协约国欢欣鼓舞，并使其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推翻。[④]

1918 年 7 月 6 日，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由军政要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并通过了与日本联合出兵的行动计划：日本政府负责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提供轻武器、机枪和装备，由美国分担这笔费用；在海参崴集结大约由 7000 名美军和 7000 名日军组成的武装力量，

① *Вильямс*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1917－1920гг，с. 188.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 17.

③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第 36 页。

④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 15.

以保护前往伊尔库茨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交通线。[①] 1918年7月8日，美国和日本缔结了关于在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共同行动的正式协定。[②] 而在此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已经派15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奥林匹亚"号巡洋舰在摩尔曼斯克登陆，随后美国将摩尔曼斯克的美军增加到5000人。[③]

对威尔逊总统而言，做出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抉择。他担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武装干涉会激起俄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武装干涉与自己此前一向主张的民主、和平、自由和人权的理念相悖，因此干涉不仅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对，也会使美国自身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大大受损；美国将上百万的军队派往欧洲战场，在西伯利亚的干涉主要依赖日军，因此日本有可能借此机会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由于美国对干涉西伯利亚始终怀有矛盾心理，在出兵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和借口，在协约国的一再敦促下，在国内外包括俄国某些主张干涉人士的积极劝说和鼓动下，在迫于日本已经派兵先行进入远东的压力下，威尔逊总统终于做出了出兵的最后决定。[④]

在武装干涉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于军事行动是否与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有关，始终只字未提。191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向国会解释出兵西伯利亚的理由时也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为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使其免受敌军（主要是德奥战俘）消灭的危险；二是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通，消除西伯利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向西伯利亚及全俄居民提供经济援助。对于这样的解释，参议院的议员们和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都表示怀疑。[⑤] 如果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防止盟国在俄国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军之手这样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尚可成立

---

①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年）》，张玮英、曾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第217页。

②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第47页。

③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年）》，第217页。

④ 沈莉华：《试论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2期，第87页。

⑤ *Дэвис. Д.*，*Трани.* Ю. Перв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аследие Вудро Вильсона 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ерия архив, Пер с англ,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 344；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第47～49页。

的话，那么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却没有任何撤军的意图，而是继续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这恰好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尽早垮台。武装干涉时期美国虽然派特使布利特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谈，但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情况，谈判不过是在战场上难以取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当美国和协约国得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前线又展开进攻的时候，谈判自然就不了了之。1919年9月，在美国已经考虑撤军问题时，副国务卿隆格在与从前的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会晤时仍然表示："我们希望援助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在昔日帝国领土上其他任何有能力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1]

为了对抗苏维埃政权，美国和协约国向俄国内各派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1917年12月1日至1920年1月1日，美国共向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各力量派别拨款7730万美元。[2] 在1919年9月5日，美国经高尔察克同意，向邓尼金的军队提供了30万发榴霰弹、7.2万支步枪、23.5万双皮靴、1500包皮革。[3]

在美国干涉军撤出俄国之后，为了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美国增加了对波兰的供应。在1920年上半年内，美国援助了波兰200多辆坦克、300多架飞机、2万多挺机枪和其他武器和服装。[4] 此外，1920年8月，美国"法拉比"号轮船还从纽约向弗兰格尔部队运送了436挺机枪、247.9万发子弹、456捆钢材、3130支步枪。[5]

美国政府对通过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府充满了期待，并幻想在布尔什维克党统治垮台后按照美国的社会制度模式来改造俄国。在援助高尔察克期间，威尔逊总统曾派特使前往高尔察克军队驻地。总统希望高尔察克能明确地保证：一旦推翻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统治，高尔察克政府必须

---

① *Дэвис*、*Трани* Перв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аследие Вудро Вильсона，с. 362.

② *Дэвис*，*Трани* Перв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аследие Вудро Вильсона，с. 369.

③ 别辽兹金：《美国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与参与者》，来新夏等译，三联书店，1958，第151页。

④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Т. Ⅱ，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7，с. 560.

⑤ 别辽兹金：《美国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与参与者》，第198页。

保证土地私有权、民众的选举权和召开立宪会议等。[①]

由于参与武装干涉的各国之间存在矛盾、它们所支持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自身的腐败、美国内反对干涉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民众的英勇抵抗等因素，美国和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固程度远远超出其最初的预料。同时，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很难用武力战胜它。威尔逊对此曾深有感触地说："布尔什维克的侵略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在我看来试图用作战部队来阻止一场革命运动，就像用一把扫帚阻挡大潮一样。"[②]

武装干涉失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今后的对俄政策。鉴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冲突，1920 年 7 月美国政府出台了对苏政策史上的重要文件——《柯尔比照会》，全面阐述了美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方针和政策。照会中说："目前俄国政权并不是建立在大多数俄国人意愿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他们允许召开立宪会议，但并未保证任何具有民众选举性质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尽管数量上仅占民众的极少数，却凭借暴力和阴谋诡计推翻了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政府，夺取了权力和国家机器，并继续依靠这些手段和残酷的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可能承认目前俄国政权的合法性"。照会还说，"苏俄多次宣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及其政权的维持，取决于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包括美国发生革命。它将推翻和摧毁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美国政府很清楚，第三国际是一个公开宣传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的组织。并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宣称，不干涉他国事务的承诺决不会束缚第三国际组织的活动。因此，毫无疑问，第三国际组织将受到布尔什维克党在其他国家可能设立的任何外交机构的庇护和支持。既然布尔什维克党政府决心要而且必然要图谋推翻我们的制度，而这个政府的国际关系概念与美国的国际关系概念、美国的价值观念又是如此大相径庭和针锋相对，所以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政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 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 c. 31.

② 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 237 页。

权，不能承认或友好地接受这样的政府代表，也不能与这样的政府保持官方关系。”①

《柯尔比照会》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苏不承认主义政策的正式形成，成为指导美国对苏政策的总纲领。事实表明，无论是威尔逊政府，还是以后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政府，都遵循《柯尔比照会》原则，对苏联政府采取对抗和不承认的外交政策。

武装干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和平共处时期。在此期间，苏维埃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与美国发展经济联系及外交关系的努力，但由于对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美国政府对苏联希望发展双边关系的要求反应十分冷淡。在整个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未曾放弃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努力，而苏维埃政权对美国政府也始终存在高度的戒备心理。

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

1921～1923年苏维埃俄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严重饥荒。饥荒波及俄国30多个省，受灾人口达到3350万。伏尔加河流域、奥伦堡等省份是这次饥荒的重灾区。② 据统计，仅在灾情严重的巴什基尔地区，饥民人数就达

---

① 武军：《早期美国对苏政策的演变——从不承认主义到美苏建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6期，第23～30页。

② 鲁滨斯坦：《1921～1922年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曹汀等译，成都：时代出版社，1950，第110、111、116页。鲁滨斯坦在这本书中指出："发生饥荒的全部和部分省份有22个，人口有2330万。在未被认定是歉收省份中尚有12个饥馑的省份，连同乌克兰各省的饥馑灾民总数达到3350万人。"对于1921～1922年俄国遭受如此罕见饥荒的原因，很多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冷战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多强调饥荒是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带来的后果；美国和西方历史学家则认为，饥荒的根源在于苏维埃政府及其所实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对饥荒负有直接、不可推卸的责任。苏联解体后，美俄学者多认为饥荒是由包括革命和战争在内的诸多因素导致的严重后果。如俄国学者齐赫拉什维利和美国学者恩格尔曼在谈到饥荒发生的原因时说："到1921年初，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破坏，苏维埃俄国已经满目疮痍，前一年的饥荒干旱、西方的经济封锁、余粮征集制及其类似行为导致粮食资源枯竭。饥荒发生后，由于交通运输遭到破坏，苏维埃政府实际上无法组织有效的粮食救援工作，将粮食从条件稍好的地区向灾区调拨。"参见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Н. Ш.*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 - 1923 годах: конфликт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199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6, с. 192。

106.4 万人，占居民总数的 90%。无以为食的饥民不得不吃猫、狗和马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凄惨景象。饥荒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和敌对情绪。一些农民把共产党员看作是老百姓灾难的根源，对苏维埃政权征收粮食税的政策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在有的地方，由于粮食危机工人对苏维埃政府也产生了不满情绪。[①]

早在 1921 年 5 月，苏维埃政府就已经获知夏季干旱将至的消息。由于预料到饥荒即将到来，苏维埃政府想尽各种办法来收集粮食。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列宁更是整天被饥荒所困扰，苦苦思索着渡过眼前这场难关的良策。5 月 10 日，列宁致电在伦敦的苏维埃商务代表团："给你们下达的购买 200 万普特粮食的命令必须立即执行，不拘价钱多少，无论在何处，请于近日购买一批，哪怕是数量不多的一批。"另据克拉辛回忆："当我 1921 年夏天从伦敦回到莫斯科，来到列宁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他处于不安的情绪中。他老是望着酷暑、炎热的天空，显然他是在期待着，渴望已久的云儿何时才会出现。而且，他不断地问我：'我们是否能够从国外购买到粮食？协约国是否允许运粮食到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亲自关注每一艘从国外来的轮船，简直是用电报和信函来轰炸我们：'切望做到所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以便更快地救济灾区。'"[②]

严重的饥荒迫使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1921 年 7 月 23 日，美国的报刊上出现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于 1921 年 7 月 13 日向"有良知的人们"发出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由于歉收，千百万的俄国人正面临饥饿的威胁。因此，高尔基呼唤所有有良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来用粮食和药品帮助他们。[③] 列宁也在 1921 年 8 月 6 日《真理报》上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并向欧美各国政府发出专函，请求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向苏维埃俄国提供粮食援助。对于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怀有复杂、矛盾心理。一方面，十月革命后美国和协约国直接参与了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武装

---

① 参见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с. 192; *Корнилов Маскалова* (*отв. ред.*)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рала в XX веке, Т. I, 1900－1928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Академкнига, 2000、с. 329－330、377－386。

② 鲁滨斯坦：《1921～1922 年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第 110～111 页。

③ *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21.

干涉。武装干涉虽然失败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在这样背景下，呼吁西方国家向苏俄提供援助很可能为其从事反苏维埃政权活动提供可乘之机。早在1920年，列宁在谈到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时就曾指出，“不要指望富有者——资本家的援助。目前统治世界的英、美、法等强国资本家们虽然向我们表明，他们愿意援助我们的饥民……但他们想利用饥馑来消灭我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自由，永远夺取工农手中的政权。”[①] 另一方面，面对千百万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凄惨景象，苏维埃政府又渴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

美国方面很快对苏维埃俄国的请求做出回应。美国救济总署同意对俄国饥民开展救援工作。美国救济总署是一个慈善机构，成立于1919年，由赫伯特·胡佛负责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向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的居民、特别是儿童和老人提供援助。美国政府虽然称它是一个非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但这不完全与该组织的真实情况相符。该组织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就希望利用它对欧洲国家的粮食援助来达到遏制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目的。1919年1月11日，威尔逊总统在谈到美国救济总署向欧洲国家提供粮食援助的目的时曾经指出：“粮食援助是解决目前欧洲局势和和平问题的关键，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向西方推进，它已经席卷了波兰，并正在向德国蔓延。虽然武力不能阻挡它，但是粮食援助可以阻止它。”在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时期，美国政府也曾试图通过该组织对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粮食援助来达到反苏维埃政权的目的。[②] 显然，美国政府也希望借饥荒援助的机会来对苏维埃政权施加影响。

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前，苏维埃俄国与美国救济总署就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救济总署提出条件，要求苏维埃政府尽快释放关押在俄国的美国人（在苏维埃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他们被称作俘虏——作者注）。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感和不信任，美国救济总署还提出粮食援助范围不包括军人和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要求其工作人员在苏维埃俄国享有治外法权。为了获得境外的粮食援助，苏维埃政府违心地接受

① 鲁滨斯坦：《1921～1922年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第162页。

② 胡佛是共和党政治家，曾任哈定和柯立芝政府的贸易部长，1929～1933年任美国总统。他曾任道胜银行经理，在俄国有大宗存款。关于美国粮食援助的动机参见 *Березкин А. В.*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ША 1917－1922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7，с. 243。

了上述条件。[①]

1921年8月20日，苏俄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里加签订了救济饥民的条约。条约签订后不久，美国救济总署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就已运抵俄罗斯。为了救济灾民，在整个饥荒期间美国救济总署共募集资金6600万美元。截止到1922年7月1日，即在饥荒最严重的日子里，美国救济总署共向俄国运送了788878吨物资，其中包括粮食、大豆、豌豆、罐装牛奶、糖、奶油、可可、药品和服装等；救助饥民总数855万人，其中包括325万名儿童和530万名成年人。[②] 另据苏维埃政府统计，美国救济总署曾向俄国48.5%的饥民提供过粮食援助，并向俄国多家医院和保育院提供过药品援助。正是因为有了美国救济总署的粮食和药品援助，才使千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俄国饥民摆脱了疾病困扰和死神威胁。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和对立，苏维埃政府对外国救援机构在俄活动始终怀有高度的戒备心理，担心这些机构在俄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1921年12月斯大林对外国救济组织的谍报活动发出警告："不要忘记，充斥俄国的商业和其他代表团在与俄国做买卖、救济俄国的同时，也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谍报机关。"[③] 1922年5月俄共（布）乌法省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在声明中也指出："美国救济总署为白卫分子破坏苏维埃政权、从事反革命活动提供了场所。"[④] 正是因为相互间缺乏必要的信任，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合作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摩擦。

按照里加条约，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俄方雇员。这一点常常引起苏维埃政府的不安，担心因此会失去对美国救济总署

---

① 就胡佛提出的尽快释放美国俘虏作为援助苏维埃俄国的条件一事，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1921年8月3日在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信中说："我认为，既然原则上决定释放美国俘虏，即使我们尽快释放他们，也不会损失什么。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已经被法庭判刑的叫基里的人。应当说为了援助饥民我们采取了非正常步骤，违反法院的判决释放了判处一定刑罚的犯人。还需要指出，基里的罪行是他滥用我们对他的信任。因为我们曾对他说，可以随便看一看，而他利用这一点来为美国政府搜集情报。"参见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отв. ред.*）Россия и США：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00－1930，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6，с. 213。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отв.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1918－1926，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Материк，2002，с. 233－235.

③ 鲁滨斯坦：《1921～1922年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第127页。

④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ях в начале XX 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5，с. 397.

在俄活动的有效监督。美国救济总署通常喜欢吸收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俄国知识分子来为其工作，但是这样的人数量有限。十月革命后大批的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和医生离开了俄国，剩下的很多人遭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排挤和镇压。由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充满恐惧、害怕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和与外国资本有瓜葛等原因，很多俄国人拒绝为美国救济总署工作。[①] 但是，救济总署的地方机构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在这些地方机构中的很多俄国人是贵族和小市民出身。由于这一点和其他原因，苏维埃权力机关指责美国救济总署在吸收俄方雇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知识和经验，结果让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更富有阶层的人获得了这份工作。

苏维埃地方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时候还干预救济总署的工作。1922年11月4日，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总负责人哈斯克里向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兰杰尔[②]反映：救济总署决定在喀山设立露天食堂，但当地的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却拒绝提供开办食堂的资金。而根据里加条约的规定，美国救济总署有权决定食品供应的地点，苏维埃政府必须负担这些食品供应点的费用。于是，哈斯克里向兰杰尔表示，如果苏维埃方面不能为成立露天食堂提供资金的话，美国救济总署将停止在当地发放救灾食品。[③] 通常，类似这样的事件因美国救济总署以停止当地的救援工作相威胁都会很快得到解决。

当然，苏维埃权力机关无法对在外国机构中工作的俄方人员完全不受它们的约束无动于衷。1922年夏，兰杰尔要求美国救济总署承认苏维埃工会对其俄方雇员的监督权，理由是：75%～80%的俄方雇员都是各工会的成员。这就意味着，美国救济总署应当承认当地的工会委员会有权代表这些劳动者的利益。此外，兰杰尔还要求美国救济总署在招收和解雇俄方工作人员时应向他个人通报。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西罗尔·克文则认为这些要求与里加条约不符，予以拒绝。[④]

---

① ГАРФ（俄联邦国家档案馆），ф. 1058，оп. 1，д. 803，л. 28－30、43－26、51－52。

② 兰杰尔在1922年夏初被任命为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而此前这一职务由埃杜克担任。

③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отв. ред.*）Россия и США：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33，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7，с. 66.

④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1923 годах，с. 199.

逮捕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是苏维埃政府反对该机构在俄国享有特权的明显表现。1922年春，在萨马拉的8名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被苏维埃方面逮捕。当美国救济总署就逮捕俄方雇员的原因提出质询时，苏维埃方面表示，这些人是社会革命党成员。考虑到美国救济总署对此事的不满，苏维埃政府只好做出让步：签署逮捕救济总署俄方雇员命令的、苏维埃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萨马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萨夫金被解除职务。[①]

1922年2月，苏维埃方面逮捕了察里津省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人员阿尔扎马斯采夫，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理由是其在1919年曾支持过察里津的白卫分子。美国救济总署在察里津地区的负责人博乌坚向当地权力机关表示，逮捕阿尔扎马斯采夫违反了里加条约的规定，在其未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前，美国救济总署将终止对察里津的救灾工作。[②] 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埃杜克1922年2月18日在给哈斯克里的信中情绪激动地指出："博乌坚先生的行为与其作为你们和美国人民的代表所担负的伟大使命和义务并不相称。"[③] 哈斯克里通知埃杜克，他将临时中断察里津的工作。加米涅夫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对此表示抗议。哈斯克里则答复说，美国救济总署并不打算保护犯罪者或反革命分子，但是从今往后将反对地方权力机关未经批准擅自逮捕和恣意行动，因为这将妨碍救济灾民的组织工作。由于担心被苏维埃权力机关逮捕，在察里津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根本不敢为美国救济总署工作。

1923年救济总署在苏联的活动结束后，苏联政府逮捕了几百名曾在美国救济总署各地区分部工作过的俄国人，指控他们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和金钱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苏维埃方面称这些被逮捕的人早就处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监视之下，只是对其逮捕推迟到救济总署的工作结束之后。逮捕美国救济总署从前的俄方雇员引起胡佛的强烈愤慨。《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后来曾就此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一开始我理解他的愤怒，但很显然，在美国救济总署雇佣的8万人中有不少滥用自己的地位从事国

①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1923 годах, с. 200.

② ГАРФ, ф. 1058, оп. 1, д. 803, л. 1－5、9－10、16.

③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1923 годах, с. 199.

家政治保安局认定的犯罪行为。”①

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行为都与其在俄国的崇高使命相符。在克里木，当地的居民特别是鞑靼居民对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印象欠佳。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还要求苏维埃方面为其提供别墅，他们不愿用普通的碟子吃饭，想喝陈年的葡萄酒和香槟。②

1922 年圣诞前夕，美国救济总署的一些工作人员试图通过走私将珍宝、皮毛和艺术名画偷运出境。由于这些物品在苏维埃海关通常要征收很高的出口关税，所以他们把这些物品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外交邮件放在一个箱子里，严重违反了苏维埃海关法律。苏维埃方面曾当着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克文的面打开箱子，结果证实了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从事走私活动的猜测。经过调查，克文很快开除了其手下的 5 名工作人员。苏维埃政权利用这一事件指责在俄国的美国人“贪财”、“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消息报》上还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他们如此援助！》。文章中说，走私事件是“文明”的美国人在“不文明”的俄国行为的典型事例。对于《消息报》这篇评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兰杰尔在秘密报告中曾遗憾地指出：“在《消息报》发表有关走私的报道后，我们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③

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援助的目标上也发生了分歧。到 1922 年秋，俄国各地的灾情得到了缓解。苏维埃政府此时最关心的是如何恢复经济，而不是单纯地给饥民提供援助。用加米涅夫的话说，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改良耕地、改造运输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歉收现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地养活一些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在下一年到来之前饿死。而美国救济总署对援助目标的看法却与苏维埃政权存在明显差别。从一开始，救助饥饿人群就是美国救济总署前往俄国的主要目的。在美国救济总署的官方声明中

---

① *ИванянЭ.* 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с. 30。这名记者在文章中指出，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为 10 万人，但我们从俄美经济贸易关系的档案文献中证实这一数字为 8 万。参见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Россия и СШ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 – 1933, с. 65。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Россия и СШ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 – 1933, с. 62.

③ ГАРФ, ф. 1058, оп. 1, д. 154, л. 24、18, Известия, 16 дек 1922г..

曾经指出："援助将只提供给饥饿的人群。"胡佛也曾经说过："任何恢复俄国经济生活的建议都应受到批评。"当两个农业公司的董事长给胡佛写信，希望通过他领导的美国救济总署向俄国供应拖拉机时，胡佛回答说："我的组织从来没有做过向苏维埃国家提供拖拉机和其他技术的生意。"显然，美国政府反对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任何旨在恢复其经济的援助。①

1922 年秋，苏维埃政府声明，俄国的饥荒已经基本消除，同时宣布了与饥荒造成的后果作斗争的新方针。新方针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工业和农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2 年 9 月 12 日的决定，救助饥民的中央委员会被改为与饥荒后果作斗争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工作方针的改变，使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复杂起来。②

当美国政府了解俄国决定向国外出口粮食后，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加米涅夫称，俄国出口粮食的数额并不大。但是对于出口粮食的这一做法在苏俄国内就有人提出异议。例如，在国内一家刊物上有人提出："不能靠饿着我们俄国人的肚子来发展粮食出口。"在后来一次部门会议上，中央统计局的代表波波夫也提出："如果我们把一部分粮食运到国外，同时又从国外得到慈善救济，这样的做法不太合适。"③

对于苏维埃出口粮食，美国方面的反应更加强烈。胡佛和哈斯克尔表示，俄国出口粮食使美国救济总署的援助面临着危险。美国的报纸上用大标题醒目地写着："用武力和狡猾的阴谋赢得和平，这就是红色俄国人的把戏吗？""俄国一边要救济、一边卖粮食"，"苏维埃卖了很多粮食！"④ 1923 年春，美国救济总署决定离开俄国。5 月末，美国救济总署向苏维埃政府正式通知了这一消息。到 1923 年夏，该组织的所有美方工作人员全部返回了美国。

在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无法否认，美国政府在对俄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背后，暗含着一定的政治动机，即：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俄国发生严重饥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之机，

---

①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 - 1923 годах, с. 203.

②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 - 1923 годах, с. 203 - 204.

③ ГАРФ, ф. 1058, оп. 1, д. 187, л. 11.

④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 - 1923 годах, с. 205.

通过粮食援助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尽早垮台。

早在1919年3月，胡佛在致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就提出了有关利用粮食援助来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计划。胡佛认为，“革命的钟摆还要向后，向某个适中的位置摆动”，国际武装干涉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同意这种干涉，士兵们也不能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感染”。所以，他建议向苏俄派遣“中立”的委员会以组织粮食干涉。因为“这样一来就有时间来决定……俄罗斯人民本身是不是要向后摆动，趋向中庸之道。而这些思想（此处指布尔什维主义——作者注）就会不攻自破”。可见，胡佛认为对俄国的援助是“保证共产主义崩溃的最好方法”。[①]

关于美国援助苏俄饥民的政治动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并不讳言。例如，1921年12月美国国会在讨论拨款2000万美元来援助苏维埃饥民的法案时，参议员肯翁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捐赠，也是一种坚定的经济政策。我们缓解了国内局势，同时也排除了我们纯粹的慈善活动的性质。”另一名议员罗格尔斯也认为：“众议院很多议员担心，援助法案将对正在灭亡的布尔什维克制度提供帮助。显然，他们的担心是自然的，但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果说等待做出决定的法案有某种政治意义的话，那么它将迫使布尔什维克制度更快走向灭亡。”[②]

尽管苏维埃政府在1923年7月10日专门通过决议，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救济总署对俄国饥民提供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通过美国救济总署向其提供的援助”。但是在私下里，苏联官方却对美国援助俄国的真正动机持另一种看法。在目前已经解密的1921年10月17日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息公报中说：“……美国政府支持胡佛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让俄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同时把大规模援助饥民的活动当作反苏维埃制度的一种宣传，顺便利用胡佛的人员来搜集和扩充他们所需要的俄国情报，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美国政府和胡佛试图利用胡佛的组织及其在俄国的间谍达到其直接的反革

① 鲁滨斯坦：《1921～1922年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第116页；*Иваня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с.165。

② Буржуаз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Ш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омощи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66，№ 4，с.175.

命目的。”[1]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没有实现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愿望，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只是到3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美才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暂时搁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峰回路转的苏美关系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作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为40%，但到1933年末，美国的工业产量却仅相当于1929年的65%。在美国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市场需求几乎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同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高筑关税壁垒，极力抵制美国商品涌入，致使美国对外贸易大幅滑坡。与1929年相比，1932年美国的出口额减少了69.4%，进口额减少了69%。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美国迫切希望寻求和扩大商品销售市场。[2]

正在美国遭受惨重经济危机之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以资本主义国家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发展。到1932年，苏联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的工业产量大大增加，并先后建起了一批大型重化工业企业。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工业设备需求强劲，成为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最大买主。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30%，到1932年这一比重上升为50%。1929～1933年，苏联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的外汇开支达60.1亿卢布。[3]

美国是苏联机器和设备的主要提供者之一。1929～1930年，美国有36个州的几百家企业参与制造苏联的订货，尤其是威斯康星州、伊利诺斯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据统计，1931年苏联所购买的美国机器设备约

---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18－1926、с. 197.

②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146～147页。

③ 梁士琴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周邦新译，三联书店，1982，第399页。

占美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50%。[①]

苏联不仅是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重要的原料供应地。锰、镍、铅、铬等是美国奇缺的矿物原料，国内几乎不能生产，主要依赖进口。1929年美国所需的锰矿有一半以上是从苏联进口的。[②] 除矿物原料外，美国还需要进口苏联的锯材、羊毛、小麦等商品。与其他国家相比，苏联供应的商品不仅质量较好，而且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

尽管如此，由于没有外交关系，美苏两国的贸易关系极不稳定。首先，苏联很难得到美国提供的长期贷款和签订长期的贸易合同。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苏联欠美国的债务问题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美国许多大银行都不愿意向苏联提供贷款。在银行严格限制提供贷款的条件下，美国公司很难接受苏联的订货。它们通常只接受苏联的现金支付方式，而避免接受苏联的汇票，因为银行对苏联的汇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即使一些公司可以为苏联的订货提供贷款，但贷款条件十分苛刻，贷款利率很高。其次，美国国内反苏势力的宣传活动也给两国贸易关系带来不小的阻力。1930年3月24日美国保护宗教和少数民族权力委员会通过决议。决议声明，如果苏联不停止在国内破坏教堂和迫害信仰宗教的人士的行动，美国将不会承认苏联。1930年2月罗马教皇还公开号召对苏联进行“十字军”征讨。美国劳联负责人还指责苏联驻美机构——苏美贸易公司暗中支持美国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为这种活动提供拨款。苏美贸易公司因为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而得不到司法保护，美国很多贸易公司和银行都避免与其直接进行联系。

在两国贸易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胡佛政府从顽固的反苏立场出发，对苏联的出口采取了许多歧视性措施，致使苏美贸易关系严重恶化。美国指责苏联按倾销价格抛售商品，并据此对从苏联进口的许多商品征收反倾销税。被课征反倾销税的商品包括火柴、石棉、木材、无烟煤、种子和其他商品，约占美国从苏联进口额的1/4，反倾销税平均提高到59%，给苏美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1930年美国还通过一项新的关税法，

---

① *Фураев В. К.*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39,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64, с.99.

② 伊凡诺夫、列昂尼扬：《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关于1933年苏美建交问题》，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27页。

该法令307条规定，禁止使用囚犯劳动或强迫劳动的商品输入美国。美国的新关税法要求进口商必须证明，它们进口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使用强制劳动。1930年5月美国以使用强制劳动和倾销为名禁止苏联产的火柴进入美国市场，随后，又宣布禁止苏联的木材和锰矿入境。1930年12月，美国农业部还出台了有关不承认苏联的兽医卫生许可证的决议。美国对苏联出口商品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同时，还极力怂恿一些欧洲国家也抵制苏联的商品。1930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梅隆访问欧洲，其目的是呼吁欧洲国家也抵制苏联的商品。在他的鼓动下，法国在10月宣布对从苏联进口的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随后，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比利时也对苏联商品采取了抵制措施，结果导致苏联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大大缩减，苏联政府不得不增加从德国和英国的订货。由于苏美贸易关系的恶化，到1933年，苏联对美国的出口额仅为1929年的32.25%，从美国的进口额还不到1930年的6.3%。[①]

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人士开始认识到，美国对苏贸易歧视政策最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利益，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苏联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销售市场和重要的原料供应地。因此，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美国必须尽快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苏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不仅有利于美国实业界，也有利于苏联的经济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拖拉机、金属加工机器、挖掘机、电力设备、汽车等。美国的技术援助更是对苏联的工业化建设起到明显推进作用。1928～1929年苏联与美国共签署了132个技术援助合同。这些援助合同涉及由美国公司负责向苏联提供开采煤炭、制造汽车、拖拉机、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以及生产收音机和各种仪器设备等方面的技术。对于美国技术援助对苏联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斯大林曾做过公正评价。他认为，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尤其是福特先生帮助苏联建立了拖拉机和汽车制造工业。因此，为了加速苏联工业化建设，与美国建立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迫切任务。

① *Корецкий В. М.* Очерки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и практи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ча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Москва: Икра, 1935, с. 321－361.

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也使国际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成为日后苏美外交关系转变的前提条件和契机。

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首先是与日本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脆弱的日本受到严重冲击。面对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力图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其摆脱经济危机和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给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构成一定威胁。可是美国一开始并没有积极采取外交行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上美国和日本虽然互为竞争对手，但双方在激烈角逐的同时，又存在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经济上，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1930 年美国对日贸易超过其对华贸易的 3 倍，占日本对外贸易的 1/3。[①] 政治上，日美都有反苏、反共的愿望和意图。此外，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忙于解决经济危机，国内又存在反对战争的浓厚孤立主义情绪。鉴于日本的侵略尚未对美国在华经济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美国首先力图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卿史汀生在会晤日本驻美大使时表示，希望日本和中国军队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使用武力。[②]

随着日本侵略行为的加深，特别是日军攻陷锦州后，华盛顿开始意识到，中日之间已经完全不存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满洲问题的可能性。如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再不加以遏制，美国和世界和平将面临严重威胁。1932 年 1 月 7 日，史汀生分别向日本和中国政府发出照会，阐述了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照会声明：美国政府现在不承认、将来也不承认能够给美国及其公民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带来损害的条约和形势，包括那些涉及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

1932 年 1 月 28 日，肆无忌惮的日本军队对上海发起了进攻。日军进犯上海在西方列强中间掀起轩然大波。上海是中国南方的门户，也是西方

---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 68 页。

② *Сафронов В. П.* СССР, США и японская агре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1931 – 1945гг,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1, c. 49.

列强对华经济渗透的中心。英国在华投资的近80%，法国在华投资的约90%，美国在华投资的65%都集中在上海。美国政府认为，日本侵占上海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中国，把包括美国和其他大国排挤出中国，继而实现其独占东南亚和大洋洲的狂妄梦想。[①] 事变发生后，美国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太平洋地区开展军事演习。

日本对中国侵略，不仅对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对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和远东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开始进犯中东铁路线。鉴于东北的军事战略形势对苏联越来越不利，1931年末，苏联政府开始加强远东的军事部署，同时采取了一些外交措施。1931年12月31日，苏联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这一建议，日本政府直到1932年12月中旬也未给予官方答复，这更加剧了莫斯科方面的不安。1932年初，日本未经中东铁路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占领火车站来运送日本军队，随后又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利用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的要求。迫于日本的压力，苏联不得不在1932年2月末同意日本为了商业目的使用这条铁路。从1932年4月起，日本及其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在中东铁路制造事端，占领车站、抢夺贵重财物、逮捕并杀害苏联公民，此类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日本的一些人士还多次发表演说，公然提出进攻苏联和夺取远东领土问题。

满洲局势的不断恶化促使苏联开始认真考虑应该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遏制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侵略行为。[②] 由于美国一直顽固地坚持不承认苏联的政策，因此，在联合抗击日本侵略问题上，苏联经历了对美国指责、猜疑到逐渐接近的转变过程。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美国曾试图插手1929年中苏在中东铁路的冲突事件，这令苏联政府大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缺乏对美国的信任，当时的苏联报刊断然指责说，美国实业界和金融界都希望远东发生战

---

① *Мотлев В. С.* 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узел второй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5, с. 100.

② 对于苏联政府而言，选择一个能与自己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国家并非易事。九一八事变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与日本相安无事，而与后来成为自己反法西斯盟友的各大国关系均不正常。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中断了；同英国虽有外交关系，但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宣传活动使英国政府宁肯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容忍的态度，也不愿意与宣扬共产主义的苏联进行交往。

争。1931年12月10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美国现在和过去都企图使苏联卷入远东的战争、企图组织和发动美国资产阶级集团来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华盛顿是挑起战争的危险策源地。”在苏联看来,对美国的上述指责虽无真凭实据,却不无道理,因为满洲事变前美国的报刊曾发表言论说:“消灭苏联是胡佛毕生的目标。”[①]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和远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苏联对美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苏联政府认为,虽然美国对日本的侵略并没有采取制裁措施和军事行动,但是华盛顿政府已经流露出对日本的反感。据苏联驻美非官方代表斯克维尔斯基回忆,华盛顿上层承认,日本人欺骗了他们。虽然日本再三保证无意侵略满洲,结果却占领了锦州。而且,日本很有可能将侵略范围扩大到中国内陆地区。因此华盛顿政府讨论过抵制日本甚至是与其作战的计划。1932年1月,有消息说美国军队将在太平洋沿岸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莫斯科认为,这一消息说明美国打算对日本采取遏制行动。[②] 美国的反日行动在莫斯科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于是,苏联政府决定投石问路,试探美国在日本侵略远东问题上的反应。

1931年末,苏联驻立陶宛全权代表加林斯基在与美国外交官富尔顿会晤时表示,苏美建立外交关系有利于两国在远东地区的相互合作,然而美国在承认苏联问题上的某些做法令人失望。加林斯基还进一步指出,日本占领满洲后,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菲律宾。如果美国不与苏联在远东建立联盟,在未来的美日战争中日本将成为胜利者,因为军事行动是在离美国主要军事基地较远的地方展开的。在两人后来的会晤中,加林斯基除重复上述观点外,还特别强调: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美苏在远东联合起来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1932年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期间,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在对美国和平组织发表讲话时,李维诺夫声明,苏联与美国和中国相互疏远并缺少外交关系是造成远东现在局面的真正原因。否则,这种不利的局面是可以避免的。[③]

---

① *Сафронов* СССР、США и японская агре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1931 - 1945гг, с. 73.

② Известия, 4 января 1932 г.

③ *Сафронов* СССР、США и японская агре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1931 - 1945гг, с. 82.

除了在远东地区联合遏制日本侵略扩张外，美苏在对抗德国法西斯的势力、维护欧洲的稳定和自身安全方面也存在着共同利益。

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将建立世界霸权，把美国排挤出德国和欧洲市场，继而排挤出世界市场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希特勒曾扬言："我们要在巴西建立新的德国，通过国社党的宣传，可以很容易地把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两个国家统一起来……墨西哥应当成为德国的墨西哥。美国在垂死挣扎，它永远也不能再干涉欧洲战事。"①

为了实现狂妄的扩张计划，希特勒对德国所有的驻外机构都进行了改组，大量的间谍充斥其中。德国间谍从1933年就开始在美国活动，当时美国有18个由德裔人建立的团体，这些团体在纳粹分子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宣传破坏活动。法西斯分子上台后，他们就开始秘密策划对美国的战争。

令美国政府更为不安的是德日法西斯势力的联合动向。据美国驻德国武官向国务院报告，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第一年，德日之间就开始频繁进行接触。欧洲的报刊还报道了德国和日本外交官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秘密联系。法国的一些观察家甚至指出，德日之间存在某种共同行动的协议。② 美国政府认为，一旦德国的扩张计划得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将面临严重威胁。

希特勒上台后的头几个月，美国和德国矛盾进一步加深。为了扩军备战，德国开始缩减从国外首先是从美国进口粮食。德国还对美国公民进行挑衅，恐吓并逮捕在德国的美国人。

针对德国的反美行动，美国驻德大使多德多次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德国虽然表示道歉，但依然我行我素。1933年希特勒政府采取措施，使外国持有者特别是美国持有者手中有价证券的价值大幅贬值。由于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购买德国有价证券的美国垄断组织的利益，德美关系趋于恶化。③

鉴于德国法西斯分子的猖狂活动和德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希望通过苏美关系的正常化来稳定欧洲局势，巩固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关于这一

① 伊凡诺夫、列昂尼扬：《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关于1933年苏美建交问题》，第42页。
② 伊凡诺夫、列昂尼扬：《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关于1933年苏美建交问题》，第43页。
③ 沃斯兰斯基：《美国对德国问题政策史略（1918～1919）》，郑德麟、陈致中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222页。

点，美国历史学家白瑞德曾经写道：在直接参加苏美建交谈判的三人（菲利普、布利特和凯利）中有两人认为，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是美国同苏联建交的主要原因之一。[1]

德国法西斯分子执政，同样也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和安全。1922 年苏联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在此后的 10 年时间里，苏德保持着正常的经济、政治往来，德国还是苏联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自从法西斯分子上台后，两国关系开始不断恶化。1933 年 1 ~9 月，德国多次对苏联公民进行非法搜查和逮捕。苏联政府曾屡次向德国提出抗议和警告，德国政府却置若罔闻。苏联政府还获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邀请英、法、德共同签署四国公约，承认德国在军备上与其他大国享有平等权力的消息。尽管公约最后没有被批准，但意大利绕过国联为希特勒扩军大开方便之门的做法使苏联政府认识到，在处理欧洲事务时几个大国有意孤立苏联，欧洲的局势对自己愈加不利。[2] 面对日益复杂的欧洲局势，苏联外交把遏制德国扩张，维护自身的安全以及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当作一项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正是日德法西斯日益加深的侵略扩张行动才使苏美之间出现了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主张苏美关系正常化。苏联政府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变化。1932 年 4 月 25 日苏联驻美非官方代表斯克维尔斯基向李维诺夫通报说："远东局势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增强的侵略扩张行动使美国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苏日冲突的危险性。去年 11 月，当我刚从苏联来美国时，美国很少有人从远东局势的角度来审视苏美关系。那时候就连美国国务院也相信，日本不会入侵中国。国务院还试图把日本在远东的强硬政策和苏联的克制行为理解成苏日之间有秘密条约存在，在某些有影响力的群体中也普遍存在着亲日情绪。日军占领锦州、上海并在中国内陆省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表明，美国此前对苏日关系的判断是缺乏根据的。因此，无论是公众舆论，还是华盛顿政府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

① R. P. Browder, *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31.

②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Т. XV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0, с. 862.

倾向于反对日本。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在争夺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中自身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削弱苏联的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苏联在稳定远东局势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主张苏美和解的观点获得了广泛支持。"①

在主张承认苏联的队伍中，既有广大工人群众，也有主张同苏联进行贸易的农场主和工商界人士，还有主张同苏联进行科学和文化交流的知识分子，就连美国政界人士也积极呼吁政府应当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1932年4月，众议院民主党参议员萨巴特向外交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案，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呼吁同苏联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萨巴特在决议案中说："既然……苏联政府是一个稳固的政府，各个国家都已经承认它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既然苏联政府一再表示愿意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且因为两国没有友好关系，美国公民已经失去了有利可图的贸易往来，那么，参众两院应联合通过决议，请求美国总统指示国务卿就美俄两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问题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美国"对外政策协会"会长雷蒙德·布埃耳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阐述美国在远东的困难处境，他强调指出，"不承认苏联的政策……削弱了美国在远东的地位。"②

美国社会各界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在新闻媒体的评论中得到明显反映。1933年6月，俄美关系委员会曾在美国报界就承认苏联问题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1139家报纸中有718家即63%明确表示赞成承认苏联；有306家即26.9%表示反对承认。而到1933年10月，赞成承认苏联的报纸已有1000多家。③

罗斯福的转变与美苏建交谈判

在苏美建交问题上，苏联政府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明确的，即：愿意在不干涉内政和解决债务问题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革命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отв.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1933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атерик, 2002, с. 552.

② Правда, 24 января 1933г.

③ 伊凡诺夫、列昂尼扬：《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关于1933年苏美建交问题》，第67页。

后，苏维埃政府多次主动要求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和政府，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1919 年初，苏维埃政府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外交代表马尔滕斯。美国不但拒绝承认其代表地位，还以苏维埃政府试图通过共产国际颠覆美国社会制度为由将其驱逐出境。尽管如此，列宁在 1919 年秋天仍然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与美国（也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①] 1921 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向美国政府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并着重强调："同美国没有正常的事务关系，这在苏维埃俄国看来，对于两国人民是特别不正常和有害的。"[②]

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1922 年苏维埃政府派出了以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会上苏维埃政府声明，可以放弃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封锁给俄国造成损失的赔偿要求，但各大国必须在法律上承认苏联。美国政府表面上拒绝派正式代表出席热那亚会议，暗地里却阻止苏维埃政府与一些国家达成协议。[③]

1923 年底，柯立芝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随即致函柯立芝总统，希望缓和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并就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进行谈判。苏联的建议遭到柯立芝政府的拒绝，理由是苏联政府一直拒绝偿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欠美国的外债，拒绝返还被没收的美国公民的财产，并不断进行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宣传活动。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与美国建立经贸和外交关系的努力。1927 年底，齐切林在给李维诺夫的信中还指示："当前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与美国实业界之间建立联系。要争取与美国做贸易，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贷款。"[④]

1929 年胡佛就任美国总统后，苏美关系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胡佛早年

---

① 《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 31 页。

② 伊凡诺夫、列昂尼扬：《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关于 1933 年苏美建交问题》，第 4 页。

③ 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韩正文、沈芜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 200 页；*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 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4, с. 56。

④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Россия и СШ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 – 1933гг., с. 235.

曾与英国企业家乌尔克瓦特一起从事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矿产资源的开发活动，他们成立了克什特姆采矿厂、塔那雷克斯公司和俄亚股份公司。1914年俄亚公司的子公司——额尔齐斯股份公司又在俄国创办了里杰罗夫斯基和吉尔吉斯矿山公司，其中吉尔吉斯矿山公司还在俄国从事租让活动。但十月革命后所有这些公司都被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胡佛因此蒙受巨额财产损失。[①]

胡佛崇尚美国的民主政治。他称布尔什维克是一伙"杀人犯"、"共产主义是一个深渊，认为如果失去理性的民众被饥饿和瘟疫所控制，那么所有的政府都会坠入这一深渊"。因此，向俄国提供援助是"保证共产主义崩溃的最有效手段"。[②] 在胡佛执政时期，美国始终拒绝承认苏联。1931年3月，当国务院有人提出同苏联改善关系时，胡佛命令国务院电告所有美国驻外使馆："本政府不可能改变态度，承认俄国的现存制度。"[③]

在1932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苏联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获悉胡佛在承认苏联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只要胡佛继续当选总统，承认苏联的问题就毫无指望。于是，苏联把两国建交的希望寄托在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

1933年，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取代始终坚持反共政策的胡佛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对共产主义信仰持否定态度，但作为有着非凡胆识和战略远见的总统，他更倾向于从国际局势的视角来冷静、客观地审视苏美关系：尽管苏美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根本对立和冲突，但随着日德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扩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不断增加。日德法西斯的侵略行动不仅威胁美国，也威胁到苏联在亚洲和欧洲的利益和安全。如果不与苏联这样与日德法西斯侵略存在利害关系的大国合作，美国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利益之间，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罗斯福总统最终选择了后者，主动打开了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

1933年10月10日，罗斯福总统直接致函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

① *Иваня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 с. 164.

② *Иваня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 с. 165.

③ 刘绪贻、李存训：《美国通史》第5卷，《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2002，第237页。

加里宁。他在信中对“两国伟大的人民一百多年来存在令人愉快的传统友谊”，现在却没有外交关系表示遗憾。他“盼望努力结束美国一亿二千五百万人民和俄罗斯一亿六千万人民之间目前的不正常关系”。为了解决两国现存的矛盾和问题，罗斯福建议苏联派代表前往华盛顿就建交问题直接进行谈判。[①] 罗斯福的主动邀请使冻封已久的两国关系的冰河开始融化。莫斯科欣然接受了苏美谈判的建议。1933 年 11 月 7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就建交问题展开直接谈判。

苏美建交谈判主要围绕宣传、宗教和债务问题展开。随着美国社会舆论向对苏友好方面转变，在困扰苏美关系的三大问题当中美国公众更为关注宣传和宗教问题。整个建交谈判依然暴露出双方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矛盾。

宣传问题始终是困扰苏美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大量的档案材料表明，美国社会对共产国际在美国的宣传问题极为关注，而苏联政府许多年间对此事一直矢口否认。

1926 年 1 月 11 日，美国共和党民族执委会成员古特里奇在给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及夫人的信中写道：“您曾对我说过：‘俄国不会给第三国际提供资金，但我们不能拒绝为其提供场所，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曾给第一和第二国际提供场所。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拒绝第三国际’。可是美国人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第一、第二国际并没有号召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存的政府。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想成为我们的邻居，就不能在自家的屋内庇护经常威胁要闯进我们屋子里的人。”信中还说，“直到现在季诺维也夫还是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委书记和政治局成员，同时还是第三国际的主席。这就不可能让美国人相信，共产国际不是苏联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可以说，我们的绝大多数民众坚信这一看法，并完全支持总统的政策——只要在美国还进行鼓动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宣传，只要苏联政府不仅向此类机构提供场所，还向其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已被苏联官方报纸上的大量文章所

---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 - 1933гг., с. 704.

证实），美国就绝不会承认苏联。”[1]

1930年8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处负责人阿林斯与美国的一些议员和学者进行了会谈。会谈中美国人曾向阿林斯询问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以及苏联政府为共产国际提供资金一事。阿林斯辩解说，苏联政府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不是一回事。比方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是政府签订的，可是全世界共产党都反对这一公约。美国人又提出：“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俄国人认为，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要进行世界革命。但现在，显然苏联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为什么苏联政府不能公开声明，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存在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呢?”阿林斯则答道：“应该把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区分开来。苏维埃政权自存在之日起就试图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所以不需要专门声明。”[2]

苏联政府始终矢口否认与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然而，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呢？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苏共档案证实：苏联政府确实与共产国际存在一定的联系。美国著名的实业界人物、美国在苏联的第一家租让企业的负责人哈默曾长期扮演共产国际的间谍和信使的角色。共产国际正是通过他作为中间人对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也正是由于哈默与苏联政府非同寻常的关系，才使其与苏联政府在租让制问题上相互合作，并在俄国居住的9年时间内将大量沙皇家族的珍贵艺术品运往美国出售。[3]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20年代英国谍报机构获得的重要情报中证实苏维埃政府对共产国际提供过资金援助。1922年12月，英国的谍报机构搞到了一份共产国际领导人秘密会议记录。这份记录表明，苏维埃政府在俄国遭受严重饥荒的困难条件下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决定向美国共产党拨款30万美元，目的是支持美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国内的黑人志愿者参加红军；向英国共产党拨款8万英镑，用来援助其进行大选和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

---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18 – 1926гг, с. 473 – 474.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 – 1933гг, с. 327.

③ *Иваня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 с. 584.

向印度共产党拨款12万英镑，以支持英属殖民地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①]

在1933年11月10日会谈中，罗斯福交给李维诺夫的有关宣传问题的文件要求：苏联政府必须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干涉美国内政；不支持、不参加旨在干涉、推翻、削弱和改变美国或美国政府所属机构的宣传活动不得为这种宣传活动提供资金；禁止利用政府机构和代理人从事上述目的的宣传活动并为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参与组织上述活动；苏联政府应禁止以此为目的的组织、团体和个人留在本国境内，并取缔此类组织在本国领土上的活动。这份文件尽管没有点名，但显然是指共产国际，其实质是要求苏联政府取缔共产国际。[②]

罗斯福坚决要求苏联就宣传问题做出承诺。李维诺夫则表示，关于这一问题苏联可以和美国缔结一份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缔结的协议相类似的协议，超出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当晚，双方继续会谈，罗斯福总统的态度稍有变化。他没有提出取缔共产国际和终止革命宣传的要求，而是建议莫斯科终止与美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李维诺夫则回答说，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没有联系。随后，他拿出一份有关宣传问题的文件，文件中列举了苏联在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就这一问题做出的承诺。[③]

11月11日晚9时，李维诺夫与罗斯福和布利特就宣传问题再次展开交锋。双方谈到了此前苏联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中就宣传问题所承担的义务。罗斯福总统和布利特指出，除协议中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外，拉脱维亚、阿富汗等国还要求苏联撤销共产国际及其在各国的分支机构。鉴于宣传问题的敏感性，布利特提出应禁止美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活动。李维诺夫则强调，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时将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美国。[④]

在讨论宣传文件的具体细节时，罗斯福总统和布利特提出，应当使共产国际的义务具体化。李维诺夫坚决反对，他直言不讳地声明："我们过

① *Иваня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с.584 – 586.；*Нежинский Л.Н.* В интересах народа или вопреки им? .Совет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17 – 1933 годах，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17.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с.344.

③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 XVI，с.649，865。转引自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с.344。

④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с.346.

去没有承担此类义务，现在不会终止共产国际的活动，将来也不会去影响共产国际，更不用说去影响某些共产党了。因此必须事先认同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就承担义务所做出的相关解释。"① 罗斯福和布利特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让苏联政府取缔共产国际简直太难了。于是，他警告说，如果三年以后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仍频繁活动，美国政府将就此事专门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②

11月11日晚9时45分，李维诺夫收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加急电报。电报明确指示："美国人的宗教和宣传草案是无法接受的，这些条款无异于投降。关于宗教和美国公民的权利问题不能与我们所能接受的底线相距太远。在宣传问题上我们只能接受别的国家承认苏联的条件，不应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让步。"③

经过几天的艰苦谈判，11月16日罗斯福与李维诺夫终于交换了关于宣传问题的文件。考虑到苏联在宣传问题上的坚决态度，美国方面做出较大让步。文件中规定，两国政府相互保证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得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必须严格制止旨在煽动和鼓励对缔约国另一方进行武装干涉的任何行动；双方保证禁止成立以武力改变和推翻另一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军事组织和团体。文件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共产国际。④

关于宗教问题的谈判也不顺利。美苏建交以前，美国朝野对苏联政府迫害本国宗教界人士的做法一直十分反感。因此，美国希望利用建交谈判的机会迫使苏联政府改变自己的宗教政策。在罗斯福交给李维诺夫的有关宗教问题的草案中要求：苏联必须保证在其境内的美国公民享有充分的信仰和礼拜自由；保护牧师、神甫等神职人员的权利不受限制，保证他们不受法律上的歧视和迫害；美国公民有权在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中间开展慈善活动。⑤

在11月10日晚李维诺夫与罗斯福和布利特的会谈中，双方将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宗教问题。罗斯福对李维诺夫说："您是无神论者，可是您

① АПРФ（俄联邦总统档案馆），ф. 3，оп. 66，д. 291，л. 175。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 346.

③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 344－345.

④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 XVI，с. 642－644.

⑤ АПРФ（俄联邦总统档案馆），ф. 3，оп. 66，д. 291，л. 168－169。

的双亲信仰上帝，他们也会教您这样做。谁也不能强迫您改变对宗教的态度，可是其他人信仰上帝，我们也不能禁止他们这样做。也许，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您也会想起要找上帝，这就是人生的哲学。”[1]

11 月 11 日晚 9 时，在双方的再次会晤中，李维诺夫将一份文件拿出来供大家讨论。这份有关在苏联的美国人地位问题的文件列举了苏联相关的法律条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打算承认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条件必须是在苏联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罗斯福反对引用苏联的法律条文，并指出，在存在这些法律条文的条件下宗教信徒实际上受到了迫害。他坚持要求应准许美国神职人员有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李维诺夫拒绝了这一条件。双方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2]

李维诺夫询问布利特，总统为何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如此坚决。布利特解释说，这完全与美国的内政有关。因为“有关宗教的文件将使罗斯福在国会获得 50 张赞成票。他非常需要这些投票来支持经济改革”。[3]

罗斯福总统一面与李维诺夫在宗教问题上讨价还价，一面说服国内有关人士不要在美苏宗教谈判问题上制造障碍。11 月 11 日，罗斯福还会见了美国天主教徒、大学校长沃尔舍姆，说服他不要强烈反对即将举行的谈判。为了争取新闻界的支持，罗斯福总统还做了许多工作，使新闻界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很大转变。[4]

考虑到美国国内对宗教问题的强硬态度，苏联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11 月 16 日，李维诺夫在给罗斯福的文件中承诺：“苏联政府保证居住在苏联境内的美国公民自由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保证其在信仰方面不受任何限制和迫害；每个公民有权信仰任何宗教。”[5]

苏美谈判中最复杂的是债务问题。1921 年 10 月苏维埃政府在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照会中表示愿意偿还沙皇政府 1914 年以前的各项外债，但前提条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必须在外交上承认苏联。美国政府拒绝了苏维埃政府提出的这一条件。1922 年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期间，苏维埃政府

---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с. 343.

② АПРФ（俄联邦总统档案馆）ф. 3，оп. 66，д. 291，л. 175。

③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 XVI，с. 663.

④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с. 343 – 344.

⑤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 XVI，с. 644 – 649.

再次与西方国家就此问题进行磋商。西方国家坚持要求苏维埃政府必须偿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欠的全部外债；归还已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主的全部财产，或者即使不能归还，也必须偿还这些所有者因企业被没收和征用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在热那亚会议上，苏维埃政府先是拒绝了西方国家提出的俄国应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欠的军事债务，以及返还已收归国有的外国企业主财产的要求，然后提出西方国家必须就武装干涉给俄国造成390亿卢布的巨额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考虑到这样的赔偿要求不可能被西方国家所接受，苏维埃政府接着提出：可以在不计以往利息的条件下部分偿还沙皇政府的战前债务，但军事债务不在赔偿范围之内；给财产已没收和收归国有的外国企业主提供一定的补偿，办法是将其过去的企业优先租给他们；苏维埃政府放弃外国武装干涉给俄国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补偿要求，但各大国必须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国家。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维埃政府在债务数额、赔偿方式等方面的要求相去甚远，双方在此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协议。苏美建交谈判之前，大多数美国人在谈到苏联欠美国的债务时，都认为债务的数额并不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担心，如果美国放弃苏联欠美国的债务，其他国家就会拒绝偿还欠美国的外债。对于苏联政府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如果苏联政府偿还了欠美国的债务，那么它不得不偿还所有革命前的外债。[①]

1933年11月13日，苏美就债务和相互要求问题展开谈判。李维诺夫从一开始就提出，债务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解决。因此，他建议最好暂时搁置这一问题，等苏美建交后再行解决，罗斯福总统则认为必须尽快解决它。11月15日，李维诺夫与布利特就债务问题再次展开了交锋。布利特警告说，国会很快就要通过约翰逊的立法草案，该草案规定不向欠债的国家提供贷款。于是，两人就债务的具体数额开始讨价还价。李维诺夫一开始提出苏联将偿还5000万美元的债务，布利特表示反对。他指出，这一数额无法为国会接受。李维诺夫小心翼翼地问道："国会可能接受的数额是多少？是1.5亿吗？"布利特避免直接提出这一数字，因此反复强调，只有总统有权就具体数额做出决定。[②]

---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 – 1933гг, с. 327.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 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 с. 358.

在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中，李维诺夫表示承认克伦斯基政府的1.87亿美元债务，前提条件是美国必须向苏联提供为期20年的贷款。总统同意了这一条件，并保证向苏联提供总计2亿美元的长期借款。双方还商定，有关债务问题的具体协议将由李维诺夫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专家们进行磋商。为了不使双方的物质要求复杂化，苏联政府放弃了在美国的苏联财产，以及1918年1月以后因美国军队干涉西伯利亚而给苏联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要求。[1]

1933年11月15日，李维诺夫与罗斯福在有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布利特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了关于财政问题的两个文件。文件规定，苏联政府同意支付克伦斯基政府的债务不少于7500万美元，罗斯福总统则说服国会同意将克伦斯基政府的债务确定为1.5亿美元。鉴于双方的分歧较大，此问题以后将由李维诺夫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布利特的谈判来解决。两国政府间的其他债务均被取消。[2]

在建交谈判中，李维诺夫和罗斯福还就公民的法律保障和诉讼案件问题交换了文件。关于公民法律保障的文件中规定，苏联准备向美国公民提供其他国家公民在苏联享有的权利。此项条款排除了美国方面提出的美国公民在苏联应享有优先权的要求。[3] 在双方关于诉讼案件的文件中规定，从今往后，一直到苏美间的相互要求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两国政府不再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财产、贷款和其他义务方面的司法判决或提起此类的司法诉讼。

1933年11月16日，即苏美结束宗教谈判的当天，李维诺夫和罗斯福交换了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的文件。至此，美苏两国结束了长达16年没有外交关系的历史。尽管长期外交隔绝使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错综复杂，但苏美却在短暂的10天时间里就困扰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最终达成一致，这恰好说明，两国外交所面临的、共同的紧迫任务是对抗日德法西斯的侵略行动，维护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由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存在，美苏能够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相互妥协、让步，从而打开

[1]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 – 1933гг, с. 353.

[2]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 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 – 1933, с. 354.

[3]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195页。

了双边关系的僵持局面，并最终共同揭开了美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回顾自苏维埃政权成立到苏美建交的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始终是困扰苏美双边关系的症结所在。只是随着国际局势的根本变化，特别是日德法西斯侵略行动的加深，苏美两国政府才从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暂且搁置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分歧，开始了缓和和合作的进程。尽管如此，苏美之间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原则性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国国内反对苏联社会制度、宗教政策和共产国际干涉美国内政的声音仍不绝于耳。美国社会舆论调查表明，直到1939年11月，仍有25%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美国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它“直接从莫斯科获得指示”。另有27%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的政策虽然是独立的，但它在做出决策时，仍需考虑莫斯科的意见。只有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没有必然联系。由于美国朝野浓厚的反共意识，72%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共产党在政府机构中任职。1937年美国的民意调查还显示，59%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需要在纳粹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中间做出选择，他们更愿意选择希特勒的纳粹制度。[1]

由于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以及国内孤立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建交之后的美国对苏联一直采取半心半意的合作态度，只是在德日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时候，美国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真正开始了与苏联的反法西斯合作。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日法西斯失败已成定局，苏美潜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加之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因素，最终导致了冷战格局的出现。

① *Лукавышников В. О.*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холодный мир, Москва: наука-проект, 2005, с. 30－37.

苏联30年代大清洗

——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北京大学　徐天新

苏联1930年代开展了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的“人民的敌人”的大清洗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这是苏联历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大清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有的人把它限于大清洗高潮的1936~1937年两年，有的人把它定为1930年代，还有人把它扩展为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本文将大清洗定为1930年代对党政军干部的清洗、迫害和镇压。它始于1934年底的基洛夫被害案件，止于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39年初。

大清洗的镇压规模非常巨大，并且将矛头指向党内领导人和斯大林本人的战友，令人难以理解。而众多的苏联党政领导人又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一直在进行叛党叛国活动，则使人更为惊奇。众多难解的谜团和众说纷纭的内幕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同时，大清洗涉及数百万人的性命和前途命运，又是一个非常牵动人们感情的问题。因此，苏联的大清洗备受史学家关注。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首先涉及原始档案资料问题。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档案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基本不公开。1956年2月7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调整改进档案文件管理制度，开始放宽档案的使用范围。1986年12月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开放档案的问题。根据这一委员会的建议，14个部委和中央统计局解密了80多万份的档案卷宗。但有700万份左右档案卷宗受到某种限制使用，更多的档案文件则根本不开放。[①]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档案开放。1992～2005年间，大约有1000万档案卷宗解密。1990年初，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对苏联内务部档案实施解密，还出版了相关的文件目录集。[②] 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原始档案和关键资料已被有意销毁，还有一些文件遭到篡改伪造。[③]

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文件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内务部中央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此外，其他的档案馆中也收藏有重要的相关文件资料。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联共（布）中央的文件以及斯大林的个人档案。未发表的斯大林讲话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主要保存着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机关报和科研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文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武装力量全部活动的文件。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国民经济主要管理机关和计划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以及一些外交官的信件。此外，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也保存着军事方面的相关档案资料。

苏联和俄国的史学家对有关大清洗的很多档案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按专题分类，公布于《苏共中央通报》、《苏共历史问题》、《文献资料》、《历史档案》、《祖国历史》、《人头马》等杂志中。[④] 此外，出版了大量有关大清洗的文件资料集和著述，如多卷本的《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俄

---

① 参见 *Афанасьева Ю. Н.* （*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Москва, 1996. с. 524。

② Архивы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т. 5. Приказы НКВД СССР 1934－1941гг. Каталог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1999.

③ 参见 *Афанасьева Ю. Н.* （*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 525；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张慕良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557页。

④ 参见相关的俄文杂志 Известя ЦК КПСС、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Источник、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Кентвр，以及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2、30、15等卷。

罗斯》等。[1]

前斯大林集中营囚犯及其家属还组成了历史教育协会——《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旨在揭示大清洗的实情。各地搜集整理发行了遭迫害者名单，如《列宁格勒殉难者名单》。后来又加上牺牲者的传记、幸存者的回忆、图片地图等，还出版了《恨与爱的教训》、《生命反对死亡》、《巴什基尔斯坦的殉难者》、《安魂弥撒》、《白皮书》、《纪念丛书》、《贵族会议》等著作或作品。[2]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苏联史学界长期只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口径进行阐述，称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对具体情况除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外，则很少涉及。

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大清洗的内幕开始被揭开。1953年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党中央委托，重新审查斯大林时期的党纪处分和刑事处分案件，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并每年做一工作报告。1961年5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审查有关军队内的镇压问题，成员包括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苏联总检察长。1964年6月26日，委员会向赫鲁晓夫报告工作结果，并呈上《关于1937年司法机关和党的机关指控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亚基尔同志、乌博列维奇同志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家背叛祖国、搞恐怖活动和军事阴谋的复查报告》。该报告全文刊登在《俄罗斯军事档案》[3]，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4]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进一步审核1930年代的反党叛国案件。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9月28日成立了复核有关1930～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经过一段工作，于1988年3月5日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检察院、国家安

---

① *Козлов В. А.* Неизвестная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Москва, 1992; *Хлевнюк О. В.*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 - 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АИРО-XX, 1995; *Покровский Н. Н. и Петров С. Г.*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 Политбюро и церковь.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7.

② Уроки гнева и любви. Петербург. 1990; Жизнь против смерти. Рига. 1993; Мартиролог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а. Уфа. 1999; Реквием. Орлов. 1999; Белая книга. Самара. 1997 - 1999; Мемориальная книг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4; Дворян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Москва. 1995.

③ Военные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 Вып. 1. Москва, 1993, с. 29 - 113.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24～644页。

全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一案。1988 年 7 月 27 日，又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莫斯科总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等案件的材料。经过审议，委员会认为当时的判决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有关人员平反昭雪。相关的调查材料和决议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上。[①] 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上。[②]

苏联国内对大清洗的研究，最早是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出版的《古拉格群岛》[③]，作者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麦德维杰夫于 1971 年在美国出版了《让历史来审判》，系统评述了大清洗的历史。该书 1974 年发行了俄文版。[④]

苏联解体后，俄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综合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⑤] 此外，还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如对军队中的镇压问题[⑥]，对检察院和内务部的工作情况[⑦]都作了专门研究。

西方学者凡谈到苏联历史时都大谈特谈大恐怖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库尔

---

① Извесття ЦК КПСС. 1989, No. 4、6、7、8、9、11.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第 574～790 页。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Москва, 1991.

④ 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赵洵、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

⑤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 - 50 - 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1991; *Хлевнюк О. В.* 1937 год. Москва, 1992; *Степанов 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обвинения. в3 - х т. Москва, 1993; *Роговин В. З.* 1937 год. Москва, 1996; *Стецковский Ю.*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1917 - 1995. Москва, 1997; *Роговин В. З.* 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Москва, 1997; *Гетти А. и Наумов О.* Дорога к террору. Москва, 1999; *Росляков М.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уголов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в 1930 - х годах. Л., 1991; 安·弗·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彭卓吾译，红旗出版社，1992。

⑥ *Иванов В. М.* Маршал М. 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 1985; *Сувениров О. Ф.* Трагедия РККА 1937 - 1938гг., Москва, 1998; *Карпов В.*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е маршалы. Москва, 2000; *Лесков В. А.* Сталин и заговор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Москва, 2003; *Минаков С. Т.* Сталин и заговор генералов. Москва, 2005.

⑦ *Звягинцев А. Г. и Орлов Ю. Г.* Распятые революцией: российские и советские прокуроры, XXв. 1922 - 1936гг., Москва, 1998; *Иванова Г. М.* ГУЛАГ в системе тоталита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1997; *Брюханов Б. Б. и Шошков Е. Н.* Оправданию не подлежит: Ежов и ежовщина. 1936 - 1938гг. СПб., 1998; *Петров Н. В. и Скоркин К. В.* Кто руководил НКВД в 1934 - 1941гг. Москва, 1999; *Иванова Г. М.*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6.

图阿等人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等。①

中国学者也十分重视这一课题，并就镇压的规模等问题展开争论。②

尽管有关大清洗的档案资料在陆续解密，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问题仍然十分多。再加上这一运动同政治、道义等方面的密切关联，学术探讨经常掺杂着政治争论和情绪对抗，以至有时完全失去了学术内容。一些人用它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尖锐阶级斗争的表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把它当作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

当前不清楚或说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清洗中许多重大案件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而内幕不清楚。一些学者凭片面材料或凭直觉提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如基洛夫被暗杀，究竟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还是内务部或是斯大林指使的，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又如，军队中是否有反斯大林的计划，也有争论。多数人否认有阴谋存在。少数人持不同看法，说斯大林对将军们的镇压是正确的。③

其次，对大清洗、大镇压的时间和规模看法不一。有人把它限于1937~1938年，说遭到镇压的只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68万人。有人则把整个1930年代都视为大清洗大镇压的年代，并认为有很多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还有更多死于监狱或劳改营的人。此外，还有人把遭受迫害的富农分子、富裕农民以及被迁徙的少数民族也计算在内。他们认为遭

① R. C. Tucker and S. F. Cohen (eds.), *The Great Purge Trial*,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5;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 Rev. Ed. New York, 1973;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Reassess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J. A Getty,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 - 193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 A. Getty and R. T. Manning (ed.),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bert Thur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1934 - 194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Wendy Goldman, *Terro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tal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Куртуа С. и др.* Чёрная книга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1999.

② 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郑异凡:《论斯大林镇压问题研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马龙闪:《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吴恩远:《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③ 参见 *Суворов В.* Очищение. Зачем Сталин обезглавил свою армию? М-АСТ., 2000。

镇压的有300万~800万，遭迫害的则多达数千万。

第三，关于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的原因，有人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镇压国内外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求所引发的。有人说是斯大林政权软弱造成的，因为“强大、稳固的制度是不需要靠大规模暴力进行统治的”。[①] 苏联的大清洗不具有事先计划好的性质，它是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下面对各级官员的不满才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有人则反驳说，是政府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维权的无知，有意制造的。大清洗并非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为，是领导把群众变为迫害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②] 有的人说是领导的认识发生偏差，夸大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夸大战争威胁所导致的。还有人说是斯大林模式所决定的，说暴力专政是斯大林体制的最基本色彩，“恐怖是斯大林秩序的基础”。[③] 大清洗是斯大林专权的产物。

第四，关于大清洗的错误性质，或说是肃反扩大化，或说是原则错误。

第五，关于大清洗的后果影响，究竟是为后来的战争提供胜利保证，还是造成战争前期的失利，是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埋下了布尔什维克党失权的祸根，一直有争议。

第六，关于谁应对大清洗的错误承担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是斯大林个人，或是斯大林为首的中央领导。有的人说是地方官僚，他们为确保个人的地位而肆意扩大清洗规模。还有的人认为是反对派分子，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在这件事上抓住了党的清洗方针，同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把这个方针歪曲到荒谬的地步，使清洗变成了真正的血腥疯狂的行为”。[④]

本文拟利用目前已经掌握的档案文献，考察大清洗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

① A. J. Getty, "The Politics of Stalinism", in A. Nove (ed.), *The Stalin Phenomenon*. London, 1993. p. 118.

② *Павлова И. 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адные историки о сталинской России 30 – х год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г. No. 5.

③ J. Baberowski, *Der rote Terror: Die Geschichte des Stalinismus*. Munchen: Deutche Verlags-Anstalt, 2004, s. 8.

④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何宏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0页。

一　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是在国内矛盾激化，危机日益显现的背景下，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和多方准备后出现的。

1927年，斯大林战胜最大的对手，把托洛茨基一派开除出党，接着又将布哈林等人排斥出领导岗位，确立了自己在苏联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独掌大权后，采用行政暴力的手段全力推进自己规划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虽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但同时也产生诸多严重问题。经济畸形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由于人为地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下降，强制和半强制劳动范围不断扩大，强迫命令和惩罚判刑力度日益加大，社会由此动荡不安。用巨大代价建成的新社会也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理想，一般群众直至各级党政领导人日益对现行政策产生疑问和意见。一些新提拔起来的领导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营建个人专权的小王国。不安定因素在增长，危机苗头开始显现。在这一动荡时刻，斯大林不是调整政策，缓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他所喜爱的专政手段。他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力图用清洗和镇压来扩大自己的业绩。

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对付农民；同时，对党政干部进行清洗镇压。1929年4月，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决定“实行总清党”，清洗“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清洗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蜕化分子、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混进党内的分子、自私自利的分子和以官僚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分子”[①]，开始对党内一切不忠、不满直至反对斯大林政策的分子，对一切可能是敌人的人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前非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也悄然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生产事故不断发生，群众十分焦虑不满。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8年逮捕了顿巴斯煤矿沙赫特地区的50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3名德国顾问。7月，进行审判，指控他们建立反革命组织，破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第52，49，48页。

坏生产。49人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此后，全国掀起了清除“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①]

1929年，宣布破获“拯救乌克兰联盟”（Союз вызво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其领导人是乌克兰科学院副主席C. O. 叶弗列莫夫，说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同波兰秘密订约，企图把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去。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1930年春，仍对40多人进行公开审讯。主要领导人最初判处死刑，后改为8~10年监禁。[②]

1930年，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Трудов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партия），其领导人是副粮食人民委员、著名经济学家H. Д. 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经济学家A. B. 恰亚诺夫、Л. H. 尤罗夫斯基、农学家A. Г. 多亚连科，说该党在农业部、财政部、合作社系统、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处都有地下秘密组织，共有党员10万~20万人；指控该党准备通过武装起义来夺权，商定未来政府的首脑是康德拉季耶夫。在没有对该案件进行公开审讯的情况下，1930年9月25日，秘密宣布判处康德拉季耶夫等48人死刑。[③]1930~1932年，因隶属“劳动农民党”而被逮捕的有1000多人。[④]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了“工业党”（Промпартия）案件。交付法庭审判的有热工学院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员Л. K. 拉姆津教授、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B. A. 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И. A. 卡林尼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H. Ф. 恰尔诺夫斯基等8人。说“工业党”有2000多人，是“资产阶级技术知识界上层反革命分子集团”，同外国反动分子有联系，“企图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还准备在边界制造事端，让法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进行武装干涉，日期定在1930年，后因缺乏有利条件，延期到1931或1932年。结果，多数接受审

①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185~187页；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New York，London，1992，pp. 76~80、99~101。

②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188页；*ДмитренкоВ. П.*（*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АСТ，1997，c. 373~374。

③ 1987年8月5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为康德拉季耶夫等人恢复名誉。

④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188、201~202页；陈启能主编《苏联大清洗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第236~242页；*ДмитренкоВ. П.*（*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c. 374。

判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案件审讯过程中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为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决定对"工业党"领导人减刑，改判为不同期限的监禁。但7～8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被枪决。[1]

在侦讯"劳动农民党"案件的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Г.Г.亚戈达于1931年2月23日下令"立即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前、现和流放过的孟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进行审查，逮捕所有涉嫌进行破坏以及和非法组织有联系的人，并进行侦查"。[2] 这以后，许多人被逮捕。3月1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Союзное бюро ЦК РСДРП，меньшевиков）案件进行公开审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В.Г.格罗曼，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В.В.舍尔，俄罗斯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下属对外贸易垄断研究院工作人员、作家Н.Н.苏哈诺夫，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院教授А.М.金斯堡，商业人民委员部供应部副主任М.П.雅库博维奇，作家В.К.伊科夫，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И.И.鲁宾等14人被交付法庭。这些人原来是孟什维克，但已经在1920～1922年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公诉人指控他们后来又秘密加入孟什维克党，并组成这个党在苏联境内的领导总部；指控他们从1928年起就开始活动，与"劳动农民党"、"工业党"联合，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但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一份相关的书面文件资料来证实这些指控。法庭审讯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二国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国外强大反对声中，法庭仅判处他们以5～10年的监禁。这些人后来大多死于流放地（格罗曼、舍尔、金斯堡等）或被枪毙（苏哈诺夫、鲁宾等）。[3]

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审判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镇压。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监禁了80万人。人们把监狱戏称为"工程师和技

---

①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189～190、194～201页。*ДмитренкоВ. П.*（*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 375。

② 转引自 *Богданова，Н. Б.*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Союзного бюро ЦК РСДРП（меньшевиков）" в 1931 году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1，No. 2，с. 44。

③ 参见 *Богданова，Н. Б.*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Союзного бюро ЦК РСДРП（меньшевиков）" в 1931 году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1，No. 2；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pp. 167～170；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191～193页。

术员的休养所”。[1]

193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危机引发党内意见分歧。一些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甚至起来反对。С. И. 瑟尔佐夫于1926～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书记，积极贯彻对余粮户的非常措施；1929年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便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相抗衡。后来，他对非常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感到担忧，对工业化速度表示怀疑，提出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他与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В. В. 洛米纳泽多次会面。他们想弥合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鸿沟，认为应把斯大林从党中央书记的岗位上调开。尽管他们还没有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他们的活动已被人告密。1930年11月4日，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审查瑟尔佐夫等人的问题，后未经党中央开会就决定将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开除出党中央，将前共青团第一书记、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Л. 沙茨金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2月1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瑟尔佐夫、洛米纳泽等派别活动》的决议，指责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沙茨金组成左派—右派联盟，进行派别活动。沙茨金于1937年、瑟尔佐夫于1938年被处死；洛米纳泽于1937年自杀身亡。[2]

1932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Союз марксистов-ленинцев）成员，其首领是М. Н. 柳亭。柳亭于1914年入党，1924～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不同意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右倾问题时，采取了所谓缓冲立场，被指责为对右倾分子持调和主义态度。1928年10月，他被解除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21日，柳亭等人在莫斯科近郊开会，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宣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认定，国家之所以面临这种严重形势，是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在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以实

①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17页；*ДмитренкоВ. П.*（*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 375。

②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24页；*ДмитренкоВ. П.*（*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 376。

现加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问题上的偏激做法造成的。文件谈到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停止强迫集体化。文件认定，在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期间，很难指望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党的生活和活动中的列宁主义原则，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使国家摆脱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之职。同时，文件把斯大林称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①]

1932 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柳亭等人。10 月 9 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说柳亭集团成员“已蜕变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妄图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人幌子，以秘密的方式成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尤其是复辟富农统治的资产阶级富农组织”。[②] 斯大林对柳亭的行动十分恼火，要求枪毙他。基洛夫、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政治局委员反对。1932 年 10 月 11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判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 30 名成员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劳改和流放。1937 年 1 月 10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颁布的非常法，在没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的情况下，对柳亭等人开庭审讯，判处柳亭等 12 人极刑，并于当天执行枪决。1988 年 6 月，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此案的刑事判决。[③]

1932 年底，联共（布）中央又揭露了“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A. П. 斯米尔诺夫曾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1912 年进入党中央，历任土地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书记、食品供应人民委员。同他一起被揭发的还有国内战争参加者、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P. П. 爱斯蒙特和交通人民委员 B. H. 托尔马切夫。他们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提出了解散集体农庄，改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会与国家分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1933 年 1 月 12 日，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关于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等人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第 662 页。
② Правда, 11 октября, 1932.
③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第 677 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 224 页；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pp. 211 – 212。

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建立了秘密的派别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决定将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将斯米尔诺夫开除出党中央。1936年，爱斯蒙特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斯米尔诺夫、托尔马切夫则在后来被枪决。[①]

不久，又揭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集团”。H.A.斯克雷普尼克于1897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代，乌克兰内部有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势力。斯大林把这股反苏维埃的民族势力同斯克雷普尼克联系到一起。被软禁的斯克雷普尼克知道此事后于1933年自杀身亡。[②]

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同意政治局1932年12月10日关于在1933年进行清党的决定，试图以此制止党内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扩散。清党运动原定在5个月内完成，实际进行了一年半。200多万党员中，18%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15%的党员是自愿退党的。[③]

在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的同时，斯大林大力宣扬党内外冲突激化的必然性和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正确性，把暴力理论系统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④] 1929年，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专门讲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面前，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会反抗，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其绝对增长还是有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资产阶级“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

①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48～249页。

②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22～223页；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克雄、达洲、代军合译，人民出版社，1981，第457～460页。

③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 377.

④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全会：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1928年7月9日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50、149页。

抵抗”。[1]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讲到国外敌对阶级对国内阶级敌人支持的问题。他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还说，资产阶级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必然会反映到党内。[2]

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他还把资产阶级反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说，“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3]

斯大林一方面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当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对抗了。为了消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日益把斗争尖锐化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进行间谍恐怖活动的加强，把清洗镇压对象定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间谍特务。[4]

---

①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5页。

②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5、307页。

③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7日的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191页。

④ 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263页。

1937年，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他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总结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①]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人为制造和激化分歧、斗争开辟了道路，为掩饰政策和工作的失误提供了借口，为排斥异己、维护小集团利益提供了武器。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被确定的同时，斯大林不断加强国家的治安机构。原来有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负责侦察和审理反革命案件。一般刑事案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大镇压统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实施。

1934年，亚戈达出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Н. И. 叶若夫接任；1938年12月，改由Л. П. 贝利亚担任。这三人，特别是叶若夫，是大清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疯狂迫害无辜者，最后自己也落个被解职、被枪毙的下场。

根据1924年宪法的规定，苏联设有法院。1934年，又设置了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区军事法庭，负责审判重大案件。此外，在1933年设置了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是И. А. 阿库洛夫。А. Я. 维辛斯基最初是副检察长，1935年升为检察长。按法律规定，内务部机关必须先向检察长提交说明逮捕理由的决议以及相关的文件资料，经过检察机关审核批准后，内务部机关才能进行逮捕。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随后的侦讯，内务部应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并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最后由检察机关负责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上并不受司法检察机关的限制监

①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集》，第144、153页。

督，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自行其是。内务部通常是在没有司法检察机关同意下，自行逮捕人。审讯也是由内务部工作人员主持进行，检察人员通常是不参加的。

1934年11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置了特别会议（OCO）以及下属的共和国、边区和州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可以绕过法院自行审判，并且通常是在被告、证人、律师、检察官不在的情况下作出判决。1935年5月25日，这一权力扩大到地方的三人小组。它一般由地方检察长、内务部地方局负责人和警察局长组成。1937～1938年，与三人小组并列工作的还有两人小组，其正式名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委员会，由这两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两人小组经常只审理案件的名单，不召见囚犯和见证人，不对审讯人员收集的材料进行审核，就作出判决，然后上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他们批准后，小组负责执行。

内务机关自成系统，各级地方机关只受上级机关的领导，不归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管理，并且有权监督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活动。如州党委第一书记无权过问州内务机构的事务，却受后者的秘密监视。根据《关于保护领袖的法令》，各级干部不通知内务部派去的警卫人员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不接受警卫人员的监视也不能会见任何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直属党中央政治局领导。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膨胀，它日益成为斯大林个人控制和使用的工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一特殊组成机制使它成为破坏法制、开展大清洗镇压活动的得力工具。

苏联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有关惩罚镇压的严酷法律。党中央原来决定，政治案件未经党中央核定不准宣判处以极刑。但它经常遭破坏。政治局不得不在1931年4月20日重申这一规定。1932年8月7日，颁布保护财产的法律，加重对侵犯公共财产者的惩罚。9月16日，政治局决定取消党中央的上述决定，规定经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批准即可执行死刑。同年底和次年年初，政治局又批准乌克兰等地组成三人小组，授予判处死刑的最后决定权。

1934年6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客观参与》的法律，认定罪犯的成年家属不管是否参与、是否知情，都在客观上参与其事，都要承担责任。对逃往国外的家属、受其抚养的人，可判处流放西伯

利亚5年。1935年3月30日的法令更加严厉，后来载入刑法第58条。它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其他成员判处5年徒刑。1935年4月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对12岁以上（含12岁）的未成年人判刑事罪，直至判处死刑。后来，这条法律成为利用对小孩的惩治来折磨大人，胁迫大人认罪的工具。1935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从此，“人民的敌人”这个含义不清的罪名便成为随意镇压无辜者的方便借口。1937年，联共（布）中央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一项关于采用肉体感化的决定，把早已实施的严刑逼供合法化。内务人员据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毒打被关押的人，采取不许睡觉等折磨人的行为，甚至把人活活拷打致死，或受伤后死亡。[1]内务部人员还自己编造口供，强迫在押人员签署。[2]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在斯大林个人专权和治安体制缺乏民主监督、相互制衡、内务部依仗特权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苏联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日益走向全国性的大清洗。

二　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1930年代初期，对党外人士的镇压声势浩大，而对党内的清洗还刚刚开始，而且是分散地、不太引人注目地进行着，也没有涉及最高层的领导干部。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相对比较平和，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但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乌云已经密布，雨点开始散落，只待一声惊雷就会掀起一场暴风骤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身亡，正是某些人期盼的惊雷。

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原姓科斯特里科夫，生于1886年，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在高加索工作，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基洛夫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积极贯彻和热情歌颂斯大林的政策。1926年，他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

①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476、413～434页。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 9，с. 40.

联共（布）西北局书记，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受到质疑。1929年9月初，《真理报》刊登文章，把列宁格勒的局势说成是“对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歪曲”和“右倾的具体表现”。[①] 同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工人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告密，说基洛夫曾同立宪民主党有牵连，指责他没有同反对派进行必要的斗争，要求撤销他的职务。基洛夫立即做出反应，开展清除“社会异己”分子运动。不久，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议，审查了基洛夫的问题。斯大林说，“基洛夫在《捷列克》报工作时犯有错误，他承认这点，但他有权同自由派报纸合作。提交呈文的同志没有正确评价基洛夫和正确看待他在列宁格勒的有益工作”。[②] 斯大林的讲话使基洛夫逃过一劫，但也留下一个“犯有错误”的结论。1930年基洛夫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党中央书记。但他始终不是斯大林最亲密圈子中的人。[③]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代表们在会上狂热地歌颂斯大林，发言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1500多次。但欢呼的背后却是人们对现实诸多问题的担心，对中央领导的不满。1960年代初期，党中央主席团下属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仔细调查研究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证实在大会进行期间，在政治局委员Г.К.奥尔忠尼启则家里举行了秘密集会，发起人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舍博尔达耶夫，参加者还有基洛夫、埃赫、米高扬、柯秀尔、彼德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商议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了。斯大林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可能是基洛夫告诉他的。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中央委员。选票上的候选人数目同应选出的委员数目一样多。代表可以把名字留下或划掉。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在全体代表面前，有意在拿到选票后看也不看就走到投票箱前投了票”。[④] 这显然是要代表按照他的榜样去投票。Л.М.卡冈诺维奇还向一些代表建议，划去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的名字，以防止斯大林的得票数少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选举结果，斯大林比全

① Правда, 1 сентября, 1929.

② *Росляков М.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уголов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в 1930－х годах. Л., 1991, с. 109.

③ 斯大林最亲密圈子里的人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④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No. 3, с. 67.

额少了近300张选票。选举委员会主席B.П.扎通斯基将情况告诉卡冈诺维奇。后者说，必须让斯大林比基洛夫多得一票。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得知后命令将反对他的选票销毁。最后，扎通斯基向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斯大林实际上究竟得到多少选票，目前还不得而知。档案中保存有1059张选票，但宣布有1225位选举人，即少了166张选票，原因不详。[①] 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的成员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她说，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有292张选票划去了斯大林名字。其中的289张选票被烧掉，因此在向代表大会宣布的记录里，只有3票反对斯大林。[②] 选举委员会副主席韦尔霍维赫也说欠292张选票。[③] 还有说欠160票和欠300票的。由于选举委员会的63名成员后来全遭迫害，其中40人被杀害，其他人则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活到1950年代中期的只有3人。这就使得这次选举的内幕更加扑朔迷离。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档案资料能说清这次选举真相，其结果对斯大林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与基洛夫被刺案件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都是尚未明了的问题。

1934年12月1日（星期六）下午4点多钟，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的前警卫库利涅夫1960年12月30日向苏共中央下设的委员会作证说，上级禁止他们离领导太近，"命令我们不得近于20~25步"。[④] 而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射击。据州统计局负责人米·罗斯里亚科夫[⑤]回忆，他应基洛夫的要求，这天带统计材料到斯莫尔尼宫三层的州第二书记丘多夫的办公室。那里，已经聚集了20~25位市和州的领导人等待基洛夫开会。突然听到两声枪响，大家冲出门外，看见基洛夫倒在门左边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No. 7, с. 114－121.

② 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64~165页。

③ *Роговин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п, Москва, 1994, с. 47.

④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Материалы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миссии Комитета партий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КГБ,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1990－1991（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газете），"Гласность"，с. 74－75.

⑤ 基洛夫被刺后，他遭逮捕流放。1956年平反回家，1970年写成回忆录，1985年逝世。

的地上，头部中枪。门右边躺着一个男子，右手拿着枪。他放的第二枪不知是要把自己装作受害者还是要自杀。人们把基洛夫抬进屋内平放在桌上。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韦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

凶手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他于1920年加入共产党，先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后任联共（布）历史研究所职员，后来被开除出党，1934年4月失业。他在日记中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我和我家（5人）很快就要被赶出住所流落街头”。[1] 而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和公诉人都说他失业3个多月，但是活得很好，还在城外有别墅。1934年11月5日和10日他曾两次企图行刺，未成；被捕后，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尼古拉耶夫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目前都不清楚。

基洛夫被刺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日丹诺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和其他党政领导人赶到列宁格勒。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基洛夫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竟是一辆一般卡车，而且在半路发生了车祸。卡车司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向中央主席团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卡车正在行进时，坐在司机旁边的内务部人员抢过方向盘，把汽车开过人行道，直往墙上撞。汽车撞墙后停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汽车右前灯碰坏了。接着在车厢内，发生了一些事情，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在医疗鉴定书上写的是，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后来，鲍里索夫的妻子也被杀害了。司机则被关进集中营。[2]

政府最初宣布，暗杀基洛夫是从芬兰、拉脱维亚和波兰潜入的白卫分子干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城市先后处决了105名白卫分子，流放了11702人；同时，谴责“西方保护伞”是白卫恐怖活动的

---

① 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1991. No. 5 c. 17.

② 参见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No. 3. c. 138；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86页。

监护所。[1]

斯大林进而抓住基洛夫被害事件，有计划地镇压前反对派分子。斯大林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就说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叶若夫在1937年2～3月党的中央全会上讲，“我现在还记得，最初是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去，说：‘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找凶手’。我应该说，肃反工作人员不相信这一点”。[2]在斯大林的指令下，内务部不择手段地编造恐怖集团。首先逮捕了前共青团干部。这些人原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1934年曾开会讨论编写共青团历史之事。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当时曾要求逮捕这些人，但被基洛夫拒绝。基洛夫被刺后，他们被斯大林划定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成员。斯大林亲自划定恐怖集团的成员。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列宁格勒总部”和“莫斯科总部”，然后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住在莫斯科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写在“莫斯科总部”下面，将被捕的共青团干部等人的名字写在“列宁格勒总部”下面，还把一些人从一个总部转写到另一个总部。斯大林亲手写的这张纸的影印件曾提交给调查基洛夫被刺案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3]

12月22日，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总部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鉴于罪证不足”，其案情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进一步侦查。

12月27日，法院对“列宁格勒恐怖总部”案件进行审判，断言暗杀基洛夫是该恐怖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还说已经发现了两个恐怖组织：一个由H.H.沙茨基领导；另一个由前共青团中央委员И.И.科托雷诺夫领导。尼古拉耶夫就是接受科托雷诺夫的指示杀害了基洛夫的。控告结论还说，尼古拉耶夫已经承认，他从某外国领事那里得到5000卢布，该领事是托洛茨基和阴谋者之间的联系人。1934年底，拉脱维亚驻列宁格勒总领事乔治·比辛尼克斯被驱逐出境。但拉脱维亚政府坚决否定比辛尼克斯同谋杀基洛夫事件有牵连。12月29日，14名

---

①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59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00页。

③ 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p. 298.

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全部被处死。[1]

1934年12月16日，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和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都是1901年入党的老党员，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历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两位领导人于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他们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二十三人声明》，宣布停止反对派活动并完全服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928年6月，他们被恢复了党籍。1932年9月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柳亭集团的《呼吁书》和《行动纲领》，但未向党和苏维埃机关报告。10月，再次将他们开除出党，并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参加者和思想煽动者，判处流放3年。1933年5月8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党中央和斯大林，承认他被惩处是正确的，但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向党赎罪。12月1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党籍，季诺维也夫任《布尔什维克》半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加米涅夫任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1935年1月15日，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2]等19名原反对派成员进行了秘密审判，指控他们秘密组织"莫斯科总部"，从事反苏秘密活动，企图取代现任领导人。加米涅夫向侦查机关提交一份声明，声称："把我划归'旨在消灭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组织之列，与侦查工作的整个性质、向我所提的问题以及在侦讯过程中向我所提起的公诉不符。"[3] 季诺维也夫断言，党的十五大以后反对派总部解散了，不再有什么组织；同时断然否认同基洛夫被刺一事有任何牵连，并且当庭谴责了恐怖行为。但在高压下，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反斯大林行为可能在客观上助长了目前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促使犯罪者堕落。因此他们对尼古拉耶夫

---

① 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91页；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pp. 299～300。

② 格·叶·叶甫多基莫夫，1903年入党，先后任列宁格勒省党委书记，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1927年因进行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任食品工业部乳品工业管理总局局长。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8日被捕。1935年因"莫斯科总部"案被判处8年监禁，1936年被判处死刑。

③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No. 7, c. 81.

的罪行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这种承认并不能构成“暗害活动的策划者”的罪行。检察机关也拿不出其他任何材料来证明季诺维也夫等原反对派成员犯有罪行。审讯最后结论说，“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害基洛夫的事实”。尽管如此，军事审判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监禁，其他人不同年限的监禁。现今材料证明，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基洛夫被刺案无关，苏共已为他们平反昭雪。①

基洛夫被刺，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白卫分子也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但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有幕后指使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基洛夫事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需要谨慎审核。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委员会，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1957年4月23日，委员会作出结论，说凶手尼古拉耶夫从未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有任何联系。1960年，以政治局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为主席的新的委员会，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结论是，基洛夫被害是内务部人员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1961年5月，成立了由苏共中央、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主席是什维尔尼克。其分析没有超出莫洛托夫委员会所作的结论，但认为基洛夫被刺事件需认真审查。1963～1967年，佩尔谢领导党中央下属的一个委员会重新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基洛夫是尼古拉耶夫刺杀的，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是意外车祸死亡的。1988～1990年，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尼古拉耶夫曾企图获得党积极分子会议的入场券，后来用自己的党证两次进入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遇见基洛夫，并向后者开了枪，接着又朝自己或是朝天花板开了第二枪，被斯莫尔尼宫的电工普拉特奇击倒。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落在后面大约20步，没有能制止刺杀。尼古拉耶夫用的是1917年生产的纳甘左轮手枪，持枪许可证是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

①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9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61～264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77页。

表处在1930年4月发的，有效期到1931年4月21日，即行凶时已过期3年。至于28颗子弹，尼古拉耶夫完全可以合法地在内务部人员经营的体育协会商店“狄纳莫”购买。[1]

近年来，俄国学者对基洛夫案做了大量研究。[2] 一些人认为是内务部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另一些人认为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或说是因嫉妒基洛夫同他妻子有暧昧关系而干的。2004年，相关档案已解密，但没有足以说清问题的可靠资料。可能的知情人员，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市苏维埃主席，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正副局长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基洛夫的警卫人员，以及审讯基洛夫案件的第一批内务部人员都被杀害。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以及她的姐姐和姐夫也被处死。基洛夫被刺案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但无论如何，这一案件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源头，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案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立即建议对苏联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决定：“一、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二、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三、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这个决定公布得很匆忙，政治局事先未讨论，签署的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加里宁。[3] 法令公布后，各类案件的审查处理速

---

① *Плимак Е. Г. и Антонов В. С.* 1 декабря 1934 – год: трагедия Кирова и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No. 6, с. 32.

② *Петухов Н. и Хомчик В.* Дело 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центре// 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1991, No. 5, 6; *Росляков М.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Л., 1991; *Кирилина А.*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Киров. СПб. Москва, 2001; *Лордкипанидзе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89, 11 – 17 февраля; *Плимак Е. Г. и Антонов В. С.* 1 декабря 1934 – год: трагедия Кирова и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No. 6.

③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77～378页。

度大大加快了。

为了准备新的镇压浪潮，斯大林调整了司法检察机关的领导。1935年2月1日，党中央全会决定叶若夫任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党中央书记，同时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任命维辛斯基接替阿库洛夫，担任苏联检察长。5月25日，又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6月，解散了前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由叶若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了这两个协会的档案，并利用它来编造问题，打击老一代布尔什维克。①

从1935年5月起，开展了检察党证的工作。1936年6月，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说，通过更换党证共开除了20多万党员。②

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要修订宪法，扩大民主。1935年6月17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逮捕的程序》的决议，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逮捕人必须事前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而逮捕全苏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工厂和国营农场的正副厂（场）长、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等，不仅要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还要得到相关人民委员会的同意。③ 7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解除农庄庄员的前科罪》的决议。随后，政府决定对判处剥夺自由5年以下的庄员，如果现时老实劳动，可解除其前科罪，恢复其选举权。到1936年3月1日，共处理了768989人。④ 1936年4月，政府释放了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处10年徒刑的拉姆津、拉里切夫、奥格涅夫等人，并恢复其公民权。

从宽处理一些已不构成巨大威胁的人，只不过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大清洗。这以后，骇人听闻的“叛国案”被一个接着一个捏造出来，通过审判和片面宣传，在全苏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镇压浪潮。

---

①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99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83页。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ф. 17，оп. 2，д. 571，л. 194，*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 1，с. 11.

③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1930 – е годы. Москва，1996，с. 149.

④ РГАСПИ，ф. 17，оп. 163，д. 1106，л. 134，*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 1，с. 8.

“密谋杀害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

斯大林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前反对派分子。1935年1月17日，他将亲自起草的致党的各基层组织的秘密信《与谢·米·基洛夫惨遭凶杀相关联的事件的教训》文本交给政治局委员，并提议“今天就讨论这一案件并做出决议”。第二天，这封信发给各级党组织。它断言暗杀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干的。该总部处于“季诺维也夫分子莫斯科总部”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之下，而后者“无疑知道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主义情绪并煽动这种情绪”。它还说这些情况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封信做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是白匪组织最阴险、最卑鄙……的隐蔽形式”，并要求像对待白匪那样对待他们，不能仅限于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①]

不久，开始对原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26日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1）将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逐出列宁格勒3～4年；（2）将党内一批原反对派分子共325人从列宁格勒遣送到其他地区工作”。[②] 根据这一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5年1～2月在列宁格勒逮捕了843名原季诺维也夫分子，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和雅库特。[③]

1935年初，内务部逮捕了大批的克里姆林宫各机关的职员及其家属，其中有清扫工、看门人和话务员11人，图书馆工作人员18人，指控他们组建反革命集团，准备采取恐怖活动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7月27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禁止旁听也没有国家公诉人参加的情况下对克里姆林宫案进行审讯。审判厅指控加米涅夫是犯罪集团的主要组织者，但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加米涅夫在预审时和在法庭上都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可是审判长B. B. 乌尔利赫仍判处加米涅夫10年监禁，与1935年1月判处的5年监禁合并执行。判处克里姆林宫管理局代理书记西涅洛博夫、工农红军情报部处长切尔尼亚夫斯基死刑，判处其他27人以不同刑期的徒刑。在此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于7月14日对牵连进此案的80人判处了徒刑。1957～195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决定撤销对因克里姆林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25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3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2～733页。

宫案而被判罪的人的判决，但加米涅夫等3人不在其中。1988年，最高法院又撤销了对加米涅夫等3人的判决。[1]

1935年5月17日，斯大林得到叶若夫呈送上来的一部书稿——《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这是叶若夫写的一本有230打字页的小册子，它毫无根据地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定期互相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也熟知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活动中的恐怖主义方面。不但如此，在对基洛夫同志遇刺事件进行侦查时某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以及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逮捕，业已表明，托洛茨基分子也走上了恐怖集团的道路”。[2] 斯大林非常赞赏叶若夫的这本小册子。他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组织联系并转向恐怖活动，决心把对前反对派分子的打击推向新阶段。

内务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千方百计地捏造托洛茨基指挥反苏活动的证据。1936年1月，逮捕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教员瓦连京·奥尔贝格。他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因赞同托洛茨基观点，进行派别活动于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来苏。内务部迫使奥尔贝格承认，他是带着托洛茨基交给的特殊任务来苏联的，目的是组织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接着在高尔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大搜查，共逮捕100多人，指责他们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3]

1936年3月，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势力和揭露恐怖集团”的进程，同时建议将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法庭，全部处死。3月3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经侦查揭穿、犯有参与恐怖活动罪的全部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执行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于侦查终结后提出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应交付法庭的名单”。[4]

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并由斯大林签署。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肯善罢甘休、反革命气焰嚣张，建

①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78～691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3页。

③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4页。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5页。

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现在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因大肆进行敌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而尚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远方的集中营3～5年。建议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被告发参与恐怖活动的所有被捕托洛茨基分子，将他们处以极刑——枪决。[1]

1936年6月19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遵照斯大林下达的关于加强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向他提交了包括82名据说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反苏恐怖组织参加者交付军事审判厅。[2]

亚戈达试图把恐怖集团局限于 И. Н. 斯米尔诺夫[3]及与他有联系的奥尔贝格等人。斯大林非常不满，认为不能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统一的审判，认定亚戈达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会使消灭托洛茨基集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召见叶若夫，指示要继续彻底侦查，并指派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内务部采用非法逼供手段迫使原托洛茨基分子 E. A. 德赖采尔和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维·皮克尔[4]承认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承认它是在恐怖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亚戈达在这些供词旁边批上"不可信"、"不真实"。许多被捕者提出申诉。沙茨金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是这样审问我的。首席侦查员根金拟好了我承认进行恐怖活动的4页供词（而且他在其中写上了我与洛米纳泽之间的谈话，关于这场谈话他不可能有任何资料，连假资料都不可能有）。当我拒绝在这份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就威胁我：不经审判就枪决；或由军事审判厅在侦讯室里开庭审判15分钟走走形式，审判时我只限于作一个字的回答，'是'和'否'，然后枪决；在布特尔监狱刑事犯囚房里组织犯人将我毒打一顿；用刑；把我母亲和妹妹流放到科雷玛边疆区。有两次，夜间不准我

---

[1]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1991, c. 216－217.

[2]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6页。

[3] 斯米尔诺夫，1899年入党，1923～192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因进行反对派活动，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判5年监禁。

[4] 德赖采尔，1919年入党。先后任师政委，车里雅宾斯克州菱镁矿厂副厂长。1928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7月被捕。皮克尔，1917年入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工作。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6月被捕。

睡觉：'直到你签字为止。'而且，有一次夜间连续审问12个小时，审问时侦查人员发号施令：'站起来！摘掉眼镜！'还在我眼前挥舞双拳：'站起来！拿钢笔！签字！'如此等等。我举出这些事实，绝不是出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向他们表示抗议，而只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几十次的审问（审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辱骂）之后，会把人搞得不知所措，这时会出现虚假供词。然而，比审问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求在供词上签名时，竟然以党的名义，说是为了党的利益。"①

侦查人员经常伪造审讯笔录。叶若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1937年3月3日的党中央全会上说："我应该坦率地说，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让被告签字之前，侦查人员先把笔录审查一遍，然后呈送上级首长，重要的笔录甚至要禀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做出指示，说应该那样记录，而不是这样。然后让被告在笔录上签字。"②

内务部为制造恐怖活动的证据，随意编造事实。它迫使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爱德华·格里茨曼承认他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这件事。"苏联政府还将格里茨曼的上述供词作为"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证予以公布。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立即做出反应，发布一条消息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苏联政府却说什么格里茨曼1932年在该饭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这纯属虚构"。内务部只好不再提及此事，但仍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组织暗杀斯大林。③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多次遭逮捕、审讯、单独监禁、流放、囚禁。在这一轮的预审和庭审期间，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备受摧残，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开始对指控抱无所谓的态度，都予以"承认"。加米涅夫在庭审时说，他承认自己有罪，这并非因为有不利于他的罪证，而是"因为我既然被捕而且被指控犯有这一罪行，我就认罪"。季诺维也夫在给斯大林的便函中写道，"我知道，不论怎么说，我的肉体存在也为时不久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2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3页。
③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96～397页。

了。我本人觉察得到，也懂得，我的体力每个小时都在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枯竭下去，而且在我发生此事之后，也不可能有其他结果"。[①]

1936年1~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预审。在预审尚未结束、庭审尚未开始的时候，叶若夫于7月底将一封预计发往各地方党委员会的秘密信件草稿呈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作了修改和补充，他将标题由《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的恐怖活动》，把被告说成是组织严密的联盟参加者，从而加重了他们的罪责。联共（布）中央于7月29日向各地方党委员会发出这封秘密信，信中断言，"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从事恐怖主义勾当时，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直接联盟"。"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总部的决定而被暗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联合总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是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特舍夫等同志"。[②]

这封秘密信发出后不久，维辛斯基就拟好起诉书的初稿，并呈报斯大林。原稿中的"根据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在联合总部的直接领导下，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同志进行了凶残的暗杀"，被斯大林改为"根据格·季诺维也夫和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③] 还添加格·耶·叶夫多基莫夫等4人为被告。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乌尔利赫将判决书呈送给在斯大林休假期间代行其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后者也随心所欲地作了修改。

1936年8月10~14日对所有被告宣布侦查结束，但是未让被告了解侦查材料。8月19~24日，最高军事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④]、斯米尔诺夫等16人进行公开审讯。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并声称"所有被告都拒绝请律师"。国家公诉人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书，指控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5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8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9~750页。

④ 谢·维·姆拉奇科夫斯基，1905年入党，历任乌拉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27年因进行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被告犯有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但是所有的控告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没有任何物证或文献来证实。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这一罪行。但斯米尔诺夫否认自己犯有上述罪行。

8月24日凌晨，军事审判厅判决季诺维也夫等人犯有如下罪行：

（1）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指示，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总部，目的是杀害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

（2）通过列宁格勒秘密恐怖集团，策划关于1934年12月1日实施对谢·米·基洛夫的凶杀；

（3）建立一系列恐怖集团，预谋杀害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安·安·日丹诺夫、拉·莫·卡冈诺维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斯·维·柯秀尔和帕·彼·波斯特舍夫。

1936年8月24日，军事审判厅判决全部16名被告死刑。第二天执行了死刑。[1]

“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

在进行审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同时，内务部卖力地搜寻其他参与恐怖活动的原托洛茨基分子。1936年7月，内务部从“联合总部”案件被告那里获得一份既不具体又自相矛盾的供词，说前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业第一副人民委员 Г. Я. 索柯里尼科夫也参加了这一组织。26日，逮捕了他。7~8月，内务部又从加米涅夫等人的口中获得了据说是还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的证词。不久，又有人供出重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 Ю. Л. 皮达可夫，说他曾领导乌克兰托洛茨基总部。叶若夫将此事报告了斯大林。8月11日，叶若夫向斯大林书面报告说，“已召见了皮达可夫。已对他言明撤销中央关于任命他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件公诉人的决定的理由……并已建议他出任奇尔齐克建筑工程局局长。皮达可夫对此反应如下：1. 他理解，中央对他的信任已发生动摇……4. 他请求为他提供任何一种洗冤的形式（由中央斟酌）。在这方面，他个人建议批准他亲手枪毙所有本案被处枪决的人，其

[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1~732页。

中也包括他的前妻。可将此事公布于报刊"。8月11日，皮达可夫写信给斯大林，说指控他的证词是造谣中伤，他保证彻底清算自己过去的政治错误，努力在行动上执行党的路线，愿意为党、为斯大林献出生命。皮达可夫恳切而又卑躬屈膝的表态并没有救了他。9月11日，他在出差期间被捕。①

在皮达可夫被捕前后，内务部还逮捕了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后降为新西伯利亚市供应局农业处处长的 Н. И. 穆拉洛夫，内务人民委员会公路管理总局副局长 Л. П. 谢列布里亚科夫，党中央国际情报局主任 К. Б. 拉狄克，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 В. М. 普里马科夫，哈尔科夫军区副司令 С. А. 图罗夫斯基，驻英使馆武官 В. К. 普特纳，副交通人民委员 Я. А. 利夫希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基础化学工业总局局长 С. А. 拉泰恰克等人。

斯大林一方面制定新宪法，树立社会主义建成、苏维埃民主扩大的新形象，另一方面加快清洗和镇压的步伐，以确保局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对内务部的工作不满意，认为对反对派的镇压还不够有力。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休养地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政治局其他委员说，"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刻不容缓的是，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件中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案件上延误了四年。所有党务干部以及绝大多数州的内务部代表都持这种意见"。② 26日，亚戈达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接替李可夫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并保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至于斯大林提出的"延误了四年"，看来是指1932年未能按他的意见处死柳亭之事。

叶若夫上台后，立即扩大镇压规模，加快镇压速度。1936年9月29日，政治局根据叶若夫提交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对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的态度》的决定，提出"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不仅镇压被捕者"，"也不仅镇压受侦讯者诸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而且还要镇压早些时候被流放的人"。③ 这实际把参加过托派组织，或某个时候曾经支持或同意托派观点的人，甚至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托洛茨基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8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9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9页。

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12月4日，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汇报清除托派地下组织的工作情况时说，两个月内在乌克兰逮捕了400多人，在列宁格勒州400多人，在格鲁吉亚300多人，在亚速海—黑海边疆区200多人，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20人，在斯维尔德洛夫州100多人。①

内务部加快了对皮达可夫等人的侦讯工作，采用体罚和精神摧残的手段获取需要的口供。许多审讯笔录都呈送给斯大林过目。在1936年10月4日审讯索柯里尼科夫的笔录上记录着后者关于他不知道英国记者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口供。斯大林在这一记录旁边写道："索柯里尼科夫当然向塔尔博特提供了关于苏联、关于中央、关于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方方面面的情报。由此可见，索柯里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情报员（间谍加奸细）。"② 斯大林对维辛斯基呈送的起诉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还更换了一名被告。

1936年12月，新宪法顺利通过。斯大林抓住人们欢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机，进一步打击前反对派的领导人。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开审讯。检察长维辛斯基提起公诉，指控皮达可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之外，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指控他们在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了地方总部，在库兹巴斯等地进行破坏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的活动，还图谋暗杀莫洛托夫。他们的罪行比"联合总部"更为严重，不仅进行恐怖活动，而且替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说这是为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他于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利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月25日即皮达可夫供认后的第三天，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利尔机场的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

① РГАСПИ，ф. 17，оп. 2，д. 571，л. 194。转引自 *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 1，с. 11。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70页。

飞机在该机场着陆。穆拉洛夫在法庭上说："在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吧。我为这个国家奋斗了23年，为这个国家在三次革命中英勇战斗，曾经有数十次生命危在旦夕……假定说，甚至要把我关起来或者枪毙，那么我的名字无论对现在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人，还是对逐渐长大成人的人来说，都将有一种代表意义。"[1]

1937年1月30日，军事审判厅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判决皮达可夫、谢列布利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等13人死刑，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10年监禁，米·斯·斯特罗伊洛夫——8年监禁。13人当即被枪决。阿诺尔德、斯特罗伊洛夫在1941年被缺席判处枪决。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在1939年5月被同室囚犯打死。[2]

"阴谋组织军事政变"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斯大林对一批有职业素养和独立见解、又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将领不放心，对他们批评自己提拔的不懂得现代化军事科学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是感到愤怒。

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3]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72页。

② *ГусейновЕ. Сироткин В.* Лицо и Маски Карла Радека //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14 Мая, 1989.

③ 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73页。

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1] 1921 年他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后任军事学院院长，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 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称号，著有《现代战略问题》、《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等书，强调发展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重要意义，提出纵深作战的理论。为此，他曾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发生过争执。

1937 年 5 月 8 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送来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在德国总参谋部和盖世太保的协助下”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信件。[2] 这是德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人相信，情报机关利用图哈切夫斯基 1926 年同德国一家公司签约时留下的签字伪造了他的签名；同时还演出了一场德国军部遭纵火和这一文件被盗的闹剧。斯大林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文件，不得而知。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卷宗中也没有编入这一文件。[3]

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 1936 年就开始积极收集各种指控军队将领的“证词”。1936 年 8 月，先后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普里马科夫和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武官普特纳。两人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现均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战斗集团”。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对普里马科夫的审讯。参与审讯的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事后供认，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是在遭到毒打后才招出关于参加阴谋的口供的。[4]

1937 年 2～3 月党中央召开全会，莫洛托夫在闭幕词中说：军队里的

---

① *ИвановВ. М.* Маршал М. 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 1985, с. 128.

② *Пфафф И.* Прага и дело о военном заговор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88, No. 11, с. 50.

③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德国材料的真伪等问题，俄国学者有很多评述，主要有：*Викторов Б.*: “Заговор” в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Правда, 29 апреля, 1988; *Иссерсон Г.* Судьба полководца//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88, No. 5; *Тухачевская Е. Н.* В тени монумента //Огонёк, 1988, No. 17; *Хорев А.* Маршал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4 июня, 1988; *Жохов М.* Гамарник Ян//Коммунист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1988, No. 17; *Пфафф И.* Прага и дело о военном заговор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88, No. 10; *Абрамов Н.*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Новое время, 1989, No. 13; *Сергеев Ф.* Нацис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против СССР: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операция “цеппелин”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89, No. 1; *Иванов В. М.* Маршал М. 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 1985; *Случ С. З.*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велика ли заслуга СД? // Советское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1992, No. 1, и др。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3 卷，第 536～537 页。

"问题大概更为严重……如果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里都有反革命分子，我们能否想象只是那里没有反革命分子呢？这是十分荒谬的……军事部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其工作的审查不是现在就进行，而是晚些时候，并且要非常有力地审查"。[①] 根据莫洛托夫这一指示，内务部加紧对军队的镇压活动。

4月27日，内务部从已被捕的内务部副处长 З. И. 沃洛维奇那里取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说他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说他保证动用军队支持这一阴谋。但这些证词是借助欺骗、挑拨和暴力手段取得的。原内务部工作人员 И. Д. 苏罗维茨基在1961年12月20日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自白书中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当时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经过周密考虑蓄谋已久的陷害活动……审问沃洛维奇的是叶若夫……绝大多数姓名都是由亚尔采夫或我根据他的指示暗示给沃洛维奇的……侦查人员还规定了证词的'逻辑性'。沃洛维奇指控图哈切夫斯基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准备派军队协助阴谋分子武装夺取政权的证词，也是这样取得的。"[②] 沃洛维奇未经审判即"按特殊程序"于1937年被执行枪决。

1937年5月中旬，开始新的逮捕浪潮。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司令 А. И. 科尔克，莫斯科军区副司令 Б. М. 费尔德曼首先被捕。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5月22日被捕。同日，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Р. П. 埃德曼也被捕。接着，基辅军区司令 И. Э. 亚基尔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 И. П. 乌博列维奇被捕。

1937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揭发联共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候补中央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的反苏托洛茨基右倾阴谋集团和反苏间谍工作的材料。因此，联共中央政治局将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出党并将其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提请联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表决。"[③] 5月25~26日，以咨询的方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中央委员谁也不怀疑，谁也不给他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19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21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30页。

们辩护，甚至也不想去听一听元帅自己的申辩。布琼尼更在决议旁边写道："绝对赞成。必须把这些混蛋处死。5月25日。"[①]

1937年5月31日，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И.В.斯莫罗季诺夫到正在生病的扬·鲍·加马尔尼克家，向他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解除他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命令。他们刚一离开，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消息："原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鲍·加马尔尼克与反苏分子难分难解，害怕真相大白，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1937年6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作《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工农红军中的反革命阴谋》的报告。6月2日，斯大林发言，断定国内曾有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分子鼓励和资助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组织"。这一阴谋组织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斯大林担保说，在他列举的13个阴谋领导人中有10人，也就是说，除李可夫、布哈林和加马尔尼克三人是"间谍教唆者"外，其他的人都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其中有几个人还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②]

6月5日，斯大林从4～5月逮捕的大批军人中，挑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埃德曼和费尔德曼，作为"军事阴谋"案件的被告。为了使案件具有托洛茨基色彩，又加上了曾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为了审理这8人的案件，成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其成员由元帅和军区司令组成，有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瓦·瓦·乌尔利赫、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远东集团军司令瓦·康·布柳赫尔、莫斯科军区司令谢·米·布琼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德·卡希林。

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

① 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77页。

②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521～526页。

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但得到的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坯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和……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①]

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秘密开庭审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案件。维辛斯基宣读起诉书，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于1932～1933年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建立托洛茨基军事组织。他们与托洛茨基总部和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分子集团勾结，从事破坏、颠覆、暗杀活动并准备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以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基本上承认了在侦查时招出的供词。当夜11点35分，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8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被枪决。他们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②]

在开庭的11日当天，斯大林给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工人大会，在可能的地方也组织农民大会，以及红军部队大会，做出必须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措施的决议"。[③] 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各地纷纷举行声讨集会。

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9天，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伏罗希洛夫又决定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军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因"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而被判处死刑的共有401名军队干部，另有7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劳动改造。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

在镇压托派分子的同时，斯大林一直未曾忘记打击"右派"领导人。内务部不敢怠慢，迫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被告交代他们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犯罪联系。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38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68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640页。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06年入党，1919~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因反对斯大林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他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于1929年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4~1937年任《消息报》总编辑。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被指责犯有右倾错误，1931~1936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04年入党；1923~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10月至1921年5月，1922年9月至1929年5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指责犯右倾错误，被调往化学工业管理局、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工作。

1936年8月21日，报纸公布了维辛斯基检察长的命令，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开始对他们进行侦查。托姆斯基预感到等待他的是什么，于第二天8月22日自杀身亡。他的家属也没能逃脱厄运。妻子被判刑10年，死于西伯利亚。两个儿子被枪决，16岁的小儿子被监禁10年，流放9年。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侦查，没有获得什么确凿的证据，《真理报》于1936年9月10日发布检察院公告说，“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材料，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但是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他们在1936年12月的党中央会议上遭到围攻。叶若夫指控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组织阴谋活动。布哈林等人愤怒反击。会后，布哈林写信给斯大林，驳斥对他的诬陷，论证自己的无辜，但全无回音。1937年1月16（17）日，布哈林被解除了《消息报》总编辑的职务。而李可夫早在1936年9月就被免去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

1937年2月23日至3月5日，党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布哈林给全会写了一个声明：“为抗议背叛、变节等等闻所未闻的指控，我宣布绝食至死，只要得不到洗刷，我就不停止绝食。如得不到

满足，我的最后要求是不要碰我，让我死去。”[1] 党中央全会的回答是增加一项议程：关于布哈林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布哈林决定出席全会，参加这一议程的讨论。当他来到全会时，斯大林对他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斯大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同时驳斥了对他的各种诬陷。

叶若夫在会上指责布哈林和李可夫对党耍两面派，继续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并同托洛茨基结盟，组织武装暴动，进行暗害活动，以达到推翻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目的。叶若夫建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给军事审判厅并处以极刑——枪决”。2 月 26 日，全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2] 斯大林的秘书随即通知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 27 日的中央全会。

布哈林知道与妻子诀别的时刻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背下他写的《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为非常果断而且是有信心的……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3] 当天，也就是斯大林向布哈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后的第四天，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被逮捕入狱。

布哈林在最初的审讯中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具体问题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февральско-мартов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ВКП（б）1937год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No. 2，c. 24 ~25.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8 卷，第 512 页。

③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 289 ~ 290 页。

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活动。后来，布哈林屈服了。他在1937年12月1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布哈林试图解释产生这一案件的原因。他说，"我思考发生的一切时，得出大致如下的设想：（1）由于处在战前时期，（2）由于向民主过渡，产生了进行总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因此要对"（1）罪犯，（2）嫌疑者，（3）潜在的有嫌疑者"进行清洗。而布哈林落入清洗之列自然也成为必然、合理之事。布哈林是党内知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看重人的价值。他称斯大林的"大计划、大思想和大利益高于一切"，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他"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可是，布哈林仍"深感痛苦，极为烦恼"。因为他不仅要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故意作恶"，"亲自帮助清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造成了他人的毁灭"。布哈林思想的局限性使他陷入绝境，他问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斯大林能相信他的忠诚，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能为他平反。[①]

1938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大厅对"右派一托派联盟"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其中3人是列宁时期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H. H. 克列斯廷斯基，1名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革命家X. Г. 拉柯夫斯基，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И. A. 捷连斯基，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等人。

维辛斯基检察长指控被告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充当外国间谍，进行破坏活动，暗杀了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等领导人，图谋瓦解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各国、远东滨海地区脱离苏联，推翻革命政权。同前两次公开审讯相比，这次又添加一条罪状——妄图在苏联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在庭审时，审判长乌尔利赫逐个向被告提出同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被告都说"是的，我承认"。因为在公开审讯前，内务部人员对被告已进行了多次排演，逼迫他们按规定的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515～516页。

台词回答，并威胁说，要按他们的表现决定对他们以及对他们家属的处置；还对一些人说，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被告在压力下，都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笼统地、抽象地承认指控他的全部罪行，承认自己是“右派—托派联盟”的领导人，表示“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接着又说，“一伙匪帮的成员应当相互认识，以便结成一伙，彼此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布哈林对该集团的许多成员素昧平生，有的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布哈林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指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作者注）负有责任”。但接着他指出，他“个人并不持这个立场”，向敌军“打开防线”的话不是他说的。布哈林对另一些指控则直接予以否认。他坚决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否认参与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活动，否认 1918 年曾企图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还进一步指出，他的一些罪名是依靠一些被告的招供确定的，是不能成立的。

克列斯廷斯基在侦讯过程中遭受毒打。原内务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 1956 年提供见证说，“克列斯廷斯基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残酷毒打，整个背部密布伤痕，背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 3 天”。[①] 克列斯廷斯基被迫按要求招供，但在庭审时试图翻供，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派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但对克列斯廷斯基采取一些“措施”后，他又重新认罪，说“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②]

1938 年 3 月 13 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 18 人死刑，3 人长期监禁。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曾请求斯大林，如果判处他死刑，“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③] 但他的请求没人理睬。布哈林、李可夫等 18 人在判刑后的第二天被枪决。

至此，反对派领导人都被肉体消灭，只有托洛茨基因在国外，仅被

① 陈启能主编《苏联大清洗内幕》，第 196 页。

② Правда, 5 Марта, 1938；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 276 ~ 281 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8 卷，第 517 页。

缺席判处死刑。1940年8月20日，他在墨西哥被暗杀。[①] 其他前反对派分子，不管现时持什么观点和表现如何，几乎都在1937年被逮捕判罪。

这四次审判都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其罪名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斯大林这样残酷地对待老一代革命家，这样诽谤和妖魔化他们，极大地丑化了联共（布），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1955年，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撤销对加马尔尼克的指控。[②] 1957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撤销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的判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后来又为同案中的其他人恢复了名誉。[③]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承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不是外国间谍，但仍然认为他们犯有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行。他写道："至于军事阴谋，那些对这一阴谋仍存疑问的人不妨再读一读上面引用的审讯速记记录的片段。整个审讯过程并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并没有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只有对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④] 但审讯早已被众多资料证实是有意诬陷，口供更是凭空捏造、刑讯逼供的产物。《大元帅》作者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

1987年9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首先撤销了军事审判厅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的判决，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但亚戈达除外。同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了其他两个案件，认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被告提出的组织针对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指控查无实据，未经任何材料

---

① 凶手是麦尔卡捷尔，普遍认为他是苏联内务部的暗探，但尚无档案资料确认。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574～576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585～594页。

④ 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第121页。

证实。被判罪人的供词纯属臆造，使他们在遭受非法侦查手段摧残以至心力交瘁的情况下招认的（应该指出，在对原反对派分子的公开审判结束之后，一些曾参加本案侦查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认定参与反苏阴谋，并被消灭）”。“调查证明，1927 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①] 对皮达可夫的指控也“经不起推敲”，1988 年 6 月 13 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和“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的判决。1988 年 7 月 27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复核委员会审议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提交的调查材料，认为当年的判处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平反昭雪。[②]

四　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斯大林的清洗镇压引起一些领导人的不安。Г. К. 奥尔忠尼启则和 А. С. 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密友，早年一起在格鲁吉亚战斗过。奥尔忠尼启则先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 ~ 1937 年为政治局委员。他参与各种清洗镇压行动，但对镇压规模的迅速扩大感到担心，对内务部随意逮捕他手下的人提出抗议。斯大林、叶若夫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派人搜查奥尔忠尼启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奥尔忠尼启则十分愤怒却又感到无力，于 1937 年 2 月 18 日自杀身亡。[③] 政府第二天发布公告，说奥尔忠尼启则由于心脏麻痹在家中突然逝世。叶努基泽长期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 年因克里姆林宫案件被开除出党。在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后，叶努基泽被逮捕。据说，叶努基泽在受审时说，“我的全部罪过就在于，当他（指斯大林——作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第 753 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第 788 ~ 790 页。

③ 参见 *Хлевнюк О. В.* Сталин и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Москва，1993，с. 111 – 130。

者注）把打算审判和枪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念头告诉我时，我曾极力劝阻他"。[1] 当年，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了叶努基泽，并以间谍罪判处他死刑。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会，在同"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下，动员开展普遍性的清洗镇压。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昨日的动摇今天已转化为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他们与法西斯分子串通一气，极力讨好他们。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在各地坚决击溃法西斯阵营派出的这些密探和破坏分子别动队……我们应当尽快完成这件事情，不能有丝毫延误和动摇"。[2] 伏罗希洛夫在发言中提出，"如果非党人员以不问政治、漠不关心的面貌出现，那么它就是半个敌人，或者是敌人的间谍"。[3] 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提出不同看法，他发言说，"我个人认为，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与敌人进行了长期和残酷斗争的党的健康分子，在1934年能够跌入到敌人的阵营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不相信这一点。"[4]

3月3日斯大林作报告，总结出"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还提出，"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6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

---

①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徐晓晴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328页。

② 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463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20页。

④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с. 221.

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①] 斯大林就这样安排和布置了清洗党中央委员的工作。

1937 年 3 月 19 日，叶若夫在内务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到斯大林对内务部工作的“严厉评价”。21 日，他明确要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补上在我们的审判工作和粉碎敌人方面所失去的时间。”[②]

1937 年 7 月，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先后得到奖赏，被授予列宁勋章。不久，叶若夫又被提升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二人更加卖力地推进清洗镇压。

1937 年 7 月 3 日，叶若夫发布第 00447 号命令，要求发起逮捕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并具体规定了各地区应逮捕的人数，要求在 4 个月内完成。这场战役实际用了 1 年多时间。从 1937 年 8 月到 1938 年 11 月，逮捕了 787397 人，而原定逮捕的人数是 34.2 万人，其中枪决的为 386798 人（原定 7.2 万人），流放到集中营的为 380559 人（原定 27 万人）。[③]

1937 年 8 月 15 日，叶若夫根据政治局的决议下达第 00486 号命令，要求判处所有“叛变祖国者的妻子”以及他们的 15 岁以上的子女不少于 5～8 年的剥夺自由。

1937 年 12 月，基辅州揭露了 87 个破坏组织和托洛茨基组织，365 个暴动—颠覆小组。[④]

在 1937 年 12 月 29 日一天的时间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就审理了一份包括 1000 名囚犯的名单，其中判处枪毙的有 992 人。1938 年 1 月 21 日，两人小组审理了一份包括 2164 人的名单。[⑤]

1938 年 1 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

①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集》第 136、159 页。

②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с. 186.

③ *Зеленин, И. К.* Кульминация “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деревне. Зигзаги агр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1937－1938гг.）//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No. 1, с. 176.

④ *Аймё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с. 193.

⑤ *Аймё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с. 218.

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的决议，谴责“有些党组织不作任何审查，就毫无根据地开除党员的党籍，剥夺他们的工作，甚至往往毫无根据地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任意非法地处置他们”。决议只字不提中央领导的错误，强调问题是一些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两面派搞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停止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大批开除党员的做法”，责成各级组织“在三个月内把所有被开除党籍者的申诉书全部处理完毕”。“禁止立即撤销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职务这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做法”。[①] 但全会不仅没能纠正清洗运动中的问题，反而因它将各种错误都归结为尚未揭露出来的敌人的阴谋，使镇压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下去。

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镇压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然而，在1966名大会代表中，竟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占代表总数的56%。

打击的矛头还指向了党中央委员。1917年8月俄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在21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死的有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米柳亭、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等10人，还有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遭迫害的占到一半以上。

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7名中央委员，其中遭迫害致死的有16人，他们是：布哈林、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科罗特科夫、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拉狄克、拉科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死于狱中）、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邱巴尔。此外，彼得罗夫斯基被逮捕，后获释。遭迫害的占到60%以上。

1937年10月，党中央会议将24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7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方式通过决议：“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员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

① 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见《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第489～500页。

为人民公敌予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接着，斯大林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① 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98人即占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没能幸免。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一些曾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斗争，并得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也遭镇压。仅1937～1938年就有5名政治局成员遭逮捕，全被处死。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1926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党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4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他被捕，被指控领导拉脱维亚反苏维埃民族主义组织。鲁祖塔克在法庭上声明自己无罪，但法庭只用了20分钟就做出死刑判决。1938年7月鲁祖塔克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柯秀尔，1907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7年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2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柯秀尔以缺乏警惕性的罪名被解除在乌克兰的职务，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他被捕，指控他在1922年就参加了反革命的波兰军事组织，1934年又成立和领导了“乌克兰反革命阴谋恐怖中心”，1939年2月26日被枪决。

弗拉斯·雅可夫列维奇·邱巴尔，1907年入党，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1926～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38年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7

①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61页。

月被他逮捕，被控参加恐怖组织，是德国间谍，1939年2月同柯秀尔一起被处死。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1904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哈尔科夫州委、基辅州委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特舍夫在1938年1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指出，他到古比雪夫州时看到，经过清洗以后，州党委员会、州执行委员会以及区委员会的工作都瘫痪了。许多区委由于只剩下两三个委员，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在州里，这样的区有30多个。卡冈诺维奇抓住他的发言做文章，说"波斯特舍夫在这次全会的发言是在重复敌视党的言论"。其他人也跟着批判波斯特舍夫。[1] 1938年2月，波斯特舍夫被捕，被指控参加了右派—托洛茨基阴谋，充当日本、波兰和德国的间谍，1939年被处死。

罗伯特·因德里克维奇·埃赫，拉脱维亚人，1905年人党，1935～1938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7年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37年改任农业人民委员，1938年4月被捕。埃赫在法庭上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声明说，"在似乎是我交代的供词中，除了下面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这些签名也是被迫的。供词是在审讯员的压迫下制造出来的，从我被逮捕时起，就开始对我实施严刑拷打……审讯人员还利用我有病的身躯（我的脊柱已经被折断），在上面击打，就像在琴键上做的那样。这是无法忍受的酷刑……我没有犯罪，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活动"。1940年2月他被处死。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德边科、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格列鲍夫－阿维洛夫）在这次清洗中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1937～1938年被

---

①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66～567页。

捕后牺牲的政府领导人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重工业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瓦·伊·梅日劳克，接替梅日劳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 Г. И. 斯米尔诺夫，国家计委副主席 Э. И. 克维林，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В. В. 施米特和 Н. К. 安季波夫，国防工业人民委员 М. Л. 鲁希莫维奇，司法人民委员 Н. В. 克雷连柯，农业人民委员 Я. А. 雅科夫列夫，财政人民委员 Г. Ф. 格林科，轻工业人民委员 И. Е. 柳比莫夫，林业人民委员 В. И. 伊万诺夫，食品工业人民委员 С. С. 洛博夫，国内贸易人民委员 И. Я. 魏采尔，卫生人民委员 Г. Н. 卡明斯基，邮电人民委员英·安·哈勒普斯基，水运人民委员 Н. И. 帕霍莫夫，机器制造业人民委员 А. 勃鲁斯金，国营农场人民委员 Г. Н. 卡尔马诺维奇和 Н. Н. 杰姆钦科，国家银行管理局主席 Л. Е. 马里雅辛等。

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 年 10 月到 1937 年 3 月底，大约有 2000 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交通人民委员部在 1936～1938 年间，有 13 名副人民委员，65 名铁路局局长，63 名政治部主任和铁路局副局长被逮捕。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人除外），绝大多数的专家工程师都遭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依靠的惩罚机关。但他们知道的镇压内幕太多了，斯大林不能留下这些见证人。另外，他们是第一线执行人，积怨很深，正好是缓解民怨的替罪羊。因此内务部的清洗更是突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处死后，他的副手——副内务人民委员，以及各司司长都先后被逮捕处死。叶若夫后来承认他“清洗了 14000 名肃反工作人员”，还说他“最大的过错是清洗得少了”。[1] 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贝利亚上台后，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内务部下属的各局局长和他们的助手。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1930 年代，苏联有 5 名元帅，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外，其他 3 名遭镇压。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后，下一个受迫害的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他在国内战争期间，任远东共

[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4 卷，第 447 页。

和国总司令，五次获得红旗勋章。1924～1927年他到中国，任广州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加仑将军。1929年起，他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8年夏，他指挥红军打败日军在张鼓峰的入侵，10月被逮捕，11月被秘密处死，但一直没有公布这一消息。另一位元帅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内战期间先后任南方和西南方方面军司令，方面军委员是斯大林；1931～1937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被捕，1939年2月遇害。1956年，为这两位元帅恢复了名誉。

此外，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伊·费·费季科和弗·米·奥尔洛夫，红军副总参谋长В. Н. 列维切夫和谢·亚·梅热尼诺夫，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Г. А. 奥谢皮扬，海军人民委员彼·亚·斯米尔诺夫，副海军人民委员П. И. 斯米尔诺夫（斯韦特洛夫斯基），海军司令米弗·维·克托罗夫，海军参谋长Л. Г. 斯塔谢维奇，黑海舰队司令伊·库·科扎诺夫，北方舰队司令康·伊·杜舍诺夫，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彼·基列耶夫，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И. Н. 科达茨基－鲁德涅夫，莫斯科军区司令С. П. 乌里茨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米·德·韦利卡诺夫，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弗·古比雪夫，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伊·伊·加里卡维，中亚军区司令伊·肯·格里亚兹诺夫，乌拉尔军区司令鲍·谢·戈尔巴乔夫和Я. П. 盖利特，哈尔科夫军区司令伊·纳·杜博沃伊等都遭镇压。

对红军将领的镇压规模巨大。被枪杀的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①] 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②]

丹尼洛夫依据档案资料认定，1937～1939年有24574名军官遭迫害，其中9579人被逮捕，14968人被清除出军队，但11178人又重新返回军队。[③] 另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937～1939年间陆军中共有36898名军官被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0页。

②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 385.

③ *Данилов В. Д.* Советское Главн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8，No. 6，с. 5.

解除了职务，其中28685人是因政治或民族原因被处理的。1938～1939年，有11178名被解除职务的军官重返军队。到1940年1月1日，遭迫害的军官为17981人。[①]

根据军事审判厅厅长向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军事法庭的工作报告，编制出工农红军干部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表如下：[②]

	中高级领导干部	初级指挥干部	士　兵	共　计
1936年	79	166	680	925
1937年	957	578	2544	4079
1938年	756	366	2010	3132
1939年	365	98	636	1099
1940年	61	160	1382	1603

由此可见，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被审判的军人有10838人，其中中高级领导干部为2218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因为1937年的数据不包括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决的“法西斯军事阴谋”和“右派—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包括内务部“特别会议”及其他非司法机关判处的人员，而对这些人的统计数字至今尚未进行足够的研究。有人统计，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被判处反革命罪的有3777380人，其中2900000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的，占76.7%。假设非司法机关对军人审判的比例与上述平民的比例相同，那么，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受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审判的中高级军官为9519人。

地方党政机关也被镇压浪潮席卷。在俄罗斯联邦，90%的州党委和州执委委员遭镇压。列宁格勒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骨干几乎全部被消灭了。1935～1940年间在列宁格勒有68088人被镇压。[③] 在绝大多数自治共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No. 1, c. 188－189.

② Р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9，оп.29，д.383，л.19－20，74－75；АВКВСРФ（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оп.1，д.1а，л.4－9、44－47，62－64；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8131，оп.27，д.540，л.108－109。

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9页。

和国、边疆区、州和市、区，有2/3的党政领导人遭到逮捕。

一般的党员也遭清洗镇压。1937～1938年受迫害的党员共达116885人，占党员总数的1/9。[①] 这里指的是被逮捕时仍是党员的人数，如果把曾是党员的人也算进去，数目就要大得多。

一些仍留在工作岗位上的领导人的亲人也遭到逮捕，如加里宁的妻子，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不知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想通过这件事来考验或威胁他的下属。

对各民族共和国党政干部的被镇压

乌克兰受到沉重打击。1937年8月，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到基辅，要求乌克兰党中央对其中央书记柯秀尔、人民委员会主席 П. П. 柳布琴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投不信任票，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书记，遭到乌克兰党中央拒绝。后来，莫洛托夫提出邀请乌克兰全体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2人到莫斯科讨论此事。柳布琴科预感后果的严重，并担心自己的家属也会遭迫害，他先打死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身亡。其他人去了莫斯科，最后只有彼得罗夫斯基等3人活了下来。[②] 1938年1月，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在1938～1940年间，在乌克兰有167565人被逮捕。[③]

在白俄罗斯，马林科夫和叶若夫编造谎言，说那里存在一个以党政领导人为首的反苏地下组织。这使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逮捕镇压。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 Н. М. 戈洛杰德，白俄罗斯党中央常务局委员 А. Г. 切尔维亚科夫等被杀害。白俄罗斯党组织人数减少一半。[④]

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的众多领导人遭到迫害。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Г. М. 穆

---

① Долг памя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Правда, 13 апреля, 1991.

②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2～323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1页。

④ 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428～429、419～420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3页。

萨别科夫遭杀害。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 A. 汉姜，中央书记 C. 斯拉比奥尼扬（卢卡申）、A. 约尼扬、Г. 奥弗谢比扬和 A. 科斯达尼扬，人民委员会主席 C. M. 捷尔－加布里耶梁，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C. 马尔蒂基扬被镇压。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 P. A. 阿洪多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古塞恩·拉赫曼诺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C. M. 埃芬季耶夫遭杀害。在格鲁吉亚，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 M. Д. 奥拉赫拉什维利，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 Л. И. 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等人被处死。1937 年召开的格鲁吉亚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共有 644 名代表，不久以后有 425 人被逮捕或处死。[①]

中亚共和国受到的清洗更是惊人。1937 年哈萨克党中央常务局的成员无一例外地被逮捕处决。牺牲的有中央书记 Л. И. 米尔佐扬、C. 努尔皮伊索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У. Д. 伊萨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У. 库鲁姆别托夫等人。

土库曼党中央书记 T. A. 穆哈默多夫和 Я. A. 波波克，人民委员会主席 K. 阿塔巴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H. 艾塔科夫等人被镇压。只有 120 多万人口的土库曼在 1937 年 8 月到 1938 年 11 月共有 15660 人被判刑，其中 5008 人被处决。[②]

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 A. И. 伊克拉莫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Ф. 霍贾耶夫被处决。1937～1939 年间，在乌兹别克有 4.1 万人被逮捕，6920 人被处死。

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 M. K. 阿姆莫索夫、第二书记 M. Л. 别洛茨基、监察委员会主席 Д. C. 萨达耶夫等人被处死。

在塔吉克共和国，内务部揭露了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说它与托洛茨基中心、伊朗、阿富汗、日本、英国和德国有联系。这个组织的领导有塔吉克党中央书记 Ю. 阿舒罗夫和 A. 弗罗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 A. P. 拉希姆巴耶夫和 12 名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C. 绍捷莫利，以及塔吉克党中央几乎所有各部的部长和 18 名区委

① 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 341～343、468～472、512 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 323～326 页。

② 李宗禹：《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 187 页。

书记。[1]

仅1937年，中亚地区基层党组织干部的55.7%、区党委干部的78.8%被清洗。[2]

在俄罗斯联邦的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党政干部普遍遭迫害。卡累利阿、鞑靼、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科米自治共和国以及犹太自治州的党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均被逮捕处死。北奥塞梯自治州的11名州党委成员中有9人被捕。

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令，于1937年7月25日签署了第00439号命令，要求各地方机关在5天内逮捕所有在军事工厂和铁路运输部门工作的日耳曼人。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即远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4.2万日耳曼人被处死。

在1937年8月25日到1938年11月15日的反民族主义分子战役中，两人小组和特别三人小组共审理了335513人的案件，其中247157被判处枪决。[3]

对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镇压

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引发了众多严重问题，生物学界也因此受牵连。特·杰·李森科等人曲意迎合政治需要，不断高升，而诚实的生物学家因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打击。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Н.И.瓦维洛夫是世界著名的育种学家、遗传学家。他搜集了世界各地的5万个野生植物标本和3万多个小麦样品，带回苏联进行遗传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1926年获得列宁奖金，却于1940年无辜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亚·伊·穆拉洛夫，以及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都遭镇压。更多的生物学家被逮捕流放。植物学家А.А.米歇耶夫在克累马河集中营[4]被毒打致死。著名的外科医生К.Х.科赫教授也关在克累马河集中营，因没有完成开采黄金的定额被枪决。

国防工业的许多科学家受到迫害。坦克设计师В.И.扎斯拉夫斯基，

① 中亚各共和国的大清洗情况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329～333、432～438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6～327页。

② 雷振扬：《斯大林民族政策评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第19页。

③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Мемориала". Вып. 1, с. 33.

④ 克累马河集中营位于伯力附近，是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许多无辜者在这里被迫害致死。

无后坐力炮发明者Л·库尔切夫斯基等众多军械武器设计师遭诬陷被处决。著名的飞机设计师A. H. 图波列夫于1937年10月21日被逮捕，被指控参加“俄国法西斯党”，进行破坏活动。同年，被逮捕的还有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帖·克列伊梅诺夫，他的助手、“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人Г. Э. 朗格马克，以及B. П. 格卢什科。他们的罪名是在火箭科学研究所内建立“反革命组织”。由于被逮捕的工程师非常之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集中关在一个特别监狱中，继续进行各种武器的设计开发工作。早在1929年就在布特尔监狱内设立了内部监狱设计局，为首的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H. H. 波利卡尔波夫和Д. П. 格里戈罗维奇。设计局后来迁到霍德飞机场地区，改名为中央设计局——第三十九号。后来又陆续设立了多个监狱设计局，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一般称为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在那里工作过的有6名科学院院士（谢·帕·科罗廖夫、尤·阿·克鲁特科夫、亚·伊·涅克拉索夫、鲍·谢·斯捷奇金、尤·鲍·鲁麦尔、安·尼·图波列夫），17名总设计师，12名教授和科学博士，将近200名囚徒科学家。[1] 火箭专家C. П. 科罗廖夫于1937年被捕，次年6月被判刑，在克累马河黄金矿当苦力，后调到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1944年被减刑提前释放。他后来成为苏联火箭总设计师，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И. З. 舒尔特被镇压。领头的物理学家如伊·叶·塔姆、B. A. 福克等遭诽谤，被指责为“唯心主义者”和“敌对思想的走私犯”。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M. П. 布朗施坦也遭到镇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米·费多罗夫斯基于1937年被逮捕判刑，他是实用矿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负责组建和领导矿物科学研究所。

各厂矿、企业、工地、铁路成千上万的领导人和工程师被逮捕、判刑、处死。全国瞩目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领导人瓦·米·米哈伊洛夫和谢·米·弗兰克福特被镇压。荣获各种勋章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E. C. 古戈列，车里雅宾斯克联合企业的负责人B. A. 雅可夫列夫，马克耶夫卡联合企业的经理Г. B. 格瓦哈里亚被逮

[1] 参见沙拉金《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崔芝远、傅士彬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14~18页。

捕处死。重工业部掌握着200家大型机器制造厂，这些厂长几乎全部先后被逮捕，其中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机厂、高尔基汽车厂、乌拉尔汽车厂、基洛夫（原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等工厂的厂长被处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制造厂在1937~1938两年中，从事行政技术工作的人员差不多全部被消灭了。遭镇压的有工厂的总机械师、计划生产科长、各车间主任。各铁路局的局长也几乎都遭镇压。[①]

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专家遭到专横的批判后，又被逮捕判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 B. Г. 克诺林、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弗·哥·索林、基辅语言学院院长 H. M. 西雅克、解出通古斯象形字的语言学家 H. A. 涅夫斯基以及曾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哲学课的扬·斯特恩等人均被镇压。更多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语言学、教育学家被逮捕，不少人死于监狱或集中营中。哲学家 Л. П. 卡尔萨温死于集中营。[②]

1930年代被逮捕的作家有600多人，占作家协会成员的1/3。著名的作家波·安·皮利尼亚克、加·谢列布里娅科娃、伊·埃·巴别利；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遇害。戏剧导演弗·埃·迈耶尔赫里德死于狱中。各少数民族的文艺家普遍受到迫害。[③]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外国侨民的镇压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援委员会都进行了清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И. A. 皮亚特尼茨基于1939年被处死。

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其中包括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库恩·贝拉都被杀害。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居什奈尔·卡尔菲加利波维奇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指控其领导机关为间谍所渗入，被第三国际解散。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抓。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尤·伦斯基-列什琴斯基，中央领导成员爱·普罗赫尼亚克、玛·

① 参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54~157页。

②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53~365页。

③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65~373页。

柯秀茨卡、阿·瓦尔斯基、耶·伦格等在苏联被处决。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Г. 列梅克、Х. 埃别尔莱恩、Г. 诺伊曼，希腊共产党总书记A. 孔塔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M. 戈尔基奇、B. 乔皮奇、M. 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A. 绍特曼、Г. 罗维奥被镇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苏联指导他们党的活动，1930年代遭逮捕遇害。[1]

1937年8月11日，叶若夫下达第00485号命令，要求逮捕“（1）在审讯过程中被查明和根据所附的名单至今未被找到的最积极的‘波兰军事组织’成员；（2）所有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俘；（3）从波兰来的投敌分子，不取决于他们转入苏联的时间；（4）从波兰来的政治侨民和政治交换人员；（5）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和波兰其他反苏维埃政治党派的人员；（6）波兰地区各地防范苏维埃民族主义分子中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员”。[2]

1937年10月23日，叶若夫签署第00693号命令，强调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打着政治避难的旗号进入苏联，因此“对于一切投诚分子，无论其进入我们境内的动机和情况如何，一律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3] 这样一来，为了躲避迫害而来的兄弟党干部，为了寻求更好生活而来的外国劳动者都遭逮捕。1938年4月12日，《莫斯科报》[4] 发表社论，说“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想法。当时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70%以上被逮捕。[5]

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侨民也遭到迫害镇压。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大概有50万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去从事后方工作的。[6] 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工作，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两国关系紧张。斯大林下令逮捕在莫斯科的中国人；1930年代，进而迫害中国

---

①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45～352页。

②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с. 190.

③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с. 190.

④ 《莫斯科报》是周报，1934年4月至1939年5月用法文出版。

⑤ 迪特里希给德共中央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处的报告（1938年4月29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23、424页。

⑥ Правда, 2 сентября, 1989.

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于1935年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但于1938年2月23日被逮捕。苏联军事审判厅指控他为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间谍、恐怖集团首脑。[①] 1938年，爆发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参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②]

五　大清洗运动的尾声及其严重后果

大清洗运动的逐渐结束

1930年代苏联出现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联共（布）缺少执政经验有关，但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斯大林应承担主要责任。他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来说明镇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以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亲自领导了这场大清洗，迫害一切他不信任不喜欢的人，包括他的亲属、密友和得力部下。斯大林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以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的朋友、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特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卡拉汉。

斯大林充分利用苏维埃体制的缺陷，依靠内务部和检察院，破坏法律，恣意横行，无人能拦，也无人敢拦。他还利用群众对官僚的不满、对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担忧，制造遍地有间谍特务的谎言，把矛头指向一切他所称的人民敌人，把一场灾难和罪行导演成保卫革命的战斗。

斯大林亲自坐镇指挥镇压行动。1937～1938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内务部领导人278次，时间多达834小时。[③] 斯大林和他的左右手批

① 参见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人民出版社，2005，第246～248页。

② *Коровяковский П.* Китайцы Жертвы Сталинской Репре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No. 2. с. 143－144.

③ Marc Jansen，Nikita Petrov：*Stalin'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s Commissar Nicolas Ezhov*，1895－1940，Stanford，Californi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pp. 205、207.

准处决大批领导干部。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 1937～1938 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 383 份名单，涉及 44465 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 39000 人被确定为枪决。就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的 362 份，莫洛托夫 373 份，伏罗希洛夫 195 份，卡冈诺维奇 191 份，日丹诺夫 177 份。①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 1938 年 12 月 12 日一天就批准枪决 3167 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要比上面提到的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②

在大清洗大镇压中，斯大林的助手起了恶劣作用。莫洛托夫积极参与和组织大清洗运动，特别是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镇压。伏罗希洛夫则对镇压军队将领负有直接责任。卡冈诺维奇亲自组织了许多镇压行动，扮演了一个瘟神的角色。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乌尔利赫、维辛斯基等则是第一线的刽子手。此外，日丹诺夫、赫鲁晓夫、米高扬、马林科夫都卖力推行清洗镇压活动。可悲的是，后来被迫害处死的波斯特舍夫、柯秀尔、邱巴尔也积极参与了镇压行动。1938 年秋，苏联民间流传说，苏联全境只有 5 个人确保不会遭镇压——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当 1938 年 2 月叶若夫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时，人们既惊讶又困惑。后来将 5 人改为 6 人，用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替代了叶若夫。③

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不仅引发人民的不满和恐慌，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直到 1938 年 9 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中以后，斯大林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镇压的行动。

1938 年 11 月 17 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指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的缺点和歪曲事实的现象”。④ 内务部于 11 月 26 日发布命令，“立即停止所有大规模逮捕和强行迁出行动”。⑤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27 页。

② 参见 *Афанасьева Ю. Н.* （*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 525；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 557 页。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1937 – 1938 год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No. 1, с. 202.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4 卷，第 436、438 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7 卷，第 11～16 页。

斯大林精心安排了结束大规模清洗镇压的进程。早在1938年8月，拉·贝利亚就被委派为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准备全面接管内务部的工作。11月17日的决议又进一步宣告，“人民的敌人和钻进中央以及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分子，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搞乱被侦查的案件和间谍案件，故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逮捕，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伙伴，尤其是钻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同伙免于被粉碎。”[①] 11月19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关于内务部内潜伏有间谍特务问题的声明。叶若夫知道这些行动都是针对他的，便于11月23日主动请辞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第二天，政治局决定“满足叶若夫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保留党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几个月后，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恶贯满盈的叶若夫自知“性命当然保不住了”，在法庭上说，“我只有一点请求，请从容地处决我，不要折磨我”。为了表白他至死都是忠顺奴才，他最后说，“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②] 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入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停止了。几十万个案件本已在内务部机关做了准备，现在被搁置到一边。还成立了以A. A. 安德烈耶夫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内务部的工作。1939年3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含糊地表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③] 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更列举了诬陷好人的例子。平反工作随之展开。

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中下级指挥员。这显然同国际形势紧张、军队干部缺乏有关。被平反的人很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将领，如K. K. 罗科索夫斯基、K. A. 梅列茨科夫等。

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平反。如有名的物理学家Л. 兰道和阿·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33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49、450页。

③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文集》，第268页。

贝格在战争爆发前夕被释放了。图波列夫等10多名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细菌生物学家П. 兹德拉多夫和Б. А. 季利别尔等人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

这次平反规模有限，只涉及几万人。而在平反的同时，新的镇压一直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运动的尾声中断送了性命。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枪决3167人。[①] 1939年3月6日，乌尔利赫向斯大林报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在莫斯科不公开地审理了436人的案件。413人被处枪决。判决已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予以执行。”[②] 前面提到过，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就是在1938年被捕，1940年被处死的。著名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也是在1940年被捕的。

尽管清洗镇压活动在1939年以后仍在继续，但随着战争的逼近，大清洗、大镇压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最终还是逐渐结束了。

大清洗的惊人规模

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涉及的面极为宽广，受迫害的人数多得惊人。В. П. 波波夫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处代理处长帕夫洛夫上校整理的资料绘制了苏联被判刑人数统计表。制表日期注明为1953年12月11日。

这份资料中有两处显然不准确。一是表中第8栏所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判刑的人数，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于1934年撤销。二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刑的人数（第9栏）从1924年即开始列入表中，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到1934年11月5日才成立。因此，列入上述年份的判刑人数应计入该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资料上有铅笔写的标注：“1921～1938年判刑人数共计2944879人，其中30%（1062000人）是刑事犯。”

---

①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618页。
②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612页。

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

判刑人数统计（1921～1940年）

年份	判刑总数	其中				判刑人			
		极刑	集中营和监狱	流放驱逐	其他	法庭和法院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会	特别会议	三人小组
1921	35829	9701	21724	1817	2587	35825		无资料	
1922	6003	1962	2656	166	1219	6003		无资料	
1923	4794	414	2336	2044	—	4794		无资料	
1924	12425	2550	4151	5724	—	3059	—	9366	—
1925	15995	2433	6851	6272	437	—	2284	9211	4490
1926	17804	990	7547	8571	696	—	2323	13102	2379
1927	26036	2363	12267	11235	171	—	34334	15947	6655
1928	33757	869	16211	15640	1037	—	3756	25844	4157
1929	56200	2109	25853	24517	3741	—	10262	37197	8761
1930	208069	20201	114443	58816	14609	—	9072	19377	179620
1931	180696	10651	105683	63269	1093	—	13357	14592	152747
1932	141919	2728	73946	36017	29228	49106	6604	26052	60157
1933	239664	2154	138903	54262	44345	214334	—	25330	—
1934	78999	2056	69451	5994	11498	32577	12588	1003	32831
1935	267076	1229	185846	33601	46400	118465	—	29452	119159
1936	274670	1118	219418	23719	30415	114383	—	18969	141318
1937	790665	353074	429311	1366	6914	39694	45060	17911	688000
1938	554258	328618	205506	16842	3289	95057	—	45768	413433
1939	63889	2552	54666	3783	2888	—	50868	13021	—
1940	71806	1649	65727	2142	2288	—	28894	42912	—

资料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361～362页。

苏共中央特设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资料，于1956年2月9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报告，列表说明1935～1940年镇压从事反苏维埃活动分子的规模如下表。[①]

①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с. 190.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被逮捕的人数	114456	88873	918671	629695	41627	127313
其中被枪决者	1229	1118	353074	328618	2601	1863

从上面的两表可以看出：1930～1940 年判刑人数总共为 2871711 人，比 1921～1929 年的 208843 人增加 10 多倍；其中判处死刑的相应为 726030 人和 23391 人，扩大了 30 多倍。

1935～1940 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 1920635 人，其中被处决的有 688503 人。1937～1938 年是高潮，每年逮捕和处决的"人民的敌人"比此前的 1936 年陡增约 10 倍。两年被逮捕的共 1548366 人，其中被处决的有 681692 人。

需要指出的是，判决多数不是法院做出的，而是公安机关（内务部的特别会议、三人小组）决定的。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统计，1937～1938 年判刑的 1344923 人中，134751 人是司法机关做出的，1210172 人是非司法机关做出的。[1]

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1939 年多达 352508 人，远远超过沙皇时代关在监狱中的囚犯数目：1901 年为 84600 人，1912 年达到高峰——184000 人。[2] 除了监狱外，苏联还在边远地区设置了集中营。1930 年 4 月 25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 4 月 7 日的决议颁布了 130/63 号命令，成立劳改营管理局。后改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劳改营最初设在极北和远东地区如白海的索洛维茨岛，进一步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系统。后来又设立了劳改区，关押刑期在 3 年以下的犯人。集中营和劳改区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经常得不到遵守。1932 年全苏有 11 个劳改营。1940 年 3 月 1 日，扩展为 53 个劳改营，475 个劳改区，在押犯人共有 1668200 人。[3] 这一年年初，劳改营中有 7124 名 18 岁以下的孩子，19497 名 60 岁以上的老人，108898 名妇女。犯人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

① *Попов В. П.*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ррор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23～1953гг.：источники и их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1992，No. 2，c. 28.

② *Смирнов В.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ичины крах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СССР//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2，No. 6，c. 107.

③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под 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c. 330.

繁重，成批死去。1935 年死去 32659 人，1936 年 26479 人，1937 年 33499 人，1938 年猛增到 126585 人，1939 年 65301 人，1940 年 56703 人，6 年共有 341226 人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①]

依据俄国现有档案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是，1937～1938 年有案可查的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大约为 150 万人，被处死的近 70 万人。但是这并不是最后定论。俄国学者泽姆斯科夫依据档案资料计算出，1937～1938 年共逮捕 3141444 人，其中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的 1575259 人，犯有刑事罪行的 1566185 人。由于刑事罪的内涵不清，能确定为单纯刑事犯的（如流氓小偷等）为 647438 人，剩下的 918747 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尚需研究。如果把他们归为第一类，则遭政治迫害的大约有 250 万人。[②] 另外，除被处决的外，1935～1940 年死在监狱和劳改营的囚犯还有 341226 人。[③]

上述数字并没有全面反映斯大林的迫害镇压规模。如果从整个 1930 年代看，遭迫害的还有人数众多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在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 1929 年到 1933 年间，共有 519600 富农分子被逮捕[④]，其中仅在 1930 年就有 20201 人被枪决。[⑤] 另外，大约有 120 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并被强制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移民。许多人在恶劣条件下死去。[⑥]

此外，1937～1938 年还开展了反民族主义分子的战役。1937 年 8 月 2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将远东边疆区的全部朝鲜人迁出。到年底，大约有 17.5 万朝鲜人被强制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⑦]

关于大清洗中遭迫害的人数，还有其他的说法。米高扬提出，从 1935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Заключённые в 1930 – е годы: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No. 4, с. 69, 63.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 1937 – 1938 год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No. 1, с. 203.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Заключённые в 1930 – е годы: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No. 4, с. 63.

④ Кентавр, 1990, No. 3 – 4, с. 59.

⑤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и власти в 1930 – 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1996, с. 19.

⑥ Кентавр, 1990, No. 3 – 4, с. 60.

⑦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第 363～433 页。

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有1900万人遭迫害，其中700万人被处死。[1]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说，从1930年到1953年有3778254人受迫害。雅科夫列夫在1997年把这一数字扩大为480万。[2]

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一书中说，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3] 而《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1930年代被镇压的人数大约为1600万，其中：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1937~1938年有68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有将近220万的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流放区。[4]

大清洗的严重后果

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浩劫，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

大清洗使数百万上千万的干部和群众蒙受各种不白之冤，无辜遭受迫害甚至被夺去宝贵生命。它使国家失去众多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和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还使大批红军将领遭清洗，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在卫国战争初期接连败退。

大清洗严重破坏了民主与法制，把阶级专政发展成为国家对社会的恐怖，把公民的所有活动都置于国家监管之下。它破坏了社会的正常运转，片面依靠暴力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克服危机，实施目标。清洗和镇压最终成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本质特点。它使初创的、本身存在严重弊端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日益僵化，失去了自我改进的动力。

大清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被卷入迫害镇压的浪潮中，失去人格，不敢坚持正义，甚至还会造谣中伤他人，以告密求安求荣。干部没有安全感，唯上是听。个人崇拜盛行，国民素质下降。所有这些，都展现了

---

[1] R. W. Davies, "Economic Aspects of Stalinism", in A. Nove (ed.), *The Stalin Phenomenon*, London, 1993, p. 70.

[2]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97, No. 27.

[3]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 p. 189.

[4] *Куртуа С. и др.* Чёрная книга коммунизма, с. 207.

斯大林模式的致命缺陷。大清洗表面上加强了团结一致，实际是加深了社会的内在矛盾，使苏联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是战争的逼近才使危机在1930年代没有爆发出来，但矛盾也越积越大越深，埋下了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祸根。这一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

吉林大学　李庆华

古拉格（Гулаг）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3 年 7 月 6 日至 1934 年 7 月 10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1934 年 7 月 10 日至 1946 年 3 月）—内务部（1946 年 3 月至 1953 年 4 月）—司法部（1953 年 4 月至 1954 年 2 月）—内务部（1954 年 2 月至 1960 年）下属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简称。从 1930 年至 1960 年它先后多次改名：1930 ~ 1934 年，称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1934 ~ 1938 年，更名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劳动居民和关押地管理总局；1938 ~ 1941 年，则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居民管理总局；1946 年至 1953 年 4 月，被称为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3 年 4 月至 1954 年 2 月，改称为苏联司法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4 年 2 月至 1959 年，易名为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9 ~ 1960 年，则称苏联内务部关押地管理总局。虽然如此，古拉格这个缩写词的简称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形式上，古拉格存在于 1929 ~ 1960 年期间，实际上却产生于 1918 年。

自“1930年4月25日成立”[1] 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开始解体的20多年间，古拉格在斯大林加速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承担了无数大型工业项目的设计、建设或生产等任务。1930年下半年，在它刚刚成立不久便承接了大型项目“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施工任务，并在两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工；1931年11月11日，承接了在“克雷马河上游开采金矿工程”；1932年9月30日，承接了“伏尔加—莫斯科河运河工程”，随后又承接了“远东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工程、伯朝拉河流域煤炭、石油及其他资源开采工程、共青团城建造船厂工程，以及为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采伐原木和木材”等生产任务。如果说“1928～1933年克雷马河金矿采金量为1937公斤”的话，那么在古拉格成立后的1934年则发生了转变。“1934～1936年间，包括远北工程管理总局在内开采了53吨多黄金，而1937年开采了51.5吨黄金”；“1935年1月，古拉格承接了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团城180公里铁路建设任务”；“6月23日，承接了诺里尔斯克镍联合企业工程；7月29日，承接了谢格扎木材造纸化工联合企业纸浆厂工程；9月14日，承接了乌格利奇和雷宾斯克地区水利枢纽工程任务，年底承接了公路工程任务”；“1937～1938年承接了大量的木材采运任务（1938年古拉格森工企业运出2290万立方米木材，比1937年多2倍）”，“1938～1939年，古拉格的木材采运量占苏联的13%”；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的大部分军工企业和设施是古拉格承接完成的，如“远东和欧洲北部的庞大铁路建设工程、连接波罗的海、白海和里海的伏尔加河—波罗的海和北德维纳河水路设施、水电站和码头的建设，金、镍、锡、铜等有色金属，以及铝、磁铁、石油基地、飞机制造厂、公路设施的建设等”；“1941年为国防部新建和改建了251个飞机场”。20世纪50年代初期，古拉格工业产品的相对指标额并不大，企业产品的批发价仅为国家工业品总额的2.3%，但是，其某些产品却占领先或绝对优势地位，例如，“1952年锡产量大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0%，镍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从1950年起，古拉格承建了“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伏尔加河—波罗的海运河、土库曼运河、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

[1]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Конец 1920 – х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1950 – х годов. Собр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7 т.，Том 2. Ка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структура и кадр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 81.

等水利设施。古拉格还承建了一些军工设施，尤其是“在苏联核方案实施处于关键时期的 1947 ~ 1948 年，古拉格经济成分中承建核工业设施的比重从 24.6% 增加到 30.5%，1949 年为 21.3%”等。① 由此可见，俄罗斯史学家们称古拉格是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② 不无道理。

迄今为止，俄罗斯出版的关于苏联古拉格历史的著作已有数千本之多，但对苏联古拉格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应当认为始于俄罗斯开放档案之后，因为苏联惩罚机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档案资源的公开解密，实质性地改变了局面，为史学家们对古拉格历史进行研究开辟了新前景。总体上说，近年来俄罗斯史学界对古拉格历史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积累的独特的第一手新资料，首先是近年来刚解密的档案资料和有关对苏联惩治机构的结构、活动、公文处理机制等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研究，目前已整理出并由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出版的七卷集文献《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是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不仅为研究这个复杂而又大量的解密文件系统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也为全面深入研究古拉格的历史提供了可能。目前已有许多俄罗斯史学家开始出版运用档案资料研究的成果，如斯米尔诺夫编撰的《1923 ~ 1960 年苏联劳动改造营制度》，库库林等撰写的《古拉格：1918 ~ 1960 年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鲍罗德金等撰写的《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伊万诺娃·加丽娜·米哈伊洛夫娜撰写的《1918 ~ 1958 年古拉格历史》等著述。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将在俄罗斯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仅从理论和实践视角入手，透视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建立的历史过程，从而为揭示古拉格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强制劳动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

古拉格经济机构的产生、发展和衰亡都与使用强制劳动密切相关。

①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с. 69 – 75.

②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8.

“‘强制劳动’的说法最早是由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活动家、第三等级代表拉鲍·谢恩特·埃季耶恩作为政治法律词汇加以使用的。他认为，强制劳动是针对自由人而言的‘自由劳动’的对立面”。[①] 史学家苏斯洛夫认为，强制劳动是以强制为主要刺激手段的劳动。如果说什么人在苏联从事强制劳动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想到的是囚犯、特殊移民、劳动大军、战俘、被中立国或交战对方拘留人员、检查—审查劳动改造营的囚犯，即那些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的文件中被列为“特殊人员”（即囚犯），也就是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督之下，或多或少公民权利受到限制，通常情况下被强制参加劳动的居民。“强制劳动”这一术语，狭义上指的是“特殊人员”的劳动，而不是指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督之下工人的“自由劳动”。[②] 本文使用“强制劳动”这一术语，专指苏联古拉格囚犯的劳动，它作为一种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方法产生于苏维埃的理论。

不劳动者不得食——通过劳动对旧时代的不劳动者进行改造

古拉格的强制劳动作为一种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方法产生于苏维埃的理论。“广为人知的布哈林关于‘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无论听起来多么离奇，但却是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培养成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的观点，实际上是惩治政策的理论基础”。[③]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强制是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法”。[④] “对于各种强制措施的益处，普列汉诺夫建议从原则的角度来加以评价：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⑤] 劳动组织强制措施的积极拥护者托洛茨基就此写道：“我们做的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为了大多数劳动者自身利益组织劳动的尝试。但是这并不排除各种形式的最温和的和极为强硬的强制手段。”[⑥]

---

①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6, с. 223.

②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255 - 256.

③ *Бухарин Н. И.*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кн.: Бухарин Н. И.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с. 168.

④ *Бухарин Н. И.* 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с. 139.

⑤ *Ленин В. И.* Плеханов о терроре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5, с. 184 - 185, 转引自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93.

⑥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6, с. 129.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实行“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政治体制，摒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1906年和1920年，列宁曾经两次重复提到过专政的以下定义：“专政的科学概念不是指别的，而是指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法律、任何绝对规则限制，直接依靠强制的政权。”[①]

上述思想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确立之时所制定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对全民劳动责任的理解中得到了体现，它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在苏维埃俄国境内的每个人都要参加劳动，由此便出现了对那些不是劳动者的人们，其中包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代表等采取强制劳动措施的实践依据。

十月革命胜利后，“被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同代替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刚刚发生大变革之后，人民的生活中就立刻清晰地出现了许多就原先的活动或生存条件而言同新的生活方式产生明显矛盾的人群。这种矛盾如此尖锐，以至于新政权不得不同其进行严肃的斗争，并因此将已计划好的全民劳动义务工作延缓到更有利的时期开展。在弄清除了内部反革命势力之外，还有外国列强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的敌人时，就更增强了这种斗争的必要性。于是，在危险局势的影响下产生了建立强制工作营的想法，并根据1919年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始了强制工作营的组建工作”。[②]

1920年1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工作的报告也指出，“组织强制工作营的思想产生于1918年，当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协约国积极地协助白军，于是在内部反革命势力竭尽全力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在旧官员仍继续怠工、经常拒绝在苏维埃机关和企业工作；或即使在其中工作也破坏工农政府威信的情况下，被迫投入一批不劳而获者和不劳动分子来巩固靠近前线的城市。资本家不顾严重的粮食危机，隐藏粮食，希望借此引起群众的不满等。为了把危害分子从社会中隔离出来，苏维埃政权承认了主要是在省会城市设立强制工作营的合理性。关押犯过各种罪行的人，被判处投机、怠工、职务犯罪等人员，明显的人民压迫者和剥削者，以及资产阶级和沙皇贵族制度的拥护者，通过强

①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с. 93.

② *Петров Н. В.*（*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545－546.

制劳动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迫使其抵偿自己所犯罪行”。①

1918年7月2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关于失去自由人员及其惩罚措施和服刑制度》的暂行规定。该规定指出：“司法人民委员部关押地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劳动对囚犯进行再教育。如果囚犯拒绝劳动，则要将其全部生活费开销直接计入到其分户账上，而且这类囚犯只能在他们刑满时才能获得释放（甚至即使法庭判决规定的刑期期满也不予以释放）。那些顽固不化的囚犯被视为‘死不改悔者’，对他们采取了诸如减少口粮和关入隔离室（特别监狱）的惩治措施。因此，囚犯应当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补偿政府对其生活费开支的‘自负盈亏’原则，被视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关押地发挥职能的原则”。②

1918年9月2日，在有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代表出席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和莫斯科区特别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全俄特别委员会下达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命令：“①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派全部重要人物，并将其关进监狱。②逮捕如：人质、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厂长、商人、反革命神甫和所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军官，并将这些人全部关押到集中营，设立最严密的警戒，迫使这些老爷们在看守的监管下去工作”。③

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12月1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劳动法典》，规定对16～50周岁有劳动能力者实行劳动义务制；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政权机关有权对他们实行强制。1919年2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捷尔任斯基对使用囚犯劳动的必要性问题做了如下阐述：“除了进行法庭审判外，还必须保留行政审判，确切地说，就是集中营。直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劳动中还远没有使用被捕人员的劳动，因此我建议，为了使用被捕人员的劳动，为那些不干活的老爷们，为那些不强迫就不干活的人留下这些集中营。如果我们以苏维埃机关为例的话，那就应该对玩忽职守、迟到等工作态度采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534－536.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4.

③ *Кокурин А. И.*，*Петров Н. В.* （*сост.*），*акад. Яковлева А. Н.* （*ред.*）ГУЛАГ：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 1918－1960，Москва：МФД，2000，с. 14.

取这种惩罚措施。我们可以用这种措施来约束我们的工作人员。”[①]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改造营系统最基本的原则通常说法就是关起来：“强迫寄生分子进行劳动”。[②]

“从事自我服务的工作被看成是使用囚犯劳动的最佳方法，因此，与拨给强制工作营房屋改造相关的所有建筑工作都是由囚犯来完成的。此外，囚犯的劳动还被用在打扫房间，总的来说是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锯木材、给房间供暖、准备食物、照料马匹、料理菜园、在办公室及周围地方的服务等工作。后来，在营内建起了各种手工工厂：细木工厂，成衣铺，制靴厂，洗衣店，铁匠铺。经验表明，手工工厂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这些手工工厂中安装机械化生产设备。强制工作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了电力照明问题，建起了消毒室、浴室和太阳能室。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营，从囚犯中挑选懂技术的工人成功地建起了装有5台马达的印刷厂，并且是完全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小工厂。在其他营，建起了生产盖房顶用材料的工厂、气焊厂、针织编织厂和钳工机械厂。在安德罗尼耶夫营，建起汽车修理厂，为社会工作与义务管理总局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使退役的乌乌斯汽车和运输急需但是已完全损坏的汽车处于完好状态”。[③] “彼得格勒营制服车间两个月内可以制成2000件军大衣，1500条马裤，1200件军便服，1000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15000件棉袄和灯笼裤”。[④]

“囚犯和战俘在强制工作营外部的工作使用也是按计划安排的。工人首先被派去参加红军，其次是派到交通运输、燃料部门和苏联机关去工作”。[⑤] 例如，1919年12月17日，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吸收在押犯人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法令，全文如下：

人民委员会决议：

1. 根据人民法庭、革命法庭（包括革命军事法庭）判决和肃反委

①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224.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26.

③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48.

④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36.

⑤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48.

员会决议，在关押地点服刑的专家可以按照他们的专业派往苏维埃机关和国家企业工作。

2. 上述人员可以不经押送队押送派往工作地点，但必须有申请派遣的机关或企业的担保，工作结束后必须直接返回关押地点。

3. 派遣到苏维埃机关或企业工作，要根据苏维埃机关或企业的申请进行。向在押犯所在地的苏维埃人民法庭、革命法庭或肃反委员会提出此种申请时，应说明：工作需要的具体人名、工作地点、在押犯分派工作的必要期限、预定分配给他的工作性质，以及如果派出工作的犯人逃跑，应由苏维埃机关或企业领导机构中的何人担保。

4. 人民审判员委员会、革命法庭或肃反委员会开会研究申请，作出决议，决议应写明被派出去工作的犯人名字、父名和姓氏，派往机关，作何种工作，为期多久，何人担保；这种担保的内容就是一旦有事，立即逮捕第三条规定的担保人，并在3个月内无权改变强制措施。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邦契－布，秘书莫斯利

克里姆林宫，1919年12月17日[①]

除此之外，管理总局技术处负责组织专门使用囚犯的独立对外工作，确切地说，是在莫斯科郊外的克留科夫工业区砖厂工作。这些工作的生产效率非常高，工厂因此被评为一级厂，并且上了光荣榜。克留科夫工业区从事木材采伐工作，在冬季不仅为莫斯科营准备了足够的木材，而且还有剩余。

为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惩治机构规定参加劳动的囚犯可以获得劳动报酬。“囚犯的劳动报酬按照工会制定的工资标准发放。同时，按照常规要求，营的开支应当通过囚犯劳动所得的工资收入来支付。无论是1920年1月1日以前，还是在（同年）11月1日以前，都严格遵守了这种原则。截至1920年1月1日，囚犯的平均工资为43卢布8戈比，而

① 赵仲元、陈行慧：《列宁与全俄肃反委员会（1917年～1919年）》（上册），许宏治译，群众出版社，1981，第349～350页。

每个囚犯的生活费支出为27卢布8戈比；而截止到1920年11月1日，囚犯的平均工资为78卢布13戈比，支出为31卢布5戈比，只是从中央得到的全套制服和办公用品没有被计算在内。从上述核算报告中可以看出，参加劳动的囚犯用自己的工资收入支付了强制工作营所有囚犯的生活费开支”。[1]

从1920年1月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的工作报告内容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惩治政策的思想主张通过“为期10个月的使用囚犯和战俘劳动的尝试，毫无疑问，不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使不劳动分子养成劳动习惯以及研究其中适合强制工作需要的行业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 “让游手好闲和寄生分子养成劳动习惯具有巨大意义，因为这使他们走上了健康的体验劳动之路，破除了被捕者不劳而获的思想观念。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了劳动群体的力量”。[3] 由此可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时期，布尔什维克不仅提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通过劳动对旧时代的不劳动者进行改造”的理论，而且在实践该理论的过程中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

转向实用主义——建立自给自足的劳改营经济

“从强制劳动机构组建之时起，政府就把所有劳动机构都视为苏维埃的经济组织，其目的是培养被判刑者的劳动技能并予以合理地使用”。[4] 然而，与其他经济组织不同的是，强制劳动机构的开支要全部由自己解决。其依据是1918年司法人民委员部制定的监狱政策的两项基本原则：关押地开支完全自给自足（囚犯劳动的收入应超过其生活费的支出）和对犯人的彻底再教育。在社会工作与义务管理总局关于1920年1月1日至11月1日的工作汇报中也指出，“强制工作营的主要任务是，使囚犯养成劳动习惯和更好地使用其劳动力，具体表现就是，囚犯一进入强制工作营就被派去工作。根据所属类型，一部分囚犯被派到外部去工作，另一部分被安排

---

1.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48 – 549.
2.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47.
3.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36.
4.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18.

在营内工作。截至今年1月1日，从事工作的囚犯为61%，其中39%在营外工作，22%在营内从事有偿工作。到11月前，该百分比提高到67%，其中45%在营外工作，22%在营内工作。不工作的只是老人、病人和残疾人"。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时期，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委员们真诚地相信强制劳动对罪犯的改造作用，而没有把强制劳动的经济作用放在首要地位。也就是说，最初"设立强制工作营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司法人民委员部在监狱中开展惩罚工作，而是把危害分子和不受欢迎的人隔离起来，通过强制、再教育和系统的纪律约束使他们养成自觉参加劳动的习惯。因此，一方面对这类人员进行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使其学会各种体力劳动技能的做法被视为是达到该目的的最佳途径。"② 1920年12月8日，就颁布惩治政策通告问题，捷尔任斯基在致全俄特别委员会业务主管人员的便函中指出：必须致信告诉所有特别委员会、特殊处和区运输系统特别委员会，我们的监狱装满的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资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的真正敌人。为此，中央必须注意监狱的居民，它的社会成分。应当考虑，把这件事委托给谁去做，和谁来制定所有监狱居民报表的样式。为此需要召集萨夫拉索夫、赞格维尔、弗拉吉米尔和我们的人员开会。

对于不是因为反革命行为而被捕的工人和穷人，应当在工厂工会或者其他工农组织的担保下广泛实行提前释放，同时责成它们对罪犯进行改造。我们特别委员会应当记住，他们是在进行阶级斗争，因此要自觉对待这一问题，弄清怎样以及采取何种方法对待不同的人。总之，要用我们的政策占领所有监狱。这不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事情。③

1921年1月8日，全俄特别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签发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关于特别委员会机关惩治政策的第10号命令》也充分体现了这种观念："外部战场没有了，资产阶级政变的危险性消失了，国内战争的危急时期结束了，但是却留下了严重的后果：监狱中人满为患，并且其中关押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应该消除这种不良后果，为监狱减负，同时要目光敏锐地将那些真正威胁苏维埃政权的人关进监狱。在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47 – 548.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47.

③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57 – 558.

战争情况下，甚至是市场上微不足道的投机，或者穿越前线的行为都可能会给红军带来危险，但是现在就可以排除类似事情的危险性了。

“今后同强盗惯犯的谈话应该简短，但是不应当把有小偷小摸或者投机行为的工人和农民们关押在监狱里。大规模的投机很危险，但是要予以循序渐进地解决，我相信，苏维埃政权采取的一揽子经济措施一定会解决这一问题。的确，盗窃现象十分严重，其中许多参与者是工人，但是，如果不把有盗窃行为的工人关进监狱，而是让其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的同时，由其他工人负责对他进行教育的话，那么在诚实人包围下的西多洛夫或者彼得罗夫有可能会再次偷盗，这样他就会再次给自己的工厂脸上抹黑，或者他因此而转变为一个诚实的同志，这么做，要比对其进行侦查或者审判的效果更有力、更合理。工作环境可以拯救弱者和觉悟低的同志，而监狱则会把他们彻底毁掉。”特别委员会机关的口号应当是：“监狱是给资产阶级准备的，对工人和农民要采取同志式的教育……”[①] 当时，应当被关在强制工作营的大体上是这几类人员：不劳动分子和居民中的寄生阶层——商人、经纪人、投机分子、无固定职业的妇女等；反革命分子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某些职务犯罪人员，采取措施逃避工作的人和怠工者；国内战争的战俘等。1919 年上半年在强制工作营设立之后，由于监狱人满为患和缺少关押地，于是作为临时措施，甚至允许不把某些不太危险的刑事犯关人监狱。

然而，从 20 年代，尤其是从 20 年代中期起，能否提高强制劳动机构经济职能问题开始逐渐成为保留还是关闭强制工作营的关键所在。当时，“国家极为严重的经济状况和饥饿使强制工作营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短期内，身体健康的人失去了劳动能力，死了许多人。用于营生活费的资金严重不足。许多省因无力供给资金而提出关闭强制工作营的问题。关押地面临的这种危机局面，部分是由于 1922 年其生活费来自地方财政预算。政府只把 15 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关押地列入了国家供应计划之中。属于这一类的有：最大的隔离监狱、未成年人劳动教养院和地方政治犯监狱。地方机关因为不愿意给自己本来就十分困窘的财政预算增加负担，因此回避关押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558 – 559.

地的一切物质要求”。[1] 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相信强制工作营既能起到隔离阶级敌人，又能带来物质利益的作用是非常难的事情”。[2] 于是，人们开始更加关心今后强制工作营应当如何解决自身生存的经济问题。

1920年春，在全俄特别委员会主席团收到的一份呈文中提到了关于囚犯关押状况的事情：“安德罗尼耶夫集中营警备司令在亲自查看了营中关押的囚犯之后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在想，为什么这些愚昧无知，而且多数几乎全是农民出身的囚犯哪里都不使用他们，关押在营中什么活都不干，干消耗不够吃的口粮，因为吃不饱而生病和死亡……”[3] 当时，类似的呈文来自各地。在强制工作营处于去留抉择困难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有特殊远见而且热衷于强制工作营事务的人物出现。北德维纳省强制工作营警备司令就是这种人物之一，1920年1月，他在呈文中写道：“此时此刻我可以大胆地说，未来强制工作营一定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帮助和益处，尤其是在营中人满、供应后者饮食和衣物的情况下。”[4] “1924年，在捷尔任斯基的信中似乎第一次提到，苏联惩治政策主要目标的定位应从革命的浪漫主义向国家实用主义转变的问题。与自己1921年1月8日下达的命令内容相反，捷尔任斯基否定了对罪犯进行阶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必要性”。“5年以后他的这种思想成了古拉格经济学说的基础——为了对难以到达且有着丰富矿产资源的伯朝拉、奥伯多尔斯克等北方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囚犯们被派到了这些地区”。[5]

1924年10月16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改造法典，该法典第九条规定：“每个劳改机构都应当坚决奉行通过关押在其中的囚犯劳动来弥补犯人自身的开销，但是同时不能忽视改造的目的。”[6] 法典在明确规定劳动改造机构今后要坚决走自给自足经济道路的同时，还表明，工作重点明显由两部分构成，即通过强制劳动解决经济任务和对苏联惩治政策各项原则的实施。

---

①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146 - 147.

②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142.

③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142.

④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142.

⑤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27.

⑥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130.

在加速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形成并发挥无限动员能力

强制劳动机构的职能从以教育为主向以经济职能为主的转变，显然还与准备宣布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向计划经济过渡、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方针，以及正在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主要成分的工业企业中，劳动关系发生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1925 年 12 月，联共（布）十四大的决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决议指出：“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决议反映出苏联领导集体已决定走一条摒弃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样，就“彻底改变了经济思想的整个方向：从合营经济、调解阶级与劳动冲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转变到不惜任何代价、不顾居民中个别团体和阶层的抵抗，加速生产的发展，以保证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经济和军事方面更强的工业国。新经济政策时期奉行的阶级和解与合作思想被随着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提法所取代”。[1]

随着五年规划的制定，充分利用国内一切可以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问题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制劳动机构作为劳动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会被遗忘。

众所周知，苏联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资源最丰富、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但也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因此如何使用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来发展经济，在短期内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十分难以破解的问题，换言之，为了实现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国家迫切需要劳动力。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为了保证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经济将不同世界经济接轨，以避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和制约。这样一来，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们就把完成生产计划和各种计划任务的主要希望寄托于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上。为此而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

[1]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31.

如突击手运动、接受挑战计划运动、不间断工作运动、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运动等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宣布为是完成五年计划任务、新的劳动态度和社会主义新人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看作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工具。但是突击手却成了那些落后分子、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的捣乱分子——这些最初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后来渐渐扩大到越来越多城市居民之中的落后工人的对立面。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了同1928年相比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生产领域的这种状况对于完成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而制订生产计划和各种计划任务来说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合理使用强制劳动机构囚犯劳动的问题就具有了现实的经济意义。于是，早些时候就产生的、派被关押者到非强制劳动的工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工作的想法开始落实到行动上来，当然此举也希望在五年规划工地上工作有助于对在押者的再教育。

“早在1927年，政治局研究在采金领域使用囚犯的可行性时，已经确定在大型经济方案中开始使用囚犯劳动的最初实践尝试”。[①] 为了实现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国家迫切需要外汇资本。“1928年，司法人民委员杨松建议，‘为了迅速扩大木材出口，使用囚犯采伐木材’。”[②]

然而，20世纪20年代经济和政治领域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缺乏大型工业规划、党内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围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争论等，不利于国家领导人组织全国规模的囚犯劳动，限制了实施惩治政策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从理论角度就加强惩治的必要性发表了个人看法。1928年7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指出，“随着我们的前进，资本主义分子的抵抗也将加强，阶级斗争将更加激烈，而实力将不断增强的苏维埃政权将奉行对这些人进行孤立的政策，分化工人阶级敌人的政策，最后还有压制剥削阶级抵抗的政策……”[③] 为了更加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还引用了他非常熟悉的托洛茨基说过的一句话：“阶级敌人的抵抗越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27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28.

③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158.

是猛烈和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惩治系统的惩治制度。"① 1929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使用刑事罪犯劳动》的决定（П80/9－рс）。决定硬性规定，"向大规模有偿使用被判处3年以上徒刑的刑事犯劳动制度过渡。"②

1929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议，"今后把集中营（即强制工作营）改名为劳动改造营。"③ 鉴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关押地区实施大型工程计划力所不及，因此出现了建设专门的大型劳动改造营和为从农村流放出来、被没收了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农民、其他"异己分子"和"社会危险分子"建立专门移民体制的想法。于是，1929年7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在北方、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远东地区使用在押人员劳动的决议（第20/307 п.130号）。决议内容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

1. 被联盟和加盟共和国司法机关判处失去自由3年或者3年以上的犯人，送交到国家政治保卫管理总局组织的劳动改造营服刑。

授权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在对明显不适合体力劳动人员或者减轻处罚人员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在判决书中可以特别规定用其他服刑方式替代在劳动改造营的服刑方式。

（注：根据该决议之规定，送到劳动改造营服刑囚犯的挑选工作，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组成的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机关驻地方专门委员会负责。）

2.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了接收这些犯人，需要对现有劳动改造营进行扩建，同时（在乌赫塔和其他偏远地区）组建新营，以便向这些地区移民，并通过使用失去自由人员的劳动，开发这些地区和开采当地的自然资源。

3. 为了对将要组建劳动改造营的这些地区进行循序渐进地开发，建

① *Троцкий Л.* Терроризм и коммунизм, Пг.：Коммунист, 1920, с.53.

② *Петров Н.В.*（*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28.

③ *Кокурин А.И.*, *Петров Н.В.*（*сост.*），*акад. Яковлева А.Н.*（*ред.*）ГУЛАГ：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 1918－1960, М., 2000. с.62.

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一道，根据下列原则抓紧制定出完整的实施措施：

1）将该区内，行为上表现良好或者工作出色、但是还没有服满规定刑期的囚犯，提前转为自由居民，同时要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

2）已服满刑期，但是法律剥夺了其自由选择居住地权的囚犯，要留在该地区居住，同时分给其土地；

3）已服满刑期，但是想自愿留在该地区生活的囚犯，可以进入该区居住。

4. 对正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动改造营隔离服刑的人员，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现行的劳动改造营法来处理其劳动报酬、生活费、管理制度以及内部条例等方面的事情。

5. 其他所有被判处失去自由，但是不符合本决议第1至4条规定的人员，由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重新研究其辖区失去自由地分布问题，以便从以下几个方面保证其分布的合理性：1）关押被判3年以下刑期人员的失去自由地；2）处于被侦查阶段的人员失去自由地；3）囚犯押解站。

6. 建议联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后要充分利用被关押在为了减少现存失去自由地、仅仅保留其对处于被侦查阶段人员隔离或者囚犯押解站功能而专门组建的农业或工业教养院、失去自由在1年到3年以下人员进行劳动。

7. 本决议要立即实施。

8. 委托由杨松主席、克拉西科夫、克雷连柯、卡塔尼杨、托尔玛切夫、鲍拉依科、费尔德曼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本决议所废止的纲要和对现行法律的修改，并在两个月之内提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批准。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鲁德祖塔克

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加德卜诺夫

苏联人民委员会秘书米罗什尼科夫[①]

---

① *Кокурин А. И.*, *Петров Н. В.* (*сост.*)、*акад. Яковлева А. Н.* (*ред.*) ГУЛАГ: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 1918－1960，с. 64－65.

"决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手中的所有囚犯都是失去自由3年或者更长时间者，而在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关押地关押的只剩下被判处3年以下，或者因为没有生活费被判处在卫兵的看管下强制工作的人"。[①] 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在施工周期长、条件艰苦、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对囚犯的劳动加以使用。

"在决议批准前的组织阶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经有了几个隶属于自己的劳动改造合成营，其在押人员有23000人左右。实施计划任务要求集中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来建设大型工业和交通设施。他们应当成为新区移民的支点。拟打算待在押人员刑满或提前释放之后，流放人员在恢复公民权利之后，以'自由'的身份留在新区。于是便采取了（对在押人员进行）强制移民的方针。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强制劳动机构的形成和劳动资源动员分配制度的确立"。[②]

"在这一时期，最高领导集体也在不断地批准希望使用囚犯劳动的新建工程项目和开发国家北部地区的决议。虽然有一部分决议内容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却反映出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倾向。例如，1929年11月29日，通过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在萨哈林岛使用囚犯劳动的决议；1930年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为建设奥涅加—白海运河进行地质勘探的决议；1931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使用囚犯开采镭的决议；1932年2月23日，通过了关于在远东地区修建铁路的决议；1932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开发诺里尔斯克（在这个地区发现白金和稀有金属产地）的决议"[③] 等。

"从1929年起，由于粮食短缺，于是开始对消费品实行凭票供应。渐渐地票（券、证、购货本）扩大到了粮食、面包、油、肉、糖、米等方面。由于对私人经济成分的打击，关闭私有商店和小铺，非粮食品的公开销售也开始减少。国家明显保证不了对居民的供给。另外，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别也常常意味着在黑市上购买商品时要花高价。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服工作人员去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排队过长，对企业劳动纪律产生了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28.

②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21.

③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30.

负面影响，旷工和迟到现象不断增加。酗酒、躲避工作、毁坏车床和设备、生产受伤事故，这些本来就对工人们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如今变得频繁发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开展了加强纪律的斗争。劳动法典的修改为企业提供了不是旷工 6 天，而是旷工 3 天就可以开除工人的权利。然后又赋予行政部门有权不经过冲突评议委员会批准，独立地对违反考勤处罚规定者实行各种处罚，通过这种方式使行政部门对纪律状况和生产制度状况的责任得到了加强"。[①]"1930 年 10 月 20 日，中央委员会关于保障生产所需劳动力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同劳动力流动作斗争的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劳动交易所和只根据居住地来进行劳动登记的措施。在企业，因没有发挥专家特长而耽搁了对专家的使用，因不正确使用稀缺职业的工人，因挖别的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到自己企业来工作，因违反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支付标准和有多余的劳动力，领导应承担行政责任；1931 年 6 月 23 日，斯大林在对经济领导人讲话中谈到了更有组织地招募劳动者、劳动机制、消除人员流动性、平均主义、无人负责、改善日常生活条件、干部的正确分布、生产中引入经济核算原则、改变工资报酬政策的必要性等问题。以斯大林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六个条件'而著称的这次讲话的主旨，深入国民的意识中，在许多立法和行政法规中得到反映，到处悬挂，甚至在古拉格的工地上也是如此"[②]；"1932 年 12 月 27 日，通过了实行公民证制度法，该法律规定按居住地登记和确认城市居民的财产，使市民享有食品购买证权和住房权。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一些工业中心成为有优先供应权、有限户口登记的城市。在 1933 年间国内发放了 2700 万本护照。数十万人因违反户口登记制度而被捕并派去强制劳动"。[③]"1933 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的全体代表联席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关于在建设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论题，他指出，阶级的消灭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熄灭的方式，而是通过加强阶级斗争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斯大林提出了消灭即将灭亡阶级的最

---

①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31 – 34.

②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34.

③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36.

后剩余的任务，并且列出了未来要惩治的对象：私有企业主及其奴仆、私有商人及其走狗，原先的贵族和牧师、原来的白匪军官和士兵、原来的警察和宪兵、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反苏分子"。[1]

1936年9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人民委员叶若夫成了亚戈达的接班人。1937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关于惩治原富农、刑事犯及反苏分子行动》的第00447号命令。随着这一命令的发出，许多私有企业主及其奴仆、私有商人及其走狗，原先的贵族和牧师、原来的白匪军官和士兵、原来的警察和宪兵、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反苏分子，以及屡教不改的刑事犯被判处到劳动改造营服刑。新一轮大惩治运动，导致了劳动改造营规模的扩大和既有国民经济意义，又有国防意义的新工程开工（例如，索里卡姆工程和古比雪夫工程；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卢日斯克海湾第200号海军工程；第201号阿穆尔河底加深工程）。[2]

但是，在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时期，古拉格的囚犯们首先被看作是敌人，然后才被看作是经济个体，这显然会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各种计划任务的完成。1938年11月，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停止大惩治行动。完成了自己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被撤职，后来被枪毙。1938年11月25日，任命贝利亚接替叶若夫的职位。贝利亚是个实用主义者，他首先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强制劳动的制度问题，从而成功地使古拉格变成一个重要的经济总委员会。[3]

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劳动机构作为苏维埃国家经济组织加以使用，尤其是在大型经济项目建设上加以使用的趋势愈益明显，并逐渐成为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

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建立

古拉格在苏联作为一个主要以使用各种强制劳动，首先是囚犯劳动为基础的特殊经济部门，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组建劳动改造机构的实践

---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33.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33.

③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4.

始于十月革命初期。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并没有规定建立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专门机构。但是，国内阶级斗争条件和政治力量的分布，导致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同反革命以及暗中破坏作斗争，最初被称为全俄特别委员会的这类机构的产生。1917 年 12 月 7 日，在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决议，“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由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新机构——‘同反革命分子和暗中对抗分子作斗争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取代已被废除的、原先同苏维埃政权的抵抗力量作斗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①]

根据 1917 年 12 月 7 日的人民委员会决议，“组建这个新机构的任务是：‘1）制止和消除整个俄罗斯境内任何人的所有反革命和暗中破坏企图与活动；2）将所有暗中破坏者和反革命分子交给革命法庭并制定同其作斗争的措施’，提出可能采取的斗争措施包括：‘没收财产、迫迁、剥夺各种票证、公布人民的敌人名单等等’。全俄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范围模糊不清，对其越权行为应承担的责任只字未提”。[②]

人民委员会对待全俄特别委员会同国家其他机关之间关系的立场是由列宁规定的。列宁坚决不同意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具有干涉“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事务的权力，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只负责奉命向这些人民委员部通报“有着极高政治意义的逮捕事件”。[③]

1918 年 3 月开始组建隶属省、州和县的苏维埃地方特别委员会，它们拥有逮捕、搜查、征用和没收充公的权力。1918 年上半年，国内已有 40 个省和 365 个县的特别委员会在运转。它们相应隶属于全俄特别委员会和省特别委员会，它们的活动绝对独立；由于它们是地方苏维埃的最高行政机关，所以它们只向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省、前线、军队和州特别委员会有权采取最高处罚措施。1918 年 12 月 1 日，为地方特别委员会制定的秘密工作细则规定：“特别委员会作为革命危急时刻的斗争机关，担负着在必要时刻取缔或终止行政管理程序中非司法程序的罚款、流放、枪毙等非法处罚行为。”[④]

全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和权力的不断扩大，决定了在其机构中出现许

---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2.

②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с. 95.

③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с. 95.

④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с. 97、96、98.

多和同反革命势力及职务犯罪作斗争处于平级的新建处：1918 年 8 月，为了同铁路和水路运输领域的敌对分子作斗争，成立了交通处；1918 年 12 月，为了进行搜查、逮捕和外部跟踪，成立了军事行动处；1919 年 1 月，成立了特别处，1919 年 2 月 21 日，全俄特别委员会决议赋予它的使命是同陆军和海军中的反革命势力及间谍活动作斗争；地方的省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由全俄特别委员会特别处直接领导的特别处（前线和军队处）。它们的任务是，不仅同前线，而且还同后方的反革命势力进行积极的斗争。该处的工作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监督指导，全俄特别委员会特别处处长凯得洛夫向他作每周工作汇报。[1] 1919 年 4 月以前，地方集中营直接由省特别委员会领导。除此之外，一部分囚犯被送到 1918 年 4 月 27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部下设的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系统的集中营关押。[2]

1919 年 4 月 3 日，由捷尔任斯基提出的“关于集中营问题”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常务委员会定为当日会议的基础。在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名称——“强制工作营”。[3] 1919 年 4 月 11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关于强制工作营”的决议案。1919 年 4 月 15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组建强制工作营的决议。决议规定，强制工作营（当时各种集中营的统称）的组建工作由省特别委员会负责，而其管理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5 月 12 日，通过了《强制工作营条例》。5 月 1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强制劳动营》的决议对 4 月 15 日的决议进行了扩展，并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了具体说明：

强制工作营的组织

（1）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工作由省特别委员会负责，地方执行委员会房管处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办公处所。（注：根据当地条件，强制工作营可以安排在市内、城市附近的田庄、修道院、庄园等地。）

（2）交给相应执行委员会管理处管辖的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工作须经内

---

①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96.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23, 24.

③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130.

部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批准。

（3）所有省级城市，在特别条例规定的期限内，应组建起每个都能容纳不少于300人所需数量的强制工作营。没完成条例规定的责任由省特别委员会承担。（注：在县城设立强制工作营，须经强制工作处特别允许。）

强制工作营的管理

（1）内部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负责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强制工作营的管理。

（2）强制工作处的职责是：①制定强制工作营组织与管理的条例、工作细则和规则；②定期提交强制工作营的工作报告；③制定和提交强制工作营的生活费用预算，确定强制工作营行政人员的编制等；④从地方执行委员会提供的候选人中选拔强制工作营主任；⑤对强制工作营的经济、财政进行全面管理；⑥负责强制工作营的发展问题；⑦解决与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和管理相关的所有问题；⑧负责在县城设立强制工作营的工作；⑨负责强制工作营之间囚犯的调转；⑩负责强制工作营开设手工工厂的审批。

（3）强制工作处处长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常委会委员担任。

（4）强制工作处下设3个科：①行政科，负责各个强制工作营及其全体人员、收集统计数据和其他科管辖范围外各种问题的管理；②组织指导科，负责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并对营行政机关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等；③总务科，负责强制工作营的总务、强制工作、营内维修与施工事务。

（5）地方执行委员会管理局的管理处负责对强制工作营整体活动的直接监督。（注：对强制工作营卫生设施、犯人住所及劳动条件的监督，由地方执行委员会另一个相关处负责。）

（6）指挥长是每个强制工作营的最高领导，指挥长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选出，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批准任命。指挥长是维护强制工作营秩序并严格执行中央政府下发的所有决议、指示和命令的责任人。强制工作营的所有公职人员和囚犯必须服从营指挥长的命令。

（7）在接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管理局和临时特别委员会管理处领导的同时，营指挥长还必须每两个星期向强制工作处提交强制工作营工作、囚犯人数与变动，以及营中发生的所有特殊事件的简明报告。

（8）营指挥长有权根据特别条例规定对囚犯进行处罚。指挥长有权任

用和开除营公职人员。

（9）营总务主任和强制工作主任是指挥长的直接助手。

（10）总务主任的职责是，负责营的食品、采暖、照明、囚犯和公职人员的服装供应，监督营房维修以及强制工作营的所有总务工作。

（11）强制工作主任的职责包括：①组织囚犯在营内外工作；②经强制工作处允许，为小工厂安装设备；③为囚犯提供必要的工作设备、工具、原材料等；④监督囚犯及时认真地完成工作；⑤寻找和承接使用囚犯工作的订单（注：只能接受苏维埃机关的订单）；⑥根据苏维埃机关的要求，派囚犯到强制工作营之外去工作；⑦核算每一名囚犯的工作时间、工资和发放工资。

（12）营的文件处理由文书、出纳员、抄写员（每100名囚犯需要一名抄写员），以及打字员（每300名囚犯需要一名打字员）等办事员负责处理。

警卫队

（1）营秩序的警卫任务由卫队长、副卫队长、两个班和一个卫队直接负责。

（2）警卫队队员的数量取决于囚犯人数，营中囚犯不超过300人时，每15名囚犯需要两名警卫；囚犯超过300人时，每10名囚犯需要一名警卫。

（3）警卫队一半被安排在营内承担警卫任务，另一半负责囚犯在营外期间的警戒和押送。（注：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从卫队增加押解人员数量或进行相反操作。）

（4）卫队长的职责：①监督卫队全体人员正确履行警卫任务；②监督囚犯遵守秩序；③防止囚犯违犯纪律；④监督进入营中的一切外来人员；⑤指派警卫人员监督会面的在场人员；⑥接收待交物品，统计交给总务主任的接收物品清单；⑦搜查重新收留和收工回来的囚犯。

卫生和医疗监督

（1）地方执行委员会卫生处负责对营卫生状况进行全面监督。

（2）地方执行委员会卫生处指派的医生和医士负责对囚犯提供直接医

疗观察和救助。

(3) 医生的职责是：每星期至少到营中去两次，给病人进行检查和治疗，调查囚犯的健康状况，监督营房的卫生状况，特别是厨房、住所、公共厕所等地的卫生状况。（注：在囚犯突发疾病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叫医生。）

(4) 医士要常住在营中，负责急诊室和药房工作，给囚犯提供医疗服务，为重新患病的囚犯做检查和监控制作食物的质量。

(5) 营中设立一个急诊室，每 300 名囚犯安排 15 张床和一个急救药包。

关于囚犯

(1) 强制工作营总则第二条所列人员应关押到强制工作营（法令汇编 1919 年第 12 号第 124 条），以下两类人员除外：①根据全俄特别委员会规定，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被关押在特别改造营的人员；②患有慢性疾病和因身体残疾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注：由地方营管理局根据医生诊断确定是否丧失劳动能力。）

(2) 女性及未成年人应分别关押在各类特别营中。

(3) 应该关押到强制工作营的囚犯，进营时要携带法院判决书或决议，其中应注明：囚犯的姓、名、父称，作出押解囚犯决定的机关名称，犯有什么罪刑，判刑时间和刑期。

(4) 囚犯进入强制工作营之后，立即将其个人信息一式三份填到特殊卡片上，其中一份放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册上，另一份存放在囚犯的卷宗里，第三份送到强制工作处。

(5) 营办公室有每名囚犯的个人账户簿和用来存囚犯工资的存折，用于登记囚犯的工资收入和支付划拨到囚犯人头上的营生活费开支，以及囚犯自己的花销（因为营管理制度允许这么做）。（注：根据本细则第 35 条规定，营生活费开支由囚犯全员分摊。）

(6) 囚犯受到的任何处罚都要记入其个人档案。

(7) 所有囚犯到达营后必须立即分派工作，并在其整个服刑期间从事体力劳动。囚犯从事工作种类由营管理部门分配。（注：个别囚犯在获得地方管理局管理处批准的情况下，可以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

（8）为囚犯规定了8小时工作日制度。可安排加班和夜班工作，但须遵守劳动法（1918年法令汇编第87~88号，第905条）。

（9）囚犯的食物口粮应符合为从事体力劳动人员规定的标准。

（10）每名囚犯的劳动报酬，根据相应地区工会制定的工资额标准发放。囚犯的工资收入要扣除其生活消费开支（食品，衣服）、住宿费用、营行政、警戒费用开支。但是总扣款数额不能超过工资的3/4。

（11）在囚犯全员状况下，营及管理部门的开支应当由囚犯的劳动来补偿。根据特别工作细则规定，营的财政赤字责任由营管理部门和囚犯共同承担。

（12）根据特别工作细则规定，确定对囚犯的惩罚力度、种类和性质。

（13）对于第一次逃跑的囚犯，服刑期在原期限基础上增加10倍。第二次逃跑的囚犯交由革命法庭审判，革命法庭审判有权确定处罚力度，直至使用最高处罚措施。

（14）为了防止囚犯逃跑，可采取连环保制度。

（15）要从所有囚犯中选出一名工长，作为囚犯与管理部门沟通的中间人。

（16）根据特别条例规定，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工作的囚犯将受到处罚。

（17）囚犯应立即履行营管理部门的所有命令。每名囚犯有权力对管理部门不正确的行为提起申诉。为此，每个营都应当有投诉书放在工长手中，并可以将其提交给管理局管理处和有权力监督强制工作营的人员。

（18）只有在周日或节日，囚犯的直系亲属（妻子、子女、父母亲、兄弟和姐妹）不用特别许可就能探望囚犯。在此期间，若探望其他囚犯，则需得到管理局管理处的许可。

（19）不允许给个别囚犯带食品。所有转交给囚犯的食品一律归全体囚犯共用。

（20）那些特别勤劳的囚犯可以：①允许住在自己家里，完成指定的工作时到营里来；②根据地方执行委员会管理局管理处的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可以缩短他们的关押期限。（注：本条的第二款规定不适用于因司法机关判决而关入强制工作营的人员；这类人员只能根据提前释放的总则规定获得提前释放。）

住宿

(1) 为强制工作营指定的住所应完全符合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要求。(注：在营区内警卫队要有单独的房舍。)

(2) 囚犯在营中的住所要根据房间的大小及结构来决定是合住，还是单住。

(3) 强制工作营要设置在远离其他建筑和设施的地方。

(4) 每个房间都要提供给囚犯居住所需的全部生活用品。(注：为了预防传染病，禁止床与床紧挨在一起。)

(5) 营里设有浴室、洗衣房和消毒室。(注：在营内没有为囚犯准备特殊的浴室时，每月至少送囚犯到市内浴池洗两次澡。)[①]

1919 年 4 月 15 日和 5 月 17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中公布的这些文件，相应地开始了对集中营的法律调节活动。[②] 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 1920 年 1 月的工作报告”对此作了如下描述：由于关押犯过各种罪行的人，被判投机、怠工、职务犯罪等人员，明显的人民劳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以及资本主义和沙皇贵族制度的拥护者，通过强制劳动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迫使其抵偿自己所犯罪行的新关押地的最主要选址原则是，营房四周要与其他设施分隔开，便于看守，以消除囚犯逃跑的可能性，此外，还特别注意到技术配备，因为人员聚集地总会有疾病传染源存在，所以要采取措施敷设给水、排水系统，建洗衣室、浴池、消毒室等设施，因此，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年半之后的 1919 年年中，才着手组建营地。但是最合适的建筑设施已经被各种机关占用，故不得不把营地安置在剩下的、未被占用的修道院和庄园等地。几乎每个地方都需要大修，而这在危机和必要材料缺乏时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做到。截至 1920 年 1 月，在以下各省的 21 座城市组建了强制工作营：阿斯特拉罕、库尔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沃罗涅日、维亚特卡、维捷布斯克、伊万诺夫－沃兹涅辛斯克、卡卢加、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奥伦堡省的依列茨克扎稀达、彼尔姆、梁赞、萨拉托夫，北德维纳省的大乌斯鸠克、辛比尔斯克、斯摩棱斯克、唐波夫、特维尔、图拉、切列波维茨和雅罗斯拉夫尔，莫斯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525－530.

②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 с. 130.

科8个营，彼得格勒1个营。在9个省会城市（沃洛格达、弗拉基米尔、叶卡捷琳堡、库尔斯克、鄂木斯克、奥廖尔、奔萨、萨马拉和布良斯克）和两个县城（辛比尔斯克省的塞兹兰，图尔斯克省的别列夫）改造营处于组建阶段。营行政机关管辖的战俘囚犯总计为16447人。值得注意的是，省强制工作营的组建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强制工作营半年以后才建成，而且还是在特别指示督促下才完工的。

莫斯科有4种营：特殊使命营，战俘营，普通强制工作营，在兹韦尼哥罗德为有道德缺陷的儿童设立的改造营—城市。在伊万诺夫特殊使命营中，关押的主要是重要人质和在国内战争期间因重罪被判刑人员。这里平均每天有480名囚犯。根据囚犯总人数比例，床位是按照刑期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同分配：刑期在5年以下的占0.55%，5~20年的占0.55%，到国内战争结束前的囚犯和人质为98%。全俄特别委员会占13.78%，莫斯科特别委员会占14%，特别法庭占6.04%，地方的省特别委员会占24%，其他机关占42.15%。安德罗尼耶夫特殊使命营关押的主要是外国人质和下列犯人：定期囚犯占42.2%，到国内战争结束前的囚犯占57.6%。由于只在极特殊情况下这些营的囚犯才被派到营外，所以多数情况下囚犯们是在营中的小工厂工作。营中的小工厂有以下几种：细木工厂、钳工厂、缝纫厂、装订厂和洗衣厂。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多数囚犯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他们需要适应环境，因此现在还要确认工厂的生产力是否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押国内战争战俘的科鲁霍夫营充当调配站的功能。该营中关押着许多旧军队的大人物：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此外主要是无产阶级分子和政治可靠性不明确人员。囚犯们在这里接受文化教育，在确认囚犯确实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之后，其中的许多人被派去当红军。从（1920年）5月起，该营输送出18000名战俘，其中的66%，即11895人被送到军事委员部。在兹韦尼哥罗德，为有道德缺陷的儿童设立的改造营—城市收留的主要是10~17岁的未成年人。营的职责是保护和赡养这些未成年人。教育经济处原先隶属于社会保障机关，而现在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普通强制工作营有4个：诺沃别斯科夫调配站、诺沃斯帕斯克女犯强制工作营、波科罗夫斯克和弗拉德金斯克男犯强制工作营。4个强制工作营的囚犯为2420人，其刑期如下：5年以下的为51%，5~20年的为3%，到国内战

争结束前的为 8%，白军战俘为 28.5%，无期徒刑的为 10.5%。属于全俄特别委员会审判的囚犯为 9.5%，莫斯科特别委员会审判的囚犯为 22%，革命法庭审判的囚犯为 3%，人民法院审判的囚犯为 18%，各种行政机关审判的囚犯为 19.5%。省级强制工作营囚犯的刑期构成如下：5 年以下的为 39%，5 年以上的为 3%，人质和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始终关押的为 36%，白军战俘为 22%。

几乎所有营中都有主要是为满足营自身需要服务的制靴、成衣、内衣、钳工和细木工车间，而在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强制工作营中还有汽车电器安装厂、给排水厂、油漆厂、皮革厂和织布厂。彼得格勒的营制服车间两个月内可以完成：2000 件军大衣，1500 条马裤，1200 件军便服，1000 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 15000 件棉袄和灯笼裤的制作。所有囚犯和战俘人营后立即开始工作，管理部门对此十分重视；由于国内战争使许多工人都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了，因此到处出现缺乏劳动力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才下达了按最大化和最合理的原则使用囚犯劳动和制定相应的劳动报酬标准，以及机关同囚犯核算原则的命令。由于到处都出现对现有劳动力的需求成倍增长的局面，因此囚犯主要被派往对国家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岗位去工作。最近几个月燃料问题受到了特别重视。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除了完成规定的采伐任务外，还依靠自身力量为制材厂采伐了近 2 万立方俄丈木柴和木料，1000 名囚犯和战俘被派到燃料工业总局的下属机关去工作。还有许多囚犯被派到火车站去装卸木材。总体来说，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囚犯们实行的是 8 小时工作日制，囚犯劳动收入的 75% 用于食品、服装、行政管理机关和警卫队等的公款开支，25% 存入囚犯的个人账户，在刑满释放时发给囚犯。对于急需用钱者，允许在其释放前预支自己账户上的钱。在共和国中参加劳动的囚犯和战俘平均占其总数的 69%”。[①]

1919 年 5 月 21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常务委员会在听取了由凯德洛夫做的关于中央战俘与难民事务委员会下属的莫斯科强制工作营的报告之后指出，这里的“看守不严和对战俘劳动缺乏组织性”，于是作出决定，“将上面提到的中央战俘与难民事务委员会的这些营交给强制工作处，按照为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534 – 536.

其制定的总条例来对战俘和难民进行使用"。[①] 在此之后，5 月 24 日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也被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为了便于对集中营进行领导，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立了强制工作处，后来它被提高到管理总局的地位，并多次更改名称：自 1920 年 5 月 18 日起称"强制工作管理总局"，从 1920 年 9 月起改称"社会工作与义务管理总局"，从 1921 年 2 月至 1922 年 10 月 12 日被废除时止重新易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管理总局"。"强制工作营主管部门的不确定性（其中一部分机关因受 1919 年 5 月 1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影响，1922 年以前留归全俄特别委员会领导）对该部门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从 1919 年 3 月起，全俄特别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同时领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强制工作处管理总局的早期领导人凯德洛夫（1919 年 4～6 月）、梅德韦季（1919 年 9 月到 1920 年 2 月），多为肃反委员会的大人物"。[②]

强制工作营的数量迅速增长，"1919 年年底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有 21 个营，1920 年夏季已达到 49 个，到 11 月之前已达到 84 个，1921 年 1 月达到 107 个，11 月达到 122 个"。[③] "如果考虑到 1921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 52 个省和州的话，那么平均每个省有两个强制工作营。然而，实际上这些匆忙建成的关押地分布很不均衡。例如，仅莫斯科就有 7 个集中营。到 1919 年 11 月 12 日止，共关押 3063 人，其中，伊万诺夫营关押 564 人，科鲁霍夫营关押 600 人，安德罗尼耶夫营关押 418 人，弗拉德金斯克营关押 191 人，诺沃斯帕斯克营关押 251 人，诺沃别斯科夫营关押 165 人，波科罗夫斯克营关押 874 人。除此之外，许多囚犯可以在营区外生活和工作。例如，在这个时期，波科罗夫斯克营进行所谓"长期出差"者就有 820 人，诺沃别斯科夫营有 120 人，科鲁霍夫营有 2385 人"。[④]

"与全俄特别委员会所属的关押地系统并存的还有刑事罪犯关押地系

①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c. 130.

② *Петров Н. В.*（*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c. 24.

③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c. 131.

④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c. 130.

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1917 年 10 月前归俄罗斯司法部管辖）的关押地管理总局对该领域实施领导。1918 年 4 月关押地管理总局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在司法人民委员部内成立了中央惩治处"。[①] 1921 年 10 月，中央惩治处更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劳动改造处。

"早在 1920 年，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建议把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主管部门合并起来的时候，部门间为争夺关押地领导权的斗争就出现了"。[②]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关押地拥有良好的组织联系，并且强调强制工作管理总局能够比司法人民委员部更快地解决关押地的收支平衡问题。同样，司法人民委员部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忽视了对囚犯的再教育问题，而中央劳动改造处则完全能够解决这一问题"。[③]

国内的新政治环境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迫使苏维埃领导集体对惩治机构进行重组。1922 年 2 月 6 日，为了"加强革命的法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全俄特别委员会和关于进行搜查、搜走和逮捕规定"的法令。该法令废除了全俄特别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并且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一系列新任务的完成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包括：镇压反革命活动、同间谍活动作斗争、保卫交通线、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的政治保卫、同走私作斗争，以及完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交给的保卫革命秩序的专项任务。为了确保这些任务的实施，法令规定组建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而在地方组建国家政治保卫处。原全俄特别委员会的特别处和交通处以及军队特种部队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管辖。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地方机构在必要情况下有权进行搜查、搜走和逮捕。国家政治保卫局没有诉讼程序以外的特权，法律严格规定："所有反苏维埃或者破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4.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5.

③ *Смирнов М. Б.* （*сост.*），*Рогинского Н. Г.* （*ред.*）Система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в СССР，1923－1960：Справочник，Москва：Звенья，1998，с. 13.

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的犯罪案件，只能由革命特别法庭或者相应的人民法庭按司法程序进行判决”。[①]

1922年2月9日，在全俄特别委员会刚被废除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所有关押地移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管理”。[②] 然而，1922年第五届全俄省执行委员会管理局机关主任代表大会同意保留和简化强制工作营。代表大会指出，“认为强制工作营的惩治工作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管部门有着更为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就此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们提出了下列想法：“司法人民委员部在四年期间不仅没有完善其所接收的监狱机构到足以符合自身职能的状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受到广损坏，其中县级监狱几乎损失殆尽。与此同时，强制工作管理总局在不到三年期间内从零建起了相当强大的强制工作机构，甚至为免除国家对其实施供给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争论并未到此结束。1922年6月3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别拉巴罗多夫致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信中列举了以下一些有利于“自己”部门的理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使命是服务于司法领域的事情，其中包括维护法律和执法，自然也包括制定“刑事处罚”政策。与此相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对内部进行管理，它既包括对“惩治政策”制定的管理，又包括对关押被判刑罪犯的惩治机构的管理，它一方面要防止社会受到罪犯的侵害，另一方面又要对罪犯进行改造，并使其回到诚实生活的道路上去。这是从理论角度进行的论证。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此还补充了一些实践依据。“把强制工作营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内部，别拉巴罗多夫在信中指出，不仅具有把服务于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的机构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机关保留下来的必要性，而且还可以保护国家的经济性能不受损害，阻止建立在合理使用囚犯劳动以及对其进步发展提供合理希望的经济单位出现解体。如果今后在失去自由地自负盈亏的试验上取得成功，就会为国库摆脱用于惩治政策的开支打开广阔的前景，并使1919年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基本思想得以实施”。[③] 另外，由于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温什利赫特对2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把所有关押地移交给司法人民委员

①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с. 102－103.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5.

③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5.

部进行管理”决定的坚决反对，迫使对已通过的决议进行重审，1922 年 7 月 25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把所有的关押地都交给内部人民委员部管理”。[①] 这次主管部门之间为争夺关押地领导权之争，以内务人民委员部大获全胜而告终。

根据 1922 年 8 月 10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法”规定，政治惩罚的实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驱逐问题特别委员会来负责的。同年 10 月 16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补充决议赋予该委员会将社会危险分子，其中包括反对苏维埃的社会政党“驱逐出境和关押到驱逐地所在地强制劳动营的权利。”[②]

1922 年 10 月 12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决议规定，组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组成的关押地管理总局。原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劳动改造处的领导施文特（他在这个职务上干到 1930 年 12 月 15 日，直到关押地管理总局被废除）负责该局的工作。苏联成立后，为了联合各加盟共和国同政治、经济领域反革命势力、间谍活动和土匪活动进行斗争的革命力量，“1923 年 7 月 6 日，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批准成立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该局通过自己在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中的全权代表，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地方机构。该全苏机构的法律地位是由 1923 年 11 月 15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机构条例》来确定的”。[③]

各种类型的关押地都从属于一个部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归其管辖）管理的局面持续时间不久。“各主管部门自己的关押地如：关押被侦察囚犯的内部监狱、孤立政治反对者的政治隔离网络，以及 1923 年，在由北方强制工作营管理局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分局组成的索洛维茨特别使命营‘霍尔莫格尔’和‘别尔多明斯卡’被转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之后，都归全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理，于是便形成了苏维埃制度政治反对派和普通刑事犯关押地并存的体系。1925 年 4 月 1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废除了 1919 年 4 月 15 日和 5 月 17 日关于强制工作营的

---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5.

②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с. 104.

③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с. 103.

决定，同时规定所有政治犯都应当关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的关押地"。[①]

被苏联宣传机构称为"社会主义全面进攻时期"这个历史阶段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向苏联人口稀少和经济落后地区移民任务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规模扩大问题。1929 年 5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关于使用刑事罪犯劳动》的决定（П80/9 - pc）。决定硬性规定，"向大规模有偿使用被判处 3 年以上徒刑的刑事犯劳动制度过渡"，但未指出具体由哪个主管部门负责此事。这种情形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产生了将所有事情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愿望。其代表人物托尔马切夫和施文特说："5 月 13 日的政治局决定可以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来完成"。[②] 1929 年 6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议，"今后把集中营改名为劳动改造营"。但事情并未就此终止。"苏联领导人认为，劳动改造营只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组建，这一点可以从 6 月 27 日政治局赞成杨松的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把囚犯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现有劳动改造营网络并组建新营的建议中略见一斑"。[③] 1929 年 7 月 11 日，这些建议未经丝毫改动写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官方决议文件中。这样一来，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手中的所有犯人都是失去自由 3 年或 3 年以上者。[④] 从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带着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信托，开始认真地从事劳动改造营体系的扩建工作。例如，1929 年夏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中只有索洛维茨特殊使命营的一个管理局。"1929 年 5 月 23 日，政治局作出决定，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乌赫塔地区组建新集中营"。[⑤] 同年 6 月 28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亚戈达签发了第 136/68 号《关于组建以乌斯季 - 瑟索尔斯克市为临时中心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的命令。命令指出：①苏联政府决定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组建新集中营，目的是要通过对囚犯劳动更加合理使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7.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8.

③ *Кокурин А. И.*，*Н. В. Петров* （*сост.*），*акад. Яковлева А. Н.* （*ред.*）ГУЛАГ：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 1918 - 1960，с. 62 - 63.

④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8.

⑤ *Кокурин А. И.*、*Петров Н. В.* （*сост.*），*акад. Яковлева А. Н.* （*ред.*）ГУЛАГ：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 1918 - 1960，с. 62.

用的途径：其一，开发乌赫塔、伯朝拉以及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同时把隔离期满的囚犯逐渐移民到这些地区；其二，修建铁路和土路；其三，从事采伐木材等工作。②为实施该决议，决定组建以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市为临时中心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③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应立即着手组建工作并对囚犯进行劳动使用。

1930年3月26日，以乌斯季－瑟索尔斯克为中心的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改名为瑟克特夫卡尔管理局。1929年7月组建了以乌拉尔州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为中心的维舍尔斯克特殊使命营管理局。1929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地方机关规定，组建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营、以新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西伯利亚营、以塔什干为中心的中亚营和以阿拉木图为中心的哈萨克斯坦营。“截至1930年6月1日，这7个营中关押囚犯总数为168163人”。[①]

“至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成了完整的劳动改造营网络”。[②]

1929年11月6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1924年通过的“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法基本理论”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其中，该文件的第13条规定：“司法—改造性质的社会保护措施是……2）失去自由，在苏联遥远地区的劳动改造营服刑；3）失去自由，在集中关押地服刑……”而第18条又做了如下补充：“失去自由，在苏联遥远地区的劳动改造营服刑期限为3～10年。失去自由，在集中关押地服刑期限为3年以下。被判处失去自由、在普通关押地关押的人员，通常要在劳动教养院服满刑期。”[③] 于是，在苏联的立法中首次出现了“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的正式术语。[④]

1930年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改造营系统逐渐得到扩大。[⑤] 1930年2月5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撤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

---

① *Кокурин А. И., Петров Н. В. ГУЛАГ: структура и кадры*. Статья первая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9, №8, с. 110－111.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29.

③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 с. 166.

④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1958, с. 166.

⑤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30.

其原有职能被转给了其他主管部门，其中最主要的是转给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

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梅辛格签发第130/63号命令，组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劳动改造营管理局”。[2] 它的内部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于“1930年10月1日取得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的法律地位。从这个时期起，大批被捕人员大军被派到各种工地上去劳动、去挖运河、开采有用资源，以此来保证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施”。[3] 标志着古拉格诞生的第一个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工程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这里，古拉格展示出在短期内集中大量人力，通过大众突击的方式保证国家计划得以完成的可能性。“从1929年底开始，政治局直接批准下出现的新营加速增长现象说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制度改变了惩治政策，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强制劳动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就是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而建立该体系的推动力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4] 也正是从这时起，缩写词“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的代名词。它标志着斯大林时期“使用囚犯的日劳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5]

1930年11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关于撤销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原隶属于它们管辖的关押地从1930年11月15日改为由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接管”。[6] “为便于在各共和国对这些关押地进行领导，组建了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ГУИТУ）。在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没有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便采取了其他方式对劳动改造机构加以领导。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隶属于共和国最高法院；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劳动改造特别处”。[7]

---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30.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81.
③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9.
④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с. 166.
⑤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9.
⑥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6.
⑦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26.

"1934年2月2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组建包括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内的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并委托亚戈达、科甘诺维奇和古比雪夫负责在5天内根据政治局讨论该问题时的意见提出议案。次日，2月21日，亚加达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草案交给了科甘诺维奇。在亚加达准备的草案中，提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有权决定流放、驱逐和关押到劳动改造营问题的特别会议。(注：从1924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就下设有具备类似权力和最大惩罚期限为3年的特别会议。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自己有权作出包括枪决在内的非司法审判决定)"。[1]

"1934年7月10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组建了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ГУГБ)的身份进入其组成部分之中"。[2]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保证革命秩序和国家安全，保卫社会（社会主义）财产，记录公民身份证明文件，边境保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包括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居民管理总局（ГУЛАГ)，工农警察管理总局（ГУРКМ)，以及许多其他分支机构。在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设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职务。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要业务分支机构都进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之中。

"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并在当天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根力赫·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而他的副手分别是：阿格拉诺夫（第一副手）和普罗科菲耶夫"。[3]

1934年7月，古拉格成为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快，1934年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把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关押地管理总局移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П15/224)。从此时起一直到斯大林去世，监狱—劳动改造营系统的领导权全部集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这个主管部门的手中。在新人民委员部基层班子和地方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с. 31.

② *Михайловна И. Г.* История Гулага 1918 – 1958, с. 109.

③ ГАРФ, ф. 9401, оп. 1, д. 467, л. 363.

建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取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全权代表处）的重组过程中，劳动改造营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直属于古拉格的独立劳动改造营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管理局创建的劳动改造营、劳动教养院和关押地进行了一些合并。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政治犯隔离室”也被改革。“1935 年 11 月，它们被改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监狱”[1]，“在刚好一年之后，即 1936 年 11 月，又被转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管理总局管理”。[2] 1936 年 9 月，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接替亚戈达的职位；1938 年 11 月，叶若夫被撤职；同年 11 月 25 日，贝利亚接任该职务，从此古拉格的经济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结 束 语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全俄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剑与盾”。在这个最重要的国家机构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不仅守住了政权，而且还通过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而古拉格的诞生则为斯大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高速度实现工业化方针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农业国。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其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值、产量指标赶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内向型的经济结构体系也已建立起来。凭借辽阔国土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苏联以其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 30 年代跻身于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些成绩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与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因为古拉格囚犯的劳动是 20 世纪 30～50 年代决定苏联经济的实质性成分。对于这种经济而言，必须有机动的劳动力资源，将劳动力资源集中到所需地区不需要更多的开支和复杂的组织措施。劳动改造营的劳动力大部分被使用在大型工地、矿山开采行业、木材采运、劳动力资源特别缺少的偏远地区的工业工

---

①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32.

② *Петров Н. В.* （*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с. 32.

程设施建设方面。[①] “在斯大林领导集体的眼里，强制劳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动员能力的强弱和在社会生活基础设施处于最低投入的条件下，把大量劳动力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的能力”[②] 和攻坚能力，如：①20世纪30年代它为苏联工业化纲要任务的完成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修建了许多运河、铁路，建成了许多工业项目，流放的农民则开垦了许多新土地，还有许多被流放农民在煤炭、森林领域从业；②远北工程管理局开采的黄金为苏联政府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不可替代的外汇来源[③]；③工业化时期苏联的一些重要企业，如诺里尔斯克联合企业在自身建设和发挥职能作用的头20年期间，实际上全是靠强制劳动[④]发展起来的；④古拉格设计机构——特殊技术局使用强制劳动构成了强制劳动的特殊部分。古拉格特殊技术局的囚犯被用于解决那些用通常方式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特殊技术局的工作而加速了红军的现代化。据统计，卫国战争时期，设计和装备着由特殊技术局研制的发动机的飞机占苏联轰炸机的2/3。[⑤] 在1947～1948年苏联核方案实施的关键时期，古拉格强制劳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目前已解密的文献等资料来看，要想从历史文化视角比较清晰地展示出古拉格的全貌，至少需要把握住古拉格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古拉格成立之前身的机构演化阶段；第二，其成立之后的鼎盛时期；第三，走向衰亡阶段。要想展示出古拉格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至少需要数倍于本文的篇幅才行，因为古拉格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管理等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鉴于此原因，本文只侧重从经济层面展示了古拉格成立之前各个时期机构演化的政策理论依据和实践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只能让读者对古拉格有个阶段性的局

---

①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153.

②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280.

③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240.

④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236.

⑤ *Бородкин Л. И*, *Грегори П*, *Хлевнюк О. В.* (*отв. ред.*) Гулаг: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 *с*. 25.

部认识，而非全面认识。另外，第一阶段又是古拉格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不展示这个阶段的曲折演化历程，就无法充分理解其后两个阶段的必然发展结果。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丰富的材料支撑，充分揭示出古拉格成立前期所经历的曲折漫长发展历程，以便向读者展示“古拉格的前身究竟是什么样子”，从而达到让读者看到以后古拉格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发展结果时，能够不惊讶，能够做出：“这是古拉格整个历史演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种判断的认知目的。最后，由于目前我国与古拉格有关的汉语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仍处于完全空白状态，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文献，所以本文对古拉格问题的认知与研究就只能完全依靠外文资料了。由于笔者的外文水平有限，行文中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多多见谅。